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十四部书览要



前 言

研究毛泽东思想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如宏观研究，微观研究，考证或考据，诠释或发挥，对比研究，等等。宏观研究是从宏观上研究毛泽东思想体系，它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起源，它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这一体系内部各理论的相互关系和与现实的联系诸问题。微观研究是从微观上研究毛泽东的某一概念、观点、理论、思想的形成条件、演化过程，或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和对其他观点的影响等问题。考证或考据是借助搜集得来的可靠材料，对毛泽东的活动史迹，对纪录毛泽东生平、事业、思想的历史过程的文献进行认真考察，去伪存真。尤其是对毛泽东著作中一些线索不清或易致争议的文献，以确凿的证据去理清其写作背景、具体写作或修改以及发表过程，理清其继承鼎新关系，即它所受思想影响、它的理论流源、社会作用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有创新和贡献。诠释是对毛泽东著作进行注释、讲习或评价，是在学习、研读、理解原著的基础上对之作出合理的解释，这种研究不可避免地包括了诠释者本人的误解和发挥。对比研究是对毛泽东及其思想作比较研究，例如将毛泽东及其思想与历代或同代人物及其思想作比较研究，如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比较，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观点比较，与陈独秀、王明等人比较。通过比较，鉴其异同，观其优劣。此外，从修辞学或语言学角度进行研究也是一种方法，例如研究毛泽东对某些重要词汇的运用，它们在毛泽东著作中出现的频率及占有的重要地位；或研究毛泽东的语言风格和写作技巧等等。这些方法，被人们运用来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研究毛泽东思想时，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优势和作用，取得了各式各样的成果。可见，一定的研究方法适应于一定的研究领域，一定的研究成果总是和一定的研究方法及手段相联系。研究方法的更新必然导致研究领域的扩大，并有可能获得新的成果。本书对毛泽东 14 部书所作的研究，采用的是一种较少用的中观研究方法，即把毛泽东的每一部书，不管它是一卷本还是多卷本，都当作一个研究的整体对象来看待。通过阅读和理解，分析和综合，抽取出它的主要理论观点或核心思想，以达到把握其实质的目的。这种中观式的研究，介于宏观与微观研究之间并与之衔接。一方面。它虽然不是先要从整体上探讨毛泽东思想体系，但通过概括毛泽东每一部书的内容，非常有利于按照从部分到整体的秩序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全体。另一方面，它虽然不是运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却又须要研读大量文献，即通过研读业已出版的毛泽东所有文献去采摘毛泽东思想的精华，以一步一步地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殿堂。这种研究方法是一种近乎笨拙的方法，它付出的劳动与其成果成正比：读的愈多，所获愈多。这正如蜜蜂采花愈多、酿蜜愈多，采花与酿蜜成正比一样。故这种方法也是一种稳当的方法。如果连毛泽东的书都不去通读钻研，何谈对其思想进行研究？这不就像蜜蜂不采花而去酿蜜吗？

毛泽东十四部书览要

抡古今大要汇时代精华

从人类历史上看，毛泽东的书无疑是发行量最大、阅读者最多的书。从中国历史上看，毛泽东的书无疑是影响中国命运最深刻、影响人们思想最广泛的书。毛泽东的书，由他所留下的各种文字作品组成，体裁丰富，形式多样，主要包括专著，论文，负责编辑和主笔的报刊杂志的文章，会议报告或讲话，授课讲义，演讲纪录，谈话纪录，诗词等文学作品，为党的文件或重要报刊文章所作的修改和所加的按语，为私人作品所作的修改，学习笔记。读书笔记和读书批注，调查报告，工作建议，政策条文，文件批示，指示，命令，布告，通告，声明，照会，电文，公函，家书，祝词，题词以及书法作品等等。毛泽东的这些文字作品，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贡献了新的宝贵财富。建国以来，毛泽东的书已出版了 14 部。它们是：《毛泽东选集》（1—4 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1991 年新版，107.2 万字），《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53.9 万字），《毛泽东文集》（1—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63.9 万字），《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58.2 万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1993 年版，328.6 万字），《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21.2 万字），《毛泽东军事文集》（1—6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267.6 万字），《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 1983 年版，25 万字），《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42 万字），《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31.1 万字），《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30.8 万字），《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14.9 万字），《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增订版，12 万字），《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0.5 万字）。这 14 部书，总计字数有 1036.9 万。它们基本上分为两个著作系列：综论和专论。《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文集》、《毛泽东著作选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 5 部书属综合性著作，余下的 9 部书属分门别类的专论。认真阅读、研习这些书，对于从理论层面上把握毛泽东的各个重要理论观点及至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是至关重要的。打开书页，就像漫步在一个巨大的文化殿堂。那些内容丰富的思想理论，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教育、科学文化、文学艺术、新闻、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哲学、伦理等，一览无遗地展示在眼前。毛泽东的书，首先是一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百科全书。它曾经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逐步把中国引向强国之路。

毛泽东的著作中所提出的诸多理论都在各自的领域发生影响，而给人影响最深，社会功用最大者莫过于政治、军事、外交、哲学、道德等理论以及诗词作品。生逢在中国多难而巨变的时代，中国社会的政治革命成为毛泽东第一的和终生的任务。作为大革命家、大政治家，毛泽东在他的书中所大量阐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的理论和策略，武装着中国几代革命者，激励他们进行前赴后继的斗争。毛泽东提出并着手完

成的伟大政治革命任务业已成为社会现实，我们今天正生活在他所创设的社会政治体制中并都在为这一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完善而工作着。中国社会的政治革命是直接借助武装斗争完成的，所以在毛泽东的书中，其军事理论的重要性仅次于政治理论的重要性。毛泽东在漫长的军事生涯中造就了自己的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者、中国革命军队从弱小到强大，最终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一切反革命武装力量、夺取全国政权并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军事奇迹的理论，也是以劣势军备战胜入侵朝鲜的以美国军队为首的联合国军，创造世界历史上军事奇迹的理论。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仍为世人广泛地关注着。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进行社会建设时，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紧密相关的。尤其是当中国自近代以来已沦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外国侵略者时，需要正确地处置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这就产生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要义，是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与各民族国家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侵略和霸权主义。数十年来，在毛泽东这种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外交胜利，并以新的姿态活跃在世界外交舞台上。毛泽东教会了中国人民怎样去看待世界和革命，他的哲学的核心观念是对立统一、阶级斗争。这两个核心观念多年来已为人们所熟悉、所遵循。毛泽东更新了时代的道德风尚，树立革命的道德准则。这就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必须以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最高准则，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这种道德准则，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应当牢记和实践的。处于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的世界中，只有真正为人民服务才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由于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作为诗人革命家的毛泽东以诗言志、以诗描写和歌颂革命便构成他精神生活的另一个层面。毛泽东的诗词精妙绝伦、壮丽辉煌，令人百读而不厌。那豪迈的风格，苍凉的意境，奔放的气势，俊逸的情思，给人以不尽的享受，给人以精神力量。

毛泽东的书，是毛泽东这位一直站在时代前列、指导时代前进的伟人的心血的凝结，故从他的书中可以触摸到时代的脉搏。可以说，毛泽东的书是一部与中国社会革命实践相平行的革命思想史，其间汇集了整个革命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中国社会从近代向现代转变的漫长而又痛苦的道路中，毛泽东的书不断地给人以智慧、勇气、信心和方法。它告诉人们怎样去革命、去战斗，去抵抗外敌的入侵，去推翻国内的封建专制统治。它教会人们怎样以新的态度去从事新的生活，以怎样的毅力去克服面临的那些困难，以怎样的精神去开创自己的事业，以怎样的信念去迎接自己的未来。

毛泽东的书产生于自己的时代，但它义赋予该时代以一种新的精神动力。在这种意义上说，它超越了时代。作为集中反映时代精神的毛泽东著作，颇像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通道。许许多多的古今中外的优秀思想文化，都以中国革命实践为中介，在这条通道里得以重现、运转或重组。这条文化通道，是毛泽东用 5000 年前就已发明的方块汉字构造而成的。中国 5000 年的古文明在这里被转录为活的文化之流，同时世界文明中的诸多优秀成果也被浓缩和记录在他所使用的方块字中。换言之，这条由毛泽东著作所构成的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通道，由于它问时负载了中华民族乃至各文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故从它里面可以感触到强烈的现代气息，亦可以捕获到全部历史的信息。毛泽东的书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与世界文化息息相通，首先在于毛泽东曾熟读中国文史典籍，曾站在中国文明的制高点上接受西方文明

的典型代表马克思主义文化和现代科学文化。否则，他的书就不会成为一条贯通古今的宽阔文化通道。正因为尽抡古今大要，毛泽东的书才能汇时代精华。他的书不仅堪称我们时代的圣典，亦将成为未来时代的明镜。

对于毛泽东内容富博、像海洋一般宽阔的书，阅读起来的确下是一件轻松的事。因为阅读在这里不仅是字面的阅读，而是在与一位具有伟大精神人格的伟人对话，同时必须紧随着他广袤的思路和丰富的学识游弋在他所涉猎的各问知识领域。如果阅读者的视界与他的视界不能融合，阅读者的思想境界和知识结构以及情志结构不能与他的思想境界和知识结构以及情志结构一致，就谈不上真正的阅读。另外，与这种阅读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把这种阅读所得表述出来呢？这这就是一个从阅读到理解的问题。阅读者把自己的理解写出来，就需要根据毛泽东著作的内容。

毛泽东每部书的特点进行叙述、介绍。这同时要求阅读者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将这种叙述和介绍作有轻有重、详略得当的处理。一般说来，毛泽东的每一部书都有其特殊的重要价值。但具体比较而言，毛泽东的每一部书的价值并不是平列的。就其思想的丰富性而言，《毛泽东选集》无疑是第一重要的，这是毛泽东全部理论著作中的精华，是经过毛泽东本人精选编辑而成的，其文章内容涉及中国革命各领域，富具指导性。而就其文学价值而言，《毛泽东诗词选》最为重要，它代表了毛泽东的最高文学水准和最高文学成就，也最为毛泽东所钟爱。此外，《毛泽东早期文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都很重要，不过这种重要是对阅读研习者而言的，因为它们为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50年代以后的思想以及文学上学思想有特殊价值。但就其文献体裁看，这其中的一些书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的文献就比其他书中的文献就更需要有耐心去阅读，因为它们多是电文、指示、批示等，同时对它们的介绍也需要更为综合和精练。

根据毛泽东每部书各自的特色，对之加以有详有略而不是千篇一律的介绍是一种内在的要求。遵循这种要求，本书拟对《毛泽东选集》进行重点介绍，对其他的书则进行简介或重点介绍一些方面。由于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文献会被同时收编入各部书。本书对之介绍时就注意兼顾和关照。所取原则是，凡收编入《毛泽东选集》的文献，一般都优先介绍。《毛泽东选集》中未编入的文献，一般在专集中优先介绍。但为了兼顾也有例外。比如，毛泽东的全部重要军事文献都被收编入《毛泽东选集》，同时也都波收编入《毛泽东军事文集》。为了彼此关照，在《毛泽东选集》中对这些军事文献只简略介绍，在《毛泽东军事文集》中则对其加以重点研究。力求统筹兼顾，就有可能使重复介绍的现象尽量减少。不过本书这种重复介绍肯定是存在的，但这并不是本书的心愿。本书的心愿是，运用中观式的研究方法把毛泽东的 14 部书作为整体对象进行研究，力求在思想上有所获。

毛泽东在迟暮上年还在不断修改自己的诗作，可见他对其受之深切。1966年夏，邢台地震波及北京，正在毛泽东处值班的护士长拉起他就往屋外跑，可是毛泽东却迟疑下又返了回去，把案头的一个装有自己诗稿的牛皮纸袋拿了出来。护士长问他那么多好东西不拿，光拿个破纸袋子有什么用时，毛泽东说：“那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身无长物，只有这些诗稿属于我。”（《当代思潮》1990年第1期）从此事中可以看出他的诗词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一 文章经纶天下事旋转还凭革命功——《毛泽东选集》（1—4卷）览要

《毛泽东选集》无疑是毛泽东所有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这部著作不仅建国前就发行过几个版本，广为流传，建国后毛泽东本人曾亲自主持重新编辑，在国内统一出版发行，以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理论教材，同时还译成外文在国外发行，这足见它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和毛泽东全部著作中的重要性。

《毛泽东著作》1—4卷共选入了毛泽东自1925年12月至1949年9月这24年间写成的159篇文献（其中第1卷18篇，第2卷40篇，第3卷31篇，第4卷70篇）。这159篇文献，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进行有效指导过程中形成的理论硕果，同时也是对中国革命艰难曲折历程的真实纪录，它以理性之笔展示了一部中国革命史。通观这部选集，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在长达20余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各个历史时期发展演进的具体历程，可以看到构成毛泽东思想各个领域中的理论经过怎样的演化而达到成熟。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理论方面，政治，政策和策略，军事，经济，外交，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新闻，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哲学，伦理以及史学等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在这个思想体系中，政治是它的骨骼，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159篇文献中，属于政治类（包括政治策略及军政）的文献达121篇（其中第1卷11篇，第2卷35篇，第3卷20篇，第4卷55篇）之多，占总数的76%以上。这种情况表明毛泽东思想首先是一种政治学说。但中国社会的政治革命又总是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故军事文献在《毛泽东选集》中占第二位，总共有16篇。这些军事文献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以及抗日战争的战略和战术问题。相对而言，有关经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哲学、伦理，文化艺术以及外交等方面的文献数量要少一些，它们分别为7篇、8篇、2篇、2篇、2篇、1篇。不过，这些方面的文献数量虽少，但其内容却很重要，并且这些内容大都被毛泽东的政治学说和军事学说所渗透。正是由于这些内容与其他内容的有机结合，毛泽东思想方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

从历史发展阶段看，《毛泽东选集》各卷分别对应于大革命末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收入大革命后期的两篇文献，主要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确定革命目标，动力和对象，正确区分敌、我、友以巩固革命阵线；并指出农民阶级是推翻中国封建政权和外国侵略势力的根本力量，农民将会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锋。第一卷中收入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6篇文献，解决的是武装斗争，工农武装割据的政权建设，农村环境中党的建设，革命军队建设，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经济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还有调查研究，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本书未涉及《毛泽东选集》第5卷，是因为该卷是在毛泽东去世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编辑出版的。它收录了毛泽东1949年9月至1957年11月8年多时间里的70篇文献，其中46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全书32.5万字，开篇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末篇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由于该卷收入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若干文献，该卷的出版说明和注释的有些提法不符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精神，故它在80年代停售。1982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提交《关于停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请示报告》后，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同年4月10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通知新华书店总店，《毛泽东选集》第5卷停售，存书分批化浆处理。

以及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哲理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2卷和第3卷收入的文献，解决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全部政治和军事问题，如国共再度合作，结成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改革内政，实行民主抗日；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建设；领导方法；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经济政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它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与社会主义前途的关系；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方向；以及国际主义等等。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收入的文献，解决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部政治和军事问题，如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人的政治策略；同国民党作战的战略战术；土地改革；工商业政策；农村整党；军队整军；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军队纪律；建设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正确解释等。

从实践角度看，《毛泽东选集》中的每一篇文献都对中国革命发生过指导作用，都有它自身的特殊价值，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各个方面的理论学说，就是负载于这些文献不断地得以传递，不断地向前伸延展开、丰富发展、演化成熟的。这些文献铺设成一条长长的文化河床，供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之水在其中奔腾涌流。这种理论之水，时而在这处涌起思想浪花，时而在那一处突奔猛进，但它总是朝中国革命的大海这一总体目标奔流而去，并总是受中国社会的基地和中国革命实践所筑成的巨大河岸所制约。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之流毕竟已经固化为文字，我们今天要去把握它，须透过字面才能感觉和理认那曾经与生命和热血、理智与情志紧密相联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当然，我们决不可忘记，毛泽东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所著的文章都贯穿着革命意识。文章经纶天下事，旋转还凭革命功，这便是《毛泽东选集》的全部秘密。

第一卷

《毛泽东选集》第1卷编入的是毛泽东从1925年12月至1937年8月这11年又8个月时间内的重要著作，共18篇，由政治以及政治策略类、军事类、经济类、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类、哲学类等五个类别的内容组成。其中政治和政治策略类的篇目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二，11篇；军事类1篇；经济类、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哲学类各2篇。这些内容重要而又丰富的著作，从思想上理论上指导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全部重要革命活动，展示了毛泽东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和前期形成和发展的轨迹。它从一开始就表明，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实践性极强、具有指导性和内容丰富的思想体系。

对整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1卷仅收编了两篇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它们都是著名的政治著作。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12.1）是毛泽东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而写的，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中国革命力量不足，但不知道到农村去寻找力量，去发动农民阶级这个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则通过分析社会各阶级而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文章的开篇开宗明义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

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地主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中产阶级代表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对于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赞成反帝反军阀的革命，在革命威胁他们时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等都属其中，它主要与小生产经济相联系，在人数上和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并分为不同阶层。第一部分是有多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有点害怕革命，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他们人数较少，属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由于身受压迫和剥削，绝不反对革命。这些人人数众多，大概占了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种人在革命中颇要紧，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数量也不少。这三部分人在革命潮涨潮落之时，对待和参加革命的态度都不同。半无产阶级，包括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五种，他们是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都是小生产的经济，生活贫困，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极需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无产阶级，指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他们人数集中、经济地位低下，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极残酷的待遇，所以特别能战斗。此外还有数量不少的游民无产者，如引导得法，他们也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通过递次分析，毛泽东最后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要提防他们以免扰乱革命阵营。毛泽东的这种分析不仅为当时组成中国革命阵线提供了理论，也为他日后制定种种革命政策提供了根据。故可以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一部奠基性的作品。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3）是毛泽东为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是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结果。这篇文献表明毛泽东此时已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农民革命运动上。毛泽东在文中指出：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的农民运动，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真正革命的党派应站在前头领导他们，而不应站在后头批评他们或站在对面反对他们。毛泽东接着考察了农民运动的组织及其革命目标：农民打倒土豪劣绅，将一切权力归农会。这种农民运动“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不“过分”不行，矫在必须过正。农民是革命先锋，他们推翻了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挖倒了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在几个月内成就了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农民运动决不是什么“痞子运动”。毛泽东还具体考察了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政治上打击地主；经济上打击地主；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

至大夫的男权；普及政治宣传；农民诸禁；清匪；废苛捐；文化运动；合作社运动；修道路，修塘坝等。毛泽东认为这十四件事就其革命意义说来，哪一件都是好的。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献里面，有9篇属于政治类，其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特别重要，阐明的是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10.5）是毛泽东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它主要是通过分析国内的政治状况以指明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毛泽东认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小块红色政权区域长期地存在，其条件是：第一，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白色政权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第二，红色政权存在的地方经过了民主革命的影响；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发展的；第四，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第五，有共产党组织的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此外，毛泽东论述了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在湘鄂赣三行的地位、经济问题、军事根据地问题以及割据过程中的军事挫折问题。

《井冈山的斗争》（1928.11.25）是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在其中进一步阐述了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环境下，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的其他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毛泽东具体报告了湘赣边界割据的起源和现势、军事、土地、政权、党的组织、革命性质和割据地区诸问题。他指出，边界特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其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险政策，等等。在确定革命性质时，毛泽东认为中国处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它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他还认为，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此外，毛泽东还报告了“支部建立在连上”这一军队党的建设的重要问题。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1.5）原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批评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的悲观估计时，亦阐述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主客观条件。他指出，要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不能靠流动游击，只能靠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毛泽东还根据江西的具体条件作出了首先争取江西的战略，并盼望中国革命高潮的尽快到来。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12）是毛泽东为红四军党的九大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它的特殊意义是通过总结自建军以来两年多时间的经验和纠正党内的种种错误思想，为红军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为在农村环境中如何建党指明了方向。毛泽东指出，红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若不彻底纠正，则担负不起中国革命所赋予的任务。毛泽东认为这些错误思想主要有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等。单纯

军事观点的表现是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以为红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极端民主化是要求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非组织观点表现为少数不服从多数和非组织的批评；绝对平均主义是一切要求平均；主观主义是对政治的主观分析和对工作的主观指导，结果便是机会主义或盲动主义；个人主义包括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等；流寇主义是只想流动游击，盲动主义残余则表现为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等等。毛泽东指出了这些错误思想的根源，如政治水平低，雇佣军队的思想等，这归根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或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他还提出了纠正的方法；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指出绝对平均只是一种幻想；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 and 党内的生活政治化、科学化；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执行纪律要得当：肃清流寇主义，加紧教育俘虏；从思想上制度上纠正盲动的行为等等。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10）是毛泽东为正确划分农村阶级成分、解决土地问题而写的一个文件，政策性极强，它对社会各阶级的划分都制定了标准。如地主是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富农一般占有土地、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其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其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一般不剥削别人并受别人小部分剥削。一部分富裕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整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整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工人（雇农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的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毛泽东写的这份文件，不仅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划分阶级提供了指导，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全国性的土地改革提供了指导，是一份纲领性文件。

土地革命后期4篇政治类的文献都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关，它们都是毛泽东在陕北根据地写成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12.27）是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其中心点是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根据日本已侵占中国东北、要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从而引起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指出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他认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党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鉴于帝国主义的力量暂时大于革命力量，为要打倒敌人，就要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红军具有决定性的领导作用。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共和国应改变为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不但代表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民族的利益，其基本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反对封建主义，但不是反对资本主义。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可能参加的民族资产阶级。至于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此外，国际的援助，是中国抗日战

争和中国革命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5.3）是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它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政策具体化了。毛泽东指出：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 1935 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尖锐引起国内矛盾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问题，其政党内部逐渐改变政治态度，全国人民大众和共产党更是大规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斗争，因此，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从而也开始了中国革命新时期。新时期的任务是争取民主以达到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所以中国应进行两方面的民主改革：将国民党一党派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共产党保证下列四项：（1）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共产党愿为三民主义、愿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愿为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实现这种转变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干部，并且首先把抗日根据地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当然，在为民主共和国奋斗时应该力争社会主义的前途。《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5.8）是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在该结论中，毛泽东强调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任务，认为民主与抗日、和平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对于革命的前途，毛泽东更是关注，他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比做上下两篇文章，认为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共产党员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毛泽东还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大批好干部，要用民主集中制把全党团结起来，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另外，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1936.12.28）这篇政论性文章中，毛泽东对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发表的《对张杨的训词》进行了评析，目的是推动蒋氏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毛泽东称：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12）是第一卷中唯一的一篇军事文献。它是毛泽东对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军事实践全面总结的产物，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主要论述了研究战争的方法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在论述如何研究战争时，毛泽东首先揭示了战争的起源、本质和目的。战争是从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故应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把它消灭，其方法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人类社会进步到了消灭阶级和国家，就什么战争都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毛泽东指出，应当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更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各有其特点，故研究它们应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毛泽东认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战争规律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的行动，军事家就能在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客观物质条件上导演出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毛泽东进而揭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的特点。这种特点主要有四个：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也规定了“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因此，红军的战略原则是积极防御，一般是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实行战略退却以利战略反攻，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和歼灭战。战略退却就是“诱敌深入”，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它应取得下列有利条件如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有利作战的阵地；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使敌人疲劳沮丧和发生过失等。开始反攻时，应注意初战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和下一战略阶段。要安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因此它力戒军事平均主义、阵地战、战役和战斗的持久战、消耗战和击溃战。毛泽东的这部著作是他的第一部军事名著，堪称军事著作的典范，它表明一个崭新的军事思想体系已经构成，它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以后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济类的两篇文章是《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8.12）和《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4.1），其内容具有明显的战时经济的特点。前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毛泽东在其中指出：为着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农联盟和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毛泽东批评许多人不明瞭经济建设工作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或有离开战争进行经济建设的错误想法，认为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毛泽东还认为，经济工作应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应组织动员群众，应有大量的工作干部去领导各方面的工作。后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一部分，重点除强调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外，还强调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毛泽东认为，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合作社。发展农业要注意解决各种困难，对某些重要农产品要有生产计划，要组织好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还应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发展工商业尤其是国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

业，应有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要确切地计算原料的生产，计算到敌区和我区的销场。要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要提倡和奖励依法经营的私人经济，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解决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政府工作应注意反贪污和浪费，等等。这两篇文献中的经济思想，对毛泽东经济思想在以后的发展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反对本本主义》（1930.5）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1.27）的价值在于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写作目的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在文中反复强调这么一些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以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正是从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出发，毛泽东大声疾呼，要反对本本主义，不要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心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共产党的正确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从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要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根本丢掉保守路线，遵循一条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以达到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斗争目的。同时，毛泽东还介绍了一些调查的技术，如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请适量的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参加调查会，要定调查提纲，要亲自出马，要深入地方，要自己做记录，等等。《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早的阐明，它对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结论的一部分，毛泽东主要讲了两个问题。关于群众生活问题，毛泽东把它与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联系起来，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因此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这样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就形成真正的铜墙铁壁，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夺取全中国。关于工作方法问题，毛泽东认为它严重地摆在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面前。领导者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就像过河要解决桥和船一样。不解决方法问题，任何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第1卷一个引人注目的部分是编入了两篇哲学名著《实践论》、《矛盾论》，它们原是毛泽东在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时所撰写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章节。《实践论》（1937.7）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及经验主义错误而写的，它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毛泽东是以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为轴心来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的。他论述了实践的基本形式及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认识的真理性问题以及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问题，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即改造人的认识能力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等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认识发展的动力，也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从实践到认识，即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即用理性认识能动地指导社会实

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此种形式，循环往复，其内容愈来愈丰富，认识一次比一次深刻。毛泽东进而揭露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特征及其根源，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思想落后于客观情况的发展，“左”倾机会主义是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其根本原因都在于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真理。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是：无数相对真理性认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的体系。要认识和把握发展着的真理，关键是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最后从世界发展史角度阐明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责任，阐明了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双重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即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矛盾论》（1937.8）作为《实践论》的姊妹篇，其重点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观点去清算教条主义。它系统阐述了两种发展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问题，较好发挥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思想。毛泽东指出，辩证的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不同，它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根据对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的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这需要把握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矛盾普遍性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并且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而矛盾特殊性则有这么几种情形：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都带有特殊性。在矛盾特殊性中，应注意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其中主要的矛盾影响和规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同时，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因此，把握矛盾时应捉住主要矛盾及矛盾主要方面，以促成事物的新陈代谢。在阐述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时，毛泽东展开发挥了列宁的思想，他指出矛盾同一性是说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双方，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而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并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矛盾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是指矛盾贯穿于事物过程的始终。矛盾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矛盾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到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认为它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毛泽东在最后总结说：事物矛盾的法则，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根本法则，懂得了它，就能够击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

第二卷

《毛泽东选集》第2卷编入的是毛泽东从1937年7月至1941年5月近4年时间内的著作，共40篇，由政治类、军事类、思想品德修养这三大类构成。其中政治类的篇目占绝大多数，35篇，是总数的八分之七；军事类3篇；思想品德修养类2篇。这些著作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前期的重大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展示了毛泽东思想日趋成熟的程度。

第2卷中政治类文献之所以占绝大多数，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艰难卓绝之故。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交织而形成的错综复杂的政治斗

争，使得毛泽东在处置这种政治斗争时表现出高超的斗争艺术并造就了成熟的政治思想。从这一时期的文献内容看，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及其党自身的建设，根据地政权建设以及党的各种政策等。

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是贯穿这一时期的根本性策略。它在抗战初期表现为促成国共合作，在 1939 年以后则表现为克服统一战线内部的投降活动，打击顽固派，以维护统一战线的团结。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日的胜利，毛泽东写下了一系列号召全国人民抗日、并与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7.23）是第二卷中的第一篇文章，毛泽东在文中提出了一条与蒋介石路线不同的共产党路线：这就是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并实行抗日救国八大纲领：全国军队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抗日的外交，改良人民生活，进行国防教育，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毛泽东认为只有实行这一种方针和办法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7.8.25）这一宣传提纲中，毛泽东将八大纲领扩充整补为十大纲领，即在八大纲领前面增加了一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新增第九条“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将第八条删改移植为第十条“抗日的民族团结”，还具体阐述了各条的内容。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9.29）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这十大纲领。他首先回顾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历史进程，指出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成立，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但统一战线还需要发展，它应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它应正式公布一个共同纲领，像一条绳索把一切加入统一战线的团体和个人都紧紧地约束起来，建立革命秩序以代替国民党的统制政策。毛泽东认为，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就需要国共两党亲密地团结，并改造政府和军队。

同以上几篇文献相比，《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10.25）内容比较丰富。它除了涉及统一战线外，还论述了军事战略战术、民主政治等方面。在该文中，毛泽东通过总结抗战的经验，指出须将现政府改造成为一个有人民代表参加的统一战线的政府，这个政府实行民主集中制，允许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并实行共产党提出的十大纲领。实现这种新的政治制度，关键在于国共两党的合作，并且克服抗日战争中的投降主义。毛泽东在该文中还论及了八路军的战略战术等问题，指出八路军主要是采取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在敌军侧翼和后方作战。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原则有三个：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等。

《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 11.12）是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提纲，其重心是反对投降主义。毛泽东指出，目前形势是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在党内，反对阶级投降主义，以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以共产党吸引国民党，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上来。在全国，反对民族投降主义，谨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

团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引导中国去适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使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11.5）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扩大全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主要是在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问题上驳斥王明的意见。毛泽东认为，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应把让步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抗日的民族斗争，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但只有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和独立自主，这才有利于合作，否则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因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同时，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也是做不到的。正确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即既统一，又独立。《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1938.5.15）是一份具有布告的特殊内容的文献，但它也贯穿反对阶级投降主义的立场。毛泽东这一布告中，主张保护人民既得利益，推动有利抗日救国的事业，制止一切阴谋破坏之行为，严惩肆意捣乱分子。布告表明，官所持的立场与中共党内一部分人对敌阴谋活动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是完全不同的。

1938年底汪精卫公开投敌之后，反对投降活动以及打退反共浪潮，以下使统一战线破裂，遂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文献有不少都与解决这一政治任务相关。《反对投降活动》（1939, 6.30）一文阐述的内容就是如此，毛泽东在该文中批驳了投降派的反共欺骗宣传，以及寄希望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止步和 international 的压力等错误。他宣称：共产党人始终站在主战派方面，愿和全国一切爱国党派和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抗战到底，收复一切失地。毛泽东认为，由于日本诱降政策的加紧执行，投降的可能就成了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因而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必须制裁反动派》（1939.8.1）是毛泽东在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的演说。毛泽东在演说中首先指责了反动派杀死抗日分子的罪恶行径，进而提出了中国应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的主张。他认为国民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是反动的，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而不利于抗战和团结，因此它应该被取消。只有制裁投降派、反动派，才能保护一切抗日的同志。《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1939.9.16）的内容包括民主政治和统一战线两个方面。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在相持阶段到来之际，应该快点实行民主政治，国共两党应该团结互助。如果国民党中的一些人闹磨擦欺人太甚，共产党的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当然，共产党员不应超过自卫原则，大敌当前，国共两党一定要长期合作，避免分裂。《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1939.10.10）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它结合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的国际新形势，分析日本的侵华政策已变为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其政治进攻就是着重分化抗日统一战线，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因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对此，毛泽东重申“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提出要准备反攻力量。他强调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共产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突然事变以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

《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1940.1.28）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它亦是通过分析国内国际存在着的困难条件和许多有利于继续抗战的因素，把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作为党的政治的总方针，并具体提出了反汪（精卫）运动的各项措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1940.2.1）和《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1940.2.1），是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的讲演和为大会起草的通电。讲演指明声讨卖国贼汪精卫，是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投降派要投降，反共顽固派要分裂和倒退，共产党则要抗战、团结和进步。只有进步才能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抗日，只有进步、团结、抗日才能统一。通电则是毛泽东“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起见，谨陈救国大计十端”。这十端是：全国讨汪；加紧团结；厉行宪政；制止磨擦；保护青年；援助前线；取缔特务机关；取缔贪官污吏；实行《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1940.2.7）是一篇短文，毛泽东在文中强调的仍是抗战、团结、进步这三位一体的方针。他提出要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利。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3.6）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心是讲政权建设问题。毛泽东指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是赞成抗日和民主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反动派的专政。它的人员分配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它的选举政策是普选制，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施政方针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3.11）是毛泽东在延安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它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作了系统阐述。通过分析国内国外的政治形势，毛泽东提出了以斗争求团结，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他指出，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推动全国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这就需要尊重他们的利益。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势力中的抗日派，因为他们在抗日的同时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但对顽固派斗争须注意三原则：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这样做利于孤立顽固派，团结中间派和进步派。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政权的问题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的主张，认为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三三制”政权，实行普遍选举政策和民主集中制，其施政方针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汉奸和反动派，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为基本出发点。同时，争取一切进步的分子于共产党影响之下，是一个必要的重大政策，此外，在宣传上应宣传国共两党的共同纲领，唤起民众，一致抗日、实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1940.5.4）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主张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针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政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克服投降危险，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团结到底》（1940.7.5）是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写的文章，毛泽东在文章中重申了团结抗战政

策：为了团结，必须坚决反对投降派，在自卫立场上坚决打退反共分子的进攻。在政治上，主张“三三制”的统一战线政权。在军事上，对不闹军事磨擦的友军采取友好态度，“不在一切友军中发展党的组织”。在财政、经济、文化、教育、锄奸等问题上，都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政策思想到 1940 年底已趋成熟。在《论政策》（1940.12.25）这一指示中，毛泽东对统一战线政策作了系统论述，具体指出了十个方面：（一）一切抗日的人民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四）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五）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是一方面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采取荫蔽精干的政策，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六）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七）对于顽固派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其尚能抗日者都加以联合，对其坚决反共者加以孤立。（八）对于汉奸亲日派也以两面政策对待之，对其亲日的方面加以打击和孤立，对其动摇方面加以拉拢和争取，但应将这种人与汪精卫等汉奸相区别。（九）对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亲日派和亲英美派加以区别，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两面派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加以区别。（十）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相区别，以利用矛盾，争取外援。与这十条政策相对应，毛泽东还综合地指出了各项具体政策。诸如，关于政权组织，必须坚决地执行“三三制”；关于劳动政策，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关于土地政策，应广泛规定地主实行适度减租减息，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关于税收政策，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关于锄奸政策，应坚决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反共分子，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关于人民权利，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关于经济政策，应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关于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关于军事政策，应尽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对于国民党军队，应继续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尽量地发展交朋友的工作。毛泽东指出，以上所述各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和根据这些原则规定的许多具体政策，全党必须坚决地实行。

第 2 卷中编入的皖南事变后的 3 篇文献，反映了毛泽东对皖南事变的态度以及怎样处置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策略。在《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1941.1.20）中，毛泽东一面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一面揭露亲日派破坏抗日、发动内战的滔天罪行。他列举了日本和亲日派整个阴谋计划的大纲，谓皖南事变不过是一系列事变的开始而已。但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毛泽东警告反动派应悬崖勒马，停止挑衅。《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1941.3.18）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5.8）都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前一指示指出，第二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了最高峰，由于蒋介石依然和日寇对立，就需要与我党暂时的缓

和。而这次斗争降低了国民党地位提高了共产党地位，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我党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但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在后一指示中，毛泽东对皖南事变后的教训作了全面总结。他指出：（1）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2）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抗日和反共的两面性，对我党依然是一打一拉，不愿合作最后破裂。（3）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4）应将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相区别，将反动大地主与开明绅士相区别，以作为反对顽固派、争取中间派的理论根据。（5）不应将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发生动摇，以对国内阶级关系作错误估计。（6）充分地准备对付国民党的破裂，但争取不破裂。（7）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8）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从以上可以看出，第二卷中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策略的 23 篇文献，展示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发展成熟的过程。

第 2 卷的政治类文献中，有 4 篇属经典性名篇，它们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10.10）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扩大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使全党同志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内容相当丰富，实质上涉及到党自身建设的各方面问题。毛泽东指出，为着一个光明的中国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有步骤地同日寇作长期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抗日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为保卫祖国而战打败了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这种爱国主义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因此，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一致的模范。在对友党友军的关系中，应坚持统一抗战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成为廉洁无私的模范；在民众运动中，应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又应是学习的模范，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毛泽东接着指出，共产党员必须提高对于民族奸细分子的政治警觉性，扩大共产党时应防止奸细混入。在坚持统一战线的同时坚持党的独立性，善于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毛泽东还说，党的干部政策是“任人唯贤”，即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党的纪律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毛泽东把扩大党内民主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认为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懂得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通过回顾党十七年来的历史，认为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了。而当前的两条路线斗争是从政治上反对有的悲观主义和反对“左”的急性病。共产党员要加强对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但

学习马列主义应端正态度，应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当作教条，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列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不但应当了解马、恩、列、斯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马列主义的伟大力量，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共产党员要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列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列主义。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列主义，是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废止洋八股和教条主义，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10.4）也主要是一篇关于党的建设的文献，它表明毛泽东当时在思考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通过回顾党的历史，并结合中国革命的特点指出，党的失败和胜利，都同能否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有关。正确处理了，党就发展。未正确处理，党就后退。所以，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也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毛泽东指出，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已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这三个阶段。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二重性，党在统一战线中对它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治路线。十八年的历史证明，不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不问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关于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北伐战争阶段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土地革命战争阶段已建立了独立的武装并学会了独立的战争艺术，抗日战争阶段能够运用武装斗争形式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经验。离开这种武装斗争，就不能了解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党的建设也同样有三个阶段的特点。第一阶段是党的幼年时期，党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了解，以致在紧要关头受资产阶级的欺骗，使革命遭到失败。第二阶段党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更多地了解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因而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但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党的正确路线没有贯穿始终。第三阶段党凭借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经验，凭借党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凭借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很高的政治信仰，凭借党对于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更加深刻的理解，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已经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十八年的经验表明，党的组织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12）是一篇系统研究中国革命及其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文献，尽管原定的第3章《党的建设》未能完成，但它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教育作用是巨大的。该文献由“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两章组成。“中国社会”章概述了中国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民族构成和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专门剖析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历代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作用。它指出，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农民起义的结果打击了封建统治，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该章还回顾了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程：帝国主义列强举行多次侵华战争，强迫中国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并把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

家的势力范围。他们控制了在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垄断中国的经济、金融和财政，并依靠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间接统治中国。在军事上干拢中国，同时推行文化侵略政策。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更使中国的大块土地沦为殖民地。该章进而分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依旧保持着。并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优势。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力量是软弱的。皇帝的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使中国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中国的地广土大，经济，政治的发展极端不平衡。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使中国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中国革命”章中，毛泽东重点研究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他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们的力量异常强大，对他们应着重采取武装斗争形式。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这两大革命任务是互相关联的。毛泽东接着通过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明确了革命的动力问题。他说，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贫农等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应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依靠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些可靠的同盟军，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去夺取革命的胜利。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它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它是一种新式的特殊的民主主义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国际上它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在国内它坚决地反对买办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这种革命虽然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因此，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这样，中国革命包含着两重任务，即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完成前一革命并准备在一切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

《新民主主义论》（1940，1）是毛泽东系统而又详细论述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名著，它全面发挥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首先，毛泽东确立了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建立一个新中国的目标，这就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形成的，它已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愿意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故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就不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属于新的范畴，属于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其革命的性质虽然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它是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因此它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它为帝国主义所反对，却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援助，因此它就不能不变成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进而具体论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他指出，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责任已经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与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相区别。也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其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其政体是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不禁止“不能操纵同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它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但允许富农经济存在。由此而出发，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道路走不通，因为国际国内环境不许这样做。毛泽东也驳斥了“左”倾空谈主义，认为中国不能直接进到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只能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决不能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或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毛泽东还驳斥了资产阶级顽固派鼓吹“一个主义”、“收起”共产主义的叫喊，说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为了说清问题，毛泽东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两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基本政纲，即新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相同。但是，两者还有许多不同部分，如共产主义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和彻底的土地纲领；在民主革命阶段外还有社会主义革命阶级，在最低纲领之外还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高纲领；三民主义的宇宙观是民生史观，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共产主义有革命彻底性。同时，毛泽东还比较了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指出只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相同。在最后，毛泽东着重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其形成经历了“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两个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有这种性质。但这种文化不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打退了。“五四”以后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则不然，它以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它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都有了极大的发展，简直是所向无敌。这种新文化已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它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毛泽东接着较详细地分析了这种革命新文化发展的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

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旗帜。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二个时期是 1921 年共产党成立到 1927 年北伐战争。这时新三民主义已发展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已被推广到全中国一部分教育界、学术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之中。同时，它除宣传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外，还宣传反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军队，掀起了农民革命斗争。第三个时期是 1927 年大革命末期到 1937 年的新的革命时期。这是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并行时期，但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是 1935 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第四个时期是抗日时期，其主要任务是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作斗争。毛泽东指出，应当克服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但在现阶段整个国民文化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新文化作为世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同盟军，也是以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的。在现时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但须把这种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应该大量吸收外国进步文化，但不可“全盘西化”；应该批判继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以利向前发展；应该教育人民大众，指导革命的实践运动。

第 2 卷中另外 8 篇政治类的短文主要涉及国际局势、知识分子、工人阶级、新民主主义的宪政问题。《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1939.9.1）和《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1939.9.28）是两篇时论。前文指出，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是苏联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迫在眉睫之际，它增加了苏联帮助世界和平运动的可能，增加了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可能，中国应好好准备反攻的力量。后文主要阐明这样一种观点：苏联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和平政策，这是与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联系着的。苏联决不会参加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而积极地援助正义的、谋解放的战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之后的整个形势，大大地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1939.12.20）是一篇生日祝词，毛泽东在祝词中称只有社会主义苏联才真正援助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五四运动》（1939.5.1）、《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5.4）和《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12.1）主要论述的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只有唤起民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才能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所以知识分子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组织起来。当然，几百万知识分子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人民群众。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工人〉发刊词》（1940.2.7）这篇短文主要说明，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了全国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团结人民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是它的任务。《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2.20）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它阐明这么一个主题：中国人民需要独立和民主，需要破坏帝国主

义和封建主义。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反动派的专政，就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和自由。事情虽然困难，却是大有希望。

第2卷编入了毛泽东3部军事名著，它们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5）这一文献总共有九章，论述的是抗日游击战争具有战略重要性，它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指明了正确道路。毛泽东首先指出，辅助正规战争的游击战争具有战略意义，是因为它发生在中国这么一个大而弱的国家。敌人占地甚广而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下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于是一整套战略问题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也使得根据地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也发生了。于是游击战争从战术范围跑出来向战略敲门。毛泽东接着论述了游击战争的六个战略问题：（1）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由于日本是强国，是进攻的，是外线作战；中国是弱国，是防御的，是内线作战，因而决定了中国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然而敌军数量不多，又是异族入侵，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战略方针：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游击战和正规战所共有的战略方针。游击战是无后方作战，需要主动件、灵活性、计划性，需要因敌情变化的不同采用分散、集中和变换的方法。（2）和正规战争相配合。游击战争配合正规战争有三种：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斗的。在敌后起削弱、钳制等作用，是战略上的配合；在各战役和战斗中负担其作战任务，是战役和战斗上的配合。（3）建立根据地。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战略基地，它主要有山地、平地、河湖港汊三种。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是有抗日武装部队，并使用它去战胜敌人，发动民众。（4）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在敌人数量围攻时，游击战争的防御方针是反围攻，在内线作战采取袭击战法，还叮使用次要力量于外线“围魏救赵”。战略进攻时是计划地消灭和驱逐游击队力能胜任的小敌和汉奸武装，扩大我之占领地区。（5）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使游击队在锻炼中逐渐变成正规部队，作战方式也逐渐正规化，游击战就变成运动战了。（6）指挥关系。游击战争的指挥方法，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

《论持久战》（1938.5.）是毛泽东论述抗日战争的一部最为有名的著作，总共分120节。前58节大体上说持久战“是什么”，后62节大体上说持久战应“怎样做”。在前半部分，毛泽东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根据，分析了中日战争双方的特点：在日本方面，它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其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同时又是在国度小、人力物力有限这种先天不足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得到国际的反对；在中国方面，它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其战争是进步的，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又得到国际的广大援助。中日双方的这些特点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因此，中国不应当妥协而应当坚持持久抗战。中国的持久抗战将经历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战争形态是犬牙交错，表现为内线和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等等。同时，抗日持久战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也呈犬牙交错的奇观。这场战争是中华民族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它不但影响中日两国，而且将影响到世界，

推动各国尤其是被压迫民族的进步。全体中国人民将投身这场神圣的、正义的、进步的、求和平的战争，一齐努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创造自由平等的中国，为争取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在下半部分论述怎样进行抗日战争时，毛泽东具体说明了 11 个问题，它们是（1）能动性在战争中。抗日战争必须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必须提倡每个指挥员勇敢而明智，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2）战争和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抗战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它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但战争有其特殊性，不等于一般的政治，参加战争的人们必须习惯它。（3）抗日的政治动员。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使几万万人民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4）战争的目的。战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则都基于此目的。（5）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在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6）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主动性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需要靠正确的主观指导去取得；灵活性是指灵活地使用兵力，“审时度势”，“运用之妙”。计划性对战争的胜利很重要，它依战争的情况确定和改变。（7）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运动战是正规兵团从事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特点是有优势兵力，呈进攻性和流动性。游击战是正规战的辅助，在战略相持阶段会上升为八路军的主要斗争形式。阵地战主要用于防御和进攻，在中国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一般都不能执行。（8）消耗战，歼灭战。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消耗战和歼灭战的统一，用歼灭达到消耗。但战役消耗也可达到战略消耗的目的，游击战同时执行消耗和歼灭任务。（9）乘敌之隙的可能性。应利用和努力制造敌之指挥错误，以供我之利用。（10）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进行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的决战，根本避免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11）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全中国民众组织起来，军队和民众打成一片，并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三大原则，我们的军队就无敌于天下，就能打败日本，争取最后胜利。总之，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完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完成，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兴起；中国的抗战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潮，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11.6）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结论的一部分，目的是说明战争和战略问题处于中国革命的首位。毛泽东首先分析了中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的关系，他指出，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无议会可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因此，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民众组织和斗争也都是为着战争的。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毛泽东接着回顾了国共两党各自的战争史，说明了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他指出，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各可分为前后两个战略时期，共存在着三个战略转变，即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国内正规战争

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毛泽东进而简略考察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强调如果没有游击战争，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因此，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力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这非常重要和必要，它有诸多利益，如缩小敌军的占领地，扩大我军的占领地；在防御阶段配合正面作战，拖住敌人；在相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利于正面整军；在反攻阶段配合正面，恢复失地；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发展共产党、发展民众运动、建立抗日的民主政权等等。正因为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所以毛泽东号召全党注意于军事问题的研究。

第2卷中还收编了两篇思想品德修养类的文献：《反对自由主义》和《纪念白求恩》。《反对自由主义》（1937.9.7）的宗旨是主张积极思想斗争，以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它列举了自由主义十余种表现，如与熟人、朋友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不负责任的、无组织的背后批评；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搞个人攻击，泄私愤；听了不正确的话也不争辩；不关心群众，不宣传群众；办事不认真；摆资格，工作随便，学习松懈；不改正错误等等。毛泽东认为，自由主义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因此，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都应反对它。《纪念白求恩》（1939.12.21）意在提倡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精神。它纪念来中国援助抗战而以身殉职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时，称赞白求恩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是一种国际主义的精神和共产主义的精神。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表现在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他是个医生，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这对于鄙薄技术工作的人是一个极好的教训。毛泽东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他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低级趣味，有益于人民的人。

第三卷

《毛泽东选集》第3卷编入的是毛泽东从1941年3月至1945年8月这4年又5个月时间内的重要著作，共31篇，另附录一篇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按其内容，这31篇著作由政治和政策类、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类、经济类、文比和文艺类构成。其中政治和政策类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二，20篇；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类5篇；经济类4篇；文化和文艺类最少，2篇。这些著作，表明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后期的丰富多样性和更加成熟。

政治和政策类的20篇著作，多是结合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为解决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国内的政治任务提供科学的分析或思想上的

第3卷中有些著作的内存具有多样性，例如，《〈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其序言谈调查研究的方法，跋则主要讲政策问题；又如《组织起来》和《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是谈经济政策，但中间涉及方法问题；再如《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既谈文化，又谈策略。为了概述的方便就只能将这些著作放至某一类别中，如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放至方法类，将《组织起来》等放至经济类，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放至文化类。

指导。40年代初期的《揭破远东慕尼克的阴谋》等4篇，在分析、评论国际形势时密切联系到中国的政治情形。《揭破远东慕尼克的阴谋》（1941.5.25）一文主要是揭露日美蒋之间酝酿造成反共、反苏局面以及日美妥协，牺牲中国的阴谋。《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1941.6.23）是号召全世界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法西斯而斗争，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坚持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42.10.12）主要是评论苏胜德败的斯大林格勒之战，是希特勒灭亡的决定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希特勒大势已去，遇着了苏联、英美及在其占领区的老百姓这三个强大的敌人。这一形势直接影响到远东，日本法西斯也将跨进墓门。

《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1942.11.6）是赞颂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法西斯势力必归于消灭。

《质问国民党》等3篇的内容主要是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政策。《质问国民党》（1943.7.12）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其内容是指责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责其撤退准备进攻边区的军队，取缔特务组织，惩办汉奸，呼吁他们与共产党合作到底，共同挽救民族于危亡。《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1943.10.5）的主要内容是分析国民党人的三种政治方向。一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乃至投降日本；二是以“准备实行宪政”的骗人空话为准备打内战和下放弃独裁统治争取时间；三是公平合理地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实行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但条件还不具备。该文号召，一切抗日党派和人民应团结起来，要求国民党走第三个方向。《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1944.10.11）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它谓蒋介石的演说空洞无物，没有答复人民所关切的任何问题。蒋氏没有政治改革的意图和抗敌的本领，否认中国将有反共内战，因而他的演说又充满了危险性。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11.6）是一篇阐述共产党现行政策的文献，毛泽东在其中指出，共产党主张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共产党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使全国人民有人身自由权，参与政治权和保护财产权。毛泽东在文中还勉励共产党员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免除关门主义作风，联系人民群众，并接受人民的监督，真心实意把国事办好。《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942.9.7）和《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1943.10.1）两篇文献是对具体政策的解释。在前文中，毛泽东指出全党应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以利克服极端的物质困难。精兵简政、机构缩小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就变成了孙行者和小老虎，就有办法对付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在后文中，毛泽东作出了三个具体指示：（1）秋收已到，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2）各根据地干部应学会推动党政机关人员、军队人员和人民群众实行大规模的生产；（3）举行一项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学习和时局》（1944.4.12）及其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4.20）是第三卷政治类文献中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它是总结党内两条政治路线问题和党的历史经验，克服党内种种错误思想和行为的纪录，标志着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已达到一致。《学习和时局》的重要性在于毛泽东在这篇文献中作出了这么几个结论：（一）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应弄清思想问题，对犯错误的同志应取宽大方针，并使避

免重犯错误，有利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二）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既应指出其政治、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主要的都错了，也应看到犯错误的同志是主张土地革命的。（三）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正确，但缺点是未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四）临时中央及其召开的五中全会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五）党内宗派曾起过不良作用，但目前只剩下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残余；目前党内重点应克服山头主义倾向。毛泽东还分析了时局的两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巨人民势力的衰落。他具体回顾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中国人民势力增长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认为在从1937年7月起至现在止的七年时间内，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种情况，党应准备担负起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要把日寇赶出去，解放全中国。为了争取新的胜利，党的干部应“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即使精神获得解放，学会善于思索。附录的党的六届七中扩大全会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4.20）这篇极其重要的文献，是记载中国共产党的完全成熟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思想地位的确立的历史界碑。它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等。由于坚持了正确路线，党在与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中达到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并使解放区形成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决议回顾了党的奋斗历史，回顾了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首的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历史。它清算了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内容：在政治上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低估军事斗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在策略上不知道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在军事上把红军的任务缩小为单纯打仗，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在作战上否认敌强我弱的前提，否定游击战和半游击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对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思想上是教条主义，把马列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而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教条主义以经验主义为帮手，流毒全党。决议还分析了“左”倾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它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决议更从正面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容：在政治上，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武装斗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武装斗争需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并运用“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建立一支执行党的斗争任务的军队，做到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位一体，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军队内部建立正确的官兵关系，采用一系列的

战略战术原则以战胜敌人。在组织上，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党的建设的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在思想上，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总而言之，毛泽东为全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这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两个中国之命运》（1945.4.23）、《论联合政府》（1945.4.24）和《愚公移山》（1945.6.11）这三篇文献，分别为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开幕词、政治报告和闭幕词。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党的七大的政治路线。《两个中国之命运》主要分析了光明的中国之命运战胜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的现实条件：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解放区，全国人民的援助和国际人民的援助，完全可能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论联合政府》这篇极为重要的政治文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全面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论述了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的本质，提出了中国人民的某本要求，正确制定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及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并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和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而斗争。在这篇文献中，毛泽东首先提出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 and 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然后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是：希特勒被消灭以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为时不远了。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与此相适应，中国国内的形势是，抗日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信心，已大大地增强了，胜利的时机已经到来了。毛泽东接着分析了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前一条路线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后一条路线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毛泽东通过回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艰难曲折的道路，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已成为抗战的主力军。他说，这个军队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团结战斗，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是其唯一宗旨。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有正确的对待友军和敌军的政策，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并获得广大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和人民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八路军新四军所开辟的解放区战场在相持阶段，抗击着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而国民党战场不过抗击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同时，在解放区内，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由于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实行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策，其政治腐败，其军队大部分几乎无战斗力，广大人民之间发生深刻的裂痕，造成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可见，“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是国民党政府，它责备中国共产党“不服从政令、军令”是无道理的。迄今为止，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着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并在进行内战的准备工作。所以，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后，中国人民面前仍有两个前途：一个是在内战中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

富强的老状态里去；一个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努力争取第二个前途。毛泽东在这篇文献中重点而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他认为，要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需要一个共同纲领。这就是：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并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其政权组织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人民代表会有高度的权力处理国事，并保障人民的民主活动。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是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部分，是国家的保卫者。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耕者有其田”；国家经营银行、铁道、航路等大型企业，节制资本；保障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发展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所主张的这个纲领，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说来是最低纲领。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毫无疑义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去，以实现最高纲领。但一切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没有一个彻底的民主革命，没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人民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同时，共产党在一定条件下提倡资本主义的发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毛泽东在阐述一般纲领之后，还阐述了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纲领，如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国际和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取消镇压人民的反动法令，使人们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维护人民的统一；维护人民的军队；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发展工业；发展文化、教育，尊重知识分子；积极帮助和尊重少数民族；外交上在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等等。毛泽东最后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他指出，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它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三次革命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愚公移山》是对七大的总结。毛泽东在这篇文献中指出，七大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新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七大是一个胜利、团结的大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党要和全国人民一道，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

第3卷中另外6篇政治类的文献篇幅都比较短小，内容则各有特色。其中有名篇《为人民服务》（1944.9.8）。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的讲演，毛泽东在文中称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揭示了这样一种人生观：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因此，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1945.4.27）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所论的是军政之事。毛泽东在文中指出，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分别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决定作用。整风是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地统一。军队生产自给，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扩大了军队，还改善了官兵关系，增强了劳动观念和纪律性，改善了军民关系和军政关系，促进了人民的大生产运动。《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1945.7.10）和《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1945.7.12）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两则评论，主要是批评美国的错误对华政策。前文指出，美国大使赫尔利抹杀中共的地位，宣称不和中共合作，极力替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等项臭物捧场。赫尔利和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但他们的反对者到处都是，不计其数。后文声称，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中国人民要求改变这种危险的对华政策。《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1945.7.29）是毛泽东对福斯特和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电，是在获知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特别会议决定抛弃白劳德的修正主义路线，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并恢复美国共产党后发出的。贺电称，美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美国共产党反对白劳德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胜利，对于中美两国人民目前所进行的反日战争和战后建设和平民主世界的伟大事业，无疑地将何重大的贡献。《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945.8.9）是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的声明。声明称：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苏联这一行动大大缩短了对日战争的时间，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因此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同时，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

第3卷中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类的5篇文献也非常重要。其中《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是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在这些文献中，毛泽东进一步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在《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5.19）一文中，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改造学习方法和制度的问题。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战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战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但还有很大的缺点。这主要是存在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

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例如，研究工作没有系统，对于国内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面，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对于中国历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只会片面地引用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脱离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战术，等等，这样一来，使人造成一种反常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导反而不重视，而对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一心向往，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态度。而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有的放矢，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马克思主义中找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实事求是态度。全党在学习问题上要提倡这种态度。

《整顿党的作风》（1942.2.1）是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三个任务：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讲到反对主观主义这种不正派的学风时，毛泽东是从澄清关于什么是理论家、知识分子和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的糊涂观念讲起的。对于理论家问题，他指出，如果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没有进一步结合研究中国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还不能妄称为理论家。我们所要的理论家，应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他有一句名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对于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一方面肯定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一方面又告诫知识分子要认识自己“比较地最无知识”。他认为，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仅有书本知识的人要变成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唯一的办法是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而不能空谈理论，搞教条主义，并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对于理论和实际联系，毛泽东强调二者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是蒙昧无知的人。只有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从中国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在讲到宗派主义时，毛泽东指出其残余在党内党外都还存在。在党内的主要表现是闹独立性，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闹独立性的人常常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是个人第一主义。因此，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都应该提高共产主义精神，防止宗派主义倾向。对于党八股，毛泽东认为它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不利于革命的，因此必须肃清它。毛泽东最后号召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人们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解放出来，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当然，有两条宗旨应当注意：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在《反对党八股》（1942.2.8）一文中，毛泽

东对党内不同于老八股、老教条的新八股进行了全面剖析。他指出，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今天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获得解放；如果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毛泽东认为，党八股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总共有八大罪状：第一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第二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第三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第四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第五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第六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第七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毛泽东疾呼，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3—4）主要是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制定党的政策的重要性。在序言中，毛泽东这样指出，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而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这首先需要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其次是开调查会以获得知识。尤其是在中国，由于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来得及搜集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所以共产党人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非做调查工作不可。毛泽东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正使他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表示要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在跋中，毛泽东主要是以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为参考来说明抗日时期政策的正确件。他指出抗日时期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它具体体现在劳动政策、土地政策、政治权利、经济政策各领域。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是，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6.1）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决定，它是一篇溶哲理于领导方法的别具一格的文献。在这篇文献中，毛泽东主要提出了两个方法：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他指出，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他还指出，在执行工作中，除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以外，还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在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即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毛泽东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抓中心工作的方法。他认为任何一地区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领导人员应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

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

第3卷中收入了4篇经济类的文献，它们的内容都带有战时经济的特征。这些文献对于当时根据地军民克服极大的财政困难、努力发展生产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12）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第一章。在该文献中，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他认为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因为决定财政的是经济。这就要自己动手，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等，作到公私兼顾。同时实行精兵简政，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减少消费性支出，减轻人民负担。《组织起来》（1943.11.29）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其中心内容是号召边区军民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这么一条方针，把群众组织起来，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开展一个广大的经济工作的运动。他说军队应该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以生产达到丰衣足食，解决物质困难。他还说，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是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包括生产、消费、运输、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以及手工业合作社等。有了这些合作社，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发挥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毛泽东认为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他要求共产党员走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宣传群众，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无论在地方工作中还是在军队工作中，都不应犯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毛病，不应自满。《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945.1.10）亦是一篇讲话，其突出之处是将农村经济工作与将来的城市经济工作和建设新中国联系起来。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了自力更生、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的办法，并根据农村人力物力分散的特点。提出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生产和供给方针。具体来说，对于农民，为了提高其生产兴趣和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拟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对于机关和部队，在普遍开展练兵运动时，还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经过几年工夫，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后，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1945.1.31）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它主要是通过介绍晋察冀游击队利用战争的间隙从事农业、手工业等生产的经验，指出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毛泽东在社论中还强调，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它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

第3卷中收入的一篇文艺类文献和一篇文化类文献有着特殊重要性。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5）这一文献，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这篇文献中，毛泽东对文艺的性质、作用，文艺的源泉、文艺的服务对象，文艺的评价标准等问题作了全面说明。他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文艺应该为

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即为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些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因此，文艺工作者应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毛泽东认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的知识分子必须彻底解决它，无论时间要多长，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的文艺。这种文艺反映出来的生活比实际生活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更能教育人民，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由于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这就需要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明显，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往往比较难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对于广大不识字、无文化的工农兵来说，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但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不能截然分开，应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渐提高，把“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起来。毛泽东进而指出，既然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那就都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超阶级、超政治的艺术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事业的一部分。而文艺服从于政治，首先是要服从于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艺术家结成统一战线。毛泽东还论述了文艺批评问题。他认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都是好的，反之都是坏的。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是统一的，革命的政治内容应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要达到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就须澄清一些糊涂观念如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性，人类之爱；文艺作品写光明和黑暗并重；文艺的任务在于暴露，还要鲁迅笔法。同时还要解决动机与效果，学习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毛泽东号召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总而言之，毛泽东以这篇文献为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944.10.30）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讲演，它讲述的是文化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他号召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提出要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等，与他们结成文化统一战线；并强调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去工作。

第四卷

《毛泽东选集》第4卷编入的是毛泽东从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至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4年多时间内写成的70篇重要著

作，它们的内容包括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工作方法等5个方面。其中政治类占其总数的绝大多数，55篇（其中直接涉及军政内容的7篇）；军事类次之，12篇；外交、经济和工作方法类都很少，各一篇。这些著作是指导解放战争这一决定中国命运之战获得最后胜利的理性指南，同时表明毛泽东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进一步丰富的发展。透过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窥见解放战争那波澜壮阔的场面。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迅即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不仅以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不复存在，而且随着两党关系的日益恶化，中国的未来将维系在第三次国内战争中胜利者的一方。为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推翻有美国支持的蒋介石独裁统治和打败国民党政权的实力雄厚的军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指挥着从抗日战争发展壮大起来的人民军队——尽管它从武器技术装备到数量上都占劣势——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勇猛无畏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辽阔的疆土为战场，以政治、经济、外交为辅助，规模极为巨大，它展示了中国革命史上最为壮丽辉煌、惊天动地的一页。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毛泽东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其中。他运筹谋划，从战略上指挥着战争的具体进程。由于解放战争是一场夺取全国政权的决战，党的一切工作全都服从于它，故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留下的70篇重要著作，可以说在本质上都是议论军政之事。除直接涉及军事战略战术之外，他有关政治、外交等的著作的内容大部直接间接与军事相关。

这70篇文献，按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和谈与战争相策应阶段；敌之全面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战略反攻阶段；决胜阶段和夺取全国胜利阶段。在和谈与战争相策应阶段（1945.8—1946.6）总共是11篇文献，其内容都是政治性的，具体涉及抗战胜利后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的方针政策。作为第四卷开篇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8.13），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它对抗战胜利后国内局势作了全面考察，提出了共产党人的斗争策略。毛泽东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大势已定的形势下，应看清中同国内的阶级关系和国共两党关系，确定我党的方针。他预知在抗战中坐等胜利、保存实力的蒋介石在这时会来抢夺胜利果实，蒋介石不会感谢曾英勇抗敌的人民及人民的军队，而会发动内战。因此，必须清醒看到十分严重的内战危险，以明确和一贯的方针坚决反对蒋介石阴谋发动内战，并以极大的努力来制止内战。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则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用战斗来保卫人民得到的权利，保卫抗战胜利的果实，而不许蒋介石“摘桃子”。毛泽东认为，抗战阶段过去以后，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蒋介石要全面发动内战会有许多困难，如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万民兵，共产党有武装斗争经验和正确的方针；国民党统治区觉悟的人民反对内战，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但对蒋介石决不能存在幻想，而应组织起人民去打倒他。我们要以自力更生为基点的方针打败蒋介石以独裁、内战和卖国的三位一体为基点的方针，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不害怕美国人的原子弹，不害怕美国人撑蒋介石的腰。总之，抗战胜利后向新时期的过渡阶段的斗争，就是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

的斗争。这一阶段中，《蒋介石在挑动内战》（1945.8.13）、《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1945.8）和《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1945.8.16）这3篇文献，重点全在于揭露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的阴谋。前篇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它指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不让八路军接受日伪投降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是在为内战找借口，同时违背了波茨坦公告。中篇是毛泽东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写的两个电报。其中8月13日电报称，蒋介石给第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地驻防待命”的命令错得很厉害，违背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8月16日电报则是因蒋介石及其政府漠视第十八集团军的意见，下达错误命令，并以军队压迫解放区而提出的严正要求：蒋介石政府在接受日伪投降、缔结受降条约时，应与中共军队取得一致意见；人民抗日军队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同盟国规定的受降办法，接受日伪投降，并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人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亦有权派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和联合国会议；蒋氏应制止内战，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释放政治犯，实行经济改革和其他各项民主改革等。后篇亦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它指出蒋介石的发言人把人民军队宣布为“人民公敌”是向中国人民宣布了内战，蒋介石阴谋发动的新的内战将是一个灾难。而共产党主张成立联合政府，就为制止内战。只要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内战就可以制止。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1945.8.26）和《关于重庆谈判》（1945.10.17）这两篇文献，主要记录了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策略及其取得的成果。前一篇文献是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前两天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通知。毛泽东在通知中分析了日本宣布投降以后两个星期内中国形势的发展，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在谈判中准备作出的某些让步以及对谈判结果的两种情况的对策，分别对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解放区的斗争作了原则的指示。他指出，在内外压力下，国民党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和平发展的新阶段。谈判中我方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全党同志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需团结一致战胜各种困难。后一文献是毛泽东从重庆谈判归来以后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国共两党谈判已取得了成果，已签订了《双十协定》。但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蒋介石想消灭我们，但还有很多顾忌，主要是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人民的反对内战和国际上的压力。我们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与他们谈，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国民党再发动内战就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我们可以作出一些让步，但人民的武装要保存。应克服一切困难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国民党进攻的真相》等5篇文献是在蒋介石已撕毁《双十协定》、日趋扩大内战规模以后写成的，其内容各异。其中《国民党进攻的真相》（1945.11.5）是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的谈话。谈话揭露国民党方

面称“政府在此次战争中全居守势”云云全系撒谎，并列举诸多事实予以证明。谈话主张：为了迅速制止内战，已经进入各解放区的政府军队立即撤返原防，恢复被侵占的解放区；全部伪军立即缴械遣散；承认一切解放区的人民民主自治，中央政府不得委派官吏，应实现《双十协定》的规定。《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1945.11.7）是毛泽东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重点强调减租和生产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要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使工人等劳动人民改善待遇，同时使地主能生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并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等必需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and 供给军队的需要，已成为迫切的任务，必须抓紧抓好。改正减租斗争中的过火现象，要组织生产运动，政府要扶持生产，部队、机关、学校要适当参加生产。另外，掌握城市经济，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也是重要任务。同时，取得人民拥护，爱惜人力、物力，事事作长期打算，就一定能够胜利。《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1945.12.15）亦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内容都很具体，它总共有十项：（1）粉碎国民党新的进攻。（2）开展高树勋运动，从国民党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3）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改进军队政治工作，团结官兵，重新组织民兵，建立和扩充炮兵和工兵，继续办理军事学校，调整后勤等。（4）在新解放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在老解放区复查减租减息的工作。工人则酌量增加工资。（5）超额完成生产任务。（6）解决财政问题，其方针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7）拥政爱民和拥政优抗。（8）救济灾民、难民、失业者等。（9）爱护培养本地干部。（10）正视困难，一切作持久打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945.12.28）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毛泽东正确地指出，党在东北的任务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把群众斗争从经济斗争迅速提高到政治斗争。还要注意争取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准备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和将来转入反攻。《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1946.4）是毛泽东针对当时对于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估计而写的文件，它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同苏联可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达成妥协。这种妥协是全世界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坚决斗争的结果，它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

在国民党全面进攻和我之战略防御阶段（1946.7—1947.6），收入第4卷的文献共有9篇；其中4篇属军事类，5篇属政治类。军事类文献阐述的是解放战争的战略战术。《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1946.7.20）是一篇具有政治和军事战略意义的文献，它针对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大举进攻解放区，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而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依靠工人阶级、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小资产阶级等，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同时，必须作持久打算，十分节省地使用人力和物质，克服困难以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946.9.16)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谈的是军事问题。这一指示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一些新的作战方法，对解放战争极具指导意义。它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须应用于战役和战术的部署。战役和战术的部署都须集中六倍、或五倍、四倍、或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打力求全歼敌人的速决战。要改变抗日时期的战法，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尤其在敌处进攻、我处防御地位的时候必须应用这一方法。我军主力集中歼敌的时候，必须同地方兵团、游击队和民兵的积极活动互相配合，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1946.11.1947.4)和《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1947.4.15)是毛泽东对西北战场的几份具体指示。前者是针对敌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时作出的。其中1946年11月18日的指示，要求将蒋介石开“国大”，打延安两点向党内外作充分说明，团结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为粉碎蒋介石进攻，建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而1947年4月9日的通知，内容是为击破敌人进攻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之目的而作出的几点决定：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后者是毛泽东给西北野战兵团的电报。它指出，应继续使敌十分疲劳、断绝粮食以造成歼敌有利条件，我军的方法是不顾疲劳粮缺再与敌周旋一时期，用“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竟，然后消灭之。

在这一阶段的5篇政治类文献中，《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8.6）与《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1946.9.29），主要是联系国际形势来分析国内问题，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的光明前途充满信心。在前一篇文献中，毛泽东认为，如果美国不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话，中国的和平是有希望的。但美国政府和蒋介石没有任何停战的愿望，中国人民就必须自卫。关于美国反苏战争的宣传，毛泽东指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种宣传是对于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二是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美帝国主义所面对着的许多矛盾，这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但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在这篇文献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美国虽然有原子弹，但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总有一天要胜利。后一篇文献是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美国以调解作掩护，援助蒋介石举行大规模内战，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实际上变力美国的殖民地，必将激起全中国一切爱国人士的坚决反抗。如果美国政府放弃援蒋政策，则中国内战必能早日结束，否则就有变为长期战争的可能。但不管怎样艰难困苦，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任务是一定要实现的。

这一阶段的另外 3 篇政治类文献，是毛泽东对内战爆发一段时间以来的前瞻后顾。《三个月总结》（1946.10.1）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

的指示,它总结了1946年7月全国规模内战爆发以来的三个月战争的一系列经验,提出了人民解放军在今后的作战方针和作战任务。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部业已发生无法克服的矛盾,这是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三个月内已歼敌25个旅,如若再歼敌25个旅,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各级指挥员都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为应付长期战争,必须有计划地扩兵,练兵并大量训练军事干部。同时发展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打击反动派活动。必须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和整理财政,深入和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三个月战争,使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大为减弱。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国民党是内战祸首,明白的人已日益增多,广大群众转而寄希望于我党的胜利。国际政治形势也极有利,如苏联的威信日益高涨,美国和被美国所扶助的各国反动派日益孤立。所以,尽管斗争仍然是长期的、残酷的,但我们一定能够胜利。《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2.1),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毛泽东指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军事形势已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过去七个月作战已歼敌56个旅,如能在数月内再歼敌40至50个旅,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现在蒋管区人民斗争涌起新高潮,美蒋反动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已结成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蒋介石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使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威胁着各阶层人民;而以孤立我和其他民主势力为目标而召开的蒋介石的非法的国民大会,在人民面前没有任何威信。国际形势的发展使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日益陷于孤立,这对于中国人民的斗争极为有利。因此,只要注意军事、土地、生产等方面的问题,我党和中国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5.30)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评论指出,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打了败仗,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军事战线和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战线。蒋介石全部进犯军已经陷入绝境,中国人民也识破了蒋介石的种种政治欺骗;蒋介石政府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政府。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为了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关于战略反攻阶段(1947.7—1948.6),收入第4卷的文献是19篇,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军事政治和政策。而且,这一阶段涉及军事的文献有一特点,即多是综合性的涉及军政问题,其中专门谈军事战略的只有一篇,即《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1947.9.1)是毛泽东力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内容比较重要。它规定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同时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它指出,执行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须同时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创造巩固的根据地。我军作战方针,仍是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先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全歼敌人。打有把握之仗,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力求调动敌人打运动战,以俘获敌人的武器和兵员补充自己,以及发展军事工业,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这一指示中的许多内容,在稍后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这一文献中得以升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12.25），是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会议上的报告，它“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毛泽东首先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主义的正义的革命的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基础，它为十八个月战争的经验所充分证明。毛泽东接着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 and 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五倍或六倍），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有中等程度的守备或守备坚固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或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毛泽东还指出了土地改革对于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巩固得多了，这是由于我党坚决地站在农民方面实行土地改革的结果。他强调土地改革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毛泽东同时还论及了整编党的队伍，城市工商业政策，新中国的经济构成等问题；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等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最后，毛泽东通过考察世界形势满怀信心地指出：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

在这一阶段，由于革命形势进展极快，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解放或即将解放，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正规性程度大为提高，全国胜利在望。这要求党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任何无纪律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而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步骤是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故此，毛泽东专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1948.1.7），这是对民主集中制的一个新发展。它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负责人定期向中央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办法。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外，亦要定时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报告军队情况及执行政策的情况。这样，就可以挽救和避免各种不必要的损失。这一阶段还有一篇全面介绍新的军事、政治形势的文献《关于情况的通报》（1948.3.20），它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通报。通报指出，在新形势下，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关于土地改革、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及新区工作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在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时主要是反对“左”的偏向。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

胜利的可能。对某些民主人士应当采取团结的政策，对他们认为“第三条道路”尚有存在可能，以及对美国和蒋介石存在某种幻想的错误观点则作适当的批评。在将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邀请他们一部分人参加政府工作，但在一九四八年内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军事方面，我南线各军大多已作了休整，采取群众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的方法，发动了全军指挥员战斗员高度的革命积极性，提高了军事技术和战术。而国民党的正规军遭我打击，数量在减少，只在淮河以北和大别山两个地区尚有一定的机动兵力。从1946年7月算起，五年左右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一阶段涉及军政的其他几篇文献，内容各具特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1947.10.10），是将自红军初创以来的革命军队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以统一规定，重行颁布，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全军严格执行，以保障解放战争的胜利。《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1948.1.30）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主要说明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的宗旨即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并指出军内的三查、三整就是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方法达到前两项目的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1948.3.7）是毛泽东写的一篇评论，它分析了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后西北战场的形势，也扼要地介绍了全国其他战场的情况，着重说明了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的伟大意义。它指出，新式整军运动是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和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发展，大大提高了全军官兵的政治觉悟，纪律性和战斗力，对于人民解放军的巩固扩大和作战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1948.4.8）主要是规定城市政策，如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对于没收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不忙于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以及禁止大吃大喝等等。

这一阶段的政治类文献主要是对政治方略及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947.10.10）中，毛泽东根据国内军事、政治形势的迅猛发展，及时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总目标，并具体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等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內战罪犯；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买国外交，等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1.18）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草案，它提出了这么几个重要问题：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在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应注意阶级政策，分别对待贫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分别对待工人、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等各个阶级；应建立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应处理好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在《关于情况的通报》（1948.3.20）中，毛泽东阐明的也是一些重大政策问题，如土地改革、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新区工作等各项具体政策，指出在反对党内右倾和“左”的偏向时主要是反对“左”的偏向。

他还指出，中国在政治上不可能走“第三条道路”，但时机还未成熟时我们也不准备在本年内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从全国各战场形势看，五年左右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4.1）中，毛泽东重点讲了工作方法和党的总路线问题。他联系晋绥工作的情况，强调我党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是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的方针，要正确对待和领导群众，不能主观主义和尾巴主义，这样才能搞好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毛泽东还指出，在新形势下，全党同志必须紧紧掌握党的总路线，不要因党的具体工作和政策而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否则就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执行具体政策时就会迷失方向。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国土的不断解放，经济工作尤其是农村土地改革及城市工商业等问题亟需得到解决，故这一阶段有关土地改革和工商业政策的文献比较多。具体来说，有关农村土地改革等问题的文献有5篇，有关城市工商业的文献有两篇。在5篇有关土地改革的文献中《在不同地区实行土地法的不同策略》（1948.2.3）是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一封电报。其中指出土地法的实施应当分三种地区，即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日本投降后的半老区和大反攻后的新解放区，这三种地区土改的策略应有所不同：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法应分阶段进行，老区和半老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必须有三年时间。《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1948.2.11）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它指出应纠正如下“左”倾错误，即不是宣传党的正确路线，而是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宣传民主政府只是农民的政府；在整党问题上有唯成份论错误；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助长急性病或否定党的领导作用，助长尾巴主义；在工商业和工人运动的方针上赞扬“左”的倾向，等等，这其中有些过左的错误是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和脱离中央路线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1948.2.15）是对新区土地改革政策的规定，它指出应在两三年内分两个阶段完成土地改革，先在若干地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分别巩固区和游击区，先组织贫农团，后组织农民协会，并吸引中农参加；消灭反动的地主武装和特务组织，镇压反革命分子，利用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参加建设根据地的的工作，以及严格注意保护工商业。《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1948.5.24）是毛泽东给邓小平的电报，重点是强调全盘考虑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它指出，新解放区宜实行减租减息等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使社会秩序较稳定，以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1948.5.25）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它具体地规定了农村工作的方针，如调查乡村情况；按照正确政策实行初步整党，以领导好土地改革工作；发动土地改革斗争，划分阶级成份，实行分配封建土地和封建财产；建立乡（村）、区、县三级人民代表大会，并选举三级政府委员会；发给土地证，确定地权；调整或改订农业税负担的标准；完成党的支部组织的整理工作；将工作方向由土改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去。为此目的，各解放区的干部必须认真学习中央颁布的各项重要文件，从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克服某些无纪律状态，将权力集中于中央。从中央直到支部，必须随时互通情报，交流经验，及时纠正错误，发扬成绩。此外，在领导农村工作的同时，还应重视城市工作。有关城市工商业的两篇文献，都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在《关于工商业政策》（1948.2.27）中，毛泽东指出，必须纠正违反党中央的工商

业政策的错误，应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方针加以区别，对工人群众进行教育。它强调，领导者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只有在政策上不犯错误，才能取得胜利。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1948.3.1）中，毛泽东重申：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因此，应对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对那些在抗日时期赞成抗日和民主，现阶段赞成反美、反蒋，赞成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应毫无例外地去团结他们。

这一阶段还有一篇专论报刊宣传之重要性的文献《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4.2）。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因此，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同时要检查工作，总结经验，这样报纸会办得更好。

关于决胜阶段（1948.7—1948.12），第4卷收入了8篇文献，其中5篇是军事文献，3篇是政治文献。5篇军事文献中，有3篇是有关辽沈、淮海、平津三大著名战役的作战方针，它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雄才大略。《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1948.9—10）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林彪、罗荣桓等的电报。其中9月7日的电报指出准备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要求每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个旅左右，并具体布置了辽沈战役计划，指示应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和处理俘虏事宜。10月10日的电报则是在锦州战役发起后对战局的具体分析，强调只要攻克了锦州，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1948.10.11）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的电报，是对淮海战役的部署提出建议，指出其战役的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第二阶段是攻歼海州、灌云地区之敌；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作战。在完成淮海战役并作休整后，主力可以举行渡江作战。《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1948.12.11）亦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林彪、罗荣桓等的电报，具体提出了15点意见。总的原则是防止敌人从海上逃跑，先拟对敌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5篇军事文献中的另外两篇，有一篇是《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1948.11.14），它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评论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已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评论预计战争进程将大为缩短，认为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而另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1948.12.17）是毛泽东配合淮海战役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的广播稿，它规劝困敌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才有唯一生路。

这一阶段的3篇政治文献中,《关于健全党委制》(1948.9.20)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对加强党的集体领导起了重大作用。它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指出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决定然后才执行,同时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1948.10.10)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通知。通知回顾了解放战争两年以来国内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的情况,提出应克服无纪律状态和地方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并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通知认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包括大批地利用国民党政权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通知提出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知还说,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是支援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环节,而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则是完成上述任务的重要环节。《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11),是毛泽东给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所写的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的论文。它指出,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并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去夺取革命的胜利。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的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它现在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团结一切革命力量,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关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阶段(1948.12—1949.9),第4卷收入了23篇文献。这23篇文献中,除一篇涉及工作方法,一篇涉及外交外,其余全部与政治有关。从历史发展看,这些文献又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将革命进行到底》等10篇主要体现了毛泽东等人的彻底革命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6篇表明毛泽东等人为接管全国政权已作好充分准备,《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等7篇则表明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已在着手建国的筹备工作,并通过驳斥美国帝国主义者唯心历史观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

在第一部分文献中,《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12.30)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它开首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所以应当将革命进行到底。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是一伙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是职业帝国主义走狗,现在忽然装着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但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这些蛇一样的恶人。献词说,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但不容许坏人侵入。1949年在军事上将获取更大的胜利,在政治上将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上亦要获得更大的成就。《把军队变为工作队》(1949.2.8)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写的电报,它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提出了军队干部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任务。这对干部问题的解决和人民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这一部分的其他几

篇文献，多是评论或声明。如《评战犯求和》（1949.1.4），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揭露国民党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实力的评论。它一一驳斥了蒋介石在元旦发表的求和声明，指出蒋氏求和是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但什么人也不相信蒋介石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1949.1.14）则是针对蒋介石的和平谈判的建议提出八项和平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八项条件后来成为中共代表团和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决议》（1949.1.21）主要是抨击南京方面无诚意商讨和平的具体条件，其和平建议是虚伪的，并讽刺南京业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1949.1.28），主要表示了两点：不容许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等人无罪；除逮捕冈村宁次外，必须立即逮捕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四十三名内战罪犯。《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1949.2.5）亦是强调这两点：惩办日本战争罪犯；惩办国内战争罪犯。并驳斥国民党方面将这说成是与和谈无关的司法问题太无道理。《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1949.2.15），是指出在辽沈、平津、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统治的总崩溃已开始。国民党陷入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绝境，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和国民党长期作孽的结果。《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1949.2.16），主要是抨击国民党方面重谈“和共党周旋到底”的老调，指出国民党死硬派已没有几天活命的时间了。《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1949.2.18），是具体批驳国民党各派人物推卸战争责任的种种论点，并指出了中共方面提出逮捕战犯、进行和谈的合理性。

在第二部分文献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3.5）极其重要，它总共有10节。第一节指出，从军事上解决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剩下的一百多万人，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第二节强调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第三节阐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并准备与不拿枪的敌人作斗争。第四节提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以一步一步地去战胜敌人。并提出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生产事业是中心任务，应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改善人民的生活，否则就不能维持政权。第五节指出南方和北方的工作任务须有区别，南方的任务是消灭敌人，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权等，北方则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第六节是具体说明经济政策，认为占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工业经济中的官僚资本收归国有后，它将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将采取限制政策，但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占百分之九十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应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这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构成新民主主义的

经济形态，同时，对外贸易应实行统制政策。第七节主要说明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第八节分析了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第九节号召党应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指出这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第十节则是告诫共产党人不要在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而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3.13）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它提出了十二种方法：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学会“弹钢琴”；要“抓紧”；胸中有“数”；“安民告示”；“精兵简政”；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傲；划清革命和反革命两种界限。毛泽东最后强调，要有以上这些方法，才能把党委的工作搞好。

这一部分文献中的其他几篇内容各有不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1949.4.4）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它指出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继续与人民为敌；一条是向人民靠拢，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949.4.21）是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签国内和平协定以后毛泽东起草发布的文件，人民解放军遵照它向尚未解放的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命令要求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逮捕一切战争罪犯；照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解决凡愿停止战争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的问题；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愿意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可再一次给以机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1949.4.25）是宣布的与全体人民共同遵守的“约法八章”：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对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的国民党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等等一律不加俘虏、逮捕和侮辱；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废除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1949.4.30），主要表明了中国人民绝对不允许外国来侵犯、保卫中国的领土主权的严正立场，并表明中国人民政府是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

第4卷的最后一部分文献，主要由讲话、纪念性论文及评论构成。这些文献可以说是为第四卷以及整个《毛泽东选集》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6.15）自始至终透现了胜利者的豪情，毛泽东在其中勾勒了新中国内政外交的总纲。他指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任务是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

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方向。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因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斗争，其意义是同一的。中国人民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它要以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去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中国愿意同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毛泽东最后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辉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6.30）是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而作，它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并阐明了新政权的一系列国策，是一篇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承先启后的文献。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懂得辩证法，他们取得国家权力是为了创造条件使之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界。党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了二十八年，是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国内外党内的敌人作战。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先进的中国人曾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只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得出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二十八年曲折的道路，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它积二十八年经验得出了与孙中山相同的结论：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因此，共产党人实行向社会主义一边倒的政策，不怕刺激国内外反动派，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争取各种国际援助，不过不幻想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共产党人在国内外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的情况下，主张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以保护人民，镇压敌人。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总结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靠三件武器：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而中国革命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最后指出，党在二十八年中仅做了一件事：取得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但现在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克服困难，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以稳步地走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地。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一组文献，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对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论。它们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同时对

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8.14）一文指出，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它驱使全世界人民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走上了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自 1840 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的 109 年间，中国人民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革命的成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却要看一看，对帝国主义还存在幻想。但帝国主义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不同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中国人民的革命就是依照这一定律取得胜利的。因此，应当站在历史唯物主义主场上，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历史，决不能希望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发善心。中国的先进分子有责任团结人民内部各阶层人士，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1949.8.18），主要是评击美国的对外政策。它指出，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欧洲、亚洲、美洲部分，想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部分。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都不要战争；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和平堡垒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空前强大，这些迫使美帝国主义不采取大规模直接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即美国人出钱，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美国的白皮书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部真相，这给思想糊涂的中国人上了课。但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中国人民也不怕困难和封锁，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1949.8.28），重心是把对白皮书讨论的范围引导到中国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上来，以起很好的教育作用。文章针对白皮书的攻击，指出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权力是一个护身的法宝，它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友谊”，还是侵略？》（1949.8.30）一文主要是驳斥艾奇逊的“友谊”谎言。它强调美帝国主义自 1340 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做了许多侵略中国的事，如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签订望厦条约，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特别是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等等。居于 4 卷末篇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9.16），是一篇从哲理角度总结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的重要文献。它主要驳斥了艾奇逊把中国革命的发生归因于中国人口太多和西方思想刺激。文章认为，古今中外的很多革命都不是由于人口太多，如美国反英革命，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国历次农民革命、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主要是反对压迫和剥削。文章指出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对于中国革命受“西方的影响”的论点，文章指出这说得很有点像。1917 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东西：马克思列宁主义。由此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得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就要打败仗。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

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二 追随先进救国拯民学贯中西始得真志——《毛泽东早期文稿》览要

湖南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为国内毛泽东学界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文字研究资料。《毛泽东早期文稿》结集了迄今为止发现的青年毛泽东自 1912 年 6 月至 1920 年 11 月这 8 年多时间内留下的原始文献，其中包括文章、信函、读书批注、章程、纪事录、报告、启事、诗赋以及课堂笔记等等，凡 151 篇（其中 132 篇编入正编，19 篇编入副编，它们记录了青年毛泽东成长为毛泽东思想创始人的一段艰辛思想历程。从这些文稿中，可以看到青年毛泽东许多积极向上的思想，他忧国忧民，追求先进和光明，不断地否定自我、战胜自我，几经转折，最终转向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方向，并运用马列主义来作为拯救和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文稿对于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以及整个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是先有了毛泽东早期文稿，然后才有毛泽东的建党和大革命文集，才有《毛泽东选集》四卷及其它。一个成熟的毛泽东，是从一个不成熟的青年毛泽东长成的。一种成熟的思想 and 理论，是从一种生长和发展着的的思想 and 理论中成长起来的。而要真正珍视文稿在毛泽东的思想演进史上的宝贵价值，首要的是对它进行切实的研究。但文稿内容富博，对它进行切实的研究和全面把握并非易事，这至少要求研究者注意如下四个较大的问题：一、把文稿放在一定的历史时代范围内来理解它的理论意义及价值；二、充分了解青年毛泽东的生活经历，把青年毛泽东的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对应起来考察；三、理清青年毛泽东所受的主要思想影响，以进而把握其思想形成的宽广的文化渊源；四、对文稿内容要有整体的了解，对重要篇目宜精心推敲，以把握文稿的精神实质，析出含藏在文稿中的几个核心思想观念。

一、把文稿放在一定的历史时代范围内来理解它的理论意义及价值

文稿是一部历史文献，研究文稿就应以历史眼光对待之，即把文稿放在一定的历史时代范围内来理解它的理论意义和价值。这就要求对文稿形成、产生的时代背景有梗概的把握。因此，为着理解文稿，先要了解中国近代历史及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中国近代历史以及世界近代历史的模版陶铸就了文稿的思想内容。

《毛泽东早期文稿》诞生时期的中国，已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度。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包括外国资本）在当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中国主体上仍是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与这种经济形式相适应，传统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统治及政治渗透遂成为当时的主要政治形式。这也就决定了改良，或反抗封建专制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统治的革命，构成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流，而对这种民主主义改良或革命要求的呼喊便构成中国政治舞台上循序演出一出悲壮雄伟的戏剧：1898 年清光绪皇帝“百日维新”运动失败；1900 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和义和团运动的被镇压；1911 年“辛亥革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接着是袁世凯、张勋相继复辟帝制和反对这种复辟的“第二次革命”；1915 年《新青年》创办和新文化思潮的崛起；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及随之而来的马列主义思想的传播。这一出出历史戏剧表明，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导演各自为他们的编导意图竭尽全力。在这些政治导演中，首推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导演了

“百日维新”运动；继起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他导演了“辛亥革命”及“二次革命”；随后而来的是世界新文化，马列主义新思想的宣传者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导演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些政治导演所导的剧目虽然各自有异，但汇合起来则构成近现代中国政治历史长剧的总体。因为这些剧目只有一个主题：不满意或反对国内封建专制统治，不同程度地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统治，这便形成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总体趋向和价值取向，形成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总体格局。这种总体趋向和总体格局，决定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先进，在对中国传统封建思想进行抨击或激烈批判的同时，积极宣传和拥护各种新思想、新文化。这种时代思想格局，无疑造成青年毛泽东接受思想、文化知识和思考时代问题的先决条件。青年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思想文化氛围中成长和活动着的。因此，我们今天在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和评价青年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思想品格时，首先要注意的是青年毛泽东在这一时代的思想文化格局。换言之，判断青年毛泽东在其早期文稿中表露出来的思想是否进步，应看它是否顺应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和总取向，是否站在时代思想的前列。同样，分析青年毛泽东思想中表现出的某种不足甚或错误，也应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它们是怎样被毛泽东接受以及最后怎样被抛弃的。离开这一点，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研究和评价就会失去时代根据。

以历史时代为根据来研究文稿，便可知道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一直走在时代前列。起初，毛泽东在思想上追随康有为、梁启超，提倡社会政治改良；接着，他追随孙中山，鼓吹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然后，他追随陈独秀、李大钊，主张并实践社会主义新思想。总之，从学生时代起，毛泽东通过新式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文化教育，接受了该时代许多先进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他有着比同时代人更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强烈的反封建专制和反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思想立场。从文稿的许多篇目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从坚定的反封建专制，反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政治思想立场出发，十分崇尚科学和民主，具有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可以说，一部早期文稿，纪录了青年毛泽东在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成长为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趋向的民主主义者的思想演进历程。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文化条件下，青年毛泽东不断地接触到和接受过许多新思想、新学说，又不断地扬弃或抛弃了它们，沿着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大道向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方向迅跑。

二、充分了解青年毛泽东的生活经历，把青年毛泽东的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对应起来考察

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应充分了解毛泽东的个人生活经历，把毛泽东的思想行程、理论活动与其社会实践活动对应起来考察。这是因为，毛泽东生活阅历和社会实践的范围和丰富性规定了毛泽东关心和思考问题的范围和丰富性。离开对毛泽东的个人生活经历的熟悉和了解，对文稿的研究就谈不上深入。

与文稿写作时间相对应的青年毛泽东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实践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求学时期、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湖南自治运动时期。求学时期包括青年毛泽东 1912 年春退出湖南新军后考入湖

南全省高级中学读书，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刻苦自学，和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一师范学校读书这一段时间，时间起迄为 1912 年春至 1918 年夏。在这一段时间内，毛泽东不仅认真学习书本知识，更“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作为一位品学兼优的青年学子，毛泽东表现出许多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和行为，如利用假期游历，了解调查社会；善于组织、领导学生工作；与同学积极创办夜校以帮助穷苦贫困的工人学文化；与志同道合者发起成立旨在“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新民学会；十分关心时事，参加湖南进行的反对袁世凯复辟君主制的活动，等等。在这一段时期，毛泽东留下了 35 篇文稿，其中正编 30 篇，副编 5 篇。这些文稿中，半数以上是书信（18 封）；余则为文章（3 篇），题志（1 篇）、广告（2 则）、日志和纪事（3 篇）、教授案（1 篇）、读书批注（1 本）、课堂笔记（1 本）、诗（1 首）以及由他人记录的谈话（2 篇）等。这些文稿的内容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青年毛泽东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对许多现实问题的严肃思考。文稿所关切者，多为社会、政治、哲学、人伦问题，如寻求宇宙“大本大源”；扫荡全国人们心中的旧思想，变换新思想，怎样革新教育，怎样打好学问功底，怎样锻炼身体，使身心完美发展，以担负起兴亡国家的神圣职责，等等。文稿表明，此时的毛泽东哲学上是个唯心论者或二元论者，政治上持理想主义的态度，但是对广大下层劳苦人民的同情本能地使他向往民主、自由，愤愤不平于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侵略势力的压迫。

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包括青年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后，赴北京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在北京大学工作和在长沙领导学生运动这一段时间，时间起迄为 1918 年夏至 1919 年冬。在这一段时间内，青年毛泽东留有 60 篇文稿。这 60 篇文稿都收录在正编，其中有 53 篇是文章，另有 4 封书信，2 个章程，一篇祭辞。53 篇文章中的 40 篇发表在毛泽东自己创办和主编的《湘江评论》上，其多数是政论和时评及新闻报道；余下 13 篇则发表在长沙《大公报》上，其中 10 篇涉及婚姻恋爱问题。众多的文稿表明，在这一时期，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和转折。他追随科学和民主的新潮流，不仅反对“以孔子为中心”的传统思想，亦反对自己曾一度崇拜的康有为，转而高呼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万岁”。毛泽东已十分注意系统的研究社会问题。他主张以民众大联合的力量来改造现实社会，他的政治视野已扩展到整个世界。毛泽东当时抨击议论较多的还有封建包办婚姻和婚制改革。他对新生活执着追求，不满社会现实而又反对“炸弹革命”、“流血革命”。对资本主义认识不足，因而对社会改革的计划不免陷于带空想色彩的理想主义。

湖南自治运动时期包括青年毛泽东组织驱逐湖南军阀统治者张敬尧的运动和组织湖南自治运动这一段时间，时间起迄为 1919 年冬至 1920 年冬。这一时期毛泽东留有 56 篇文稿，其中正编 42 篇，副编 14 篇。这些文稿中有书信 16 封，文章 23 篇，余下者为通告、文告、广告、报告、宣言、启示、倡议、请愿书、章程及谈话纪录等。文稿内容主要涉及“驱张”和“自治”，次则涉及教育、文化、新民学会的发展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设等。文稿表明，这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在政治上持激进的民主主义立场但不具备革命意识。依靠下层人民群众不能取得“自治”运动的成功，毛泽东便转而走教育救国、教育救世的道路，他设想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新民学会以为改造世界打下基础。哲学上，毛泽东已初备辩证思维的方法，反对“拿感情来论事”、

“以部分概全体”、“以一时概永久”、“以主观概客观”的“四种迷”。1920年年初在北京参加李大钊、王光祈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中在湖南参加发起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和创办文化书社以传播新文化，年底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与陈独秀取得联系在长沙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等经历，表明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由于社会实践活动的有力推动不断地向前发展着，而最后选定了共产主义的方向。

由上可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的全部内容与毛泽东早期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社会实践相一致，文稿只不过是以文字的形式再现了青年毛泽东的社会实践生活，是青年毛泽东精神生活、思想行程的实录。因此，在熟悉毛泽东早年学习生活和社会实践生活的基础上来把握文稿的意义，而不只停留在字面的阅读，于文稿多方面的内容才有切实的理解。

三、综合地把握文稿的内容，理清青年毛泽东所受的主要思想影响，以把握毛泽东思想产生之宽广的思想文化渊源

人的青年时期主要是学习、接受和掌握既有的文化知识的时期，但又是精力最旺盛、思想最活跃、富于创造力的时期。因而可以说，《毛泽东早期文稿》是把青年毛泽东对知识的接受和创造综合于一体的文字纪录。在全部文稿中，除《讲堂录》是青年毛泽东被灌输以何种知识的直接记录外，其余绝大多数都是毛泽东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的综合、鼎新和创造。故要从文稿载录的信息中真正理清哪些文化知识、理论观点是毛泽东承受过来的，哪些是毛泽东的发挥和创新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只要精心的区分，并结合了解青年毛泽东曾受过何种教育，曾密切交往过哪些人，曾研读过什么书刊，曾接触过何种理论学说，是可以大致弄清哪些东西是毛泽东接受过来的，哪些东西是毛泽东自己创新的。这种区分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通过区分，理清青年毛泽东所受的主要的思想影响，便可以把握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宽广思想渊源。从文稿本身看，毛泽东早期思想既受中国文化的深深熏陶，亦受外邦文化的巨大影响。中国文化中，包括古代和近代文化，其要点在政治、人伦、哲理方面。外邦文化，主要是从欧洲、美国及日本等地传入的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及种种社会思潮。中外文化中对青年毛泽东思想发生影响的具体学派、学说、著作以及重要思想人物，可综合列表如下。当然，由于毛泽东早期文稿散失极多，表格中列出的内容肯定是不完全的，但重要的和基本的内容则是具备的。

影响青年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学派、思潮、著作和思想人物一鉴表

学派、思潮、著作和思想人物	根据(《毛泽东早期文稿》)	备 注
儒家典籍类 孔子 论语 孟子 孟子 子思 中庸 朱子 大学 诗	第 705 页：少年毛泽东上私塾时“熟读‘四书’”。 第 21 页：“仆读《中庸》”。第 21 页：“朱子补《大学》”。第 18 页：“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 第 24 页：“吾遂及于《书》全体	《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第 9 页：毛泽东“从读三字经开始，继而点读论语、孟子和诗经等。” 西行漫记 (三联书店 1979 年)第 106 页：“我八岁那年开

书 公羊春秋	矣。他经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	始”“读孔夫子的 论语 和 四书 ”。 青年毛泽东 第 11 页：毛泽东在毛宇居那里“读的是 公羊春秋 、 左传 等经史书籍。”
其它文史书籍 史记（司马迁） 资治通鉴（司马光） 读史方輿纪要（顾祖禹）	第 24 页：“吾遂及于 史记 之全体矣。他史亦然”。 第 707 页：阅读了“司马光的 资治通鉴 、 顾祖禹的 读史方輿纪要 等书。”	毛泽东早期文稿 第 37 页：“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
学派、思潮、著作 和思想人物	根据(《毛泽东早期文稿》)	备 注
古典小说 精忠传 水浒 隋唐嘉话 三国志 西游记，等等。	第 705 页：“爱看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关于农民造反的故事”。	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第 108 页：“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
湖湘学派 王夫之	第 589 页：“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第 197 页：“中国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拟每次授语录一二条。又我之心得处，如《达化斋日记》、及《论语类钞》等，亦不妨讲与学生听。”
曾国藩《家书》	第 707 页：“一师求学初期”、“认真阅读了谭嗣同的《仁学》，曾国藩的《家书》”以及“王船山的哲学著作” 第 24 页：“曾氏《杂钞》”，“上自隆古，下迄清代，飞掄四部精要。” 第 85 页：“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谭嗣同《仁学》	第 639 页：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杨昌济	第 14 页：“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	《西行漫记》第 121 页：“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学派、思潮、著作	根据(《毛泽东早期文稿》)	备 注

和思想人物		
《汉书》 《通鉴纲目》		《青年毛泽东》第 12 页；毛泽东在毛简臣、毛麓钟门下“读了《汉书》、《通鉴纲目》等古籍。”
楚辞 昭明文选 韩昌黎全集	第 707 页：“一师求学初期”，阅读了“韩昌黎全集、昭明文选、楚辞”。 第 613 页：讲堂录“前十一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	
庄子	第 66 页：“庄子效法于庖丁”。 第 92 页：“予维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第 641 页诗中有“鲲鹏击浪从兹始”句。	庄子思想对毛泽东一生有较大影响。
墨子	第 590 页：讲堂录中有关“断腕”的记录来源于墨子·大取。	“断腕”，即舍小我为大我。“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
佛学	第 479 页：“……佛学，我都很想研究。”	青年毛泽东有否时间研究佛学，无从考证。西行漫记第 109 页：毛泽东早年受母亲的影响，信佛。 讲堂录还记录了曾国藩圣哲画像记 32 人：周文王、周文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监、顾亭林、秦蕙田、姚鼐、王念孙。（见文稿 592 页，实则 33 人。）
学派、思潮、著作 和思想人物	根据（《毛泽东早期文稿》）	备 注
近代早期资产阶级 改良思想家 郑观应 盛世危言	第 705 页：少年时“尤其喜读诸如盛世危言之类具有爱国色彩的书籍。” 第 4 页：“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	
冯桂芬 校邠庐抗议 顾炎武《日知录》		《青年毛泽东》第 16 页：“他读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还读了顾炎武的日知录”，

和“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		“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
康有为、梁启超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思想 梁启超 新民丛报 一本有关“康有为的变法运动的书”。	第 4 页：“书十一本，……新民丛报 损去首叶。”第 85 页：“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	西行漫记 第 113 页：“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 新民丛报 ，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 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第 706 页：1911 年，毛泽东“常看资产阶级革命派于右任、宋教仁主编的 民立报 ，深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所吸引，接受了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	西行漫记 第 115 页：“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 和同盟会的纲领。”
社会主义思想家 陈独秀 新青年	第 305 页：“我们对于陈君，认为他为思想界的明星”。 第 707 页：“陈独秀主编的 新青年 创刊后，他很快成了它的热心读者，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开始接受陈独秀等人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	青年毛泽东还从报刊新闻、时论中获得广泛的知识，并经常找老师请教，与同学、友人讨论人生、宇宙、社会改造及其方法等诸多问题。
学派、思潮、著作和思想人物	根据(《毛泽东早期文稿》)	备 注
	第 712 页：1920 年“赴京、沪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在陈独秀等人的接触中，曾讨论当时自己组织的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和读过的马在思主义书籍。”	
李大钊	第 710 页：1918 年 10 月“经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在这里，读到了李大钊的 庶民的胜利 、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等文章，获得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潮的机会。”	
自然科学知识 数学、物理、化学、地理以及医学等	第 585 页：“有圆周与直径”、“冰点”和“沸点”、地球“经度”的记录。 第 597 页：有牛顿、富兰克林、瓦特等科学家记录，及中西医比较记录。	

	第 707 页 :在湖南省立图书馆“ 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 ”。第 22 页：“ 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第 23 页：“ 学有三科，曰玄间著。玄科者，名、数二学属之；间科者，物理学、化学属之；著科者，博物学属之。”	
达尔文进化论	第 706 页：读了“ 赫胥黎的 天演论 ”。	文稿第 537 页：文化书社“ 重要书报杂志之销数 ”中有 达尔文物种原始 。
学派、思潮、著作和思想人物	根据(《毛泽东早期文稿》)	备 注
社会科学知识 亚当·斯密 原富 穆勒 名学 斯宾塞尔 群学肆言 孟德斯鸠 法意 卢梭 民约论 泡尔生 伦理学原理	第 706 页：“ 1912 年下半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刻苦自学，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亚瑟·斯密的 原富 ，赫胥黎的 天演论 ，穆勒的 名学 ，斯宾塞尔的 群学肆言 ，孟德斯鸠的 法意 ，卢梭的 民约论 等”。 第 116—275 页： 伦理学原理 批注(1917—1918 年)。	文稿第 541、542 页：文化书社通告书目中有《赫克尔一元哲学》、《柏拉图之理想国》、《哲学概论》、《印度哲学概论》、《科学方法论》、《杨怀中西洋伦理学史》、《心理学大纲》、《革命心理》、《心灵现象学》、《创化论》、《人类学》、《生物之世界》、《科学通论》、《近世社会学》、《现代思潮批评》、《近代思想》、《欧洲政治思想小史》、《欧美各国改造问题》等。
种种社会思潮和学说 社会主义	第 706 页：1911 年“ 从报纸上第一次知道了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还读了无政府主义者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并写信与同学讨论这个问题。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41 页：文化书社通告书目有《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等。
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	第 341 页：“ 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	文稿第 542 页：文化书社通告书目有《克鲁泡特金的思想》。
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	第 639 页：“ 安得国人有大学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	文稿第 541 页：文化书社通告书目有《托尔斯泰传》
民粹主义	第 455 页：“ 俄罗斯之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入农村与农民杂处。”	
武者小路实笃新村	第 455 页：“ 日本之青年，近来	

	盛行所谓‘新村主义’”。	
学派、思潮、著作 和思想人物	根据(《毛泽东早期文稿》)	备 注
工读主义	第 455 页：“美国及其属地菲律宾，亦有‘工读主义’之流行。吾国留滂效之，在美则有‘工读人’，在法则有‘勤工俭学会’”。	
杜威实验主义教育 思想和政治思想	第 293 页：“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41 页：文化书社通告的书目有《杜威五大讲演》、《实验主义》、《杜威现代新教育的趋势》、《杜威美国民治的发展》。
罗素政治思想	第 713 页：1920 年 10 月 26 日，青年毛泽东“被湖南《大公报》特邀为杜威、罗素”“等来湘讲演的记录员”。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41 页：文化书社通告的书目中有《罗素政治思想》、《罗素社会改造原理》
美国门罗主义	第 510 页：“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	
胡适派实用主义	第 396—403 页：“问题研究会章程”。第 475 页：“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第 494 页：致胡适信。第 533 页：“胡适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	
英雄豪杰思想	第 8 页：“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	《青年毛泽东》第 18 页：毛泽东在东山学校“借阅过《世界英雄豪杰传》”，“圈点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传记”，并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

四、对文稿内容要有整体的了解，对重要篇目宜精心推敲，以把握文稿的精神实质，析出含藏于中的几个核心思想观念

毛泽东早期思想于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大厦具有奠基意义，并且，它的许多重要思想已密不可分地溶入了毛泽东思想体系之中。因而，对毛泽东早期文稿加以整体的了解，析出含藏在文稿中的几个核心思想观念，对理解毛泽东思想具有启发意义。所谓整体的了解，是把毛泽东早期文稿看作一体的东西，看作“一”，然后把其中的各篇看作部分，看作“多”，在同一中把握差别。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著作的悉心了解，便可以发现其中恒在的东西，发现含藏在文稿中的几个核心思想观念，这便是民主、爱国、教育、

理想、贵我、奋斗以及哲学上的动、抵抗和大变化等思想观念。

民主民主意识是青年毛泽东最早具备的一种思想意识，它是由对弱者的同情、对受地主老财剥削和压迫的劳动农民的同情中产生的。在少年时期，毛泽东在家庭就反抗过专横的父亲，在家族内就反抗过专横的族长，有本能的民主意识。后随着知识的日增，毛泽东的民主意识便直接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具体表现为对中国封建君主制的否定。1910年他在研读《新民丛报》第4号《新民说》一文时曾如此批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盗窃得国之列朝也。”^①这里，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尽管受梁启超保皇思想的影响，但其民主倾向已很鲜明。至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的民主思想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他已明确意识到世界上“吃饭问题最大”，“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他号召不要怕天、鬼、死人、官僚、军阀、资本家等。他主张“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限制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变教育“为平民教育主义”，变经济“为劳获平均主义”，变思想“为实验主义”，变国际战争“为国际同盟”。毛泽东说：“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毛泽东寄心于民众的大联合，并把北方的苏联看作民主的楷模：“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鹞旗易了红旗”。可见，从本能的民主意识发展到反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并将传统的民本主义与西方的“兑莫克拉西”联合起来，更展望北方苏联的民主模式，这便是青年毛泽东民主思想意识的演进历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民主思想便是从这种民主思想意识中演化而出的。当然，这里经过了一个过渡环节，即1920年的湖南自治运动。在自治运动中，毛泽东已作为一名民主战士出现。他谋求保障人民权利，主张用直接、普遍选举来实行人民制宪，以有步骤地“采取民治主义及社会主义”^②。

爱国毛泽东的爱国思想直接与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相联系。由于中国当时已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毛泽东的爱国主义思想意识在少年时代就开始形成了。还是在故乡韶山，他读到一本关于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后，便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担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年毛泽东的爱国主义意识愈来愈强烈。辛亥革命爆发后，他随即弃学投军，参加革命。1915年，毛泽东在一本揭露日本侵略中国及袁世凯卖国罪行的小册子《明耻篇》上，题写下表明自己心志的十六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不仅表达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立场，也显露了他有志反抗外国侵略势力的刚决之心。^③1916年7月，毛泽东

①《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3、340、701页。

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3、340、701页。

③《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3、340、701页。

④《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1、51、394、397、560页。

在给友人肖子升的信中，更是表明了对妄图独霸中国的日本的满腹仇恨和对国人不觉悟的忧虑。他写道：日本“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济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励以待日本。”在信中，他还表达了“中国兴会稽之师”、“既服三岛”的愿望。由此可见，青年毛泽东的爱国主义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在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了一个较大的变化，即已与“世界主义”联系起来了。这时，毛泽东不仅企盼中华民族有“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的改革、光明和成功，不仅在考虑“民族自决问题”并且已站在“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政策”的立场。他说：“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他进而认为，“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础”，而民族自决，“即是促进大同的一个条件”。尽管此时毛泽东对殖民、侵略发生的根本原因缺乏足够的认识，也并未找到通向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爱国主义道路，对什么是世界主义也不甚清楚，但这些却构成他的民族的和民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基底，亦构成他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基底。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定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便是要使中国免除遭受殖民、侵略的痛苦，他的国际主义原则也是要使世界上各民族、各国家互相尊重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教育教育在青年毛泽东那里是一个具有十分丰富内容的概念。它更多地与整个社会的教育相联系，并包含学校教育。这种教育不仅重视青少年的文化知识培养，更重视全社会所有人的思想启蒙和改造。它的主要特点是：为社会政治改造的目标服务，与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相结合。青年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他当时政治思想的取向是一致的。他认为，只有从兴教育、开民智着手，才能达到改造和拯救中国的目的。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他叹“吾国国民之愚”，叹“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他指出在“黯淡闭塞”的“当今之世”，“强聒不舍，可以振国”。而在致黎锦熙的信（1917、8、23）中，毛泽东则在考虑“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他认为中国的思想与道德，“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而“吾人欲使此愚人而归于智，非普及哲学不可。”他那时就已“久思组织”“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的私塾。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便致力于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的工作，并在湖南长沙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1、51、394、397、560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1、51、394、397、560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1、51、394、397、560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1、51、394、397、560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13、86、88、499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13、86、88、499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13、86、88、499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13、86、88、499 页。

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①正是从“大教育”思想出发，毛泽东试想把学校教育纳入社会教育之中，或试想把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他在《夜学日志首卷》中写道：“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而他主持创办夜学的目的，一是为“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二是为“仁人之所宜矜惜”“小人”，三是为“吾等实习之场”，四是为“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这样，“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1919年12月，毛泽东为“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曾草就计划书。”计划书中“学校的办法”是：“学校教授之时间，宜力求减少，使学生多自动研究及工作”。而“工作须为生产的，与实际生活的。”毛泽东认为：“言世界改良进步者，皆知须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识始。”“然兴办学校，不过施行教育之一端。而教育之全体，不仅学校而止，其一端则有家庭，一端则有社会。”故“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必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

在《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中，毛泽东强调指出：“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动用此种工具之人。”他慨叹主持教育者“不察世界潮流”，不能改善和革新教育。正是以“社会说本位教育说”为导向，所以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以后，毛泽东又把目光转向教育，“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在1920年11月给向警予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教育未行，民智未启，多数之湘人，犹在睡梦。”“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教育系我职业，顿湘两年，业已决计。”^②

理想青年时期是人们的理想树立时期，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树立起远大的理想。这种远大理想的树立主要来之于他的政治忧患意识和政治抱负，当然也得益于他的老师的启发及古代中国文化的养育。在《讲堂录》中，就有“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理想者，事实之母也”等言论，亦有孔子、孟子“尝言志”的内容。古今中外的圣贤豪杰，都是青年毛泽东引为榜样的理想人物。毛泽东所言的志，是指“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的“宇宙之真理”，而非指什么“有志为军事家”、“教育家”等等，那只是一种盲从和模仿性。他说：“欲立真志”、“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可见，青年毛泽东所说的志向或理想，首先是以“得真理”为前提的。而探得“大本大源”或“宇宙之真理”的圣贤，其责任便是“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毛泽东认为“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由于受中国古文化的熏陶和当

①《毛泽东早期文稿》第97、449—454、495、577、548页。

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97、449—454、495、577、548页。

③《毛泽东早期文稿》第97、449—454、495、577、548页。

④《毛泽东早期文稿》第97、449—454、495、577、548页。

⑤《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9、86、89、89、601页。

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9、86、89、89、601页。

⑦《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9、86、89、89、601页。

时环境的影响，青年毛泽东把追求“大同”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毛泽东的这种“大同”理想，在当时具体表现为“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动议，而在后来找得马列主义的真理之后，便是借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途径以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贵我、奋斗贵我和奋斗是毛泽东早期思想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它们最先是毛泽东从先生们那里继承过来的。《讲堂录》中有这样的记录：“重现任有两要义，一贵我，（求己）、（不责人）。二通今，如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贵我）。

这种贵我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

因为“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由于受泡尔生伦理观念的影响，毛泽东进而认为：“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贵我，就要“以贤圣为祈向”，有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远大志向。而远大志向和理想的达到则需要奋斗。在《讲堂录》中，有这样的奋斗例子：“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而奋斗，需要有“朝气”，需要“药文弱”，需要有毅力。“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奋斗，更需要有舍死之精神：“吾尝观古来勇将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概，发横之人，其力至猛。谚所谓一人舍死，百人难当者，皆由其一无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而至强也。豪杰之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可以说，贵我与奋斗，对毛泽东一生都有重大的影响，他们从精神上支持了毛泽东事业的成功。

动、抵抗和大变动、抵抗和大变动是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中的几个重要概念，它们在毛泽东全部哲学思想及整个毛泽东思想中都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动，指天、地、人的存在方式或本性。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涉及了这一问题，他说：“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人者，有理性的动物，则动必有道。……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毛泽东不仅认为“天地盖惟有动而已”，而且认为人这种有理性的动物“动必有道”，这种道，便是有规则的动，即体育。“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使人“身心皆适”。青年毛泽东认为“讲体育必自自动始，”他更强调“内在主观的”方面，说“内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89、86、89、89、601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89、86、89、89、601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44、146、151、589、585、591、220、69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44、146、151、589、585、591、220、69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44、146、151、589、585、591、220、69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44、146、151、589、585、591、220、69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44、146、151、589、585、591、220、69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44、146、151、589、585、591、220、69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44、146、151、589、585、591、220、69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44、146、151、589、585、591、220、69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72、69、85、183、181、183、181、186 页。

断于心，百体从令”。正因为心的作用甚大，故青年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与动相联系的是抵抗。毛泽东在研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当书中言及“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时，他批写道：“至真之理。至澈之言。”抵抗，在毛泽东早期著作中其含义较丰富，有矛盾、竞争、对抗等意思。抵抗是一种自然状态：“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抵抗也是一种社会状态：“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抵抗与势力同时发展：“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抵抗乃人性所喜：“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一人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随“抵抗之波澜”而来的是变化或大变化。“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国家有灭亡，乃国家现象之变化，”“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需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亦然。……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正因为把生死成毁的大变化看作事物发展的本质和普遍现象，所以青年毛泽东对之引以为壮。他以人之生死巨变来说明问题：“死也者，亦吾有生以来一未尝经验之奇事也，何独不之好乎？……或者乃惧其变化之巨，吾则以为甚可贵，于人生世界之内，向何处寻此奇伟之巨变，于人生之世界所不能遇者，乃以一死遇之，岂不重可贵乎？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知引以为壮乎！”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72、69、85、183、181、183、181、186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72、69、85、183、181、183、181、186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72、69、85、183、181、183、181、186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72、69、85、183、181、183、181、186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72、69、85、183、181、183、181、186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72、69、85、183、181、183、181、186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72、69、85、183、181、183、181、186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99—202、197 页。

三 实践纪录理论集成——《毛泽东文集》（1—2卷）览要

1993年起，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毛泽东文集》将陆续出版发行。该文集是除《毛泽东选集》之外的又一部重要文献，时间起迄于1921年至1976年。尽管它仍是一部选集而不是全集，但由于它将编入较多的文献，尤其是将编入建国后的许多文献，因此它有可能为学术界提供又一部重要的原著。

《毛泽东文集》现已出版第一卷和第二卷，这两卷文集收入了一些什么样的文献呢？

第一卷

《毛泽东文集》第1卷编入的是毛泽东自1921年1月至1937年6月这17年间的67篇文献。其首篇是《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末篇是《给何香凝的信》。这一卷中有不少文献曾编入过其他选集，如《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等。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进程看，第1卷中的文献，与自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至土地革命战争末期毛泽东从事的革命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相对应。根据客观历史进程，第1卷的文献大致可以划分为建党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井冈山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初到陕北时期）。

建党和大革命时期（1921—1927年）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时期。这两个时期编入《毛泽东文集》的文献共有12篇，其中绝大多数都很重要，它们表明毛泽东在这时已成为一个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革命者，在哲学上遵从唯物史观，在政治上能从世界范围考虑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并能摆正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国民革命”与未来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毛泽东此时已认识到，中国革命需要组织革命的政党——共产党，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12篇文献中，1921年的3篇文献和1922年的1篇文献，纪录的是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职业革命家前后的思想活动。《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1921.1.1—2）表明毛泽东不仅已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理想，并且也确定了把中国作为改造的重心或“下手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提出‘世界’，所以明吾济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济的下手处。”他认为“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故从事中国改造应放眼于世界的改造。毛泽东还否定了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罗素的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改造社会的办法，确认中国社会的改造方法应是“俄式”的，列宁主义的，尽管它“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但“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俄式”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致蔡和森的信》（1921.1.21）表明毛泽东正在考虑组建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共产党，并已认准“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针对蔡和森提出应建立共产党以成为革命的统帅部、作战部的

主张，毛泽东告诉蔡和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可见，毛泽东当时已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动人之一。《所希望于劳工会的》（1921.11.21）和《更宜注意的问题》（1922.5.1）两文，主要说明毛泽东20年代初是怎样指导工人运动的。他推崇当时风行一时的“劳工神圣”的口号，认为一切东西都是劳工做出来的。毛泽东的远见在于他在文中指明：劳工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他在工会组织形式上主张“一依西洋工会组织，由代表会议产生相当名额之委员付与全权组织委员会执行会务。”既不要旧式行会，但权力也不要太分散。工会的口号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等等。毛泽东关注着劳工的三件事：生存权、劳动权、劳动全收权。由于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影响，毛泽东对劳工权的分析有一定深度。他认为，劳工自己恃以得食和资本家恃以获利的唯一的“劳力”，首先靠着的是工人本身的“生存”。依此，成年劳工应从资本家那里得到“保存生命”的食物，六十岁以上年迈的劳工也应有救命的食物以“尽其天年”。这就是劳工的生存权。一个社会应给工人以工做，工人有要求做工的权利。若是社会让工人“赋闲”，就应本着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给与他们平常的工资，这就是劳动权。同时，工人还有劳动全收权，这就是工人做的东西应该完全归工人自己。尽管这种全收权是共产主义实行以后的事，“但也不要太忽略了，因为这实是世界已经有了的一个大潮流。”不过，毛泽东的这些看法书本气还较浓，并提出了一些超越时代条件的要求。

1923年撰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1923.4.10）一文，是毛泽东依据国情较系统分析中国政治形势与革命前途的最初尝试。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国内各派势力的存在，使中国的统一无法实现。而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是国民党，以及与国民党合作的新兴的共产派。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后来是研究系，新兴的知识阶级及商人派。反动派包括各大军阀派系。这三派中，前两派在稍后一个时期内会合作，因为反动势力太大。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短期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一时期内中国实行黑暗统治的原因：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势反动和侵略中国，它们会完全支持反动派。国内工商业非常不发展，除沿海铁路有点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经济生活。人民的组织，几乎全是家族的农村的手工业的自足组织，全国无一个有三十万确定党员的政党，也无大的报刊，而中国全体有人口四万万，这种社会情形只能由军阀来统治。但“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这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一天进步一天。”“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在这个时期才算完成。”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6、8—9页。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6、8—9页。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6、8—9页。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0—12页。

1925 年的 4 篇文献，表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政治路线已臻完备。他一方面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但在现实上赞成和推行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国民革命政策。此时，毛泽东已投身大革命运动，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候补委员和代理宣传部长的职务。在《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 发刊词》（1925.10.20）中，毛泽东高呼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万岁”。他指出：“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主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之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在《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1925.11.21）中，毛泽东以极为简炼的语言表述了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主张：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这表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及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在这时就形成了。该文还表明，毛泽东当时很注意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政治周报 发刊理由》（1925.12.5）是毛泽东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时撰写的发刊词，它声言刊物的宗旨是要宣传“一本孙中山先生革命策略”，“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的革命。《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1925 年冬），则是毛泽东分析中国政治问题的一篇力作。毛泽东认为，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在新形势下分裂出右派，是一种必然现象，是由他们的阶级基础决定的。他首先从国民党的历史来看问题，指出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的阶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目的是要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并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目前的革命与辛亥革命是不同的，辛亥革命虽然本质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但党组织简单，多数党员看不清此点。他们没有组织工农，那时国内也没有共产党，没有国际援助。现在的革命，其目标已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党组织完备，加入了工农分子；国内又有了共产党，国际上有无产阶级国家苏俄和第三国际做中国革命的后援。随着国民党的进步，一些新老右派就跑向反革命。从国民党的阶级属性看，兴中会、同盟会等是由无产阶级（会党）、半无产阶级（侨工）、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内地学生）、中产阶级（留学生及部分内地学生）这四个阶级的集合体。在孙中山改组同盟会后，黄兴一派小地主领袖就脱离中华革命党。而当孙中山改革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明白决定拥护工农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容纳共产党派分子入党后，就有代表买办阶级的领袖脱离它。后来国民党在广东的革命工作又激动了一班新右派的分裂。但现在是以革命的国民党统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第 16、19、21、22 页。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第 16、19、21、22 页。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第 16、19、21、22 页。

产阶级组织革命联合战线与帝国主义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的反革命联合战线短兵相接斗争的时候，那些站在中间的中产阶级既赞成革命又怀疑革命，他们梦想实现国家主义，建立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其目的是发财，做新的压迫阶级。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使人类从阶级压迫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情形下，代表中间派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和阻碍国民革命。这些假革命分裂出去，革命派将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

1926年和1927年的3篇文献，内容各具特色。《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1926.3. 18）一文主要是总结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它显示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理论水平。毛泽东认为，巴黎公社是欧洲“已由资本主义进为帝国主义”时代“激烈的工人革命运动”，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是阶级斗争。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果。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二是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终被敌人覆灭。毛泽东从分析中进而得出，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应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应从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中学得革命的方法。《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9. 1）是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的序言，它第一次集中论述了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之重要。毛泽东在文中提纲挈领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毛泽东看出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它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中国虽有买办阶级，但它们集中在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中国军阀政府的财政收入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拾得来的。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的阶级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因此，应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27.4. 19），是一篇阐述具体策略的文献。毛泽东提出扩大农民协会以建立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保护革命。废除封建专制，发展中国工业，提高文化等具体措施。这表明毛泽东处于大革命末期风云变幻之际仍致力于革命，并把注意重心放在农民革命运动方面。

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指从1927年八七会议到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割据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这一段时间。文集编入毛泽东在这段时间的文献总共是17篇。从数量上看，前期的文献占绝大多数。从内容类别上看，包括会议发言，法令，布告，书信，决议案，调查报告以及有关苏区工作的指示文件等。”它们反映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的一系列创造性活动。

《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8.7）一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是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摸索正确的革命道路的纪录。毛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8—30、33—35、37—39页。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8—30、33—35、37—39页。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8—30、33—35、37—39页。

《毛泽东文选》第1卷，第49页。

泽东在其中提出了“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等著名论断。同时，毛泽东与其他参加八七会议的党的负责人一起，坚决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土地法》（1928. 12）是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最早诞生的法律，它体现了毛泽东的伟大创造：把土地革命纳入法律秩序的范围。该法律规定了土地的没收，分配，使用，土地税之征收等内容，共有九条，从根本上维护了广大农民尤其是贫雇农的利益。尽管它有如下几个缺陷，如没收一切土地，而不只是没收地主土地；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是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等，但它确是一个使土地革命有法可依的创举，并且指引着革命者在今后的革命中会更加注重革命的法制建设。《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1929. 1）是毛泽东起草，以四言形式公布的工农革命军的革命主张：反帝反封建，打地主、分田地，主张工人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外资工厂银行收归国有，实行统一累进税，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夺取政权，完成中国独立、统一大业。

1929年的另3篇文献主要与军事斗争相关。《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4. 5）主要是提倡发展农民斗争，并较为完整地阐述了红军的战略战术，针对党内一些不正确的看法，毛泽东在信中指出，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这是错误的。毛泽东不同意中央要求朱、毛离开大的队伍的主张，认为红军应集中作战，这样才能胜利。他还阐明了红四军的战略战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办法，发动群众。”《给林彪的信》（1929.6. 14）是毛泽东想要解决红四军创立三年来内部的一些争论，毛泽东认为它们是“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争论的问题主要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分权与集权；以及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军事技术等等。这些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得到基本解决。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 12），可说是毛泽东农村建党、建军和军队思想工作的集中体现，它包括如下方面：党的思想、组织、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和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士兵待遇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决议案首先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它们主要是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这些错误思想的阶级基础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在党的组织基础占最大部分，导致党内政治水平低。党的组织问题主要是未执行党的组织路线，党员质量差，组织松懈，党内青年组织及其工作作的不够。针对种种错误思想，决议案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它指出，要明白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的武装集团，应担负起消灭敌人和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及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任务，应克服雇佣军队的思想，要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增强组织观念，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问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9、52、55—57、64页。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9、52、55—57、64页。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9、52、55—57、64页。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9、52、55—57、64页。

题，等等。要坚持党的组织原则，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立一个党小组。克服纪律松懈现象，提高党内教育的方法；改进红军的宣传工作和宣传技术，加强士兵的政治训练；加强官兵团结，以法律程序废止肉刑；关照伤病兵；处理好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等等。可以说，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军队建设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它为红军初创时期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毛泽东思想中有关建党建军理论的发展确立了前提。

文集中收入的《寻乌调查》（1930. 5）、《东塘等处调查 前言》（1930. 11）、《分青和出租问题》（1930. 11. 15）、《兴国调查 前言》（1931.1. 26）、《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1931.4.2）、《长冈乡调查》（1933. 11）、《才溪乡调查》（1933. 11）等7篇文献，是毛泽东在对农村的一系列调查基础上写成的。其中对处于江西、广东、福建三省交界的寻乌的调查，是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在革命发生前和发生初的典型解剖。《（东塘等处调查）前言》等其他几篇文献，亦为毛泽东制定较完善的土地政策和阶级政策提供了依据。《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则是毛泽东对苏区基层政权建设及其革命现状的全面调查：以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提供典型经验。

集中收入的另4篇文献，主要与苏区工作有关，其中有一篇涉及宣传工作。《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1931.2. 28），主要是解决苏区的分田、耕牛及红白交界处清匪问题，贯穿的是“民权革命”的主张。《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1933. 6），目的是解决土地分配后的查田政策，是要清查漏划的地主、富农，按照当时的土地法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财产。《乡苏怎样工作》（1934.4. 10），解决的是乡苏这种苏维埃的基本组织的主席团、代表会议、乡村的组织与工作、乡与村的委员会、区苏对乡的领导等领导体制和工作方式问题。涉及宣传工作的唯一一篇文献《普遍地举办 时事简报》（1931. 3），是毛泽东专为军队和地方革命政权写的关于在红色区域怎样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和小册子，它表明毛泽东对这种宣传工作予以极大的重视。该文献认为，《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收入文集的文献总共有38篇，起迄时间是1935年11月至1936年6月。这38篇文献中，10余篇是宣言、讲话、决议、布告、谈话、协定草案等，另20余篇是书信。它们表明，毛泽东此时的注意重心已放在实现抗日救国方面，已在为争取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努力。具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文献内容各有侧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1935. 11.28），主要是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它阐述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经费；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救灾治水，安定民生；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发薪发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78—115页。

此处内容从略，详见本书《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览要》章。

详细介绍请参阅本书《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览要》章。

员的生活；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与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这十大纲领的内容，后来在其他文献中不断得到完善。

文集中收入的毛泽东同三位外国记者的谈话，其内容都很重要。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1936.7—9）中，毛泽东首次较系统地阐明了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抗日和统一战线政策。关于外交，毛泽东期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间立场。他具体分析了美国、英国、法国等反战国家，亚洲、美洲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社会主义的苏联等各种类型的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同盟，以抵抗日本法西斯的压迫。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认为中国战胜日本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毛泽东还估计到，中国抗日战争牺牲尽管很大，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依靠军队采用运动战，配以阵地战，并发挥全国人民抗战潜力，就可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在统一战线的具体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应国共合作，建立国防民主政府，以抵抗日本侵略者；给广大人民以民主权利，加速发展国民经济，实行联苏联共保护中国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以组织起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线，夺取抗日斗争的胜利。在《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和史沫特莱的谈话》（1937，3. 1）中，毛泽东基本上重申了与斯诺谈话的立场。并具体提出了抗日的民族阵线之主要政纲八项：国内的和平统一；对日抗战；人民的民主自由；南京政府转变为真正的国防政府，容纳各党各派，罢免亲日派；国家制度改变为基于普选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工商业；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毛泽东声称，为了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具体作到如下四点：一、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并受南京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二、在特区政府境内施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三、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总之，结束国内敌对，把目标移到日本侵略者身上，以打破日本帝国主义“不战而亡人之国的企图。在同韦尔斯的谈话即《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1937.5. 15）一文中，毛泽东主要是阐述西安事变后统一战线开展的前景及内容。他指出今天为抗日所作的准备是停止内战，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开放人民救国的一切自由，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同时加速完成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抗敌准备工作。此外，毛泽东还估计到中日战争胜利与亡国的两种前途，深信中国能夺取光明的前途。

文集收入的 20 余件书信及宣言、布告、通电、协定草案、命令等文献，表明毛泽东为在新形势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其总的策略是以斗争求团结。一方面广为宣传中国共产党人抗日救国的政策和主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第 361 页。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第 390—411、479—493、501 页。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第 390—411、479—493、501 页。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第 390—411、479—493、501 页。

张，以博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另一方面对国民党政府机关、政要、军要、资深人士及地方实力派展开政治攻势，推动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给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傅作义、宋哲元、王以哲、杨虎城、高桂滋等人的信，给宋庆龄、宋子文、蔡元培、何香凝等人的信，其中心内容就是围绕抗日二字。同时，给党内同志如张闻天、朱德等人的信，也主要是谈抗日，并强调抗日反蒋不能并提，为了抗日党的阶级政策也应加以改变等等。

文集中的其他一些文献，涉及的重要内容包括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对抗日战争战略的初步制定，以及对党内错误思想路线的清算。《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35. 11. 30），除总结直罗战役胜利的原因外，还着重分析了世界政治形势和日本妄图独霸中国的野心，中国内部国共两党情况，并为红军提出了猛烈扩大自己的任务。《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1935. 12. 23），是毛泽东为行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制定的军事战略。其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之下，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发挥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使白军士兵革命运动在民族战争旗帜之下；把蒙回两族反日反中国统治者的斗争提到武装斗争的程度；执行“抗日联军”的策略，争取“第三营垒”，同苏联红军结合起来，等等。在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是，进行战略防御时，执行积极防御，执行后发制人的作战原则。战略反攻时，反对机会主义，为扩大战果，夺取先机而奋斗；反对冒险主义，波浪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一般原则是运动战，集中兵力于主要方面，战略上一个拳头打人，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消灭战，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等等。

《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1937.6. 5）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的一部分，它可说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之前较早从思想路线上清算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开始。毛泽东指出，党在十五年中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有伟大的成绩。但党除了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差不多在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党既有革命的传统，也有不良的习惯。不良习惯表现在群众斗争战术上的“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宣传教育上的不联结实际，党八股等作风；党内关系上的高傲态度、里手主义、风头主义、派别观点、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作风等。其原因是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党内环境的极端困难；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占大的数目，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不强，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还没有普及与深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普及与深入，这些不良习惯是可以系统地提出来解决，新的环境与任务迫切要求对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转变。

文集中收录的毛泽东《为徐特立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1937.1. 30）有特殊价值，它推崇的是一种党性修养和道德标准。毛泽东在信中称赞徐老

某些书信内容的介绍参阅本书《毛泽东书信选集 览要》章。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76—381、505—510、477—478页。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76—381、505—510、477—478页。

有坚定的革命立场，不服老，不怕困难，敢负责任，虚心好学，表里如一，密切联系群众，严格服从党的纪律。总之，徐老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故此，毛泽东愿徐老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第二卷

《毛泽东文集》第2卷收入的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文献，即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5年多时间内写成的111篇文献，具体时间起迄于1937年8月1日至1942年12月。这些文献的内容主要包括抗日战争的军事策略，政治策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包括法制建设），经济建设，党的建设，调查研究以及哲学、文学、史学等诸多方面，其中有关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文献在该卷中具有较特殊的价值。

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毛泽东已将极大的精力投入到这场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因此他在这一时期留下的文献大多与抗日战争的军事、政治策略的制定有关。并且由于抗日战争首先和直接的是军事斗争，所以军事战略战术的正确制定又是毛泽东最为关切的。据统计，第2卷中直接和间接涉及军事的文献总共50余篇，占总数的一半以上。作为大军事家，毛泽东对抗日战争战略战术的制定总是实事求是的，高瞻远瞩的。在《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1937.8. 1）中，毛泽东提出了红军作战的总原则，认为红军作战应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以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在《对国防问题的意见》（1937.8. 4）中，毛泽东对中国各道防线的地理位置、兵力布置发表了见解，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准备将来转变到战略进攻，恢复失地。实行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等等。在《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解释》（1937.9. 12）、《关于敌情判断及八路军的战略部署》（1937.9. 17）、《关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1937.9. 21）、《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1937.9.25）、《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意见》（1937.9.25）、《关于战略计划和将来行为的意见》（1938.2. 23）等文中，毛泽东论述的都是游击军事战略战术问题。而《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1938.1. 11），则是毛泽东对袭击这种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具体详细的阐述。

抗日的军事策略与中国及世界的总的政治、军事形势和政治策略是总相关联的。在文集中毛泽东对政治和政治策略的论述也非常多，这些论述表明毛泽东随时把握着中国及世界政治的历史进程，并随时制定了与这种政治形势相适应的政治策略。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1937.9. 1）中，毛泽东分析日本大规模进攻和中国全国性抗战开始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将发生新的变化，如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抗战，并且抗日战线中的左派、中派、右派和国内阶级关系都在重新变化。他提出在政治上要根据“十大纲领”动员全民族抗战，在军事上要实行持久战以争取抗战胜利。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

（1937. 10）中，毛泽东对抗战的形势、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和建立全中国的坚固的共产党等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具体论及了如下问题：中日

战争的现状与估计，危机与困难，共产党的立场，决定中日战争胜负的具体因素，扩大与巩固以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与武装人民，帮助政府与军队抗战，组织巩固的后方，坚持游击战争，扩大与建立国防工业，争取国际援助，及建立全中国的强固的共产党以作战胜日寇的先决条件等等。

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毛泽东即在一系列文献中对这种军事、政治形势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对策。《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1939.1. 28）一文，便是毛泽东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对中日双方军事、政治形势的系统分析。他指出，自武汉、广州失守以来，中国将更加困难。由于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的丧失，国家政权与作战阵地在地域上被敌人分割，财政经济上的困难增加了。但中国也更加进步。这主要是坚持抗战，增加力量，准备反攻。另一方面，日本的进攻力量弱了，已成“骑虎难下”之势，军事上兵力不足，经济上困难，外交上更孤立，英、美、法等民主国家和苏联都不喜欢它。但中国的整个进步之中有部分退步，这就是国民党内有亲日反蒋派反共派，还有抗日拥蒋反共派，他们在统一战线里闹磨擦，这就不容忍姑息。但国民党确定了坚持抗战的方针，什么文章都容易做了，这是统一战线中进步的东西。《反投降提纲》（1939.6），是毛泽东针对国内时局提出的政治对策。他指出，由于三方面的因素，国民党投降已成为最大的危险，这三方面的因素是：一、日本“灭亡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方针和诱降政策；二、英、美、法等国对于侵略国的放任政策和“坐山观虎斗”阴谋及劝降等压力，不赞成苏联所提的普遍安全计划。三、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必须全力反对投降，坚持国共合作。但由于会产生国民党小部投降或大部投降两种前途，相持阶段可能会出现多种情况。为争取光明前途，共产党应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对付各种大小事变。同一切爱国分子亲密联系在一块，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巩固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总之，团结能战胜一切。《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1939.9. 24），重点是解释国共两党抗战基础的不同。毛泽东指出，尽管中国早已实行统一战线，但蒋介石等少数人却在事实上不承认，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不给共产党的法律地位。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中央政府代表地主资本家，尽管它已不打内战而打日本了。而共产党人是社会革命论者，它要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又要使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目前阶段的首要问题是抵抗日本，反封建的任务也服从于这第一位的目的。但是，抗日要求实行民主政治，改革旧的政治机构，改变政府组织。《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1940.7. 13），主要是从世界范围内论述战争与革命问题以及中国问题。关于战争与革命问题，毛泽东认为苏联不加入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是苏联善于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世界战略上最伟大的胜利。它不但保护了苏联，也保护了世界革命的胜利。由于两大帝国主义阵线即英美法等国与德意日等国之间存在着矛盾，这就可供革命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等于打断了两条帝国主义锁链，资本主义可能冲破，革命就不可避免。毛泽东还指出，在中国，抗日与革命是一个东西，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有区别，又有一致。而一切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共产党人的战略策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内部既团结又斗争，它要求站稳立场，又争取同盟军。《日苏缔

约后英美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态度分析》（1941.4. 20），是毛泽东针对日苏缔约后国际局势的变化，分析中国英美派、顽固派、中间派及进步派中之动摇分子，均将在英、美影响下对苏献媚，惟顽固派中之死硬分子有被亲日派拉向投降的危险。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方针是要争取国民党主体转变到亲苏、和共、改良的方向，而以维持他们的政权，承认我们的地位为条件。

从以上述及的文献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政治策略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统一战线策略。统一战线策略在其他一些文献中毛泽东也有充分的论述。例如，《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说》（1938.2. 11）主要是号召结成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的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阵线。《给范长江的信》（1938.2.15）亦是谈国共两党执行共同纲领问题。《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1938. 2）除了谈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外，还谈到了国共合作的前途，及共产党的“民主共和国”主张和欢迎美国同情中国抗日等。《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1933.3.3）重复了以国际的、中国的以及日本国内的三个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并提出了“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公式。

文集中收入的几篇有关端正党风的文献，主要是对王明左倾路线从思想上进行清算，并通过这种清算达到全党空前的团结。《驳第三次“左”倾路线》（1941）是一篇说理性强、语锋犀利、较系统地清算了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文献。毛泽东在文中首先指出，临时中央工作的“各种形式”，其实就是打、闹、叫。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他们提倡打倒一切，采取单纯的片面的冒险，极端狭隘的关门主义与盲动主义。他们的土地政策，连同政治、军事、组织路线的错误，结果闹出一场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接着从哲理角度分析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一真理。他指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他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是瞎子，却妄欲充当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毛泽东进而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者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观主义。指出他们凭主观愿望到处发现“机会主义”，以这种方法造出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造出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他们连什么叫做“两条路线斗争”一点不懂得，不知道它就是对于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着的一定事物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肯定它的暂时安定性的一种方法，他们不是从中国社会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出发分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而是完全离开了具体的科学的研究，其斗争方法是“乱斗法”。不肃清这种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9. 10），是一篇专门从思想上清算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的文献。毛泽东在该文中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主观主义表现更为严重，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具体表现是：在苏维埃运动后期提

倡搞社会主义革命，否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认为当时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决战。在军事上，使红军遭受更大的失败，不合实际的提出扩大百万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在组织上，打击干部，胡乱肃反，等等。这条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仍有主观主义遗毒。这种主观主义的来源是：除中国的“左”的传统，外国的即共产国际的影响，更有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存在和影响。克服这些不正之风的办法是认识主观主义的严重性，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提高理论，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克服空洞的理论，研究实际问题；克服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实行学制改革，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全党动员，增强党性，调查研究，等等。

《关于整顿三风》（1942.4. 20）则是一篇专论进行思想教育，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文献，其重心是号召全党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把理论和实际行动联系起来，学好中央二十二个文件，把文件上讲的东西和自己的行动联系起来。通过整顿党风学风文风这三风，在全党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目的。此外，《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8. 1）、《关于农村调查》（1941.9. 13）等文献，亦是为了整顿三风而在党内大力提倡调查研究的，其目的是要在全党坚持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文集中收入的有关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些文献具有特殊价值，它们不仅在当时对于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在理论上有指导意义，而且在今天仍然值得借鉴。这些文献中，首推重要的是《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5. 1）。这一纲领是以法律的形式将党的政策确定下来，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具体化，并在实质上起了陕甘宁边区的宪法作用。它总共有 21 条，内容比较完整，包括团结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抗日；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加强军民团结，优待军属；民主选举，中共与党外人士的民主合作；保护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各项自由权；改进司法制度，厉行廉洁政治；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土地私有制，调整租佃关系；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继续推进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推广卫生行政；实行男女平等，坚持一夫一妻婚姻制；实行民族平等；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正确对待游民分子及会门组织；对敌俘实行宽大政策；允许外国人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进入边区，等等。

除上述纲领外，有关边区民主政权建设的文献还有《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等。《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1940. 12. 13）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虽然具体针对的是苏北，但具有普遍性。毛泽东在其中强调：政权机关应坚决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劳动政策力避过左，土地改革应实行部分的减租减息；减除苛捐杂税，锄奸只镇压少数反动分子；发展工业、农业、商业，鼓励资本家办实业；容许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及教育家办报办学；去掉买办资产阶级及封建大地主的专制主义，保证工农小资产阶级及除汉奸外的资本家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政等等。《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1938.7. 2），主要是谈陕甘宁边区在中国的意义与作用，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设。毛泽东指出，在抗日的原则下，民众有自己的组织，人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

有关调查研究文献的内容，参见本书《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览要》章。

结社之自由；抗日军队能与人民打成一片；教育是民主的；经济也实行民主，人民生活得到改良；最重要的是，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选举的。“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民主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范围内的作用，是坚持抗战、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以中国、世界及日本国内的“三个统一战线”缩短战胜日本的时间，在抗战胜利后完成建立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的任务。此外，毛泽东在《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1942. 3）一文中，在强调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时也主要是围绕民主政权建设展开的。他强调在各抗日根据地内，政府系统、参议会系统及民众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均应实行“三三制”。党外人员在法律上与共产党员是完全平等的，要有专门的组织管理机构对党外干部负责，等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寇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和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使边区遭受到极大的经济困难。为了克服困难，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号召全体抗日军民进行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建设好革命根据地的经济。为此，毛泽东写下了一些经济专论，如《关于财经建设的基本方针给谢觉哉信》、《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关于财经建设的基本方针给谢觉哉的信》（1941.8. 6），主要阐明的是边区财经工作的规律性。毛泽东指出其规律有两点：发展经济和平衡出入口。他强调应以此两点来检查经济工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 12）是毛泽东较系统论述边区经济建设问题的一篇重要文献。他从具体分析边区的经济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入手，指出应自己动手克服外援全断而造成的困难，发展经济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应建立经济核算制，改善工厂的组织与管理。总之，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否则，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毛泽东还强调，如果我们样样能干，惟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无阑之人，就要陷于灭亡。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此外，《边区的货币政策》（1938.8. 17）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毛泽东战时的经济、财政思想。它规定了边区货币政策的原则，如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货币量应适应市场需要，应有准备金；对外贸易政策应作为货币政策之后盾；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注意维持边区纸币与伪市的比价，等等。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鼎盛期。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哲学、文化、文学艺术、史学等思想都进入成熟时期。围绕抗日这个中心，毛泽东在这一时期除了从事繁重的军事、政治、党务等工作外，还非常重视文化工作，他不仅注重对抗日军民的思想和文化教育，更是号召全党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哲学，并运用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共党史、清理中国文化遗产，同时还学习自然科学以用于发展生产，等等。文集中收录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表明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文化、文学艺术、中共党史、民族史以及自然科学等等多有涉猎。关于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文献，主要有《关于差别和矛盾问题》、《关于 墨子哲学思想 一文给陈伯达的信》、《关于 孔子的哲学思想 一文给张闻天的信》

等。《关于差别和矛盾问题》（1937）是毛泽东就哲学中的两个概念进行探讨，他针对艾思奇“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认为“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并提出“差别就是矛盾”的命题。在《关于 墨子哲学思想 一文给陈伯达的信》（1939.2. 1）中，毛泽东认为陈伯达的《墨子哲学思想》在中国找出了赫拉克利特，并认为墨子是中国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他还就一些哲学概念如事物的质、质与属性、“志气”、行为与行、因果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半、端及中庸等进行了讨论，并就墨子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庸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等进行比较，认为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故此，毛泽东认为不能把墨家说成折衷论。在《关于 孔子的哲学思想 一文给张闻天的信》（1939.2. 20—22）中，毛泽东对孔子哲学思想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孔子哲学的整个纲领是观念论，其长处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毛泽东认为，这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劳，并把过与左倾联系起来，把不及与右倾联系起来。他还认为孔子的道德论应当批判，并指出孔子的知仁勇一概是主观的。而孔子的认识论与社会论除形而上学外，有辩证法的许多因素，如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在《关于经学问题给范文澜的信》（1940.9. 5）中，毛泽东对范文澜的工作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他头一次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指出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

《论鲁迅》、《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等文献主要展示了毛泽东的文学、艺术观。在《论鲁迅》（1937. 10. 19）这篇演讲中，毛泽东给了现代文学家鲁迅以极高的评价。他指出：鲁迅在中国革命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鲁迅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布尔什维克。一贯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充满了艰苦奋斗的精神。鲁迅以一支笔朝着腐败、帝国主义恶势力进攻，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他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他看清了政治方向，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他具有牺牲精神，一点也不畏惧敌人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主张打落水狗。故毛泽东号召要学习鲁迅精神，把鲁迅精神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1938.4. 28）中，毛泽东主要论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点。他指出，艺术的政治立场是以团结抗日为中心，形式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既有对现状的记述，也有对将来理想、光明和希望的追求，宣传革命的精神，鼓舞人们前进。中国文艺界要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不可艺术至上主义。艺术作品要注重营养，要有生动的形象和情节，要贴近实际生活。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为新中国

而奋斗。艺术工作者要到实际生活中去吸取养料，到群众中去，掌握大众语言，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以及《关于研究民族史问题给何干之的信》等文献，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史学思想。《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3. 30）同时具有史学和史学方法的意义，它是毛泽东对中共党史首次作分期研究，也是毛泽东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的首次系统说明。他认为，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研究党史的根本方法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或叫做“古今中外法”。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己方和彼方。毛泽东指出，党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各个阶段革命的任务、联合的群众、革命所打击的目标都有具体的不同。大革命实质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因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这段材料研究一下。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国际无产阶级怎样同他们斗争，这就叫“中外法”。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但研究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还要研究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否则研究就不会有结果。《关于研究民族史问题给何干之的信》（1939.1. 17）亦间接显示了毛泽东的治史方法，毛泽东在信中赞成何干之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鼓励何干之切实地做好民族史，并称自己有志未逮，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

《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40.2.5）等文献，表明毛泽东对自然科学的热切关注。他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但对自然科学的运用与社会制度有关，边区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社会的改造，因此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就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毛泽东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得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正因为推重自然科学，所以毛泽东在《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1941.1. 31）中建议毛岸英、毛岸青“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并称“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此外，在《文化课本 序言》（1942.1. 17）中，毛泽东也提出了这样的愿望：一个革命干部，必然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

文集中还收录有一些关于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以取得抗战胜利方面的文献。例如，《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1938.4. 9）阐述的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提倡的是为战胜日本侵略者敢于牺牲一切。在《永久奋斗》（1939.5. 30）和《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1938.3. 12）等文献中，毛泽东亦强调了艰苦奋斗等精神。另外，文集中也收录了一些强调学习的文献，如《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5.

20) 是号召来一个学习运动，号召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号召人们用“挤”和“钻”的钉子精神去攻书。

四 经典荟萃思想指南——《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览要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是一部经过精选的上、下两册集本，它选辑了毛泽东最重要的著作 68 篇。这 68 篇文献中，有 42 篇（包括节选）选自《毛泽东选集》1—4 卷（旧版），9 篇选自《毛泽东选集》第 5 卷，6 篇选辑自《人民日报》。2 篇选自《毛泽东书信选集》，1 篇选自《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1 篇选自《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7 篇辑自手稿原件。从这个选读本的文献取材来源看，绝大多数取之于已公开发表的文集或报刊。这个篇目数量不大的选本，确是一个精选本。它根据少而精的原则，选辑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和建国以后至 60 年代前期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其内容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即它是纵贯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不同时代的重要文献的综合。显然，这个经过精选的版本充分体现了编辑者的意图，这正如该选本的出版说明所指出的：“编辑出版这部选读，是为了向广大干部和青年提供毛泽东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科学著作，以便于读者学习和研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果——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为了便于人们了解、掌握毛泽东思想精华，这个选读本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第七部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置于卷首，以起序言或引言的作用。

与 1964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相比，这个新的精选本在书名上与它是一致的。但选辑的篇目却比它多出 31 篇，1964 年版选辑的文献总数仅 37 篇（上册 16 篇，下册 21 篇），新旧两个版本在文献选辑的数量上有差异，一方面是由于两者文献选辑的时限不一致，1986 年版选辑的文献最早时间为 1921 年，最晚时间为 1965 年。1964 年版选辑的文献最早时间和最晚时间则分别为 1926 年和 1963 年。因而新版本就有可能收录旧版本收录时间范围之外的文献，如《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等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新版本收录的文献内容更宽泛一些。例如，它收录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等等。另外，1986 年版中的《学习和时局》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两文节选的字数比 1964 年版的要长，篇名也不一样，后者所拟篇名叫《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反之，1964 年版选辑的一些文献，新版中也没有，这些文献是《组织起来》、《党内反对错误倾向问题》、《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按语选》、《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介绍一个合作社》等。这表明，由于编辑方针的不同，1986 年版所选辑的文献内容更精一些，更偏重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更切合实际，更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由于 1986 年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与《毛泽东选集》1—4 卷（新版）有 43 篇文献（因《反对本本主义》新收入）相同，并且这 43 篇文献在《毛

《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上册，第 1 页。下引此书，不再注版本。

1964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亦出版过《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它的篇目数也是 37 篇，但内容更精简，且有少量篇目与甲种本不同。

泽东选集 览要》中又被综合研究过，所以本章对它们不再重复研究。又由于另外 25 篇文献中民主革命时期的 6 篇，《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为徐特立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给雷经天的信》、《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分别在《毛泽东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中被收录，故本章对这几篇文献亦不再予以专门研究，而将重点放在自 1949 年 9 月以后的 19 篇文献的内容上。

《毛泽东著作选读》中的这 19 篇文献，粗略地展示了自建国之日起至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思想发展行程中的光荣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人们把握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在建国初期、过渡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在经过三年困难之后的恢复时期拓展延伸的轨迹。现在来逐一进行理解和把握。

建国初期，《毛泽东著作选读》选辑的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文献有两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和《不要四面出击》。《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9.21）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的开幕词。毛泽东首先分析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他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各种重要法律，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等。毛泽东接着以豪迈之情这样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毛泽东还指出，应牢牢掌握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这一有力武器，和苏联、各新民主国家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团结一起，使中国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中国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不要四面出击》（1950.6. 6）属于一篇政治方面的文献。它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毛泽东分析了伟大胜利形势下的复杂斗争和困难，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够大够多”，这些敌人包括帝国主义、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地主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的反动势力等等。为了孤立和打击这些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尤其是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团结少数民族。总之，不要四面出击。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

过渡时期，《毛泽东著作选读》收录毛泽东在过渡时期的文献总共有 5 篇，其内容基本上是围绕着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6. 30）是篇讲话，它既讲了青年团的工作，也讲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毛泽东在其中指出党和团的领导机关都要学会领导团的工作，善于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照顾青年特点，组织和教育广大青年群众。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要保护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毛泽东接着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

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青年团如何执行这个总任务，也应当按照青年的特点作出适当决定。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 12）由两段文字组成，其中第一段文字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公布的，第二段文字则是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提纲时增写的。第一段文字明确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二段文字亦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只有完成向社会主义所有制过渡以后，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生产出各种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巩固人民政权。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6. 14），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它表明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内注重社会法制建设。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说明了制定宪法草案的方法，他指出，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就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宪法草案的好处主要有两条：第一，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第二，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性即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灵活性是指实现公有制的各种灵活形式和逐步扩大公民权利等等。毛泽东强调，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尽管这个宪法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而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但它的目的是要团结全国人民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4.9.15），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会议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全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毛泽东还特别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1. 25）一文，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在这篇文献中，毛泽东回顾过渡时期的主要工作并展示了今后的规划。他指出，在过去的六年中，前三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土地改革及各项社会改革，从1955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革命以极广阔的规模展开起来，大约再有三年时间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所有制改变以后，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

创造了社会条件。毛泽东还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我们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这就需要有干部，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团结一切力量为之奋斗。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著作选读》选编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献 12 篇，其中成于 50 年代中后期的 8 篇，成于 60 年代前期的 4 篇。它们主要反映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探索以及对这种探索的经验总结。

毛泽东在 50 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留下的几篇文献显得特别重要，它们是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开始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思想指南，也是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纪录，其中最重要的是《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论十大关系》（1956.4. 25），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它是毛泽东进行大规模调查研究中国国情和总结中国经验的产物。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法，并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具体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应处理好的十个重大问题。这十个重大问题是：一、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毛泽东认为应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才能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重工业的发展，基础会更加稳固。二、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毛泽东主张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者底子，才会更有力量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三、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毛泽东认为要加强国防建设，并要有原子弹，就要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四、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毛泽东提出应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不能只顾一头。五、关于中央和地方。毛泽东提倡中央统一领导与地方的独立性相结合，提倡各地方发挥积极性，顾全大局、互助互让。六、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毛泽东号召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七、关于党和非党。毛泽东主张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认为有几个党存在好。八、关于革命和反革命。毛泽东认为除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外，大多数反革命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镇压反革命要作艰苦的工作，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革命事业有利。九、关于是非。毛泽东主张在分清党内党外是非时，对待犯错误的人应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因为这是一条团结全党的方针。十、关于中国和外国。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认为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更不要学其短处、缺点。包括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也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能搞教条主义。毛泽东认为，这十大问题或十大关系，都是矛盾，要正确处理它们。他最后号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8. 24），是一篇充满辩证法思想的文献。中心是讲怎样学习外国。毛泽东在谈话中，把音乐和艺术问题放在中国

如何学习外国好的东西这一原则上来展开。他认为，大至中国革命，小至两片树叶，所有事情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所以，无论是向外国学习文化艺术，还是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要反对教条主义，都要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把它加以改变，变成中国的，在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的同时，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学习外国人是为了中国人，学习外国的长处，应整理、创造出中国自己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使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2.27），是一篇对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献，它原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经修改和补充，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篇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同样是积国内国际经验尤其是吸收苏联曾一度否认阶级斗争存在后又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提出来的，总共谈了十二个问题，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

毛泽东首先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表现为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与一切反抗、敌视和破坏这一事业的敌人的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此外，工人阶级等等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中国具体条件下，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因为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使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毛泽东认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对敌人，用专政的方法；对人民内部，用民主的方法，具体来说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只能用讨论、批评和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毛泽东还指出，要敢于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并且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不过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它们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飞快发展，但它又还很不完善而与生产力有矛盾。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等等又使它与经济基础相矛盾，必须按照具体情况，不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现在的情况是，在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不大习惯；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学习和取得经验。在这个时候，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人民发展社会的经济、文化、巩固新制度建设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毛泽东接着讲到了肃反、农业合作化，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及统筹兼顾等问题。毛泽东认为肃反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应该有个正确的估计。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方针应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目前的情况是：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但应考虑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丧失警惕

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认为它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是积极拥护合作社的，合作社还要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和分配上处理这些矛盾，使农民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关于工商业者，毛泽东认为在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以后，他们经过了改造，但还需要进一步改造，他们还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所以，他们必须在工作和学习中彻底改造自己。同时，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比较重视，他认为几百万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转到为新社会服务，有一个适应的问题。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并有少数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而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因此应给予知识分子以信任。使他们的才能得以积极的发挥，并善于团结他们，尊重他们的劳动。广大知识分子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尤其是青年学生，应该使他们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少数民族，毛泽东认为他们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汉族和他们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以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毛泽东从中国六亿人口出发作计划、办事、想问题的方针。毛泽东认为只有实行这一方针，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毛泽东在讲话中甚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毛泽东认为它们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不主张利用行政手段干预艺术和科学，认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它们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这是因为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被看作毒草，看着是错误的东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意见仍是常有的事，尽管不是有意压抑而是由于鉴别不清。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可以批评，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批评不倒的。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亦宜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对于香花和毒草，毛泽东具体地提出了六条辨别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下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毛泽东说，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是不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他还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口号是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民主党派得到人民的信任，共产党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同时，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因为一个党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有民主党派的监督对共产党更为有益。尽管在反右运动开始以后，毛泽东在修改这一文献时对百花齐放等问题的论述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增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有时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等与讲话主题不太相协调的东西，但他坚持“双百”方针，主张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解决人民的思想问题，这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也有现实意义。

毛泽东最后讲到了少数人闹事、坏事能否变成好事、节约、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他指出 1956 年有少数工人学生闹事，其原因既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也有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以及对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不赞成闹事，认为人民群众也不会无故闹事。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当然，对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行凶犯法的人，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对于闹事这件坏事怎么看？毛泽东认为它能变成好事，这是因为乱子有二重性。例如 1956 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是坏事，但是它教育和锻炼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就变成好事。事情总是要朝相反的方向转化的。关于节约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节约是解决一个很穷的国家进行大规模建设这一矛盾的方法，全国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毛泽东所讲的工业化道路，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经济建设以重工业为中心是肯定的，但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和资金，就会更快地发展。毛泽东希望经济建设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为了使中国变为工业国，他主张学习一切国家的好经验。

50 年代中后期的另 5 篇文献，其内容各有特色。其中《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 11.12），是毛泽东在孙中山诞辰 90 周年写的纪念文章，文章称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并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建有丰功伟绩。文章说，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把它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在进到 21 世纪的时候，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1957. 3）一文，是毛泽东所作两次讲话内容的节录，中心是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求干部不要去闹名誉，闹地位，争名夺利；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毛泽东还提出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职位高的不要摆官僚架子，要密切同群众的关系。《又红又专》（1958. 1），原是《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一条，毛泽东从哲理角度论述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对立统一关系。他认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就是又红又专，并且永远如此。从二者关系看，思想和政治是统帅和灵魂，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

的保证。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也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1958. 12. 1），是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写的一篇文章，也是从哲理上对帝国主义进行剖析。毛泽东认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它们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反动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时，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所以，在战略上应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在策略和战术上把它们又应看成活的铁的真老虎。毛泽东还认为，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一方面藐视它，另一方面又要重视它。对于任何事物，头脑要冷又要热，这样才能真正促成事物的转化。另外，《党内通信》（1959，4. 29），是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为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倾向而写的一封信，涉及的是一些具体问题如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问题等。毛泽东在信中说自己是在唱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这封信可以说是对大跃进错误的初步反思和纠正。

这一时期中，60年代前期的4篇文献甚为重要，它们是毛泽东对50年代后期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深刻反思和总结，哲理气味非常浓郁。这4篇文献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1. 30）这篇文献，选读本在选编时作了删节。毛泽东原先讲了六点意见，选读本只收编了其中的四点“意见”。其中第一点是讲开会方法；第二点重点讲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同时，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也很难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毛泽东希冀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称赞汉高祖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批评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不爱听别人不同意见的项羽，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霸王别姬”。毛泽东进而指出，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因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第四点是讲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毛泽东强调，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的客观世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尤其社会主义经济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从1950年到1957年底的头八年内，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总路线及其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从1958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

线，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但由于经验还不足，我们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结果干了许多蠢事。经过一段实践之后，我们就比较主动和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在最后一点中，毛泽东讲的是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问题，中心仍然是围绕民主集中制。他指出，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许多时候，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对犯错误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总之，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人民大众团结起来。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 5），是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时增写的一段文字，讲的是认识论问题，可视为《实践论》的扩展。毛泽东强调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的认识要经过两个飞跃阶段，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号召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1963. 12—1965），是由毛泽东的五段文字组成。毛泽东论述的分别是这样一些问题：要反对固步自封、骄傲自满，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对待成绩和缺点，要向群众的实践请教；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人类须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类既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而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这一组文字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升华，它表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独特的见解。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963.9，1964. 12），是毛泽东修改有关文件时增写的两段文字，它表露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渴求，并揭示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毛泽东指出，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除抗日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但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提倡我国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五 艰辛开拓宝贵经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8册）览要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多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从1987年起已开始陆续发行，到目前为止已发行8册，这8册文稿收录了毛泽东自1949年9月至1959年12月这10年间的2831篇文献，总计字数3286万。这些被收录的文献包括三大类别：（一）手稿（其中有文章、指示、批示、讲话提纲、批注、按语、增写文字、书信、诗词等）；（二）经毛泽东审定过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三）经毛泽东审定用毛泽东的名义所发的文稿。这2831篇文稿，少量曾公开发表，较多的在党内不同范围内印发过，亦有一部分未曾印发过。尽管还有不少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未曾收编入，但这部卷帙浩繁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像是一本流年簿，准确地记录下了毛泽东在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中的史迹，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虑，他的大量国务活动及党务活动，他的个人交往及应酬。从文稿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毛泽东怎样治国主政，辛劳勤勉，也可以看到毛泽东严于律己，赤诚待人。由于文稿犹如文海，浩瀚洋洒，文字数千万，本章不可能去细研精读其内容——这种精研细读的心得也许会形成几十个印张的东西——而只能去把握其中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一些重大决策及其指导思想。文稿首先是一部凝结成文字的人民共和国幼年史。在这历史的卷册中，可以寻找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政领导人当年是怎样建设共和国、开拓社会主义事业和寻求强国之路的，是怎样设计共和国的最初图样、怎样按照这个图样去塑造一个真实的共和国的。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等领导者曾有过怎样辉煌的成功，亦有过何种意义上的挫折和失败。本章在按各册文稿的内容去把握共和国最初十年的历史线索时，把毛泽东等人开拓社会主义宏伟事业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误、辉煌与挫折都看成共和国历史整体中的一些部分，看作是是需要加以总结的宝贵经验，看作是值得令人珍视而不可忘却小置的财富，因为只有以历史经验为借鉴，我们在新的时代才会更有作为，才不致迷失方向或重复历史错误，才会更加聪明一些以更好地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第一册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收录的是毛泽东自1949年9月至1950年12月的文稿，共计523篇，其中各类手稿480篇，经毛泽东或中央审定的讲话、谈话记录稿14篇，经毛泽东审定并用他名义发的文稿29篇。在毛泽东生前身后这些文稿有159篇曾在报刊上发表过或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书信选他同志、亲友、故旧》，毛泽东总是关心备至，爱护有加，而对他们的一些不当要求则加以适当批评，不徇私情，这从文稿收录的大量书信中随处可以看集》等文集中。文稿第1册记录了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在开国元年的繁重国事活动，一些重大政策及理论观点的形成，如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完成大陆解放，建立全国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实行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等。

第1册开首的两篇文献，《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共同纲领）起草过程

例如，文稿中收录有毛泽东《关于向陈云建议用毛巾蘸热水擦身的批语》（见文稿第4册第142页），从中可见毛泽东待人体贴入微。至于对其（接下页）

中的批语》和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是毛泽东筹备建国的思想纪录。《共同纲领》是民主建国纲领，它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尤其是以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础，近乎一部临时宪法。毛泽东在该纲领起草过程中加以关注和修改，十分重视。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 1949 年秋冬正为召开新的全国政协会议而忙碌着，他要通过全国政协制定各种法令，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国都所在地和采用年号。在通过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所致的开幕词表明一个新的国家行将诞生。开幕词中那豪壮的语言“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既为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划上了一个句号，也预示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开幕词指出，中国人民在革命胜利后将会“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只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还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以全国政协会议为开端的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开创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真诚合作、共商国是的新政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相当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府内任职。毛泽东非常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他们互通情报，对他们的建议和情况反映都及时作出处理。例如，1950 年 5 月，毛泽东收到黄炎培反映苏南川沙、奉贤等县征粮工作中存在偏差的意见书后，两次发电报要苏南负责人调查此事，按照实事求是精神，逐一查明，并加以分析具报。从 1949 年 10 月起，毛泽东在给叶剑英、陈毅、彭德怀等地方领导人的一些电报和信函中，指出要组成中共占比较多数同时团结各方面民主人士在内的地方政权机构，还要求把普遍召开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一环。他说，如果全国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群众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毛泽东的这些电文为全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这种民主政治建设当然包括少数民族地区。毛泽东在指导和平解放新疆、西藏两大少数民族地区的十多件电报中，在为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提供指示时，非常注意民主和团结。例如，在给彭德怀并西北局的电报（1949. 10. 23）中，毛泽东指出“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立人民民主的新疆。”

第 1 册中收入的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1950. 6）的书面报告和讲话，《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和《不要四面出击》，是两篇重要文献，报告阐述的是党的工作重心应转移到经济方面，并提出了建国几年内的各项工作任务，讲话则是制定具体政治策略。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的军事任务已大部完成，华西南的国民党残余军队在解放军的“远距离包围迂回”作战下已作崩溃状。至 1950 年 6 月，西南敌军 130 万人歼灭已尽，全部大陆除西藏外都获解放。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结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任务便提到全党工作的中心位置。因此，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向全党及时提出了医治战争创伤，争取用三年时间“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的任务，并还具体提出要做好如下一些工作：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保障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之外进行部分军队的复员，让复员军人回到

家乡安心生产，同时行政系统进行整编；进行旧有学校教育、文化事业的改革，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继续进行对灾民的救济工作；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学习问题，并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肃清一切上匪、特务、恶霸及反革命分子；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全党整风。毛泽东的报告实质是建国初年党的工作的大纲。鉴于开国之初国内社会情况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毛泽东在向全党提出工作任务时又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政治策略。他说：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以孤立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他强调，这就是三中全会的路线和党的战略策略方针。

建国后的全部工作中，土地改革是一项规模最大的工作，第1册中有关土地改革的文献有10余篇，它们展示了毛泽东制定土改政策的思路。1950年2月，毛泽东在出访苏联期间曾与斯大林讨论了有关土改问题，并致电刘少奇转达斯大林关于分配地上土地与富农土地分成两个阶段来做的建议。回国后毛泽东即提出了保存富农经济的意见：第一，可以更好地保护中农，彻底孤立地主，防止土改中发生过左偏向；第二，减少土改所引起的社会震动，使党和政府在政治上更有主动权；第三，可以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巩固同他们的统一战线，等等。经过充分讨论，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在土改中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同时确定各省有权决定是否征收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这些政策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它保证了土地改革的顺利推行。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对此突发事件甚为关注，他与其他党政领导人毅然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抗美，并指导了抗美援朝战争最初两次战役。第1册中，收入了毛泽东指导这两次战役的大量作战电报，这些电报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的战略战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初期作战以先打伪军为主，而后再打美英军，务求初战必胜；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人实行分割包抄，各个歼灭；诱敌深入，以利聚歼；树立长期作战思想，反对速胜观点等。同时，毛泽东还非常重视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和军队如何搞好关系、团结一致，协同作战等问题。

第1册中，收录有10余篇有关文化教育方面的文献，它们表明毛泽东对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视。1949年10月，毛泽东致信周世钊，说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有步骤地改革旧有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事业，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他还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关心着青年一代的成长。为着社会建设的需要，毛泽东还以军委主席的名义颁布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要求指战员参加初小、高小、中学或专修班等文化学习，这对全军学文化运动给予了有力推动。此外，毛泽东还提倡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帮助他们逐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领导，他一经发现就进行严肃的批评。例如，对北京农业大学负责人排挤压制研究和讲授摩尔根学说的教授这一情

况，毛泽东曾两次批示必须查处。这实质上是开百家争鸣政策之先声。

第 1 册中收录的文献表明，毛泽东在建国之日起就奉行正确的外交政策。他在开国大典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指出：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毛泽东主张同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优先发展外交关系，并在 1949 年底便出访苏联，取得了重要外交成果。

第二册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编入的是毛泽东 1951 年的 409 篇文献，计手稿 392 篇，经毛泽东或中央审定的讲话稿 6 篇，经毛泽东审定用其名义发表的文稿 11 篇。这些文稿中，当时有 21 篇在报刊上发表过。毛泽东逝世后，有 43 篇曾收编入《毛泽东选集》第 5 卷、《毛泽东书信选集》等集子。文稿第 2 册纪录了毛泽东在 1951 年度的国务活动情况，包括提出“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战略构想，领导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和三反运动，以及出版《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等等。

第 2 册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1951.2. 18），是部署 1951 年工作的重要文献，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构想：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这一构想是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用三年或者还要多一点的时间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准备条件的明朗化，也是他在 1952 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中间环节。对此构想，毛泽东曾在刘少奇送他审阅的向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的报告稿上的批语中，要求刘少奇“在会议中讲一下”，使人们“有所准备”。

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这三大运动，分别列入了 1951 年 2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是该年工作的重点。抗美援朝战争继 1950 年两次战役胜利之后，1951 年上半年志愿军又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在这三次战役期间，毛泽东未再进行具体部署和指挥，只是在战略上作决策，如对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轮番作战，对美英军实行战术小包围，对南朝鲜军实行战役大包围等问题的决策，对五次战役后敌方要求停战谈判而提出作好两手准备、实行谈打结合的方针等等。同时，毛泽东还估计到台湾国民党策应侵朝美军进犯我东南沿海的可能性，提出“敌来让其登陆，并须诱其深入，然后聚而歼之”。在抗美援朝的同时，国内的土地改革正在部署展开。全国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主要是在 1951 年冬至 1952 年春进行的。毛泽东为指导土改工作先后起草了 10 多份电报，指出既要加速土改的步骤又不能违背土改运动的一般规律，不能侵犯工商业，等等。他还根据土改运动的不平衡发展，指示在一切已完成土改的地区要及时把领导工作的重点放到工农业生产上来，并组织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在一切尚未完成土改地区则要防止急躁情绪。此外，毛泽东还赞赏让民主人士、大学教授去看土改，去领受民主主义教育。与全国性的土改工作相结合，1951 年又是镇反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毛泽东很是关注这场运动。从第 2 册收入的毛泽东指导这场运动的 103 篇文献看，他提出的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镇反要作到“稳、准、狠”，不要错捕错杀，要严格划

分具体政策界限，等等。毛泽东亦放手让民主人士与闻镇反，参加审案，这对保证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巩固革命统一战线，起了很好的作用。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是年冬首先存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的，目的是打击个别不纯分子利用权力谋私，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分子用种种手段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毛泽东从11月下旬至年底一个多月时间内，为指导“三反”运动写下了许多指示。批语和书信。从第2册收录的50余件文献看，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是：通过“三反”斗争，在全党范围内实现七届二中全会关于“防止腐蚀的方针”；开展“二反”；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以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要抓住典型重大案件的处理，引起全党的警惕和全社会的重视；注意把反贪污同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结合起来，把“三反”同当时的整党和军队整编工作结合起来。这场运动虽然中间曾发生过一些过火的行为，但总的说来是教育了干部，清除了腐化分子，有力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

第2册还表明毛泽东非常注重思想文化建设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注重思想文化建设表现在毛泽东很重视自己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以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理论教材。从第2册收入的5篇相关文献看，毛泽东对《毛泽东选集》（第1卷）的编辑非常认真严谨，对一些著作，他反复修改，亦注意文字修饰使其规范，使之准确表达思想。他对题解和注释进行逐条审改，并还亲自撰写了一些，对全书更作认真校阅。《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出版，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尤其是为国内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学习 and 了解中国革命的经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果提供了教材。与《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的同时，毛泽东还提倡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通俗宣传，并热情支持有关中共党史著作的写作（如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等。

重视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主要是毛泽东在1951年发动和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历时半年之久的批判，建国以来以文艺讨论形式出现的思想批判之先河。其起因是，孙瑜导演的电影《武训传》在1951年元月上映以后，引起了各界尤其是教育界的强烈反响，其影评文章多是赞扬。《武训传》广受赞誉的情况为毛泽东深切关注。他决定发起一场讨论。5月20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他认为武训那样的人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行为是不应当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的。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他还指出，一些虽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然向反动思想投降，这证明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尔后，毛泽东在审阅有关文章时又指出武训行乞兴学是“为富人子弟办了两所旧式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武训的‘义’学，其实是不义之学”，等等。毛泽东的批评，既指向武训，更指向宣传武训的人们，随之引来了全国性的大批判。应当说，毛泽东在批评中提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人物及其思想，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引出的讨论却是用政治批判解决文艺问题，并且夸大资产阶级思想在文艺界的影响，使不实事求是的风气得以蔓延，则是当时始料未及的。

第三册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收入毛泽东1952年的文献422篇，计手稿385篇，经他审定的讲话、谈话记录稿3篇，经他审定用他名义发表的文稿34篇。这些文稿中，有55篇曾经发表或编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毛泽东书信选集》等文集中。1952年，我国提前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大体上完成了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胜利结束了三反五反运动。该年下半年，毛泽东等党政领导人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准备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以在将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随着1951年底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始的三反运动的展开，暴露出党政军机关内部的违法行为多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有关系。为了把三反运动引向深入，毛泽东决心同时进行五反运动。他在1952年1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分子开展一个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收入第3册的183篇有关三反和五反的文献表明，毛泽东在领导这场斗争的过程中，既有清除腐败、打击不法资本家五毒行为的决心，亦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例如他强调，在运动中注意团结多数，孤立少数，迅速形成三反、五反的统一战线；在运动进入高潮以后，强调“注意调查研究，算大帐，算细帐，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指出这是“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在定案阶段，强调“不得放纵一个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提出建立人民法庭，依法惩治贪污分子和不法资本家。同时，还强调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尽管运动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偏差，下达过一些过高的打虎指标，但由于政策上把握了上述这几个重点，经过半年多时间，三反、五反运动便宣告胜利结束。

1952年是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酝酿、提出的年份，第3册中直接反映这一总路线形成过程的文献有1篇，即11月13日在罗瑞卿的信上的批语，内容则只涉及对过渡时期的设想的“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历史地看，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最初酝酿可以追溯到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当时曾提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大约需要经过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设想。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具体酝酿则是在1952年。该年8月，为制定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确定苏联援助建设项目，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并向斯大林报送了一份《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9月24日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在当天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十年、十五年以后又会怎么样，要想一想。同年10月，刘少奇率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受毛泽东之托于20日致信斯大林，征询他对“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意见，信中还具体谈到中国当时国营、合作社和私营经济在工业生产总值和商品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以及10年以后采取工业国有化的方式，谈到准备在十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谈到帮助小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改造手工业等问题。该信还说：这就

是我们所设想的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大体方法。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据刘少奇 10 月 26 日向中央的报告，斯大林对我党中央领导人的上述设想表示赞同，这条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经过 1952 年下半年的充分酝酿讨论后，于 1953 年正式制定。

在计划向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向过渡的准备过程中，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从收入第 3 册的文献来看，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毛泽东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毛泽东首先肯定：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毛泽东的这种肯定并不意味着立刻消灭资产阶级，他认为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即使在三反高潮中，毛泽东一方面提出要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另一方面又强调《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资产阶级所应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仍然没有改变。他在批转薄一波关于中央一级机关三反运动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时指出，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应集中打击少数大的不法工商业家，对于罪恶不大的工商业家，应争取他们自动坦白、悔过自新，争取他们拥护政府的政策，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态度。对于作正当经营的工商业家，必须予以保护。后在对另一件文件的修改中，毛泽东再次指出：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应克服“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的错误想法，毛泽东还对当时影响较大的文章，冯定写的《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作过修改，肯定了资产阶级有拥护工人阶级的领导、遵守共同纲领的积极的一面，指出应打击其损人利己的丑恶思想，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消极方面。在给黄炎培的信中，他亦提到，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显然，毛泽东的这种观点都是正确的。

与经济、政治战线相配合，毛泽东同时重视思想路线上的工作。第 3 册收入的几篇相关文献，如《对中宣部关于在京高级干部学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等的情况报告的批语》、《对陈伯达等关于筹备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等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对中宣部关于成立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和马恩列斯著作编译所具体事宜的请示报告的批语》等，表明毛泽东非常注重党的高级干部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非常注重马列主义教师的培养和马列主义著作编译机构的设立。与此同时，随着《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的出版，首先在全国知识界掀起了一个学习毛泽东著作尤其是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热潮，这对广大知识分子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第四册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册编入的是毛泽东 1953 年 1 月至 1954 年 12 月的 368 篇文献，计手稿 322 篇，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谈话纪录稿 3 篇，经他审定用他名义发表的文稿 43 篇，其中 169 篇（次）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或在毛泽东逝世后收编入《毛泽东选集》第

5 卷、《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毛泽东诗词选》等文集中。从这些文稿的内容看，1953 年主要是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加强农业合作化运动，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强调军队现代化建设等。1954 年主要是提倡党内团结，制定新中国宪法，加速经济建设，以及在文化领域开展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等。

1952 年三反、五反运动取得胜利以后，党政组织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变得突出起来。1953 年 1 月，毛泽东抓住山东反映的有关情况，即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指示说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指示认为官僚主义等社会根源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反动作风的残余在共产党和政府内的反映，需要向它开展斗争和加以肃清。指示还要求，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件，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果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对这场斗争，毛泽东在其他一些指示中又将它称为“新三反”，为了将这场斗争深入下去，他不断进行指导，并不断总结各地各部门的斗争经验，第 4 册编入的有关新三反方面的文献有 9 篇之多。

与政治上“新三反”斗争展开的同时，1953 年也正式开始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收入第 4 册的几份文献表明，毛泽东非常注意这一运动，他在《中共关于印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正式决议的通知》（1953.2.15）中指出，中央于 1951 年 12 月所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的决议草案，经一年多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应即作为正式决议，将“草案”二字删去。毛泽东还对这个决议作了修改，其中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保存着私有的性质，但就其在农民以上地入股后得以统一使用土地，合理使用工具，共同劳动，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红，并有某些公共的财产这些条件来说，它比常年互助组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后，还要满腔热情地帮助教育单于农民，但承认单干的合法。毛泽东还认为，现有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成为引导农民过渡到更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的简便形式。

与农业生产合作运动相配合，国家也加强了对手工业生产的领导，并且实行新税制和新的供销体制。在这种实践基础上，经过 1952 年充分酝酿讨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便被毛泽东正式提了出来。1953 年 6 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指出：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而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包括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企业。同年 8 月，毛泽东对这条总路线在文字上作了规范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强调，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了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之后，毛泽东便把注意力放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他在与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的要点（1953.9.7）中指出：现在应明确起来，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

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有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订货和只收大部分产品等三种形式；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需要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由于各民主阶级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毛泽东强调，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在对一次会议纪要（1953.7. 9）的批语中，毛泽东还指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因而它是一种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在实行“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毛泽东还非常关注国防现代化事业。在收入第四册的《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毛泽东这样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的国防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我们迫切需要培养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专门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此外，毛泽东在强调抓紧对干部的思想教育时，明确地提出了“批判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的观点。他在《中央关于批判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指示》中说：中南局和湖北省委抓紧了关于党的总路线在于部中的教育，及时地批判了干部中存在着的资本主义思想及各种糊涂观念，这在目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都是完全必要的。

1954 年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的颁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政治上推行法治的历史里程碑，宪法从起草到颁布的过程凝结了毛泽东的大量心血。从收入文稿第 4 册的 5 篇文献看，毛泽东不仅主持制宪工作，还进行具体指导并细心审改宪法草案的条文。他在对宪法草案作说明时指出：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其目的是要团结全国人民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认为，宪法草案之所以得人心，主要是总结了历史经验，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总结历史经验主要是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同时还总结了认清清末以来立宪的经验，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也未抹杀资产阶级民主。宪法草案中的原则性是指坚持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即我们的民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并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但实现社会主义要有灵活性，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例如，对于工商业，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又如，规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有四种，但实际上少数民族地区现在还有别种所有

制，这就要求对少数民族地区要有特殊条文。再如，宪法草案写进了“统一战线”的内容，它可以安定各阶层，安定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安定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等。毛泽东还说，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正确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1954年又是我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正式成立的年份。毛泽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灌注了心血，如制定好宪法，审阅修改《政府工作报告》以使在大会上讨论通过，等等。但第四册收入毛泽东直接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文献只有一篇，即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毛泽东还说明了会议的具体任务：制定宪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几个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等。毛泽东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第4册文稿的内容还记载了毛泽东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的看法。在1954年10月19日召集参加政协会议的部分党内外人士座谈时，毛泽东专门谈了有关政协的几个问题：（一）政协存在是必要的，有了权力机关人大，仍需要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二）政协的性质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是党派性的机关而不是国家机关。（三）政协的任务是协商国是问题；协商候选名单；提意见；调整关系；学习马列主义。（四）政协组织的上下关系不成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究竟如何搞，还要创造经验。（五）政协是运用统一战线的武器。

1954年又是挫败高岗、饶漱石“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行为”的一年，第4册收入了七届四中全会前后进行反对高饶斗争的10篇有关文献。文献表明，毛泽东不仅领导了这场斗争，并且还深刻分析了高岗等走向反面的思想原因。他认为，高岗的个人主义和私生活的腐化欲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第4册中收入的有关《红楼梦》研究问题的4篇文献及其与之相关的4篇文献，表明毛泽东一贯重视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事情是由两个青年团员撰文批判红学权威俞平伯引起的，这两人在1954年9—10月发表的两篇批判文章被毛泽东高度重视，于是，对《红楼梦》素有研究的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称两个青年团员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毛泽东在信中还指出，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

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起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毛泽东还号召应当批判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正是由于毛泽东的重视，全国很快掀起一场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大批判运动。1954年12月，毛泽东还批示同意中宣部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组织计划的请示报告，这表明他着意要将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深入下去。

此外，第4册编入的4篇有关毛泽东不再同意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的文献引人注意。例如，毛泽东曾嘱咐彭真，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及宣言中“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字眼删出去”（1953.4）；曾嘱咐肖克，将内务条令等文件中的“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1953.5）；曾嘱咐刘伯承，将有关文件中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提法改为“毛泽东同志”（1954.4），在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稿中，毛泽东亦强调遇到凡需要提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1954.12）。同时，毛泽东还不同意人大代表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给予自己以最高荣誉勋章的提案（1954.8），这表明毛泽东注意不突出个人和不突出个人思想的谦虚谨慎态度。

第五册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编入的是毛泽东1955年的232篇文献，计手稿200篇，经毛泽东审定用其名义发表的文献32篇，其中70篇（次）在《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长江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或出版过，或在毛泽东逝世后收编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等文集中。该册文献的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胡风；进行“肃反”；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鉴于1954年已开展对俞平伯的红学思想以及对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中共中央为了把这一批判引向深入并促进人们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在1955年1月下发了《关于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毛泽东批发了这一通知。通知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通知认为，这些思想斗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通过对我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具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向人民群众宣传唯物主义思想以提高他们的觉悟，是党的一项最基本的经常的任务。因此必须在大约五百万有阅读能力的党内干部和党外知识分子中认真地进行教育，具体地批判唯心主义思想，树立唯物主义思想，才能通过他们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为此，有必要采取演讲的方式讲解目前正在展开着的思想批判的重要意义，结合当地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对通知的批发表明他非常注意这项思想教育和思想批判工作。

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特地强调了这一问题：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和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这又是一件大好事。

正是由于注重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毛泽东亲自指导了当时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第5册中编入有关批判胡风的文献有12篇之多，记录了毛泽东在批判之时的咄咄逼人的气势。1955年1月，毛泽东在周扬关于同胡风谈话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中指出：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同年6月，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写按语，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序言、按语和注文。在这些文字中，毛泽东指出，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将他们战而胜之。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毛泽东还指出，通过调查，胡风集团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把文艺理论批判、思想批判与政治斗争紧密联系起来了，并把胡风等入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方面把从1951年开始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思想批判向“左”的方面大大推进了一步，另一方面也为60年代文化大革命把思想批判直接变成政治批判开了先声。

1955年是全国各地各部门进行大规模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年份，第5册编入有关肃反的文献共有26篇。从这些文献的内容看，毛泽东自始至终指导着这场差不多为时一年的肃反工作。尽管他把“胡风集团”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但毛泽东总是谨防在肃反中出偏差。他提出的方针是：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当肃反工作在中央各级机关、各军区、各级党政部门、各厂矿企业大规模展开后，毛泽东更是加强了指导。一方面，他指示要妥善地保存和严格地清查处理敌人遗留下来的各项

1980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复查报告》，指出“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1988年中央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通知》，撤销关于胡风把党向作家提倡的指导思想说成是插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关于胡风进行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等错误结论。

档案材料，以发挥其对肃反和审干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强调对一切确实发生“左”的偏向的单位采取措施加以克服，指出同必须克服右的偏向一样，必须认真地克服“左”的偏向，才能使肃反运动自始至终地得到健康的发展。为了使肃反不至扩大化，当时采取了给“控制数字”的措施。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在肃反运动中，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重点对象，必须也同其他方面一样，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超过这个控制数字的，必须得到各省委、自治区党委批准，有些要得到中央十人小组批准。对于肃反的起因、重要性及其方针，毛泽东后来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得很清楚：对反革命必须镇压和肃清，否则老百姓不赞成。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但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这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对一切反革命分子给以生活出路和自新的机会，这样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1955年是掀起全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一年，收入第5册的43篇有关文献表明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了这一运动，并始终是促进派。中国农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自1952年开始以后，至1955年已历时4个年头。1955年1月，农村工作部负责人邓子恢提出农业合作社转向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建议，并在同年6月又不同意合作社过快发展的主张，即被毛泽东视为思想右倾。7月，在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他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但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走快了，而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错误方针。合作化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和不难纠正的。毛泽东反对农村合作化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认为在发展的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而应当认识到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毛泽东还指出，根据苏联的经验，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进行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国条件下的农业方面，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对农业合作化要有全面的规划，要加强领导，要在1960年以后全国将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尔后，毛泽东又批评对合作化进程持异议的同志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并强调要彻底批判党内在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七届六中全会后，各方面开展反右倾，助长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这同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是紧密相关的，至1955年底，毛泽东在对七届六中全会文件集序言稿的批语和修改中，这样乐观地指出：全国农业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化，可以提前在1959至1960年完成。为此，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了104篇按语，用以具体指导全国各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使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

本胜利”。

在全国农村合作化运动掀起高潮之际，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亦抓紧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这从第5册编入的6篇有关文稿可以看出来。如毛泽东修改过的《人民日报》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一文指出，所有的人只要沿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前进都可以找到广阔的道路，这种道路，对于农民、手工业者等就是放弃小私有制，接受社会主义的合作制。对于资本家说来，就是放弃资本主义所有制，接受社会主义的国有制。毛泽东号召一切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爱国的工商业者应该认清这个前途，主动地奔赴这个前途，掌握自己的命运。毛泽东修改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更是规定了改造工商业的具体办法。即对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逐步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给予资本家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等等。当这一决议草案被中央召集的各省、自治区及大中城市党委负责同志会议讨论通过后，各地便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规划。从此，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便从个别合营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

第六册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编入的是毛泽东自1956年1月至1957年12月这两年间270篇文献，计手稿214篇，经他审定过的讲话或谈话记录稿5篇，经他审定用他名义发表的文稿50篇，其中在《人民日报》发表过的有91篇，毛泽东逝世后收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诗词选》的有36篇（次）。从这些文稿的内容看，1956年主要是在合作化基础上发展农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提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提出处理好十大关系，召开党的八大，以及在理论上同苏联展开论战等。1957年主要是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整风和反右，初步提出多快好省搞建设的设想，以及在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内拥护以苏联为首等等。

1955年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掀起高潮后，1956年一方面抓紧初级合作社的巩固和朝高级社方向发展的工作，另一方面抓紧发展农业生产并制订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收入第6册的几篇文献表明，毛泽东花了较多精力来制订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早在1955年11月，毛泽东先后同14个省、区负责人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交换意见，共同商定了《农业十二条》。1956年1月，毛泽东主持修改“十二条”逐步形成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并经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在《人民日报》公布。纲要草案设想在1957—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规划了各地区的产粮指标，提出要系统地建立、充实和提高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的机构，垦荒移民，兴修水利，消灭病虫害，以及改善社员的生产条件、生活和卫生条件，便利社会的政治文化活动等等。这一纲要草案公布后，毛泽东在1957年又对它作了修改，如增加农业机械化。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内容。当这个纲要的修正草案公布以后，毛泽东又指示在全民中对它展开讨论，以使全国人民“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

当全国的“一化三改”取得巨大成绩时，毛泽东就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收入第六册的《论十大关系》以及《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便是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纪录。毛泽东在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之前，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将所得情况综合为十个问题，这就是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等。毛泽东认为，提出这些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主要是谈怎样学习外国的长处，以使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它提出了这么一条原则：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举行的中共八大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也是自建国以后至毛泽东逝世这一段时间内三届党代会中最好、最正确的一次会议。它是在七大之后11年，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情况下召开的。八大正确的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要逐步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反对官僚主义。会议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等等。八大从1955年秋就开始筹备，从收入第6册的10篇有关文献看，毛泽东为八大的召开花费了大量精力。他为八大的政治报告稿和党章稿作精心修改，历数月之久。毛泽东的修改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在国际方面，强调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认为帝国主义者许多地方制造紧张局势，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及全世界人民的力量牵制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从外部保卫了中国革命的胜利。（2）各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即各国无产阶级取得执政地位的具体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一党制或者是在工人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制，改造旧生产关系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过渡时期所需要的时间，等等，因为各国不同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会有所差别。中国是一个东方大国，它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3）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中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4）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在各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阶级还未消灭。在阶级消灭以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5）中国目前还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一方面，它已基本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因素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几年才能完全建成。它正处在迅速变化

的过程中，等等。

1956 年针对国际上反斯大林事件的出现，《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影响较大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都是毛泽东提出的，毛泽东对文章还作了精心修改。文章表明毛泽东非常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和重视理论领域的斗争。前文主要论述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教条主义的发展）和如何从中吸取教训加以克服的问题，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答复了由于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错误而引起的种种怀疑。后文第一次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解决。

1956 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胜利完成，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地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时代赋予的新的任务。毛泽东积民主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经验，参考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在 1957 年 2 月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的讲话中，及时地提出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对于我国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则是非對抗的。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及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还有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而矛盾性质的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对敌人用专政的方法，对人民用民主的方法，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总题目下，毛泽东讲到肃反，农业合作化，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少数民族，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少数人闹事，坏事能否变好事，节约，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等诸多问题，其目的只是一个，巩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处理好各种各样的矛盾，以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尽管这一文献在后来修改中，由于反右运动已开始，毛泽东增写了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等内容，删去了一些“左”的错误的批评，并且它提出的正确思想也没有得到很好坚持，但它在理论上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

与政治上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相适应，毛泽东还提出了思想战线的革命。编入第 6 册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献记录了毛泽东提出这一思想的过程。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这个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存在决定意识，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要使新的社会制度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因此，作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并首先对全国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进行宣传。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

间内，在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就好了。知识分子要注意改造，要同工农群众结合，这样就可以把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与工农群众有共同的语言。同时，要通过全党整风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科学、艺术方面，应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这一方针使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在与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得到发展。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因为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

1957年是开展全国性反右运动的一年，而这场反右运动又是从整风运动开始的。第6册文稿中有关整风的10篇文献和反右的15篇文献表明，毛泽东对这两个运动尤其是对反右运动极为关注。1957年4月27日，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整风和党政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提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5月4日，毛泽东又发出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整风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后，当一些矛盾被揭露出来，出现了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毛泽东即感到“事情正在起变化”，他认为这是反对共产党的右派言论，认为在民主党派中和文教界，“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于是部署“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在7月1日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毛泽东这样指出：“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其“帮助整风”“是一场欺骗”。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毛泽东则认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决定性的战斗已经胜利了，但决不可草率收兵。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不过，毛泽东在这里是把反右当作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来看待的，他认为，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判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须阶段。这样整一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目必将焕然一新。但在实际上，反右在整个整风运动中却有喧宾夺主的地位，反右严重扩大化的后果是尽人皆知的，它不仅伤害了许多正直敢言之士，还推动了整个社会朝“左”的方向发展。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在讨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等问题时，毛泽东即对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并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还说：1957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他主张通过整风反右来抓工农业生产，抓“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

第6册中收入的毛泽东赴苏联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时的几篇讲话，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他所采取的国际战略。毛泽东对十月革命推崇之至，他说，苏联人民在四十年前举行的十月革命，开始了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

想变成了现实。这个革命证明：没有了地主和资产阶级，人民完全能够有计划地建设自己幸福的生活。这个革命同时又证明：没有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世界各民族完全能够和睦共处。毛泽东赞成社会主义阵营应“以苏联为首”，“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谈判可以达到团结。由于苏联的两个卫星上天，现在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力量对于帝国主义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毛泽东设想：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十五年后中国也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为了取得认识的一致，他还提出这样的建议：广泛宣传辩证法，宣传对立统一的观念；各国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都要谈辩证法问题。

第七册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编入的是毛泽东1958年的285篇文献，计手稿253篇，经他审定过的谈话记录稿1篇，经他审定用他名义发表的文稿31篇，其中有74篇（次）在《人民日报》、《红旗》、《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过，或在毛泽东逝世后收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诗词选》等文集中。这些文献贯穿的中心内容是一个：大跃进。从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到12月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这中间许多会议的议题都是大跃进。

在南宁会议（1958.1. 11—22，有部分中央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上，毛泽东提出全面规划全国的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业、林业、渔业、牧业、交通、商业、科学、文教、卫生、财政（金融）、劳动（人口）问题。他认为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到技术革命方面。他批评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毛泽东在讲话中贯穿的基本精神是批“反冒进”，为有些地区和部门提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鼓劲。他还在一份关于反冒进的摘录材料上曾如此批写道：这是“针对反右、多快好省提出批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庸俗辩证法”，是“庸俗马克思主义”。南宁会议以后，毛泽东将他的讲话内容作了增补和调整，写成《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1958.1. 28）上，毛泽东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他认为“民族发扬蹈厉，大有希望”；应“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在成都会议（1958.3.8—26，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上，毛泽东进一步为大跃进鼓劲。他在会上的讲话广涉各个方面，都是围绕大跃进来展开的。他强调“第二本帐”的问题，强调发展生产力，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对于大跃进，他指出各省大跃进不要一阵风，让河南先试一年。只要总路线正确，先后一年、两年乃至三年、五年完成四十条，不算不荣誉。他提倡“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认为成都会议解决了大批问题，比南宁会议进了一步。同时，毛泽东不满意党内“对赫鲁晓夫打死斯大林这种压力”随声附和，“对反个人崇拜感兴趣”，他认为“有两种个人崇拜，正确的，不正确的，应分清楚”。这实质上是要人们崇拜他的“正确”路线，赞成他的大跃进主张。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红旗》创刊号上发表《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向全党擂响了大跃进的战鼓。他在文中写道：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毛泽东还写道：中国一穷二白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在这篇文章的附信中毛泽东甚至这样判断：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1958.5.5—23）上，毛泽东主持制定了社会主义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他在这次“跃进的会议”上作了4次讲话，从他所拟的讲话提纲看，其主题是讲破除迷信问题。破除迷信包括“破马克思”；不要妄自菲薄，而要敢想、敢说、敢做。他认为“工业没有什么了不得，迷信是不对的”；“十五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不是狂妄的”，是“实事求是的”，是“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的统一”；要敢于“插红旗、标新立异”。他还指出：苏联之前无苏联，马克思之前无马克思。马、列是指导，不是教条。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要产生自己的理论，要分析自己的经验。在讲话中，毛泽东还讲到哲学。他认为突变是宇宙最根本的规律，突变优于量变；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但不要走向冒险主义；平衡、量变、团结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质变、分裂是永远的绝对的，此外，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并指出“党内除右派外，有一个观潮派，又一个促退派，一股狂热的运动。”

在大跃进高潮中，1958年7月份以前，毛泽东开始提出人民公社的构想。他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同时，他对“合作社办食堂”的事极感兴趣，认为有关文章“可以考虑在红旗上发表”。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在河北、河南、山东、天津等地视察，就人民公社及其他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认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当听到徐水县粮食大丰收的汇报时，毛泽东还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这时，毛泽东正在着手筹备1958年8月17日至30日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拟定了有关经济计划、钢铁生产、农业生产等17项议题，还认真修改了准备在会上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毛泽东指出，人民公社建成以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是一个过程，公社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其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只有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消灭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消灭了，国家职能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北戴河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所拟的这些议题，并估计1958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将达到1000斤左右。会议认为，工业的中心问题是钢铁的生产和机械的生产，而机械生产的发展又决定于钢铁生产的发展。因此会议决定号召全党全

国人民为在 1958 年生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会议设想在“二五”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建立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建立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会议还作出有关计划和体制、农村、财贸、教育等方面的系列决议 37 个。北戴河会议以后，全国很快掀起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同时，各种各样的卫星也层出不穷。《人民日报》则为这种放卫星推波助澜。例如，它发表过题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1958.8.27），它报道过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 120 万斤、一棵白菜 500 斤、小麦亩产 12 万斤、皮棉亩产 5000 斤、全县粮食亩产 2000 斤的高产卫星（1958.9.1）。

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1958.9.5—8）上，毛泽东讲国内形势时主要讲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认为无产阶级就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原计划十二年，四年就超额完成；粮食明年可能超过一万亿斤；钢铁明年可能超过两千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在钢铁上七年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只要粮、钢、机器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对于人民公社，毛泽东说它是一件大好事。它“来势很猛，没有办法阻挡，你叫他慢，那不行。”这件事要好好领导。

至 1958 年 11 月，大跃进中的谎报浮夸和人民公社发展中存在的一些混乱，使毛泽东有所察觉。于是在郑州会议（1958.11.210，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省市委书记参加）上，毛泽东开始注意纠正一些错误。他在对提交会议讨论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的修改中，指出要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强调劳动和休息要有节奏地结合起来，应当保证每个劳动者有足够的睡眠时间、休息时间；强调人民公社既要发展直接满足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发展商品性的生产；强调一切工作都必须力求合乎实际，力求把革命的热情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都是要不得的。在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中，毛泽东亦指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充分注意了公社的性质、体制、分配问题，全民、集体、个人的关系问题，作息时间问题，工作方法（如不许打骂捆绑群众等）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具体政策问题。毛泽东还发出读书的建议，建议各级干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很多人的“一大堆混乱思想”。

在中央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1958.11.21—27）上，毛泽东关注的是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十五年规划问题，制定 1959 年指标问题，阶级的消灭等问题。他在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中国和苏联哪个先过渡到共产主义？要从各方面慎重考虑。中国早过渡即使有可能，也可以用社会主义之名，行共产主义之实。《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获实祸。消灭阶级问题要吸取教训，经济上消灭阶级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消灭阶级，等等。在会议讲话中，毛泽东指出：看来“两个过渡”还是时间

长一点好，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要老老实实，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要有清醒头脑。会议决定将 1959 年钢的生产指标降为 2000 万吨，对外公布为 1800 万吨。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中的错误进行批评，目的是为了使错误得以克服，使运动健康发展。这从他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 11. 28—12. 10）的指导思想中更可以明显看出来。在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强调了保护劳动热情问题，他说，对犯错误的干部 90% 以上耐心说服，不予处分，作些自我批评就够了；对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1—2—3—4—5%，则要加以轻重不同的处罚，对谎报也如此。总之，处罚的极少，教育的极多，就能保护广大干部的劳动热情。对于“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这个口号，毛泽东认为它没有经过认真的分析和集体的决定，提五年基本改变较为切合实际些。他设想五年基本改变。十年至十五年彻底改变，即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对于党内争论，毛泽东认为冲天干劲、革命热情极可宝贵；要作两方面的分析。他提倡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辩证法，把雄心与科学分析相结合，实事求是地制定 1959 年经济计划。毛泽东虽然估计到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他肯定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不能估计过低；虽然看到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的危险性”，但并没有想到要从根本上克服“左”的东西。他在对八届六中全会公报稿作修改时增写这样的话：“今年我国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证明了党的一整套方针“是正确的”。不仅如此，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还对《张鲁传》加写批语印发与会者，他认为张鲁置义舍，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以祭酒为治”“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故毛泽东称“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历史来源的。”

在整个 1958 年中，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指导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作为主要领导者，他同时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并关注苏联学者对共产主义建设理论问题的新的研究成果，还顾及到资本主义国家政界和舆论界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映。为了“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毛泽东还请求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尽管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遭受了极大挫折，使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遭受巨大损失，但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却是为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

除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外，1958 年又是台湾海峡关系紧张的一年，毛泽东为此付出了一定精力。从收入第七册的 9 篇相关文献看，毛泽东在处置金门炮战时作到了有理、有利、有节，他对蒋军和美帝国主义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为此还引发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并还专门论述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具有两重性。这有一个由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的过程。因此，战略上要藐视它，战术上要重视它，有一套正确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毛泽东在 1958 年还号召“大办民兵师”，以对付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他认为民兵建设是 1958 年军事的一个大发展。从总体上看，1958 年的大跃进对毛泽东亦产生了深刻的多重的影响。这场大跃进不仅波及各个领域，不仅引起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以至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变化，更引起了毛泽东对待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的变化。大跃进在其他领域的变化最明显的是改变了教育制度，实行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改革了干部制度，干部经常下放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还开展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等。大跃进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最大的影响是毛泽东此时已开始“破马克思”，以求摆正学习与创新的关系。为了能够领导好这场大跃进，毛泽东不仅要求干部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还要学点文学，学点文法和逻辑，学好普通话和本地话，学好一种外国文等。作为诗人政治家，大跃进中的毛泽东甚至提到了全民写诗的问题，从而引来了全民写诗的热潮，引发了诗歌卫星。在对《山东范县提出 196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中毛泽东曾这样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也正是在 1958 年，毛泽东第一次对自己的诗词作了批注，澄清了一些注家的误解，并仿陆游赋绝诗一首以示自己的事业是壮丽的事业，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方向。

第八册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编入的是毛泽东 1959 年的 323 篇文献，计手稿 292 篇，经他审定过的谈话记录稿 1 篇，经他审定用他名义发表的文稿 31 篇，其中有 47 篇（次）在《人民日报》、《红旗》上发表过，或在毛泽东逝世后收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诗词选》等文集中。从文献的内容看，1959 年上半年毛泽东主要是抓人民公社的调整和建设以及经济计划指标的调整，下半年则以庐山会议为转折从纠正“左”的错误开始过渡到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并把阶级斗争引向党内。此外，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在这一年也有所发展和变化。

毛泽东在 1959 年上半年对人民公社的调整和建设，对经济计划指标的调整有一个过程。在郑州会议以前，毛泽东对大跃进等问题考虑较多，他首先注重的是保护人民群众的热情，谨防的是“右倾情绪”。在 2 月 1 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虽然看到了 1958 年已有“几个方面的失调”，不适当地提出了一些高指标，农业上放过一些卫星，报上吹过很多，不实在；但他仍然主张在 1959 年实行大跃进，认为中国有人多、大国、资源、苏联经验等条件，不会不跃进的。今后搞跃进的具体条件是：（1）群众的干劲、劳动热情：这是过去几年特别是整风、反右替我们准备下的。（2）有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的经验，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3）现在定下来的指标并不十分吓人，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4）今年还有十一个月，抓得早些。（5）今年有了人民公社，而去年大部分时间没有，等等。毛泽东还勉励领导干部学哲学，不要形而上学的看问题；要调查研究，揭露问题，解决问题；要把革命热情与求实精神统一起来，发挥符合客观规律的主观能动性。但当一些严重问题如普遍闹粮荒、影响春耕等问题暴露以后，毛泽东就把主要精力放在调整和建设人民公社方面。在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59.2.27—3.5）上，毛泽东主要是讲人民公社的问题。他说，1958 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特别显著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地建立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我们的工作中也有缺点，但成绩和缺点的关系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进行整顿巩固的

工作，相当严重的矛盾是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相当紧张，农业大丰收后农产品的收购任务没完成，全国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等“不足”的风潮。这应当从我们的政策中去寻找答案。毛泽东认为，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这是我们所不许可的。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作到了全国一盘棋。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之怀疑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但要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大约需要两个五年计划。然后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目前的任务是要克服平均主义。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公社的积累也不要太高。毛泽东最后还估计到观潮派、算帐派将会出来讥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这些情况对于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可怕，广大的群众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人民公社经过整顿和巩固，我们同人民群众的团结将会更加紧密，我们一定能够在1959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事业一定能够在巩固的基础上蒸蒸日上。郑州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写了《郑州会议纪要》并作为文件下发。纪要规定了如下十四句话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会议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对公社、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的职权作了具体划分。

郑州会议以后，毛泽东主要是抓对郑州会议精神的落实检查工作，他批转了一些省整顿人民公社的经验，不断发出党内通信，或找省、市委负责人座谈，了解情况。在至上海会议召开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作了大量工作。第8册收入的他在这一段时间内的有关文献共56篇，占他在这一段时间内文献总数的90%以上。这些文献表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问题上较郑州会议又有所改变。他在一份报告的批注中指出：“至少在二十年内，不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在大约五年至十年内，也还不是在整个国家内就能完成由集体所有到全民所有的过渡问题，而是只能看情况，逐步地完成由基本的小集体所有制首先过渡到以一个乡为范围的大集体所有制。”等等。

毛泽东的这些新认识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59.3.25—4.1）和中央八届七中全会（1959.4.2—5）得到集中反映。上海会议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了公社整顿中提出来的主要问题，并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对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也进行了调整。八届七中全会则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的会议纪要。纪要规定：人民公社的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一般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单位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

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管理权限。要认真清查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各种帐目，各级无偿征调下级单位或社员私人的财物，必须如数归还或作价日还。要改善人民公社实行的工资制度、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实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是符合农民群众要求的，必须坚持下去。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还专门讲了工作方法问题，提出要多谋善断，观察形势，当机立断；并说“一个人有时胜过多个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他强调：“权力集中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他还号召要敢讲话，要学习海瑞精神，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敢于坚持真理。

八届七中全会以后至庐山会议以前，毛泽东一直致力于人民公社的调整工作，并且深入细致。例如，他直接向包括“小队级”的干部写信，以具体指导调整工作。在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中，他谈了包产等六个问题。他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要吹牛，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今年能增产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有何益处呢？密植应注意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害人不浅，密植应根据气候、地点、土、肥、水、种等条件而定。节约粮食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播种面积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机械化是农业的根本出路，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还要逐年增加化学肥料。要讲真话，对包产，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不可讲假话。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毛泽东在信中最后说，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他强调，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

毛泽东上半年的这种调整纠偏工作，至7月份的庐山会议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这主要是由彭德怀在会议期间就1958年的工作谈了一些看法所引起。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举行。毛泽东为会议拟定了19个议题，这些议题包括读书，形势和任务，宣传，综合平衡，群众路线，工业，领导体制，协作区关系，公社食堂，三定政策，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团结问题，以及国际问题等。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看法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讲话之后，会议分组讨论时对如何估价国内形势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对大跃进、农村的“共产风”，公共食堂等提出批评，一种意见认为批评大跃进是泼冷水，是右倾。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于7月14日致信毛泽东，陈述自己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他首先肯定了1958年以来的伟大成绩和总路线的正确，然后对“左”的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意见。他认为，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济比例失调，大炼钢铁是有失有得，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原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

种“左”的表现。他希望会议系统地总结一下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讨论。讨论中，许多人一度赞同信中的观点，也有人表示反对。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支持彭德怀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批判信中的一些观点，指责彭德怀的这封信表现了“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他甚至还提到解放军跟谁走的问题。毛泽东讲话后，会议集中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8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称历史上彭德怀与他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继而，八届八中全会（1959.8.2—16）进一步揭发批判所谓“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会议最后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会议期间，毛泽东还批发了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并写下了一些有关反右倾的批语。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批语中，毛泽东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这表明，庐山会议不同意见的争论及毛泽东对争论所采取的措施，不是一般地推动毛泽东的思想向“左”的方向发展，而是已将阶级斗争直接引入了党内，用作解决党内不同意见的处理手段。

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又把右倾机会主义与国外反共势力联系起来。在为发表《到韶山》和《登庐山》两首诗致臧克家、徐迟的信中，毛泽东这样写道：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这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尔后，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又如此写道：彭德怀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他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得不偿失论”，“人民公社搞糟了”，“阶级关系紧张”，“反‘左’比反右难”，“无产阶级专政官僚主义最多”等等，没有一点点马克思主义气味。他进行“阴谋分裂活动，违反铁的纪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还强调：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确是真理。这一切表明，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在政治上已经背离正确路线很远了。

第8册中，还收入了几篇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及对外交工作指示的文献，这些文献表明毛泽东的外交战略重心主要放在如何处置同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上面。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毛泽东采取根本反对的政策。例如在对中央外事小组有关文件的修改中，就台湾海峡的炮战毛泽东这样指出：我国就台、澎、金、马问题对帝国主义展开了一场震动全球的胜利斗争。通过这场斗争，我们不仅再一次使美帝国主义的实力地位政策和战争边缘政策遭到失败，而且还运用绞索政策击破了美国从金、马脱身的政策，使美国进退维谷，空前孤立。这场斗争再一次揭露了美国力

量虽然强大但就其全局看来它归根到底不过是纸老虎的本质，极深刻地教育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有力地支持了亚非各国人民特别是阿拉伯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扩大了美国 and 蒋介石集团，美国 and 它的同盟国之间的矛盾。对于日本，毛泽东认为在岸信介不改变敌视我国的政策以前，原则上不考虑恢复中日贸易。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指出要虚心地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包括斯大林时期所犯的某些错误则从反面学习，引以为戒，同时采取积极主动和谦虚谨慎的态度，帮助各社会主义国家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人民公社运动和对外政策，消除某些可能发生的误解。

但是，1959年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已有较大的变化。他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中曾这样分析：敌人的策略有两手。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和平旗子，文化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而对于朋友苏联，毛泽东虽然强调要团结，但列举了一些不团结现象，如1945年“不许革命”；1949—1951年“开始不愿订互助同盟条约”；1953年“高饶彭黄在莫斯科的支持下，进行一次颠覆活动”；1957年“秋季的莫斯科宣言，我们批判了朋友”；1958年“中苏北京八月会谈，共同舰队和70%投资建立电台事件，我们抵制了这个进攻；金门打炮事件，吓坏了我们的朋友”；1959年“西藏事件”，中印边界事件，九月两党交换文件，十月北京会谈，抵制了朋友的谬论”；“在三月至今，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在另一篇讲话提纲中，毛泽东指出了苏联如下错误：（一）父子关系；（二）不愿学生超过先生；（三）留一手；（四）搞颠覆活动。还有骄傲自大，领导犯错误，歪曲马列，动摇国际主义原则，对和平悲观等。毛泽东对苏联的这些看法，预示了中苏之间将会发生大的分裂，预示了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将会有有一个大的调整。

另外，1959年是中国西藏地区中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3月10日），和中印边界首次发生冲突（8月25日印军入侵我国领土朗久地区）的年份，毛泽东在处置这两件事时表现了他捍卫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根本立场。例如，他在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宣传报道问题的批语中，指出报道要直指“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策动西藏叛乱，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等等。

六 悉心解剖农村社会致胜之道源于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览要

无论是在中国历代政治家、学问家中间，还是在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革命家、理论家中间，没有人能像毛泽东那样拥有一部农村调查专集。正像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调查和解剖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起来的工商业社会一样，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文集》是调查和解剖属东方文明中以小农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农村社会。作为一位在以小农为主体的国度成功领导以农民战争为特色的伟大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能写出一部内容丰富的《农村调查文集》当是时代造就而成的。毛泽东首先是农民的儿子，他孩提时代就熟悉农村环境，青年时代就开始调查农村社会，了解真实的农村生活。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后，为了取得成功，他比任何人都更加着意寻找这一运动的力量之源——中国农村社会中生活着的数亿农民。可以说，毛泽东之所以能成功中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他对农村深入而周密的调查。充分掌握中国农村社会的情况，了解广大农民的心愿和要求，代表占中国总人口数的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并取得农民对中国以土地革命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力支持，这从根本上保证了毛泽东所领导的、从本世纪 20 年代至 50 年代这场差不多长达三十年的艰难卓绝的革命的胜利。一部《农村调查文集》，既是毛泽东制定出全部土地革命斗争路线、政策、策略和方法的智慧之源，又是随土地革命深入发展而伴生出的精神之花。这部前后历时十五年而形成的作品，确是一部记载毛泽东调查解剖中国农村社会的经典之作，从一个侧面纪录了毛泽东以调查研究为先导，以中国农村社会实际为出发点，来确定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目的和前途的革命实践活动。质言之，毛泽东革命的成功首先取决于对中国农村的周密调查。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有生之年十分珍视自己的这部农村调查文集。

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文集，1941 年在延安曾以《农村调查》为书名出版过，原版一共收有 12 篇文献，由毛泽东本人亲自编辑并作序。1982 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农村调查》一书基础上增订了 5 篇文献，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增订的 5 篇文献是：《反对资本主义》、《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关于农村调查》、《中国佃农举例》、《寻乌调查》等。经增订以后，《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收入的文献总共有 17 篇。其中有关论述调查研究重要性及方法类的文献 4 篇，调查报告类 11 篇，另有 2 篇相关的法律文件，在这些文献中，最早的成之于 1926 年——《中国佃农举例》，它是毛泽东 1925 年春回韶山“养病”后组织和领导湘潭韶山一带农民运动过程中调查收集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材料，并与湘潭西乡佃农张连初交谈所得情况的基础上写成的。毛泽东在掌握丰富材料的前提下，舍弃了一切琐碎的表象，从抽象的意义上对一假定的三口之家的中国农村佃农进行了理论考察——像马克思把人们日常中见到的千万次交换关系中的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的细胞，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抽象出来加以考察，以揭示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运动的规律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一样，毛泽东从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文化上受奴役的千万个中国农村家庭中抽取一户佃户，作为解剖中国农村社会的细胞，以揭示农村贫苦农民的社会阶级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这样，毛泽东就写成了一份既有实际材料又有理论分析的别具一格的调查文献。这份最早的有关农民问题

的文献，在 1927 年 3 月曾以《中国农村佃农生活举例》为书名出版过单行本，并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之一。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收入的最晚文献是成之于 1941 年 9 月的《关于农村调查》，它是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的公认领袖之后，号召全党普遍开展整顿党风学风文风运动，以端正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并在全党大力提倡调查研究成为风气的时候，毛泽东对即将赴外考察的中央妇委、中共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毛泽东对该团成员所作的这一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根本意义和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表明毛泽东是调查研究的模范，表明他在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紧张军旅生活中曾挤出不少时间作调研工作。仅 1930 年 5 月至 11 月，毛泽东写成的调查研究文章和报告达 9 篇之多。1930 年是毛泽东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非常艰苦、成绩最大的年份，却也是毛泽东写成调查研究文献最多的年份。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工作效率如此之高，是与他善于利用每一点时间分不开的。例如，1930 年 11 月对吉水县东塘村、大桥村，吉安县李家坊、西逸亭等地的调查，便是红军前委为打破蒋介石军队的第一次大“围剿”，于 1930 年 10 月在罗坊决定诱敌深入的方针之后，毛泽东于 11 月 6 日从峡江到吉安布置红军撤退工作，沿途做的“一点简略调查”。

毛泽东不仅善于利用空隙时间调查，亦善于采取多种不同的调查形式。例如除开调查会了解被调查对象和情况、搞数据统计调查等等之外，还经常听取下属的汇报以随时掌握情况。文集中收录的最短文献，不足 400 字的《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便是毛泽东记录的王怀、陈正人有关永新及北路情形的报告而成的。文集中收入的最长文献，近 6 万字的《寻乌调查》，亦是毛泽东在寻乌的党的书记古柏的帮助下，召集熟悉寻乌社会的各类人（总共 11 人）开了 10 多天调查会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4 篇论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及其科学方法的文献特别值得珍视，其中以《反对资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最为杰出，因为它倡调查研究风气之先，最先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它当时是而且至今还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在调查类文献中，《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都是毛泽东解剖中国农村区域社会、解剖一农村社会机体或器官（不止是细胞）的尝试。《寻乌调查》是毛泽东所做的最大一次规模的调查，它对包括县城在内的寻乌的商业、手工业、旧有土地关系以及革命时期的土地斗争做了细心而全面的城乡一体式调查。《兴国调查》的特点是除了对 8 个农家作抽样调查外，还对农村旧有土地关系和土地革命之后土地分配状况，当时已展开的土地革命带来的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动，以及苏区军事化的情况作了全面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则是毛泽东对两个“乡苏工作的模范”的调查，是对革命政权建立后的农村社会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行的立体透视。这两篇调查都成之于 1932 年 11 月，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后，于 1934 年 1 月将它们印发给了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目的是在全苏区内推广这种先进典型。文集中的其他一些短篇报告，如《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江西土地斗争

中的错误》、《分青和出租问题》等，表明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了解苏区土地分配问题。《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等则表明毛泽东想要了解的是革命后农村的经济状况和阶级斗争状况，其中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分田后的富农问题，即弄清富农的经济地位和对待革命的态度。此外，文集中还收入了两个《土地法》，这两个法律文件在 1941 年出版的《农村调查》文集中，毛泽东就将它们收编入了，它们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保障土地革命的有章可循和有序进行，在总结土地革命前期土地分配的经验基础上制定的。这两个《土地法》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注意法制建设的历史书证。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虽然收入了 17 篇文献之多，但它收的还不全。如作者本人所言，大革命时代 1927 年 1 月他在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做的五个有系统的调查都散失了，井冈山时代他在永新、宁冈 1927 年 11 月做的两个有系统的调查亦散失了。这散失的 7 篇文献当然无法收编入集了。并且，大革命时代毛泽东到湖南湘潭等五县调查，在此基础上写成的总体性调查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由于收入了《毛泽东选集》，所以它也没有收入本集。还有，1926 年毛泽东考察江苏、浙江两省部分农村之后，写成的《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刊于 1926 年 10 月《向导》周报第 179 期）一文亦未收编入本集。此外，有不少有关调查研究的其他文献也不曾收入本集，如 1926 年毛泽东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时，为指导农讲所农民问题研究会的农村调查工作，曾为研究会拟定的 36 个调查项目的提纲未曾收入；及他当时为《农民问题丛刊》所写的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亦未收入，等等。

尽管这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不是全部调查文章，尽管散失和未收入的文献不算太少，但通过全面研究该文集，我们仍然可以从总体上了解：毛泽东是怎样下大力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其调查和研究取得了何种殊绩；毛泽东所倡导和运用的调查研究方法和技术有何优越之处；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研究对于整个中国革命有何重大意义，以及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对于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何重大意义。下面拟先从毛泽东的几篇典型文献着手分析以加深我们的了解。

一 几篇经典性调查研究文献

几篇经典性调查研究文献指《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 4 篇。这 4 篇文献既具有客观性，是作者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客观实际反映；亦具有主观性和目的性，即体现了调查者是为了解决一定问题而去作调查的，有其侧重点。

（一）《寻乌调查》——对中国农村社会的悉心剖析毛泽东对寻乌的调查不仅规模最大，而且最具典型意义。因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关不远。”《寻乌调查》共有 5 章 39 节，近 6 万字。它是毛泽东对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起着纽带作用的乡镇城市状况，尤其是“城市商业的情况”的全面调查。这是在毛泽东以前已基本了解了包括小乡镇在内的农村情况、农村经济、政

治、文化生活，特别是农村土地状况、阶级关系等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的调查。尽管毛泽东着意要去“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但由于中国不发达的乡镇城市同时兼有乡村特点，城市化水平极低，与广大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他在调查中仍以一半以上的篇幅（共2章26节）来记录农村的土地关系及土地斗争。当然，这一部分调查的内容与对寻乌城及其商业的调查一样，同样具有价值。

对寻乌社会如此全面的调查，在寻乌历史上甚至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作过。毛泽东首先概括调查了寻乌的行政区划及其历史沿革，寻乌的水陆电信交通及其交通工具等基本情况，进而重点调查了寻乌的商业和手工业。在“寻乌的商业”章中，毛泽东开首用了7节篇幅来简略交待寻乌与邻近地区如梅县、兴宁、惠州等地的商务往来（包括进口、出口、转手贸易等），寻乌县境内的重要市场（如吉潭、牛斗光、留东、寻乌县城、澄江、石排下等市场及一些普通小圩场）后，接着详细调查了寻乌城。毛泽东是带着为了正确“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的目的而调查的，他从中国社会受外部资本主义经济侵蚀的总体形势出发，根据从寻乌调查所得的实际状况，得出了“寻乌城是这样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他“从各种货物去解剖这个城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从盐、杂货、油、豆、屠坊、酒、水货、药材、黄烟、裁缝、伞、木器、伙店、豆腐、理发、打铁、爆竹、打首饰、打洋铁、修钟表、圩场生意等寻乌城内几乎所有的各行业去把握其商业总体状况。毛泽东通过具体的数据和对各业兴衰荣枯之历史和现状的考察，结合各商业资本的大小和各业主的经营方式及其生活方式，对寻乌城的“生活情况”有了大致了解。毛泽东注意到：裁缝业中机器正在驱逐手工，不仅城里13家裁缝中手工只剩3家了，而且“全县人口中已有30%废除手工，采用机器做衣了”。伞业是日本的羽绸伞占“销行比例”的40%，中国人加工组装的洋布伞和中国产的纸伞各占30%。同时，毛泽东也注意到了“代表半自然经济的圩场生意”和“代表商品经济”的店铺生意并行于寻乌城，但其比例是：店铺占70%，圩场占30%”。毛泽东认为，这表明城内的“商品经济势力超过自然经济势力很远了”。

作为要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的政治家，毛泽东当然更注意从人们的生活状况中寻出其生活态度。他列出了谁是“城里第一个‘资本家’”，谁是“吃饭就是点子青菜，穿的是土布衣”的小杂货店主。他既看到了杂货店的店员制度“阶级关系原是那样的模糊”，亦看到了有些“商人于与政治”。毛泽东还专门调查了城内的娼妓及城内的社团“同善社”，最后还分类统计了城中人口，分析了各类人口的成份及其在政治上的地位。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6、56页。下引此朽，不再注明出版社年版。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6、57、81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6、57、81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6、57、81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93、63、65、79、100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93、63、65、79、100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93、63、65、79、100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93、63、65、79、100页。

根据自己的统计数字，毛泽东从全城包括农民、手工业者、游民、娼妓、商人、政府职员、地主、宗教徒等在内的总共近 2700 人的各业各阶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中，和从农民 1620 人和小手工业者 297 人合计占总数 71% 的比例中得出结论说：寻乌“还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的城市，寻乌“旧社会的指导阶级，自然不是那总数占百分之八十七的农民、工人、游民和娼妓”，而“是那仅仅占人口百分之十三的地主、商人和那稣教天主教传教士等”。

毛泽东对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阶级关系及剥削状况的调查是深入细致的。他对寻乌的土地中公田占 40%，地主和农民各占 30% 这种现状进行了具体调研，他尤其注重解剖各阶级内部的各阶层状况。毛泽东首先提出了公共地主与个人地主概念，把经管公田者称为公共地主，它内部又分为祖宗地主、神道地主和政治地主三类。祖宗地主是一氏族内部的各子孙从家产中抽出一份凑份子田为宗祖立的一个公田，由氏族的“管头”管理这份公田。神道地主有神、坛、社、庙、寺、观六种。政治地主则是考棚、宾兴、孔庙、学租等教育类和桥会、路会、粮会等社会公益类的经手人。对于个人地主，毛泽东将其分为大、中、小三类；年收租 500 石以上的大地主，年收租 500 石以下 200 石以上的中地主，年收租 200 石以下的小地主。农民里面，毛泽东将其分为有余钱剩米的富农，够食不欠债的中农，不够食欠债的贫农，从事各种非农业劳动的手工工人，无业游民，做长工及专门做零工的雇农。

毛泽东对寻乌的剥削状况的考察也较详细，他深入了解了地租、高利贷、税损等几种剥削形式。地租剥削中，他详举了见面分割制（禾熟时地主同农民同往禾田，谷子打下“双方各半”）、量租制（“早六番四”）、批田（写“赁字”）、批头（“批头钱”）、田信（“批头鸡公”）、田东饭、谷纳、钱纳、铁租、非铁租、劳役等各种剥削形式。高利贷剥削中，他列举了钱利、谷利、油利等多种“毒辣”的方法。税损剥削中，他列举了钱粮税（包括地丁、官租及各种陋规）、烟酒印花税、屠宰税、护商捐、牛捐、赌博捐及派款借款等苛捐杂税。毛泽东了解到农民在这重重剥削之下的悲惨和痛苦，他们往往是“禾头根下毛饭吃”（即刚打下禾交过租就没有饭吃了），很多人被逼得“卖奶子”（卖儿子）。透过这重重剥削关系，毛泽东析出“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的关系！”

毛泽东考察寻乌的文化时注意到它的落后性。他调查到全县人口不识字的占 60%，识字的占 40%。识字人中，识得 200 字、能写信的占大多数；大学生、出洋学生、秀才、举人很少。而女子识字的更少，不过 300 人。当然，毛泽东还注意到这样一种文化垄断现象：“大学生中大多数出于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只占着五个”。“秀才都是地主阶级的产物，但也有极少数是从贫农阶级出身，受地主的栽培而读书进学的。”

《寻乌调查》最后一章是毛泽东考察自寻乌革命委员会当政，上地革命开展以后寻乌的土地斗争情况。毛泽东重点考察了寻乌的土地分配办法，土地分配的区域标准和分配进度，“平”田过程中的富农与贫农的斗争，非农民的分田问题，和与土地斗争相关联的废债、土地税问题，土地斗争中的妇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93、63、65、79、100 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153、161、163 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153、161、163 页。

女问题。毛泽东指出：寻乌的分配土地的办法“主要的是照人口平分”。“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是最直接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土地分配中，有一个肥瘦分配的斗争，这也是富农与贫农的斗争，这是土地斗争的中心。毛泽东看到了寻乌土地斗争带来了巨大变化：随着土地斗争的展开，农村的高利贷废除了，土地税也采用了新的累进税法。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到土地斗争中妇女的表现。他说，寻乌的妇女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她们在经济上是男子经济（封建经济以及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在政治上没有人身自由。土地斗争中，寻乌的妇女解决了她们没有人身自由的束缚，首先是没有婚姻自由的束缚。不过，毛泽东也从寻乌看到了女子解放的艰巨性，认为只有随着土地斗争的深入，农村贫农雇农“整个阶级解放完成了之后”才能有女子的“完全的解放”。

（二）《兴国调查》——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表现的动态考察《兴国调查》实际上是毛泽东对兴国县永丰区的调查。这个调查的要点有三：一是抽样调查了永丰区8户农户；二是整体考察了永丰区土地斗争中的各阶级的表现；三是重点了解永丰区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农村军事化状况。

毛泽东所调查的傅济庭、李昌英等8户农家，都是贫苦之家。被调查者中有些是共产党员，家人多数参加土地斗争、参加红军的预备队（或赤卫队），或愿当红军、参加乡苏维埃政府的管理。总之，他们大多拥护革命。通过这种“从来没有做过的”调查，毛泽东认为自己有了对“农村的基础概念”。他了解到贫苦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叨红军的恩典”，分得了田地，废除了债务，生活有了改善而不那么苦了，从而更加明确贫农是土地革命的依靠阶级。

在调查8个农村家庭及考察永丰区的旧有土地关系后，毛泽东重点考察了该区斗争中的各阶级。他了解到，该区各乡的地主是革命的对象，他们的家产在革命中被没收，有的人被杀，故他们都反革命。各乡的富农反革命的亦是多数，革命中有些富农的家产被抄，人被杀。富农革命的是少数。同时，土地革命初起时富农“投机加入革命的颇多”。永丰区的中农，由于在土地革命中得利，如经济上“平”进了田，各项生活费用降低；政治上不再受制于地主富农，有了“话事权”等等，故他们和贫农一样，参加革命很勇敢。永丰区的贫农是在革命中得到根本利益的阶级，如分得了田和山，革命初起时分得了地主和反革命富农的谷子，废除了债务，经济生活改善，“由”了老婆。故在革命中他们成了农村政权的主干，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永丰区的雇农也是土地革命中得到根本利益的阶级，但由于雇农不认得字，不会说话，不开通，不熟公事，办不得事，革命后在政治上没有当权。永丰区的手工工人在土地革命中亦得到了利益，他们以前80%是欠债的，革命中所有债务都废除了，他们现都参加了工会。永丰区的商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本钱50元以上的商店，在革命中受到过左政策的严重打击；一种是本钱只有20元、10元的贫民小贩则在革命中得到了很大利益，除了分得田之外，应酬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65、173，181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65、173，181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65、173，181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83、216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83、216页。

消耗减少，老婆容易讨，政治上也出了头。他们在革命中所得的利益，也与贫农所得到的利益差不多。此外，毛泽东还注意到永丰区的游民，他们包括赌钱的、讨饭的、卖水烟的、打卦的、挑观音的、道士、和尚、戏客子、算命的等9种，他们在革命中得了很多利益，一般都是欢迎革命，并且还参加革命。

毛泽东对永丰区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农村军事化作了较详细的调查。对于苏维埃政权建设，他考察了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府；考察了三级政府领导成员的人数，各领导成员的家庭出身，本人成分和职业，文化程度，工作能力及在土地革命中的表现；考察了三级政府各自的分工及工作状况。着眼于政权建设的完善，毛泽东在调查中注意到了政府人员的弊病。他发现他们的弊病有四：一是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欢接近群众。二是没收了反动派的东西，不发与贫民，拿了卖钱。三是调漂亮女子到政府办事。四是强奸民意，政府委员由少数人定了就是，代表大会选举只是形式。谁不举手谁就会被说成是AB团。再就是非党员，即使是群众领袖也不能到政府办事。毛泽东认为，这四种弊端中，第四项是最大的一项。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在30年代初对民主政权的建设就非常重视。

毛泽东专门考察了农村军事化问题。因为土地斗争与武装斗争是紧密相关的，所以毛泽东对军事化问题尤为关注。他对永丰区的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童子团、纠察队、红军预备队、区特务营、红军独立团等军事组织及其各自的编制，人数及人员素质，领导机构，军事操练和装备，军事任务等都有较细的考察。关注农村军事化问题可以说是《兴国调查》的一大特色。

（三）《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对“乡苏”工作模范的总结和推广《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是毛泽东分别向长冈乡、才溪乡的几位同志（其中包括乡苏主席）收集材料而写成的。这两个调查的单行（油印）本，1934年1月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分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单行本的题目是《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显然，这两个调查是毛泽东为推广乡苏工作典型，以加强乡苏维埃政权建设而作的。这两个调查的重点都放在乡政权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会议及其选举、“乡苏”下的委员会，以及经济生活、文化教育等方面。对于这些工作情况，毛泽东都有详细的了解，并对其工作上的创造性作了充分的肯定。例如，对于长冈乡的代表会议的情形，检查制度，值日代表，常委会，代表的作用和变动补充及其政治表现等，毛泽东在作了了解之后指出：“长冈乡代表会议有许多好的创造，如常委会、值日代表、代表领导居民、检查制度等都是别地可以学习的”。对才溪乡的具体情况作了了解之后，毛泽东亦指出：才溪乡“村的代表主任制度及代表与居民发生固定关系的办法，是苏维埃组织与领导的一大进步”。“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在总结这两个乡苏维埃工作成绩的基础上，毛泽东亦指出了它们的不足和缺点，还特别提出了对不足方面改进的方法和措施。例如，他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93、236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93、236页。

指出常委会应改为主席团，值日代表应改为代表主任，最坏的代表需早些撤换，等等。对于它们的代表大会委员会的选举工作，毛泽东同样对其成功方面给予了肯定，对其缺点提出了改进方法。在了解了选举委员会、选举宣传、选民登记、选举单位、选举工作报告、候选名单、选举大会等诸多工作之后，毛泽东指出长冈乡、才溪乡的选举一般是成功了的。才溪“充分执行了中央政府的选举训令，成为苏区选举运动的模范”。但才溪“在选举大会上发动选民提案交新选代表讨论”这一方面没有什么表现”。长冈的代表选举除成功方面之外，其缺点是：（1）宣传上没有指出，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权，选举苏维埃代表是群众最重要的权利。（2）候选名单人数恰如应选人数，没有比应选人数增加一倍，因此群众对于候选名单没有批评，等等。

除对长冈、才溪两乡苏维埃政权建设灌注自己的心血，对其建设经验予以极大关注时，毛泽东还注意推广这两个乡的军事工作、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等方面的模范经验。鉴于当时的反“围剿”战争需要大量兵源，毛泽东在介绍这两个乡的军事工作时，重点放在推广它们的扩大红军的经验上。如才溪大数量地动员去当红军的经验是：依靠政治上的充分的宣传鼓动，废弃一切强迫办法；充分地优待红军家属；健全的编制与训练地方武装。对于两乡的经济工作尤其是一些带有创造性的经济组织形式，毛泽东给予了赞扬。他认为劳动互助组、犁牛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都是办得很好的，群众是热烈欢迎的，它们使群众的生产有了保障，生活也有了提高和改善。对于两乡的文化教育，毛泽东注意到了各村都有“列宁小学”，夜学、识字班、识字牌、读报团、俱乐部等多种形式。此外，两乡的其他一些群众性组织活动如在卫生运动方面将居民编为卫生班，定期大扫除，做到饮食、衣服净洁等活动，以及儿童团委员会，反帝拥苏同盟，工人、贫农团、宣传队，突击队的工作和作用，毛泽东都一一注意到了，并从有利于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生活创造角度对之加以充分肯定。

概而言之，如果说寻乌调查是毛泽东解剖既存的中国农村社会的肌体的产物，兴国调查是毛泽东掌握革命过程中农村各阶级的关系及其变化情况的产物，那么长冈、才溪调查则是毛泽东在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过程中综合了解基层革命政权的建设，并力求使之完善而成为新生的中央苏维埃共和国的稳固基础的产物。

二 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广泛的农村调查实践形成了毛泽东丰富的调查研究理论，也形成了毛泽东独特的调查研究方法和技术。对这些理论、方法和技术 的阐述和介绍，主要见诸于毛泽东的《反本本主义》、《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这4篇文献中。

（一）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有三个基本方面：一是把调查研究当作认识世界的一条重要途径；二是把调查研究视为解决问题、制定正确政策的前提；三是把调查研究作为反对本本主义、主观唯心主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38、297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38、297页。

义的手段，作为理论联系实践的桥梁。

（1）调查研究是认识世界的一条重要途径。把调查研究看作认识世界的一条重要途径，是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明确提出来的。他在文中还提出，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产生是调查研究的结果。毛泽东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创立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同样，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这“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尤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落后，使得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者非下大力搞调查研究不可。因为“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而我们调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对于这种调查工作，需要有耐心、有步骤地去作。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他认为人类的调查研究活动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暂时性工作，而是一历史长过程。他断定，对于发展着的客观世界，“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2）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制定正确政策的前提。对于调查研究就是解决问题，调查研究是制定正确政策的前提，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说得很清楚，他这样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他还辛辣他说：只有蠢人，才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但这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毛泽东批评许多领导者一接任新的工作就喜欢宣布政见，一遇到困难就叹气、恼火，而不知迈开两脚，到自己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毛泽东认为，问题只有经过调查才能解决，因为人们在“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对于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一论点，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毛泽东进而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要靠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而这种正确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只有在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而对社会情况的了解和调查的重点在社会经济方面。毛泽东指出：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21 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21、17、5、21 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21、17、5、21 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21、17、5、21 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21、17、5、21 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2—3、8、6、4、4 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2—3、8、6、4、4 页。

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相反，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3）调查研究是反对本本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手段，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不仅是认识世界，形成理论，制定正确斗争策略的前提，同时也是反对本本主义、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手段，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由于摆正了理论、实践与调查研究三者的关系，毛泽东能一语中的地批评共产党内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实质上是一种形式主义，并揭露“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是中国社会文化落后的国情造成的一种农民心理。作为创造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本本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他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但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呢？毛泽东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向实际情况作调查。他提醒说，决不要以为“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因而空洞乐观，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他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毛泽东还这样明白写道：“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二）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方法和技术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方法和技术，是他整个调查研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毛泽东在长期的调查研究实践中形成的。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方法有较精辟的阐述，对调查研究的技术作了集中介绍。他把调查研究的方法归纳为两条：一是把矛盾分析和阶级分析的观点贯穿到观察、分析和综合中去，二是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他指出：“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进行调查研究“一定要把握住这方面的观点”，并把这种观点贯穿到观察、分析和综合过程中去。他以初到延安的人对延安的认识为例来说明问题。说到延安的人第一步是观察到延安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第二步是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这样，对延安就有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毛泽东推而广之，认为观察一个农村，也同样是如此。并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因此，毛泽东注意到了分析与综合的联系，认为分析中有综合。他提倡要象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一样，“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3、8、6、4、4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3、8、6、4、4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3、8、6、4、4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8、17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8、17页。

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他特别强调要把对立统一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运用于分析法和综合法中，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农村，了解农村的阶级特点和阶级关系，农村中各个阶级、阶层及其生活概况，以对农村有正确的全面的了解。

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的另一方面是“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他说：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因这些要点或特点是“矛盾的主导方面。”他认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用，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故调查的关键是抓住‘主要的东西’。如果十样东西，‘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毛泽东举例说，譬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矛盾。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而“这个主要矛盾”就“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所以他警告说：“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

在阐明调查研究的方法后，毛泽东接着根据自己的经验介绍了调查研究的技术。这主要应注意四个方面：（1）怎样开调查会。一个调查会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要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被邀请参加调查会的最好有三、五个。（2）怎样找调查的典型。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每种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3）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材料的收集和整理都必须亲自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找出经验来，并用这些经验再随时去改进以后的调查和整理材料的工作。（4）怎样使对方说真话。这就要根据调查对象各个人的不同特点采取各不相同的方法。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讨厌。把真心真意交给群众，使群众明确利益，群众才会讲真话，调查才能得到真情况。毛泽东所介绍的这些调查技术都是经验之论，十分宝贵。在这些技术中，毛泽东尤其推重自己运用娴熟的“开调查会”这一主要形式。早在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这一文献中专门介绍了这项技术。这项技术具体有七条：（1）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围绕调查主持人提出的中心问题经过辩论以抽出正确结论；（2）参加调查会的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与调查问题有关的各类人；（3）参加调查会的人数根据调查人的实际需要和指挥能力决定，少则三人，多则十几个人或二十几个人；（4）要事先准备调查纲目以及细目；（5）要亲自出马；（6）要深入；（6）要自己做记录。除此之外，毛泽东还非常强调调查研究的态度。他认为要了解中国，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调查了解情况时先要做调查对象的学生，采取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总之，要明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向群众作调查“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方法和技术虽然是在作农村调查过程中形成的，但它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3—24、25—26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3—24、25—26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6—27、16—17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6—27、16—17页。

具有普适意义。在信息交流较为畅通的当今时代，它仍然是十分有用的，任何一位领导者，为要掌握情况、指导工作，首先需要树立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和具备正确的态度，运用这种科学的调查方法和技术去向社会、向群众作切实深入的调查。

三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重要意义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以上地革命力中心的，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农民，占中国人口总数绝大多数的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的状况及其革命意识和态度如何，事关革命的成败。因此，要使革命获得成功，要制定出正确的革命路线和革命策略，发动和组织受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广大贫苦农民起来参加革命，首先需要革命的指导者深入农村作调查，以了解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之所以能制订出正确的革命路线和策略，关键在于他时时深入农村作实际调查，熟悉农村和农民。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就曾利用假期考察湖南农村。1917年暑假，他与萧子升曾以“游学”方式，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月有余，收获颇多。1917年冬，毛泽东到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一带访察。1918年夏，毛泽东与蔡和森一起环绕洞庭湖对益阳、湘阴、沅江作了为时半个多月的考察。通过多次考察，毛泽东真切地了解了农村的实际，他看到农村存在着八种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游民。对农村社会状况和阶级状况的这种了解，为他后来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以及农民问题提供了最初的事实经验。

大革命时期，尤其是中后期，毛泽东以极大精力从事组织农民运动的工作以及调查研究工作。1925年春，毛泽东从上海回故乡韶山“养病”。他除了对韶山一带的农民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外，还调查收集了大量有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材料。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此之前他曾赴江浙一带调查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并撰文说明江浙农民的生活很痛苦，近年来他们自发地反对过残酷的封建压榨，这就澄清了有人以为江浙两省“乃太平富庶之区，农民并无多大痛苦”的说法。同时，毛泽东还特地对当时全国土地占有情况作了调查。从中了解到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高利贷者及官吏，总共占有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七十。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贫农、佃农和雇农，却只占全国耕地的百分之十到十五。这些调查材料为农村土地革命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提供了根据。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华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之际，豪绅地主、革命军中的反动军官及国民党右派都认为农民运动“过火”、“糟得很”，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也指责农民运动是“幼稚行动”。为了回答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支持并更大规模地掀起农民运动，毛泽东1927年1月专程赴湖南考察湘潭、长沙等五县的农民运动，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指出，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是农村中苦战奋斗的

参阅莫志斌编著的《毛泽东的治学之路》，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87—88页。

参阅孙克信等编著的《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8页。

主要力量，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而占农村人口少数的“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毛泽东认为，农民在几个月之内做到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运动建立了奇勋。他热情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并以事实有力地批判了在对待农民运动问题上的各种错误观点和作法。同时，毛泽东还把农民所做的组织农会、建立农民武装等总结为十四件大事，这为后来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武装及农民政权具有启迪意义。

正是在长期、广泛和深入调查农村的基础上，毛泽东不仅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动力，找到了一条革命阵线，而且更从理论上提出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1925年12月，毛泽东写出了于中国革命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通过对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等）、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无产阶级（包括农村雇农）及游民无产者等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各阶层的深入分析，划分了一条明确的阶级阵线：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你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这种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尤其是对农村复杂阶级结构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革命的阶级阵线，显然获益于他对中国农村社会透彻的了解。正是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正确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在1925年就能正确地制订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中国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当然，对农村的调查更使毛泽东能从现实上解决中国革命的同盟军这一根本问题。他从农民运动中看到了农民身上的巨大革命潜力，这种潜力的释放必将成就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大革命后期敢于独树，一帜，深入农村去发动农民举行起义，并以井冈山为依托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开创了一条不同于俄式革命的中国革命道路。

农村调查不仅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形成和制定有根本意义，而且对毛泽东制定具体的土地革命政策和农村阶级政策也有根本意义。1927年秋举兵井冈山揭开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序幕之后，为了使土地革命有章可循，毛泽东又一次在井冈山地区进行调查。特别是随着在永新县西乡塘边村的土地革命试点工作的展开，毛泽东不断总结革命后土地分配的经验，于1928年12月制定了中国土地革命的第一部《土地法》。《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分配给农民个别耕种、共同耕种或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土地法》还规定了土地分配的数量标准、区域标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44、1—1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44、1—1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19页。

准、土地税之征收标准。这样，土地革命的政策法制化了。4个月后，根据土地革命的实践标准和“对于土地斗争认识之发展”，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又制定了一个《土地法》，其中“一个原则的改正”是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1930年5月，毛泽东对寻乌作了大量调查之后，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以后又制定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调整土地政策，并制止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土地分配政策。同时，毛泽东在调查中弄清商业问题、商人及小业主问题之后，也为以后的新的工商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可靠的根据，如保护工商业主的利益，以“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此外，经过兴国调查，毛泽东弄清了农村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尤其弄清了贫农和雇农问题，了解了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担任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后，他根据自己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土地革命战争以来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丰富经验，主持制定和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案》和《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等法律和法规性文件。这一系列适应于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法律和法规性文件的颁定，充分显露了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实践已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如此，毛泽东在从事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权建设的同时，还抓紧基层政权建设情况的调查研究，如调查长冈乡、才溪乡的情况之后将它们的模范经验向全国推广，以促进革命事业的更大发展。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已成为全党拥戴的领袖。由于他领导全党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并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于是调查研究之风在全党范围内展开起来。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已被广泛地运用于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斗争领域，这极好地保证了党的各项政策的正确制订和执行，从而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大发展，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并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形成的一系列宝贵革命经验，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无疑还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调查研究不仅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形成的基础，也是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机会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思想武器。自1920年毛泽东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以后，他便从马克思的书上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正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实际的阶级斗争、首先是中国农村实际的阶级斗争作了老老实实的调查和研究，才使毛泽东使自己与那些仅仅只有一些书本知识的教条主义者区别开来，才保证了毛泽东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5—38、40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5—38、40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9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页。

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的环境，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正是毛泽东踏在实地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这一活的灵魂，所以他能道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名言，也只有他才敢于发出“反对本本主义”的呼喊，才敢于批评一些只知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的蠢人，才敢于铲除只知道盲从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的形式主义者，才敢于讽刺粗枝大叶、不求甚解和昂首望天的不良作风，才敢于抵制那打着国际招牌满天飞的“钦差大臣”，并尖锐指出他们的空洞理论“不过是无知妄说”。正因为饱受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夸夸其谈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危害之苦，到延安以后，毛泽东便下决心领导全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并把调查研究作为理论联系实际，转变党的作风的基本环节。他向全党提出了“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要求“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我友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他这样强调：“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与此相应，党中央也专门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推动了全党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正是经过调查研究，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自觉性，全党党风有了一个根本转变，从而使革命事业蓬勃发展。

由此可见，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具体实践的关键环节，它既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起点，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和丰富的活生生的源泉。调查研究理论在整个毛泽东思想理论大厦中具有奠基意义。

七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毛泽东军事文集》（1—6卷）览要

如果从军事指挥之妙和军事理论之完整这两个方面来看，毛泽东无疑是20世纪最为杰出的军事家。毛泽东创造了在用高科技武器装备军队之前的现代军事史上的奇迹，他以弱小之军抗击强大的敌人——日本侵略军、美国扶持下的蒋介石军队，最后战而胜之。后又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打败了以美国军队为首的气势汹汹的联合国军队，保障了朝鲜半岛及东北亚的和平。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巨大战功和毛泽东军事思想这种战之能胜的优越地位已为世界公认。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称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具有“高度的分析能力，罕有的洞察力”。美国的巴特曼在《在东方的失败》一书中认为“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部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是政治军事天才人物”。日本军事评论家穴户宽则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部分是他的军事思想”，“不理解他的军事思想，也就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所不同的是，他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军事理论家”。毛泽东能成就为举世知名的军事人物，首先取决于他学识渊博、通今博古，并且胆略过人，尽操胜算，这足以抵得上千军万马。当他将自己的全部学识巧妙地运用于广泛的军事实践时，便在东方中国幅员辽阔的巨大军事舞台上导演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高度发挥了自己的雄才大略。在数十年出生入死的军旅生活的每一途中，他通过战争指挥及对战争经历的及时总结而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军事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军事思想史就是一部现代中国军事思想史，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军事思想的发展。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不仅是中国军事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宝贵指南，也是人们能从中获取多方面知识的智慧之源。1993年，在毛泽东百年诞辰之际，凝结着毛泽东军事智慧的《毛泽东军事文集》问世，这当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文集为人们全面研究军事家毛泽东提供了几乎是全部文字的军事文献，敞开了人们通向毛泽东军事艺术殿堂的智慧之门。这套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并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的6卷本《毛泽东军事文集》，递次编入了毛泽东自1927年8月至1972年12月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专著、信函、报告、谈话、命令、训令、电报、布告、批示以及碑文、诗词等1631篇文献，其中第一卷编入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267篇文献，第2卷编入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253篇文献，第3、4、5卷编入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893篇文献，第6卷编入的是建国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218篇文献。这些文献中，选自《毛泽东选集》（1—4卷）的计有52篇，选自《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计有6篇，另还有一些选自《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外交文选》、以及《红色中华》、《斗争》、《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余下者都是第一次公开发布。从类别上看，《毛泽东军事文集》中文章专著类的份量较轻，数十篇，仅占总篇数

许全兴等编：《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文选》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7年，第262、316、288页。

许全兴等编：《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文选》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7年，第262、316、288页。

许全兴等编：《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文选》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7年，第262、316、288页。

的 5% 左右；而作战命令（主要是电报）类占绝大多数——达 1550 件以上，占总篇数的 95% 左右。尽管文献类别比例如此悬殊，但数十篇论文、专著最有理论价值（它们绝大多数曾被选入《毛泽东选集》），它们基本上包涵了毛泽东的军事理论。而那些差不多占总数 95% 左右的大量作战命令一般只涉及具体战役的指挥，较少涉及军事理论方面，但它们却体现了指挥者的军事谋略和意图。故此，在重点把握毛泽东数十篇军事理论文献的基础上，紧密结合研究毛泽东指挥各战役的大量作战命令及其他有关文件，基本上可以较为全面和准确地把握整个毛泽东军事思想及其发展演进过程。但由于《毛泽东军事文集》卷帙浩繁，本章不可能对它予以详尽探讨，而拟从两个大的方面加以把握：一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几个主要理论予以综合研究，二是对《毛泽东军事文集》1—6 卷的内容进行逐卷的介绍。

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几个主要理论

把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要理论，拟从毛泽东的战争观、战争形式和战争主体、战争指导者及其战略战术等这几个方面入手。从战争观看，毛泽东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从战争形式和战争主体看，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战争是人民战争，其主体是人民军队；从战争的实行来看，毛泽东要求战争指导者能驾驭战争规律，能制定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个主要方面构成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骨骼，贯穿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的全部历程，也规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的不同历史特点。

（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

毛泽东是大军事家，同时又是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他能从政治哲理的角度对战争加以透彻、全面的认识，故他具有单纯军事家所不能具有的战争观。毛泽东的战争观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争观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的影响，但他更具有自己特殊的内容。他认为战争是社会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其实质是政治的继续，是一种流血的政治，历史上的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有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之分，等等。

毛泽东在阐述自己的战争观时是从唯物史观出发的。他通过鸟瞰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进程中，曾发生各种形式的大量的战争现象，指出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私有制和阶级斗争而来的结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毛泽东这样写道，战争是从私有制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这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实质上表

列宁曾经指出：“‘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是熟谙军事问题的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探讨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673 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 卷，第 693、691 页。下引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 卷，第 693、691 页。下引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明战争本身并不直接等同于一般政治。故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又进一步指出，战争有其特殊性，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他以列宁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的论点来论述问题，说“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因此，在中日战争中始终“贯彻战争的政治目的”，所以，“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在毛泽东的战争观中，战争是政治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或是政治的继续还包含另一层含义，即战争发生的同时仍与社会政治有极其紧密的联系，二者是一种伴生现象。毛泽东在分析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时揭示了这种密切关系。他先引证了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进而指出：“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

战争与政治的这种密切关系，决定了战争的性质问题——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问题。毛泽东认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例如，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掠夺性的侵略战争，殖民战争，压迫人民的反革命战争等等，都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战争；而反抗外来侵略的卫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反对压迫者的革命战争，人民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援助这两种战争而战的战争，都是进步正义的战争。共产党人对待这两类战争的态度是，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战争，而积极参加和支持正义的战争。为什么要积极参加和支持正义战争呢？毛泽东认为：“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问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

毛泽东把正义战争、进步战争与革命战争是等同看待的。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更加倚重于革命的武装斗争或革命战争，因为革命战争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根本途径，它在完成中国社会发展的飞跃过程中具有无可代替的作用。毛泽东从一般和特别两种角度来阐明这一问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07、308、307、303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07、308、307、303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07、308、307、303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07、308、307、303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94、334页。

题。在《矛盾论》中，他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角度这样指出：“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在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这一观点后，接着具体从中国的特殊情况出发阐明了革命战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根本作用。他说：“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他还说：“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都是为着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为了准备战争的，例如五四运动至五卅运动那一时期。在战争爆发以后的一切组织和斗争，则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区域内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直接地配合战争的，红色区域外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间接地配合战争的。再如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后方的和敌军占领地的一切组织和斗争，也同样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总之，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正是牢牢抓住了中国革命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一根本，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革命者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始终注意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发展，始终依靠以革命战争去推翻压迫中国人民的内外敌人，直至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由于正确地把握了战争与政治两者的关系，所以毛泽东在把革命战争看作是中国社会政治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看作是革命阶级推翻旧的阶级统治、夺取国家政权，完成新旧社会转变的质的飞跃之根本手段时，在着手指导革命战争时，又极为重视其他各种形式的组织和斗争。他反对把革命战争看成一种孤立的单纯军事行为，而总是将武装斗争与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如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等紧密配合起来，将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思想斗争紧密配合起来，以利促进这种武装斗争的顺便发展和成功。从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看，它首先是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的，武装斗争是它的依托，土地革命是它的中心内容，广泛发动群众参加革命、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以彻底战胜反动统治阶级是它的策略。因此，这种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流血政治，同时又与非流血的原本意义上的政治斗争等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毛泽东认为，由于战争具有特殊性，官就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因此，一切参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94、334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16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17—419页。

加战争的人们，必须脱出寻常习惯，而习惯于战争，方能争取战争的胜利。争取战争的胜利即是实现战争的目的。两军相战的战争，其根本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毛泽东认为，所谓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即“剥夺敌人的抵抗力”，而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本着这一原则，毛泽东在指挥革命军队与敌作战时，首先注重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往往实行“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同时并举”，注重从精神上瓦解敌人，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大军压敌之境、胜券稳操之际，却围而不打或兵不血刃，去寻求和平解决的出路；对陷入绝境之敌晓以大义，攻心诱降，劝其放下武器投诚，给以生路，这是毛泽东与敌作战时的一大特点。他还主张，凡是被俘者都给以人道的待遇。不管以前在战场上如何，只要放下武器，一律不辱不杀，尊重其人格，有伤病者均给予治疗。这体现了一种宽大为怀的尚武精神，一种可贵的战争道德观。这可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最为伟大之处。同时这也表明，毛泽东的军事道德思想与中国古代军事家“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善俘”、“爱卒”等道德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不仅是战争论者，也是非战争论者。从根本上说，他认为战争是一种反人道的社会行为，是应当被消灭的人类社会的怪物。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他指出：“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既然战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么它就会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再存在。“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终久和平的时代。”本着战争终久会被消灭的论点，毛泽东阐明了共产党人研究战争的目的：“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

（二）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消灭战争而从事战争，为消灭反革命战争而从事革命战争，为消灭侵略战争而从事反侵略战争，这是毛泽东对待战争的态度。建立和依靠人民军队，团结广大的民众，实行人民战争则是毛泽东克敌制胜的根本。

建立和依靠人民军队，是指建立工农武装，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并依赖这支军队以枪杆子去夺取政权。毛泽东认为，革命军队与其他军队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它是“一个执行革

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革命军队“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开这些任务，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革命军队既然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在政治上就要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08、310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08、310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431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93—694、694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93—694、694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87、97页。

绝对服从革命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对军队实行领导的具体形式是各军事单位都建立党的组织。毛泽东尤其重视军队基层党组织的建设，重视把支部建立在连上。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毛泽东曾这样强调指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由于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就从体制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指挥，同时也能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切实加强党的组织及党员与党外群众的密切联系，加强革命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和提高革命军队的战斗力。

为了保证“党指挥枪”，毛泽东为革命军队规定有一套与其党的组织和领导相配合的政治工作制度，这一政治工作制度就是连设政治指导员、营设政治教导员、团以上设政治委员和设政治处、部，军委设总政治部，其功能是根据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党的方针、政策、策略进行部队的政治工作，把党在各个时期提出的任务落到实处。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工作重心进行政治工作，这是一个中心环节。它要求对官兵进行及时的思想政治教育，把党的指示精神加以普遍深入的宣传，激发官兵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唤起官兵的革命热忱，去出色地完成各种工作任务。同时，政治工作也是部队战斗动员的关键，每次战斗之前，它鼓励官兵进行认真的准备，提高军事技术，战斗中勇猛顽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原则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它要求肃清军队中的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保证全军团结一致。它要求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要求官兵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它要求军队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以使军民团结一致。同时它还要求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对俘虏不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以有效地瓦解、孤立敌人。由于政治工作对革命军队的工作起了生命线的作用，所以保证了党对革命军队的正确领导，坚定了革命军队的正确政治方向。这使革命军队到处受到人民的欢迎，被人民称为仁义之师。

革命军队既有严格的政治训练，也有严格的军事训练，为了军官、军佐任免升调之适当，合理选拔人材，毛泽东为军队制定了一整套官兵考绩制度，即在军队内部规定教育系统，实行测验制，对兵卒、军士、下级干部、中级官佐分别进行考绩。除对他们作一般调查外，兵卒和军士还测验学、术各科，如典、范、令、游击战术，操场、野外动作，考绩其个性、嗜好、能力。干部和中级官佐还测验政治，测验战术原理、射击学理或战术学、射击学、地形学、阵中要务，考绩其主张（是否合乎红军政策及遇临时事变有无主张）、管理法、训练法、游击工作、指挥能力及果断、个性、命令之执行，在士兵中之信仰。对军需处经理人才，每月出试题举行道尔顿式之测验，并尽可能与以工作之指示和开会方式教育。对军医处医官、看护士、看护兵、担架兵等，有计划地施以普通医学、药物学与救护教育并进行测验。对副官处各级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87、97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96、297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96、297页。

副官时常予以指示并开会讨论心得，等等。通过考绩“使全军官兵的教育训练都能够在比较有计划的推动之下得到良好的效果”，“使红军中军事技术进步”，更利于完成军队的政治任务。

毛泽东认为，革命军队“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革命军队之所以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和战无不胜的力量，主要是在内部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在外部实行拥政爱民的政策。这表现为军队内部的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的团结一致，外部的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的团结一致。建立在自觉基础上，具有严格纪律的革命军队，不仅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和“生产队”，即对敌人是战斗队，对自己是工作队和生产队。它是真正的人民军队，是人民子弟兵，它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戴。

一方面，毛泽东认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只要军民团结如一人，则天下无敌。毛泽东还强调，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革命战争，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就能夺取全中国。日本侵略者、蒋介石反动派之所以注定要失败，关键在于他们的反人民性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之所以能胜利，关键在于他们代表人民的真正利益。作为辩证唯物论者，毛泽东还进一步看到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根本的和长久的条件。他认为军事“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故此，只有深得人心、深受人民群众拥护的革命军队，才能在战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当然，毛泽东在注重人的因素，注重人心向背，反对战争中的机械论尤其是“唯武器论”时，并不是轻视军力和经济力的重要作用。相反，毛泽东更强调经济对于战争的根本性作用。他在一次讲话中说：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保障，就必需工业化。他还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可见，毛泽东是在中国革命军队的军力和经济力都比较弱小的前提下来考虑问题的。他当然知道经济给养和武器装备对于军队的重要性。在革命军队几乎没有工业、没有象样的兵工厂的条件下，毛泽东制定了一条以战养战的方针；战争中的一切辎重物质的补给均就敌而取，夺取敌人的武器弹药来装备补充自己。同时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进行军工生产，建立较完整的后勤补给系统，支持前方的需要。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缴获了敌人的大量武器来装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144—146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769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97页。

见《解放日报》1944年5月24日。

备自己，毛泽东即开始强调要抓好部队的特种兵建设，在 1945 年和 1947 年两次对党内的指示中，毛泽东都专门指出了这个问题。在 1945 年的指示中他说：“应尽一切可能建立和扩充各地的炮兵和工兵。军事学校应继续办理，着重技术人材的训练。”在 1947 年的指示中他则进一步强调：鉴于“我军的装备和战术，均有进步。今后军事建设方面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加强炮兵和工兵的建设。”在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时，由于一些基本条件的进一步具备，毛泽东即开始考虑军队作战将要“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并考虑在 1949 年及 1950 年“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建国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得到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及时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防的口号。他在《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现代化国防”与现代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的建设一起作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明确地提了出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仅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制定了长远目标，并且规划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步骤。建国初，党中央确定国防建设的重点是抓好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常备军建设，同时注意发展民兵组织，建立国家动员基础。1956 年，毛泽东在考虑“多搞经济建设”以建立现代化国防工业体系时，已提出是否“真正想要”原子弹的问题。1958 年起，根据毛泽东“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的指示，我国集中科研力量抓紧这些尖端武器的研制。终于使我国在 60 年代跨入了有核国家的行列，大大加速了我国国防现代化的步伐，提高了我国的国防能力。

（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是从革命军队的战争实践中形成的。它一方面取决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的正确认识，另一方面取决于毛泽东对实战经验、对每一次战役战斗经验的总结和提炼，以及时前人或今人军事理论和战争经验的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文集》各卷中，都可以见到毛泽东对战略战术的阐述，其中集中阐述的论、著主要有《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4.5）、《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12.23）、《中同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12）、《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1938.11）、《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5）、《论持久战》（1938.5）、《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1938.10.12）、《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938.10.12）、《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11.6）、《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6.9.16）、《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1947.9.1）、《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12.25）、《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3 卷，第 14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15 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5 卷，第 466、474 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5 卷，第 466、474 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第 351 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第 366、374 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第 366、374 页。

以补充和发展》（1958.6.23）、《对部队军事训练的若干指示》（1964.6—7），等等。这些论、著表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伴随着长达数十年的中国革命战争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最早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之初的井冈山割据时期，成熟于土地革命战争中期，发展和丰富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当然，在建国以后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它进一步得到提高。

毛泽东之所以能制定出一整套高超的战略战术被革命军队用来克敌制胜，首先在于他对战争规律尤其是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作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者，不但应认真研究一般战争规律，研究一般革命战争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因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所以，对一般战争规律的研究，对一般革命战争规律如俄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研究，不能代替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研究。同时，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进行研究时除着眼其特点外还应着眼其发展，例如对中国革命战争过去经验（如北伐战争经验）的研究，不能代替对现时经验的研究。

毛泽东认为，研究战争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握全局性规律，因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而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毛泽东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斗指挥者应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东西，这样，懂得了全局，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而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但战争全局性问题或战略问题，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它属于一种“更高级的东西”，研究它，要求做到照顾如下一些关系或特点，如敌我之间的关系，各个战役之间或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有关全局的（有决定意义的）某些部分，全盘情况中的特点，前后方之间的关系，消耗和补充，作战和休息，集中和分散，攻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隐蔽和暴露，主攻方面和助攻方面，突击方面和钳制方面，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持久战和速决战，阵地战和运动战，本军和友军，这些兵种和那些兵种，上级和下级，干部和兵员，老兵和新兵，高级干部和下级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红色区域和白色区域，老区和新区，中心区和边缘区，热天和冷天，胜仗和败仗，大兵团和小兵团，正规军和游击队，消灭敌人和争取群众，扩大红军和巩固红军，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过去的任务和现在的任务，现在的任务和将来的任务，那种情况下的任务和这种情况下的任务，固定战线和非固定战线，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这一历史阶段和那一历史阶段，等等。

作为历史学识富博而深明哲理的大军事家，毛泽东在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时，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环境出发，把握到其中有四个主要特点：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91—692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97页。

1924 年至 1927 年的大革命；第二，敌人强大，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第三，红军弱小，它产生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从游击队开始；第四，共产党对革命战争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战略战术。其中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不可能很快发展和战胜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这些特点，也规定了“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同时还规定了红军作战的全部战略战术原则。这就是，在敌人“围剿”开始时实行积极防御（攻势防御、决战防御或真防御）而反对消极防御（专守防御、单纯防御或假防御），以利反攻和进攻。作好反“围剿”的准备，包括准备退却，政治动员，征集新兵，财政和粮食的准备，政治异己分子的处置等。而战略退却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阶段须取得一些有利条件，如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有利作战的阵地；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使敌人疲劳沮丧和发生过失。在反攻阶段中则主要注意反攻开始、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问题。反攻开始尤其要慎重初战或序战，初战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集中兵力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以利恢复主动地位、改变敌我进退攻守形势，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运动战是技术贫弱的红军的奇袭作战，它不需要固定的作战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是其通俗解释。运动战的实行宜注意的战役学问题很多，如侦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挥、隐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连续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等等。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与战略上的持久战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这既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原则，也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并且古今中外的战役战斗也都无不要求速决。这种速决是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更需要打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的这些战略战术是经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发展成熟起来的。这些战略战术，不仅适用于国内战争，诚如毛泽东所说的，也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军队在与入侵的列强军队作战时一般处于弱势，中国基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条件没有大多的改变，并在继续发生作用。因此，当 1937 年 7 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毛泽东将这一整套战略战术加以调整就立刻适用于抗日战争。当然，由于中日战争的国际性和日本侵略者的军事力量远远强于中国军队，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在抗日战争过程也发生了若干变化并获得新的发展。

毛泽东在论述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时，亦是先分析中日双方各自的条件。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 卷，第 745、754 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 卷，第 745、754 页。

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第二，它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第三，它国度比较小，先天不足，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第四，它虽然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会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与日本相比较，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锻炼了中国人民，其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强，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进步。第三，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的国家，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恰恰相反。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这些基本特点，规定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毛泽东预计，中日战争的持久战将经历三个阶段，即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阶段；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这场战争特别残酷、壮观，表现为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即表现为内线和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等情况，这特别需要发挥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才能取得胜利。抗日战争的具体战略方针是：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因为敌人兵少临大国，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它分路向我进攻，虽处战略外线，却在我多兵的包围中。我方可集中数倍于敌的兵力攻敌。这样，在战场上我是进攻，敌是防御；我是多兵处外线，敌是少兵处内线；我是速决，敌则企图持久待援。于是敌人由强者变成了弱者，由优势变成了劣势；我军则由弱者变成强者，由劣势变成优势。这种具体战略实行起来离不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主动性是力争使自己处于自由状态，实行正确的主观指导，利用错觉和不意使敌人丧失优势和主动。灵活性是灵活地使用兵力，即处置好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种种的战术或方法，并审时度势，把握好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计划性是指对战争的事先计划和准备，由于战争的流动性，它更需要运用之妙。抗日战争的形式主要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一般不执行阵地战。从战争的目的来说，它又要求打消耗战和歼灭战，与敌进行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的决战，乘敌之隙、战以胜之。当然，毛泽东在制定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时不会忘记战争的伟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因此他总是号召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以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在 30 年代中后期对中国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的论述，表明他的军事思想在这时已完全成熟。不仅如此，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某些战术问题亦有独到深入的研究。例如，他 1934 年写成、1938 年修改发表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文，便是对袭击战术的透彻研究。毛泽东指出，袭击战术的要领有十二条：第一，袭击的原则是要有秘密而周详的计划，迅速而突然的动作。第二，袭击的总目的是消灭小敌、削弱大敌，扰乱敌之侧翼与后方，唤起民众起来抗敌，配合正规军作战等。第三，袭击要选择有利条件，采用的办法是骄纵、麻痹、迷惑、疲劳、恐吓敌人，派遣间谍打进敌人驻地，使用游击小组等四出活动。第四，袭击前侦察敌人兵力、武器，附近有无其他敌军可增援，附近居民的情形，及袭击所经道路和隐蔽接近地。第五，袭击的时间不外夜间、拂晓、黄昏及白天。白天

袭击则须如下条件：敌人素质甚差或疏忽已极；敌孤立无援；有大雨大雾等。第六，袭击计划须保密，不应将计划全部告知部下、驻地人民及所请向导，出发时还可制造假象。第七，袭击部队开进时应注意携带必要的器具及标语，约定各种记号，选择隐蔽路段，保持肃静，先派少数便衣担任侦察与警察，行进尽可能地快，等等。第八，到达袭击地后迅速在敌人警戒线外隐蔽集结，不惊动敌，尽快实施攻击。第九，冲锋开始应按照预定的时间方向道路而迅速地突然地实行之，不要作声，也不要打枪，一下冲入敌人配置，迅速解决敌人，或先投掷手榴弹，等等。第十，袭击后的动作：成功时立即集合部队到通来路有阵地的附近集结；如残敌远逃，部队可在当地留相当时间；如情况紧张，则应缩短处理战后工作的时间，妥善处置俘虏；如袭击不成功，应分散退却，亦应伪装。第十一，袭击堡垒、寨子、土围子及城市应注意预伏间谍或有人为内应，选择敌人警戒最疏忽之点、利用夜暗悄然而入，力量充裕时可采取围困爆破的办法。第十二，扰敌或钳制敌人。在夜间袭击不成功时，则改变其任务为扰乱，或虚张声势等等。除阐明袭击驻止之敌的战术原则外，毛泽东还阐明了袭击行动之敌的埋伏与急袭两种形式。尤其对埋伏这种形式予以较详的阐明，如埋伏形式、埋伏的目的、埋伏地区的选择，埋伏部队的开进，伏击实施，伏击的成功或不成功，以及如何伏击骑兵、汽车、火车、船舶、征发队、运输队等等。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获得了进一步的丰富，这表现在他对过去战争加以进一步提炼，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以及其他一些军事原则。这十大军事原则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除十大军事原则外，毛泽东还提出一些适应军事形势发展、具有创造性的军事原则，如“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同时并举”，对敌“围而不打”或“隔而下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和平解放方式（如北平的和平解决方式，国民党军离城改编，让人民解放军和平地接收城防和市政）；“绥远方式”（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人，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38—152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53、354、431、362、514、635、37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53、354、431、362、514、635、37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53、354、431、362、514、635、37页。

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其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蘑菇’战术”（即与敌周旋，待敌十分疲劳十分缺粮时寻机歼击之），等等。当然，主要的还是十大军事原则。十大军事原则，是整个革命战争年代的产物，是对革命战争战略战术全面而又简要的阐明，是毛泽东心血的凝结。正如毛泽东在1958年指出的：“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提出来的。“运用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毛泽东还认为：“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靠人去掌握和运用的，尤其是靠战争指导者去掌握和运用。所以毛泽东非常重视战争指导者指导能力的具备和对战争规律的驾驭。他说：军事的规律，和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把握军事规律，应包括敌我两个方面，明于知己，暗于知彼，或明于知彼，暗于知己，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战争指导者不要看轻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毛泽东认为，学会战争的学问，把握战争的规律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他不要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而要求智勇双全的将军，要求战争指导者能熟悉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把主观和客观好好地符合起来。战争中要作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与战争指挥员对情况的侦察、判断及决心紧密相关。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和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并且，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这一过程检查前一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如果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一个经验多的指挥员，假使他虚心学习，又摸熟了自己的和敌人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条件和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就比较有把握地打胜仗。

但由于战争的特殊性，主观与客观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53、354、431、362、514、635、37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53、354、431、362、514、635、37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53、354、431、362、514、635、37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75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02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99—701页。

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战争需要尽量发挥人的主观努力，人的积极性、主动性、灵活性。在战争中，人的主观指导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中外历史上，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战例多得很，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肥水之战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毛泽东观于这些历史事实而益信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对于战争胜利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他这样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认为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勇敢而明智的指挥员凭借战争这个舞台，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毛泽东甚至认为人的自觉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能起决定作用，他曾这样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二、《毛泽东军事文集》各卷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军事文集》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及其发展历史的写照和简明纪录。文集的各卷与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相对应：第1卷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相对应；第2卷与抗日战争时期相对应；第3、4、5卷与解放战争时期相对应；第6卷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相对应。对文集各卷的主要内容加以综合和概括，有利于深入把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展演进历程。

第一卷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编入的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文献，时间起迄于1927年8月1日至1937年7月6日。编入该卷的267篇文献，构成了10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壮丽军事画卷，展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发展的轨迹。从时间上盾，这一时期的文献可以分为五个小的时期。

秋收起义时期。这一时期有《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等4篇文献，这些文献表明毛泽东自大革命末期以来已“非常注意军事”，通过吸收因共产党没有掌握武装，导致大革命失败这一血的教训，毛泽东这时明确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真理。故他不想再在中央机关工作，切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19、306、306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19、306、306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19、306、306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14页。

意要到湖南等地举行秋收暴动，组织和武装农民暴动的先锋队，并借助军队的帮助，去造成革命力量的中心，“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形成一政治基础，实行土地革命。

井冈山时期。这一时期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3篇文献。文献表明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这时已经形成，文献纪录了毛泽东的三个重要思想：（1）“以宁冈为大本营”或“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思想。毛泽东之所以选择以宁冈为大本营，其一是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较好，易守难攻；其二是民众比较有基础，有一些经受过大革命熏陶；其三是此间可影响湘赣两省。因此，应在此间推广民众政权，深入开展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发展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大力经营永新，制造群众割据。（2）工农武装割据即红色政权思想。毛泽东认为，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其原因是，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白色政权间的分裂和战争，使红色政权能在其间隙发生和坚持下来。同时，有很好的群众，有很好的党，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有便于作战的地势，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这都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3）军队建设及游击战战略战术。毛泽东指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红军内部已建立系统的党组织，连有支部，班有小组，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军事方面，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红军“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而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

开创赣南闽西根据地时期。这一时期有《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于官兵考绩的训令》等21篇文献。主要包括如下思想：（1）对红军游击战战略战术作了较系统的总结：“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这些战术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2）对农村环境中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有集中的论述，对红军党内的种种错误思想和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念，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指出了克服办法，对党的组织诸问题，党内教育，红军宣传工作，士兵政治训练以及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等问题有全面的论述。（3）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思想，认为通过波浪式向前扩大革命政权，必定能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4）提出“争取江西”计划，其原因是江西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本主义势力较小，而地主武装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2、4、8—9、13—14、27—32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2、4、8—9、13—14、27—32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2、4、8—9、13—14、27—32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2、4、8—9、13—14、27—32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1、134、143页。

又较弱。江西本省没有军队，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也较远。（5）建立官兵考绩制度，实行征募和教育新兵制度，以利提高军队的政治和军事技术素质。此外，毛泽东在此期间对农村军事化状况作了调查。

反“围剿”、中央苏区创建时期及长征时期，这一时期有文献60余篇，较重要的有反“围剿”作战的一些命令，《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此期间主要有这些思想：（1）在反“围剿”战争中诱敌深入，实行军事退却时隐蔽待机破敌，同时以少量主力与地方部队、群众武装配合袭扰、迟滞、削弱敌人。实行反攻时，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总之，实行人民战争，实行以劣势兵力战胜优势兵力的敌人的积极防御作战。（2）经济建设是革命战争胜利的基础，是红军给养的来源，只有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保证红军向敌进攻作战，打破敌人的“围剿”并扩大红军，实行外线作战。（3）拥护革命的广大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组织群众和关心群众生活，是革命战争组织者的两大任务。

初到陕北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留下了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及百余件作战命令。《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战略战术的总结和提炼，它对研究战争的方法、对战争的本质有科学的阐述，它表明毛泽东已能纯熟驾驭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并精通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它提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红军在这种战争形式中应采用积极的战略防御，实行战略退却和反攻，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等。

从第1卷整个内容看，经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毛泽东的一整套军事思想包括武装割据的根据地政权建设、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已全部形成了，并且，在井冈山时期就已具规模。可以说，第1卷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开山作，毛泽东所有的军事理论几乎都可以从这里寻到源头，故第1卷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发展史上享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第二卷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收入的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文献，时间起迄为1937年7月8日至1945年6月9日，计253篇。它们展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8年抗日战争中的丰富和发展，从一个侧面纪录了中国军人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功绩。这一时期的文献可以分别归入抗战初期和抗战中后期两大阶段。从中国一方来说，抗战初期处于战略退却阶段，抗战中后期处于战略相持及反攻阶段。

抗战初期（1937.7—1938.9）。抗战初期总共有107篇文献，其中一些名著如《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等都在这一时期发表。这些文献主要包括如下内容：（1）主张国共两党团结起来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提出抗日的政治路线和抗日的政策：全国军队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抗日的外交，与苏联订立军事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1、134、143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1、134、143页。

同盟并争取英、美、法同情中国抗日；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进行国防教育；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争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2）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提出红军等抗日武装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的自由，有执行战略任务的一切自由。红军的作战原则是依傍山地，不打硬仗，主要以敌后游击战袭击敌军。（3）提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认为游击战争在中国这样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已上升到战略地位。它在外线单独作战，尽管它处于辅助正规战的地位。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和正规战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等。（4）提出持久战的战略。从中日两国各自的政治、经济、军事及国际环境等条件出发，指出弱小的中国要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实行持久战，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中国军民应努力发扬自觉的能动性，进行抗日的政治动员，以反侵略战争打破侵略战争，以最后达到抗战的胜利和人类的持久和平。抗日战争是一场犬牙交错的战争；有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要赢得这场残酷的战争，须要发挥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与敌打运动战，配之以游击战，歼灭和消耗敌人。（5）提出了抗日的政治策略。即结成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和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统一战线，以加快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此外，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亦在这一时期发表，发表时毛泽东对其作了修改，使之有进一步的完善和发挥。

抗日战争中后期（1938.10—1945.8）。这一时期总共有146篇文献，其中较重要的有《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抗战与外援的关系》、《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共产党人）发刊词》、《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对伪军的政策及对伪官兵的处理意见》、《关于发展军队的生产事业》、《开展拥政爱民运动》、《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等。这些文献较集中地论述了如下问题：（1）强调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道路，在于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依靠民众。强调特定的历史条件与主观能力的优劣决定战争的发展过程，中日战争的长期性表现于战争的三个阶段，而相持阶段是战争的枢纽。相持阶段游击战争的新形势是：它在广大地区中仍能广泛的发展，但在某些重要战略地区将遇到敌人残酷进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有许多新特点，即是：全民族抗日的，长期性的，不平衡的，有军队的，有十五年经验，大多数民众尚无组织的，三民主义的，处于新的国际环境中的。（2）对中国革命以武装夺取政权的特点作了完整的论述，对自孙中山以来的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史，和中国共产党自创造红军以来的战争史作了系统的论述，尤其对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共共产党的军事战略转变作了阐明：在国内战争前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卷，第9—17、44、230—265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卷，第9—17、44、230—265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卷，第9—17、44、230—265页。

此文内容从略，参见本节第253页。

期，主要是游击战争；在后期是提高了的游击战或以打运动战为主的中国型的正规战。在抗日战争前期，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主要是游击战争；在后期即战略反攻阶段，将主要是正规战争。这里存在着三个战略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从全体上来说，中国的抗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虽然处于辅助地位，但在沦陷的大半个中国里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3）对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及对这种战争的革命政策作了深刻分析，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掠夺性的非正义战争，其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德、意、日举行疯狂的侵略战争，侵犯弱小国家、民主国家的利益而遭到抵抗。其第二阶段的特点是帝国主义战争由片面变为全面，并使新的反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之组织成分由复杂变为单纯。在第一阶段的革命政策应是组织被侵略国家的反侵略统一战线，以抵抗侵略者的进攻；组织各民主国家内人民群众高涨着的反法西斯斗争，以保卫民主；同时不放弃组织苏联与各民主国政府之间制止侵略进一步发展的斗争。第二阶段的革命政策是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准备组织革命统一战线，用革命战争打倒反革命战争，在这一胜利中产生一个自由独立的中国。（4）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5）提出对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顽固派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第一是实行自卫原则，第二是胜利原则，第三是休战原则。（6）提出对待伪军采取德威兼施办法，打与控制相结合，对俘虏耐烦地采取七擒孟获政策。（7）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即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作了比较，指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和至1944年以前，国民党战场已没有严重的战争，所担负的不过是36%的日军和5%的伪军。国民党消极抗日，“坐山观虎斗”。解放区战场则抗击日军的大部和伪军的绝大部分，解放区在强敌的压迫下和国民党军队的封锁进攻下及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天天发展起来。这里关键是坚持了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反人民战争的消极抗日的失败路线，一条是人民战争的胜利路线。（8）提倡军队生产自给，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9）强调军队的团结，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队与民兵等群众武装一道配合作战，等等。（10）强调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政军应和民众打成一片，普遍地举行拥政爱民、拥军优抗的群众运动。（11）提出努力争取国际援助，首先是社会主义苏联的援助，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以抵抗世界法西斯。

第三、四、五卷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4、5卷收入的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文献，时间起迄于1945年8月11日至1949年9月26日，其中第3卷收入333篇，第4卷收入284篇，第5卷收入276篇，三卷合计893篇。这些文献记录了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为光辉的时刻，也记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上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卷，第420—425、465—480、661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卷，第420—425、465—480、661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卷，第420—425、465—480、661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卷，第772—775页。

灿烂的一页。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可以分为和平谈判与武装斗争相配合阶段，战略防御阶段，战略反攻阶段。

和平谈判与武装斗争相配合阶段。这一阶段有 170 余篇文献。较重要的有《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关于开展高树勋运动、练兵和拥政爱民》、《力争和平准备再战》、《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等。这些文献包括有如下思想：（1）提出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的设想，但同时强调要进行内战的准备，保全人民武装，随时准备自卫。（2）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原则，用战争来保卫人民得到的权利，绝对不依靠与国民党和谈，不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以坚决反击敌人的进攻来争取和平的可能性。（3）指示建立大的野战兵团，让主力部队迅速集结整训，开展大练兵，改善部队军事技术装备，提高战斗力，并实现战略上由游击战向游击性的运动战转变。（4）强调广泛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站稳脚跟，重点作好群众工作，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进行生产运动，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得到群众拥护。（5）对敌进行分化工作，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攻势，以瓦解敌人的战斗意志，并组织敌人内部的起义。

战略防御阶段。这一阶段有 220 余篇文献，较重要的有《以自卫战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总结》、《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等。这些文献主要有如下思想：（1）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作持久打算。（2）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实行战役速决的进攻战。“争取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种完全主动的作战”政策。此外，采用“蘑菇”战术同敌作战，“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3）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手中有原子弹的美国反动派是纸老虎，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战略上，从长远看，真正强大的力量是属于人民。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中国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只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总有一天要胜利。

战略反攻时期。这一时期有近 500 篇文献，较重要的有《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总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关于情况的通报》、《关于辽沈战役作战的方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同时并举》、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3 卷，第 8—22、146、482—485 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3 卷，第 8—22、146、482—485 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3 卷，第 8—22、146、482—485 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4 卷，第 37 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3 卷，第 384—389 页。

《把军队变为工作队》、《对西南各敌均取先包围再回打方针》等。这诸多文献中，最为主要的有如下思想：（1）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同时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人民武装，巩固根据地。保护群众的利益，使群众站在解放军一方。（2）政策和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应向全军施行政策与纪律教育。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向前。（3）人民解放军作战应实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十大军事原则，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4）将权力集中于中央，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各野战军和各军区首长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作战方针等，改正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的不良习惯，以避免工作中的损失。（5）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和质量上部已占优势。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解放军在举行大歼灭战时宜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同时并举，在追歼溃敌时宜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

第六卷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收入的是毛泽东自50年代起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献，时间起迄于1949年9月21日至1972年12月10日，计有218篇。这些文献表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长达22年的新的历史时期内的发展，从中亦可看出毛泽东对自己在战争年代制定的军事原则的某种思考。这一时期可大致分为建国初期、抗美援朝时期和建设现代化国防时期。

建国初期。这一时期毛泽东留下了51篇文献，较重要的有《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渡海作战必须注意的问题》、《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和强大的经济力量》等。这些文献主要阐明如下观点：（1）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革命工作并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应高度警惕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乃至复辟。在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的同时，把人民武装力量保存和发展起来，不但要有强大的陆军，还要有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2）在人民解放战争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和平时期到来之际，军队除保卫国防，巩固治安、加强整训外，还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军队应是一支生产军，参加生产，可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减少政府开支，改善军队生活，提高军队的政治素质，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3）解放包括海南岛在内的沿海地区、进军西藏以解决西藏问题，消灭残敌并加强各地的剿匪工作。（4）对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官兵加强政治训练，整编为解放军。复员一部分解放军官兵，回乡发展生产和建设民兵。（5）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是两件大事，这有赖于全体官兵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一

十大军事原则的内容在本章第一节已介绍，此处从略，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53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35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1—5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54—55、103—104、100页。

致、协同努力、方能达到目的。（6）开展连队的民主运动，提高连队官兵觉悟程度，改善连队官兵关系，达到连队爱兵尊于加强战斗力之目的。

抗美援朝时期。这一时期共有 177 篇文献，较重要的有《志愿军人朝参战及参战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同意把士兵代表会议定为经常的制度》、《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训词》、《边打边谈边稳》、《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等，这一时期的文献主要包括如下思想：（1）从国际政治局势、国际战略范围出发作出派遣中国志愿军人朝作战以抗美援朝的决策，对敌我双方的军事实力、武器装备及各种可能性进行全面分析，制定出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即仍然运用慎重初战，诱敌深入、围而歼之，先打弱敌等战略战术。（2）对抗美援朝战争经验进行了总结：依靠正确的领导，实行人民战争，即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实际作战的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抗美援朝战争还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也“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它使帝国主义侵略者懂得，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3）自从中国人民获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之后，我们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即进到了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训练，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并建立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4）关注部队的民主建设，同意把士兵代表会议规定为经常制度。

建设现代化国防时期。这一时期有 30 篇文献，较重要的有《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要密切联系群众，官兵打成一片》、《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告台湾同胞书》、《帝国主义如果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我们将实现全民皆兵》、《应抓紧对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革命单搞军事不行》、《对部队军事训练的若干指示》等。这些文献主要包括如下方面的内容：（1）回顾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三个阶段，提出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军队的目标。认为中国近代军队的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第二代是黄埔军，第三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但严格他说来，解放军距现代化还相差很远，因此必须努力学习，要懂得原子武器出现以后的军队的战略战术和装备。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2）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认为真正想要原子弹，就要降低军政费用，多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第 54—55、103—104、100 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第 54—55、103—104、100 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第 353—356，314、357—359 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第 353—356，314、357—359 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第 353—356，314、357—359 页。

搞经济建设。指出要抓紧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并设想用十年功夫“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3）重申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希特勒、沙皇、中国皇帝、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以及蒋介石都是纸老虎，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但在战术上，在具体问题上要重视一切敌人，这样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4）“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4）艰苦奋斗是军队的政治本色，军队要有自觉的纪律，也要有民主。军队干部跟战士的关系应当密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密切。（5）部队军事训练要练硬功夫，同时，“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文化”。（6）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我们将实行全民皆兵，民兵将配合和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此外，还主张加强战备，等等。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74，375、399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74，375、399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74，375、399页。

八 通信息于文表遣舆论在笔端——《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览要

毛泽东有着丰富的宣传和新闻工作经验，也有着丰富的宣传理论和新闻理论。早在1918年，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青年毛泽东就参加过北京大学新闻学会，比较系统地掌握了办报、写新闻文章的基本知识。五四运动期间，他曾在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等刊物，引起国内报界人士的关注并获得好评。建党初期，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并亲自主编该校校刊《新时代》，以为传播和研究马列主义新文化及如何着手中国的改造和建设大造舆论。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及建国以后，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人，更是注重以报刊等形式为主要工具的革命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将其视为宣传革命、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手段，视为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重要工具。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亲自撰写文章，许多重要社论、述评、新闻文章都出自他手。数十年的革命生涯和写作生涯，使毛泽东留下了大量有关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的著作和文字。1983年，新华出版社将毛泽东有关舆论宣传和新闻的著作选辑成集，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为书名出版。尽管它远不是全集，但为研究毛泽东的舆论宣传和新闻思想提供了基本材料。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由《论述》、《作品》、《改稿》三编组成。

《论述》编收录有关舆论宣传和新闻理论的著作（包括论著、讲话、谈话、批语、按语、电报、书信）71篇；《作品》编收录具有新闻性质的文章（包括消息、述评、社论、评论、发言人谈话、广播讲话、访问记、编者按语）28篇；《改稿》编则收录了对别人各类稿件的修改作品24篇。这些著作的选入年代自上只起于1925年12月，未包括毛泽东的早年著作；自下即止于1955年11月，未收入毛泽东的后期著作；而且自1925年至1955年间的一些重要著作由于已收入《毛泽东选集》及其他著作集中，或由于种种其它原因还存之于档案馆中而未能全部收入本集。即使如此，这部收录有123件作品的文选仍然较完整地体现了毛泽东的舆论宣传和新闻思想，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从事革命宣传和新闻工作的严谨态度和认真负责精神。

毛泽东的舆论宣传和新闻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述》编中。而毛泽东从事宣传、新闻工作的严谨态度和认真负责精神，则通过全部文选、尤其是通过《作品》和《改稿》两编中，他为大量评论和新闻等文章的写作或修改所付出的心血而表现出来。

本文拟对文选这三个部分分别作些研究。

的整个舆论宣传及教育等方面的思想，将新闻思想只看成其中一个部分。这样做似乎更贴切些。也许，文选如果以“毛泽东宣传与新闻工作文选”为书名会更为合适些。

一、牢牢掌握舆论阵地时时注意宣传人民——《论述》编研究

舆论宣传和新闻主要是为革命事业服务，这一根本特征首先为中国社会处于革命时代的先决条件所规定。在20世纪上叶长达半世纪之久的反帝反封

《毛泽东新闻工作选》的内容不只是涉及新闻，甚至主要地是包括舆论宣传乃至文化教育等等。所以，本文在对文选作研究时，顾全了毛泽东（接下页）

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革命党人（起初包括国民党人）为了成功革命事业，首先以强大的舆论向封建势力及帝国主义列强发起了猛烈进攻，这期间的全部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都是为革命党人的革命事业服务，它宣传革命，打击敌人，教育人民，以唤起和鼓动人民参加革命与支持革命。为此目的，从事革命的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者如何利用各种舆论手段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而确定一定时期和阶段的宣传工作重点，以良好的写作技能写出文风活泼、使人爱看的文章，便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的《论述》编，充分体现了这一革命时代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的时代特色。

（一）舆论宣传和新闻主要是为革命事业服务，为领导革命事业的政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服务提倡舆论宣传和新闻为革命事业服务，为革命党人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服务，是毛泽东自领导宣传与新闻工作之始就具有的思想，也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思想。在《论述》编的第一篇文章，毛泽东于1925年12月所撰写的《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毛泽东开首就指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政治周报》的责任是“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这里点明毛泽东舆论宣传和新闻思想的核心之所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对一篇文章的按语中，把舆论宣传工作生动地比作是“大喊大叫”，他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

这里揭示了舆论宣传工作的时代特征和意义，即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是伴随革命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它的全部宗旨是为革命党人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这一宏伟事业服务，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服务，其目的是唤起广大人民起来参加和支持革命，以夺取革命的胜利。以上这两段时间相距30年，在不同时期所作出的论述表明，毛泽东一贯强调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应无条件地宣传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人独立地担负起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重任以后，毛泽东对宣传和新闻工作对革命事业无条件的服从性强调更甚。

1942年，毛泽东在《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一文中这样指出：务使报刊宣传服从于党的政策，要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及时指导，认清楚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作用，要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加强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其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宣传增强党性，并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在1944年3月的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号召领导同志“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

他以“全党办报”这一夸张说法来说明报刊宣传工作的重要，认为报上登“一条很好的新闻”，比“讲好多话还起作用”。根据中国文盲众多、识字人较少，人们的文化水准普遍较低的国情，毛泽东把办报工作与普及教育有机地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下引此书，不再注出版社年版。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78、97、113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78、97、113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78、97、113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15、117、149、150、156、15页。

联系起来，他强调只有普及教育才能使更多的群众看报，更好地发挥报纸的宣传作用。故他主张组织村办小学或组织识字组，消灭文盲，希望能使边区群众在几年内“人人都可以看群众报，有三分之一的人能看解放报”。在1948年2月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毛泽东更是强调“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他鼓励报务工作者“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并认为“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总之，毛泽东认为报纸是党中央的喉舌，“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

为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是毛泽东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的宗旨，注重时效则是毛泽东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的生命。毛泽东强调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一定要迅速准时，讲究时效，善于随着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发展、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和确定舆论宣传、新闻工作的重点。尤其是宣传工作，还须根据不同的对象侧重宣传某些不同的内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认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他把这一任务看成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认为红军“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为全党及时提出了新任务：依靠工人阶级，联合农民和一切革命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为此，全部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就要围绕这一任务旋转。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多篇文章中尤其是在为一些报刊所写的发刊词中不同程度地阐明了宣传舆论应围绕这一总任务而展开工作的策略。例如，在《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一文中，毛泽东这样指出，在抗日战争初期，全民族的第一个任务在于“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克服一部分人的悲观情绪，坚持拥护政府继续抗战的方针，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为此目的，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及文化艺术团体等应“作广大之宣传鼓动，坚定地有计划地执行这一方针”。“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

1940年，毛泽东根据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具体变化，认为报刊宣传的政治方向是强调抗战、团结和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言行，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利。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中，更是简明扼要地强调报刊宣传要为党的总路线服务这一立场，他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解放日报》的使命，这一使命可以“团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15、117、149、150、156、15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15、117、149、150、156、15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15、117、149、150、156、15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15、117、149、150、156、15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15、117、149、150、156、15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47、39—40、50、55、133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47、39—40、50、55、133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47、39—40、50、55、133页。

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

在解放战争初期和中期，为适应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为宣传工作及时规定了新的内容。如军事上“适时揭露敌人”，“不再是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而是要“强调我军必胜蒋军必败”，以坚定战胜敌人的勇气。在阶级政策、经济政策上的宣传，要注意研究中央政策，纠正错误观点，如宣传政权机关是“应当代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而以劳动人民为主体。”而不能宣传“是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对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宣传，应克服左倾错误，如“不是宣传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不是宣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其中包括不反对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民主的政府，而是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或者说民主政府只是农民的政府，或者说民主政府只应该听工人和贫雇农的意见，而对中农，对独立劳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等，则一概不提。”此外，还要注意克服在全党问题上的唯成份论错误宣传，土地改革问题上助长急性病的宣传，在工商业和工人运动的方针上存在严重“左”的倾向等等，否则，这就完全脱离了中央线路。在解放战争后期接管城市的工作中，毛泽东指出宣传、新闻工作要立即转入“为生产建设这个中心服务”，在政治路线上宣传“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由上可见，适应形势变化的发展，确定一定时期宣传舆论的方向和重点，是毛泽东舆论宣传和新闻思想的活力之所在。

毛泽东舆论宣传和新闻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因对象而异，注重效果，有针对性而不千篇一律，并随时改进工作。这表现在对党内、军队内的宣传，对广大民众的宣传以及时敌人的宣传，其内容都有所侧重或根本不同。例如，党内宣传重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教育，尤其是在党内遭受教条主义之害时，毛泽东更是注意全面进行端正党风、学习、文风的教育，以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提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的自觉性。他倡导党的领导干部应学会善于把党的政策贯彻到群众中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47、39—40、50、55、133 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47、39—40、50、55、133 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133、141、142、163、164 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133、141、142、163、164 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133、141、142、163、164 页。

去、善于掌握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军队内的宣传，主要是教育军队听从党的指挥，提高政治和军事素质。同时把军队内的英雄事迹广为传播，鼓励全军将士在战时成为英勇杀敌的模范，在平时成为拥政爱民的模范。

对民众的宣传，包括对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宣传，如对广大农民中的各阶层、工人、城市贫民、中小商人、知识分子、劳苦青年、游民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宣传等等，都有不同的内容和重点。革命者每到一地，都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以切合群众的情绪，鼓动群众的革命热情。宣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要注意唤醒占总人口半数的妇女的革命觉悟。

毛泽东非常关注对广大民众的宣传形式，他从当时中国的现实文化条件出发，指出对群众的宣传可以宣传队、传单、布告、简报、壁报、画报以及演讲等多种形式展开。文字宣传力戒长篇大论、内容深奥，宜简明易懂，要切合群众心理，切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情绪，使群众一看或一听就明白，这样，群众的积极性就可随时调动起来。此外，在宣传党的革命方针政策时，还可同时结合对群众进行文化教育，扫除文盲和愚昧，使群众变得聪明起来，从而真正成为拥护革命的基础。

对敌人的宣传，主要以“事实说话”，在系统研究、了解敌人情况的前提下，向他们展开强大的舆论进攻，广泛利用电台、报刊杂志以及传单揭露敌人的反革命、反共等恶劣行为，不仅使国内广大民众知道，还要在国际上造成一定的影响。例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可以简短文字材料、标语、传单向敌人作宣传，向敌人邮寄宣传品，优待俘虏兵，进行教育后再放回去，以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抗日时期可以将一些反法西斯的文章译成外文向国际作宣传，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及国民党投降派的丑行。同时，还可将这种舆论宣传与革命军队的武装斗争相互结合起来，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抗击或围歼敌军时以强大的舆论和心理攻势促使日本侵略军、伪军或国民党官兵投降，等等。此外，还可以吸收党外人士配合进行宣传以扩大宣传的广度，如让党外人士在共产党党报党刊上发表言论，并尽可能吸收党

毛泽东在30年代初写的一本《普遍地举办 时事简报》的小册子能典型地说明怎样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的问题。在这本小册子中，毛泽东首先指明了举办《时事简报》的意义：《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接着毛泽东详细说明了《时事简报》的内容和编写办法：1.它是大纸张写大字；2.它不做文章只登群众斗争的消息；3.在消息中插句把两句议论进去，使看的人明白其意义；4.登消息的次序是由本乡及本区、本县、本省、本国及外国，由近及远，看得很有味道；5.地方的《时事简报》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6.简报的材料从本地和近地采取，远地、全国和国际的材料则从有关报刊上采取；7.文字和材料都要是有鼓动性的；8.严禁扯谎；9.《时事简报》三天出一张，斗争紧张的地方可以一天出一张；10.县、区苏维埃有专人编稿，内容以本地为主，发给各乡村张贴，给群众看，同时又可做群众识字材料；11.新闻条数的大概分配是：比如一期《时事简报》有八条新闻，那末县苏的稿子四条，区苏加上三条，乡苏加上一条；12.编《时事简报》的目的主要是给群众看；13.红军在散开做群众工作时间和集团驻扎训练时，《时事简报》因宣传对象不同而其内容的编写应不同；14.红军编的《时事简报》本军、本地消息要多，要占十分之七，国际国内消息则只占十分之三，这样才能引起士兵和群众看报的兴趣；15.《时事简报》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16.《时事简报》一定要大纸张、大个字写的，油印的要不得。它是极大黑墨字，稀松七八条，看上去明明白白，看完了爽爽快，是真正群众的读物。（《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6—33页。）

外人员参加党报编辑工作，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更有说服力，更有影响。

（二）宣传与新闻工作者应具备良好的理论素质，应提倡新鲜活泼的文风注重宣传、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提倡言之有物的新鲜活泼的文风，是毛泽东宣传和新闻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质量如何，与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的素质直接相关，与文章的质量直接相关。

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者应具有哪些素质呢？毛泽东认为，他们首先要有政治家素质，有党性，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有冷静的头脑，有分析的方法。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在 50 年代以后的多次谈话中论述得较为集中。1957 年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毛泽东从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办报谈起，鼓励新闻出版界对办报心中无数不要紧，慢慢会有数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只要好好学习就行。毛泽东认为在知识分子当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学得多了，就会把旧思想推了出去，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从这段谈话中明显可见，毛泽东认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是报刊新闻工作者必备的素质之一。1959 年，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书生办报，最大缺点是多谋寡断，没有要点，言不及义。毛泽东还指出，尤其是报纸的领导工作者，要学会按马克思主义办事，按客观情况办事，免除教条主义，才能办出群众爱看的报纸来。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毛泽东提出一个要求：备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这些话表明，毛泽东对报刊新闻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政治素养的具备问题十分关切。

报刊新闻工作者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根本的一条是要学会掌握分析的方法，看问题不要有片面性，即不要思想上的绝对化，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不要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认为我们的工作一切都好或一切都坏都不合乎事实。在 1957 年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专门强调了这一问题。他指出，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故要克服片面性，就要把辩证法逐步推广，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毛泽东告诫宣传工作者切记要“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如果掌握了辩证法，神气十足，但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的文章就会减少。

鉴于记者是宣传和新闻工作的第一线人物，是新闻的直接制作者，毛泽东尤其要求记者头脑要冷静，遇到问题要有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1958 年 11 月与吴冷西谈话时毛泽东着重谈到这一点，他说，记者要善于比较，善用“勾推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记者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

克服片面性，写文章有独立见解，归根结蒂在于宣传新闻工作者敢于讲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186、188 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215、201、197 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215、201、197 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215、201、197 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212、125—127 页。

真话。尤其是对党的领导干部，毛泽东更是提倡他们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有良好的文德文风。对这一问题毛泽东在 40 年代有专门的论述。在为党的七大所作的报告中，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偷”、“装”、“吹”的不良现象，进行了认真的批评。他指出：所谓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吹就是吹牛皮。而不偷，就是不把人家写的整个小册子，给调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如果这样，就是偷，就是做贼，就是抄袭，就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不要偷。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不懂装懂。党内不允许装，对马克思主义知道得少也不要装，知道多少就是多少。不吹，就是报实数，“实报实销”，不夸大，不扯谎，尤其是要克服向上级报告工作“夸大一点”这种习惯，还要把自己领导工作的缺点向人家公开。毛泽东这番富有针对性的话，在批评偷、装、吹的不良习气时，极力提倡不偷、不装、不吹，敢于讲真话的可贵品德和作风，这对于每个宣传、新闻工作者来说都是适用的。

毛泽东不仅厌恶那些偷、装、吹的文章，更是反对做“党八股”文章。在延安时期所作的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中，他大力提倡端正的党风、严谨的学风和新鲜活泼的文风，并历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毛泽东指出党八股的罪状其一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其二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其三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其四是语言无味，象个瘪三；其五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其六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其七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其八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正因为党八股危害极大，所以毛泽东在演说中号召全党去打倒它，抛弃它，代之以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同时，毛泽东还阐明了提倡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的前提是讲究文章之道。他指出，写文章要象列宁那样先搞调查研究；要象季米特洛夫提倡的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要遵守鲁迅提出的几条规则：如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不生造除自己以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在 50 年代末，毛泽东根据自己长期从事文字著述的经验，进一步阐述了写文章注意文法修辞的重要性，指出文章的要义是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他要求文章作者应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把自己的心交给他们与之产生共鸣。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有关章节中，毛泽东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说，文章和文件都应具有三种：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等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他批评许多文件的缺点是概念不明确，判断不恰当，缺乏逻辑性，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枉费精力又少有所得，故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文风。为此，毛泽东强调各级领导部门要大力培养一些较多地懂得马列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的“秀才”。在《合作社的政治工作 一文按语》中，他也强调了讲究文法和修辞的重要，并批评一些人写文章不生动，不形象，不讲究文法和修辞，好象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212、125—127 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70—86、207、208、180 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70—86、207、208、180 页。

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

毛泽东对电文、报告、指示、决定一类的文字要求更是严格，认为更应纠正文字缺点。1951年他在审阅一件中央指示时特地指出了这一问题，他说：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汗问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这便是新闻学上称为的“导语”，亦即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以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为文应分清条理，去掉空话，但不可违背文法，并注意文字的形象性和鲜明性。

对于报刊文章，毛泽东认为题材应活泼多样，文风更宜通俗亲切，才会引人入胜。在50年代后期与新闻出版界代表座谈时，他多次强调了这一点，说：“报纸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报上的文章不仅宜“短些、短些、再短些”，而且宜“软些、软些、再软些”，文章“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在同吴冷西的谈话中，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党报不能只搞政治，要搞理论工作，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学术文章。不过，搞理论工作应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他以自己的经验为例说：“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用自己的话写文章无非是要使文风活泼，故毛泽东总是这样强调，写文章不仅要紧密结合形势，写得不要刻板，形式要多样化，要活泼，甚至政论也不排斥抒情。

在注重文章内容和风格的同时，毛泽东还强调文章标题要醒目。他认为“标题要吸引人看，这很重要。”作为报刊方面的行家，毛泽东连报纸版面安排事宜也关注到了。在1958年1月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中，毛泽东指出要认真研究如何办报，“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信的内容显示了毛泽东在办报方面的丰富学识。此外，毛泽东还特别重视更正书报上的错误，1949年4月，他为自己的文章《五四运动》及《人民解放军布告》中的多处文字错误分别给北平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写信，并附上亲笔纠正的这两文中的若干误处。毛泽东这种严谨精细，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从此可见一斑。

二、大手笔胜精兵巧为文沁人心——《作品》编研究

毛泽东丰富的宣传和新闻理论来自于他丰富的宣传和新闻实践。尽管毛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70—86、207、208、180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67、190、217、203、204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67、190、217、203、204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67、190、217、203、204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67、190、217、203、204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67、190、217、203、204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02、165、194页。《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02、165、194页。《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页。

泽东年轻时想做“新闻记者”的美梦未能成真，50年代想“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当个专栏作家”的心愿亦未遂，但他一生中却写下了数量颇多的新闻通讯类文章。年轻时主编报刊时其文往往多从己出，并时常为别家报刊撰稿。在尔后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也曾亲笔撰写过不少新闻通讯，仅在解放战争时期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文章就多达100余篇，《毛泽东选集》中便收录了他28篇新闻类文章。在《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的《作品》编中也收录了他同样数目的文章。这些文章，其写作的起迄时间是1942年10月至1949年9月这7年间，时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两个艰难困苦时期。文章总计字数36000有余，单篇文章最长者2000余字，最短者仅有百余言。除《历史教训》一文是对世界军事形势——苏德战争态势的述评（社论）外，其余皆是国内新闻，文章形式为消息、述评、时评、发言人谈话、答记者问、广播讲话、编者按等，内容几乎全是涉及敌我双方的军政之事，故这些文章从总体上反映了战争时代的特点，是一种军事政治新闻。在这些新闻文章中，有的不仅在当时传诵一时，而且在今天也不失为文中范典。这些新闻文章的最大特色是，准确报道了时事信息或有力抨击了时政，风格清新、文理明晰，令人爱读，它们透现了为文者的远大政治谋略和军事眼光，言简而意赅，文小却显大手笔。故文章不仅起到一般的新闻作用，更能教育和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字里行间，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言恳意切。不仅如此，新闻在毛泽东手里有时还会直接成为一种向敌人展开心理攻势的有力精神武器，成为配合军事政治行动的射向敌人的精神强弩。具体说来，毛泽东新闻文章的突出特点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短文中见大手笔文章短小却显露出撰文者的大手笔，从《作品》编的第一篇文章《历史教训》即见一斑。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时值1942年10月斯大林格勒战役鏖战正酣之际，亦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处在艰难的时刻。社论首先引苏德双方报刊对斯大林格勒战役具体进程的报道，指出希特勒的“巨大计划”“被斯大林格勒的抗战所粉碎”，进而分析希特勒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实力与野心之间的矛盾，其表现是军事上的“避实就虚”，即他避开列宁格勒、莫斯科，集中兵力于南线拼命争夺沃罗涅兹等地，却打不开。于是集中攻击斯大林格勒与高加索北麓，但又打不开，只好放弃攻势，被迫转入防御地位。希特勒也许还想最后挣扎一下，但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了。社论在指出希特勒必败无疑之后，便具体述评了保卫斯城战争的全过程，指出战争初期苏联红军在顿河河曲战斗23天的英勇作战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红军在这一时期的战略退却导致德军分兵，从而减轻了斯城保卫战的压力，而后又同德军展开了23天的消耗战，最后在斯城粉碎了德军的进攻。社论最后从苏德战争中得出这么一个历史教训：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社论把希特勒的惨败与日本侵略者在亚洲战场的命运联系起来，指出日本的实力与它的野心之间的矛盾，也是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毛泽东的这篇社论虽只有2000字，却切入军事形势，说理透彻，道出德国法西斯必败的根本原因，并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02、165、194页。《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02、165、194页。《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25—229页。

由远而及近，指出日本法西斯也逃辟不了失败的命运，这就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这样的文章，只有具备远大军事眼光的政治家才能做出来，非一般职业新闻工作者所能为之。

（二）一支笔胜过“三千毛瑟精兵”

新闻文章在毛泽东那里往往是一种“文战”，“文”与“武战”相结合，相得益彰。这从毛泽东在蒋傅军偷袭石家庄时写的消息、评论及其它文章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1948年10月15日，东北解放军攻克锦州后，旋即戈指沈阳，东北全境解放在即。蒋介石为了挽救败局，便令在北平的傅作义部队实施偷袭石家庄以“捣毁中共统帅部”的计划。10月下旬，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毛泽东得知敌人偷袭的阴谋后，一方面指派当地军民沿途抗阻，并调遣远在绥平线上的野战军主力回援，同时电示东北野战军派部队西进以威胁北平，还指令太岳兵团围困山西之敌不使东犯；另一方面则亲自力新华社撰写消息和评论，紧密配合军事部署。10月25日，毛泽东撰写第一则消息《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消息称：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冒险的匪军。10月27日又撰写了第二则消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消息号召华北军民充分准备，“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毛泽东撰写这些消息意在示形于敌，给进犯之敌人极大的精神威慑，进犯军中有的指挥官在读到这些消息后哀叹：“我们自以为这是一次极为秘密的行动，可是部队尚未出发，解放军对一切都了如指掌，登在报上，只怕此举是有去路，无回路！”有的指挥官则无心南进，几次要求回师。当敌军偷袭最终受挫后，毛泽东随即在10月31日撰写了《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一文，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评论辛辣地讽刺道：蒋介石因军事上指挥无能，在惨败之后溜回南京，但却不像项羽有“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于是“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由蒋傅两家合股派三十五军和十六军南下，但“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二〇八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寥寥数语，把蒋介石王朝的穷途末日之境和盘托了出来。这则评论广播以后，不仅对解放区军民是巨大的鼓舞，更对蒋军尤其是据守北平的傅作义部队施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毛泽东撰写的另外几则消息如《我军解放郑州》、《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五个军被我包围击溃》、《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以及《人民解放军总部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等等，也都具有威胁敌人的巨大精神力量，使蒋军官兵心理上蒙上一层难逃灭亡命运的阴影。尤其是两则对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配合淮海战场的围歼战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广播讲话劝告蒋军官兵认清自己的险恶处境，不要替美国人、蒋介石少数反动派及国民党贪官污吏打仗卖命，放下武器，掉转

解力夫：《解放战争实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6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60页。

解力夫：《解放战争实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8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62页。

枪口，同解放军一道打到南京去，去推翻已摇摇欲倒的南京政府。广播讲话告之解放军宽大为怀的政策：凡放下武器者“就给以宽大待遇，不论官兵，一律不杀不辱”，都有生路。显然，广播讲话对加速淮海战役的结束具有很大的助动作用。

（三）文为政声，吉必及义这是毛泽东宣传和新闻文章的又一特点。《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国共谈判毫无结果，周恩来同志返延安》、《新华社记者评王世杰谈话》、《中共不出席这届参政会》、《新华社奉命驳斥和谣》、《中央社窜改中共发言人声明用意何在》等文章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在1943年7月为新华社写的《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这则消息中，毛泽东主要通过披露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不准《新华日报》发表为纪念中共诞辰22周年的《力持团结抗战》的社论的全过程，抨击了国民党专制政治的不民主，不给其他党派和人民以言论自由，并害怕自己闹磨擦打内战的真相被揭露于众。在1945年2月为新华社写的《国共谈判毫无结果，周恩来同志返延安》的消息中，毛泽东也是通过揭露国共谈判毫无结果的根本原因来表明共产党人的严正立场，说周恩来在重庆三个星期的谈判，“由于国民党当局依然坚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反对人民与民主，并企图吞并八路军、新四军，以致仍如过去谈判一样，未能成立任何协议”，只得飞返延安。消息揭露国民党在表面让步下掩盖着其坚持一党专政的顽固立场，它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否则是不合法的政党；也不接受“改革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政策的建议”，不接受“释放爱国政治犯，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法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停止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等项要求。这就把国共谈判毫无结果、其责任在国民党一方的真相公之于世，使中外人士清楚明白。

在1945年6月为新华社写的《中共不出席这届参政会》的答记者问中，毛泽东义正辞严，把中共不出席参政会的理由和立场告之干众：（1）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多次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发布民主政纲，实行民主改革，以及统一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全国解放之后，联合政府依据民主原则，实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人民的选举，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正式政府。而这两项反映中国大多数人民公意的主张，被国民党政府多次拒绝。（2）此次所谓新的国民参政会之召集，仍如历届国民参政会一样，完全由国民党一手包办，中共方面的参议员亦为国民党当局所指派。这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3）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一切反对意见，已决定将在十一月召集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分裂人民的准备内战的所谓国民大会，而在行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现国民党的反动决议。总之，国民党政府决定召开的这次国民参政会之用意，其性质是反民族的，反人民的，反民主的，一句话，是反动的。中共方面力保卫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利益起见，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67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37、238、239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37、238、239页。

这则答记者问，理直气壮，全面陈述了中共为何下出席国民党所包办的国民参政会的原因。

1949年4月为新华社写的《人民解放军战胜英帝国主义国民党军舰的联合进攻》，也是一篇阐明共产党政见的述评新闻。毛泽东在文中先交待了事情的全部经过，进而指出了战争的责任完全在对方：“英帝国主义的海军竟敢如此横行无忌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一起，向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挑衅，闯入人民解放军防区发炮射击，直接参加中国内战，致使人民解放军遭受巨大损失，英帝国主义政府必须担负全部责任。国民党反动派历来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屠杀同胞，现当日暮途穷之际，又复勾结英帝国主义的大队海军深入长江，图阻人民解放军渡江，此种卖国殃民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这则述评新闻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直接干涉中国内战的严正立场，从中也透露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

由上可见，毛泽东的新闻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其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服务的，有的直接就是对其政治主张的阐明或解释。

（四）文理并茂，沁入人心毛泽东是文章高手，他所写的新闻文章并不只有新闻价值，亦有文学价值。他把丰富的历史知识、敏锐的政治见解与妙笔俏言和谐地结合起来，便产生出一篇篇道理深刻而又令人爱读的新闻文章。这些文章，写战争，栩栩如生；写故事，则问以嘻笑怒骂，但个中都深含世事哲理。例如，1948年11月写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便是一篇上乘之作，它把发生在南阳的现实战事与古战争巧妙地揉合于一体。消息一开始告明我军占领南阳后，即一转笔锋介绍起历史上的南阳：南阳力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刘秀，曾于此地发兵，发动反对于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此段文字似乎随意插入，但却有借古喻今以点明南阳战略位置重要之妙。文章接着展望了我军夺取南阳后的大好军事形势，以王凌云为司令官的国民党军队企图在南阳以重兵阻遏人民解放军向南发展的道路，但王凌云最后兵败而弃走至襄阳。在我野战军一年多来的强大攻势下，使得敌人在困守各个孤立据点之后又不得不弃城逃窜。王凌云逃至的襄阳也是一个孤立据点，如下再逃，等待他的只能是做俘虏的命运。这则内容丰富的新闻，一经发表便博得人们争相传诵，成为名篇。1949年4月22日为新华社写的《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消息，可读性也很强。消息开首即展示了一种磅礴气势：“人民解放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接着点出各军的战态，并揭明渡江作战胜利的原因：我军当面之敌纷纷溃退，毫无斗志，我军所遇之抵抗，甚为微弱。“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锐不可挡；”另一方面是“国民党的广大官兵一致希望和平，不想再打了，听见南京拒绝和平，都很泄气。”这则简短的消息，将解放军的神勇，敌军的崩势勾划得活龙活现，极大地鼓舞了军心人心。

毛泽东新闻文章的另一特色是笔划细腻，尤其是在揭露敌人时，善将犀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46、247、292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46、247、292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63、264、289、290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63、264、289、290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63、264、289、290页。

利的笔锋藏之于嬉笑嘲讽之中。例如，在《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这则消息中，毛泽东在揭露事实真相之后，继而细细描述了7月7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的窘态：“合众社记者又问：听说最近陕北形势很紧张，中央派遣大军包围八路军，是否确实？张道藩态度甚窘，只得用中国话小声地说了一句：‘没有的事’。另一美国记者问：每年‘七七’共产党都发宣言，何以今年七月七的《新华日报》没有看见宣言？张答：‘这是新闻检查所的事，待我去查查看。’”这段文字把国民党当局理亏心虚的丑态尽情展示出来：事情“已经闹得中外皆知”，但国民党宣传机关仍“讳莫如深”。在1945年3月写的《新华社记者评王世杰谈话》一文中，毛泽东更是以嘲讽之笔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虚伪。文章先援引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氏7日答外国记者问时称“现在政府决将关于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提付国民参政会审议”一语，接着以俏皮的笔调写道：“王世杰博士据说在英国学过法律的，现在看来并未学通。”国民参政会是独夫蒋介石所委派的一个无聊机关，“任何决定问题的权力也没有，现在叫它‘审议’起国民大会的应否召集来，按照王博士的法律，它说‘应’也没有用，它说‘否’也没有用”。文章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最使人们吃惊的，是王世杰博士的记忆力竟然差到如此程度：你的‘领袖蒋介石不是在三月一日说过‘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之负责团体’吗？六天之后，你就忘记了，似乎有了一个什么‘负责团体’，而且敢于‘审议’起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了。”“王世杰氏又在反对他的‘领袖’了。”文章在一番轻松的嘻骂之后转而对国民党独裁政府以严正的声讨，提出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猪仔国民大会，立即废止蒋介石独夫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通篇文字，读来使人痛快淋漓。在《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一文中，毛泽东以这样一种黑色幽默来讽刺蒋介石军事指挥的无能：“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业已溜回南京。”这种幽默文字固然冷峻，却又鞭辟入里，读后令人捧腹叫绝。

三、常常成竹在胸往往下笔点睛——《改稿》编研究

《改稿》编共收录了毛泽东自1944年8月至1955年11月这11年间为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审阅并修改的稿件24篇。毛泽东在改稿时，对原文有删有增。其中删掉的字数不便统计，增改的总共有8000字左右。篇中增写字数最多者达1400余，超过原文字数一半以上，是大段大段的增加；最少者仅60余字，散见在全文各处。从修改、增加的文字内容看，主要是在原文基础上更加突出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揭露，重点宣传了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及具体政策。毛泽东对文稿的修改，既表现出他这位胸有全局而又才华横溢的大政治家为文高人一筹的技巧，更显露出他治学严谨、细致的风格。一些文章，经他一改，有焕然一新之感。一些句段，经他增删修饰，文理通顺，意思准确、鲜明而又生动，顿增色彩。从全体上看，毛泽东修改文稿有如下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31、243、244、244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61页。

几个特色：一是注重修改标题，使之鲜明醒目，同时更切合文章主题。二是注重文章的完整性，不惜大幅度增删文字，以使文章结构合理，内容充实。三是注重文字润色，讲究遣词造句的生动又强调合乎文法。

（一）重视文章标题的修改，使其鲜明醒目并更好地统帅文章内容文章标题精当与否，与文章的关系极大。标题与文章犹如屋之门面、军之统帅，故毛泽东改文首重标题。《改稿》编的24篇文章中，毛泽东对其标题的修改或重拟就达8篇之多，占总数的1/3，对有的文章的小标题毛泽东亦作了修改。这些经过改动或重拟过的文章标题，确实比原题更为鲜明，也更切合文章内容。当然，毛泽东在改动标题时对文章内容也作了相应修改和充实。例如，在修改1944年3月12日《解放日报》的社论《论衡阳的陷落》时，毛泽东将其标题改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并在文章的开头、中间、结尾三处增写了相应的内容。这种修改，就把重点放在揭露国民党政府当局不要民众的片面抗战的错误策略、剖析中国抗战失败的深层原因之上。与标题相适应，毛泽东在增文中开首指出：“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人支援，因为我们政府和我们统帅部的不要民众与自愿放弃主动权的消极战略不能支援他们，人民虽然焦急万分，也无法自动去支援。”这就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是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抗战政策导致中南重镇衡阳的失守。在中间的一段增文中，毛泽东更是揭露“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采用对敌“虚晃一枪，回马便走”的战术，这样就永远抛弃了战争主动权。毛泽东最后这样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故他疾呼“国民党有识人士其思之。”该文标题经毛泽东一改动，又增写了这么三段，就大大加强了揭露国民党政府不要民众抗战的错误路线的力度，间接申张了共产党人号召组织民众抗战的正确主张。

在对1944年9月6日新华社的述评进行修改时，毛泽东为其增加了“国民参政会开会，蒋介石氏说话不当，林虎氏予以批驳”这一标题，标题醒目地告诉人们，蒋介石在政治高层中也不得人心，并无绝对权威。在正文中，毛泽东增加了“这种将一切都统一于国民党、统一于寡头政治的统一论”，“其中包含了阴风惨惨的杀机”；“蒋氏在暗示说：谁要对我的寡头专政牵动一根毫毛，我就要血洗你们”等语，这便把蒋介石“杀气腾腾的寡头”面目一览无遗地展示出来。在对1944年10月8日新华社述评进行修改时，毛泽东也拟加了一个标题：“张平群发言错误，人民要求立即改组政府与统帅部”。改文中，针对张平群答记者询问政府当局对于组织联合政府的意见称“此说不值讨论，吾人亦不拟讨论”时，毛泽东增写了一段针锋相对的话：“果真‘不值讨论’吗？整个大后方人民或者已受或者要受敌骑蹂躏了，人民要求追问国民党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值得讨论的。果真‘不拟讨论’吗？你们尽管‘不拟’，人民的死活，国家的存亡，是不能不讨论的。”增文还要求“废止寡头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等等。这些锋芒毕露的增文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03、306、306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03、306、306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03、306、306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23、324、337、338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23、324、337、338页。

与标题相呼应，确有咄咄逼人之势。

毛泽东为文章拟标题犹如画龙点睛，改标题则精心琢磨，使这能更好表达为文者之意。对 1944 年 8 月 15 日《解放日报》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修改便是出色的一例。首先，毛泽东在标题后增加“战友们”几字，把它变成“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这一经修改的标题不仅给支援中国抗战的前来延安观察的美军官兵以一种亲切之感，同时也表明处于艰苦抗战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以战友的平等姿态去迎接他们的到来。数字之增，效果大为不同。对 1949 年 7 月 31 日新华社社论的修改，也表现出毛泽东的独运匠心。社论原题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毛泽东将原题改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二十二周年》并把它作为副题，另拟一行“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作为正题。这改拟过的标题表明处于革命胜利前夕的毛泽东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他已充分考虑到夺取中国革命全面胜利后建设新中国将会面临许多困难，但共产党人有克服困难的信心。这样就一篇属一般纪念性文章改变为在新形势下向全党提出新任务的文章。与标题相适应，毛泽东在文章中也增写了相关内容，近全文文字的 1/3。在增写文字中，毛泽东指明中国革命“将经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稳步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前途，冷静估计了革命刚刚胜利后全国人民必不可免的要经过一个困难时期，增文指出：“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有些地方甚至要经过数年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毛泽东在增文中还提出了一些克服困难的根本性办法：（1）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2）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3）初步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增文最后点明：“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不管什么样的困难也不怕，人民解放军的二十二年的斗争史给了我们这样一种经验和信心，只须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明了自己所遇到的困难的性质，坚决地执行克服困难的各项根本政策，我们就能达到目的。”这篇文章从标题到内容经毛泽东一改，便有了崭新的面貌，即它把握时局的发展及时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出了新的任务，并具体指出了解决任务的途径。

（二）大幅度增改文字，使文章结构合理，内容充实，更好地围绕和突出文章主题《改稿》编中，经毛泽东作大的修改、文字增改量过半或近半的文章有 6 篇之多，占改稿总数的 1/4，另外还有一些文章的文字增改量达 1/3 左右。增改文字过半或近半的文章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新华社记者论时局：内战危险空前严重》、《冀南我军自卫战大捷》、《在国民党政府当局纵容与鼓励下，反动派扩大反苏反共活动》、《美国大量运送蒋军到东北扩大内战》、《中共中央电贺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等。修改《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一文时，毛泽东增写了 1400 余字，其总字数超过了原文。增写部分除紧扣主题以平等的军人姿态欢迎国际友军人士外，更是借机但陈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所建树的不为外界所知的殊功，揭露国民党当局抗战不力及对外实行欺骗与封锁的政策。增文称：七年以来，近五十万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八千余万被解放了的人民，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奋勇作战。他们抗击了在华敌伪全部兵力的六分之五，围

困了几乎一切敌占大城市，控制了大部分敌占海岸线。然而这种情形，一向为盟国朋友们所不明了。过去他们所了解得到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将来反攻日寇自然也是主要地依靠国民党。所以出现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说自己如何努力在打日本人。而实际上国民党从1938年10月以后整整五年半时间，所取的政策基本上是坐山观虎斗，直至现在，除湖南与缅甸外，大多数战区依然还是如此。他们欺骗外国人，说共产党不但“不打日本人”，而且总是“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但那个天天高喊“民族至上”的国民党，总共不过抗击六分之一的敌人而已。国民党对中国解放区封锁得铁桶似的，一不许共产党发表战报，二不许边区报纸对外销行，三不许中外记者参观，四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来往。总之，只许国民党的丑低、恶骂、造谣、诬蔑，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象稍许透露于世。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国民党抗战不力、腐败无能近来已成中外舆论的定论，对共产党抗战真象的舆论则在改变，而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的来延，将为这种改变开一新阶段。显然，这一大段增写的文字，突出了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的重要意义，表彰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功绩，也表露了中国战场上反法西斯军人的一种不可让人小视的平等心态，这些都是原文所未能及的。

对《新华社记者论时局：内战危险空前严重》一文修改时，毛泽东增写了1300余字，几乎近原文的一半。增文着重揭露中国独裁派的阴险狡猾，其统治是内战的根源。增文指出：国民党独裁派是很狡猾的，他们善于在政治上耍花样与善于组织对人民的突然袭击。独裁派的实施“宪法”，是要仿效袁世凯做皇帝，急于以帝制（一名大总统）来镇压人民、发动内战，以维持其自己的反动统治。独裁派的所谓“民选”，实际上都是党选。他们准备内战的计划，采取的是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的形式。他们对于民主派所主张的召开党派会议，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一项要求，仍将深闭固拒。由于独裁制度丝毫未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较前更加积极地准备发动一场极大规模的内战，而国民参政会内民主派反对内战的立场和对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决定，绝不会改变这种危险的形势，等等。毛泽东增写的这一大段文字，重在揭露独裁体制是内战的根源，提醒人们要识破中国独裁派狡猾的政治花招，并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内战，从而增加了文章的理论深度。

在对1945年11月4日新华社的消息《冀南我军自卫战大捷》修改时，毛泽东在全文各处都有改动，共增写了600余字，超过了原文字数。原文只是一般消息报道，增文则在此基础上剖析了冀南大捷的根本原因：国民党进犯军失败的原因非不善战，而在于多数官兵不愿内战。进犯的四十军一个师均是美械师，素称能战，四十军亦有善战声名，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均起过相当作用，远非那些不战而逃的腐败军队可比，但此次是在严令督责下勉强参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18—320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42—344、347、353页。

战，“因违背多数官兵的意愿，故一战即败，虽有美国枪械，亦不能取胜。”

透过这些文字可使人体悟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正义之师不可战胜，冀南我军自卫战大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心思和。在修改 1946 年 12 月 26 日新华社的述评《在国民党政府当局纵容与鼓励下，反动派扩大反苏反共活动》时，毛泽东亦增写了近 1000 字，总字数超过原文。增文主要突出国民党政府当局的“纵容与鼓励”，谓“怯西斯反动派之所以能够煽动一部分群众参加示威，一半依靠威胁，一半依靠欺骗，即是利用人们不明东北真相与不明反动派挑拨国际战争与国内战争的阴谋之结果。”增文还指出反动派的欺骗和挑拨归根到底是要失败的，并号召中国人民更加团结起来制止一切反动活动。这些增加的文字，对反动派的可耻挑拨的揭露更有力度，也更能鼓舞中国人民的信心。

（三）讲究文法而又注重文字的精确和生动，字字推敲，时有神来之笔在改稿时，毛泽东对文章既有大增大改，也有小补小修。在作小补小修时，他反复推敲笔削，时有点睛之笔，使文章更为准确，鲜明、生动。对 1949 年 1 月 22 日新华社的消息《蒋介石“引退”真相》的修改可算是这种小修改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毛泽东对全文只增改 60 余字，成整句的仅两处。其一是在“蒋介石仍然是国民党政府的‘总统’”这句话之间增添了“宣布的是‘因故不能视事’，暂时离开南京，他”这一小段文字，使该句变成“蒋介石宣布的是‘因故不能视事’，暂时离开南京，他仍然是国民党政府的‘总统’”。这种修改增加了句子表述的准确性。其二是在文章结尾处插入了“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实际权力仍然操在蒋系和蒋介石本人手里”一语，这幽默而又辛辣地揭露了蒋介石所谓引退真相，并与标题中加引号的引退二字相照应，此增语真可谓神来之笔。

在对 1951 年 6 月 6 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修改时，毛泽东对全文仅在 4 处作了增改。其中有两处各只增加了一个词，总共 4 个字。第一处是在文章的开头“语言的使用是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一语中，增加了“经济”二字，遂使该句成为“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这么一个完整无暇的句子，克服了其不完整性。另一处是在“我们的语言经历过千年的演变和考验”一语中，增加了“多少”一词中，使该句变成“我们的语言经历过多少千年的演变和考验”从而具有了准确性。

毛泽东对 1955 年 11 月 22 日《人民日报》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的修改也是少量的，其中有两处修改较为重要。一处是增写了一段有关改造政策的一段话，针对性很强，增文最后是这样说的：“要准备经过公私合营、逐行逐业的改造，在条件成熟以后，最后达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这段政策性极强的话，在当时稳定人心是至关重要的。另一处是将原文关于对资产阶级里面的反革命分子“这种人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342—344、347、353 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342—344、347、353 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379、380、405、405 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379、380、405、405 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379、380、405、405 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431、432 页。

是必须镇压的”一语中的“镇压”二字，改为“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有分别地加以惩处”，这也同样体现了极强的政策性。这两处改动都使文章更加精确了。

毛泽东在改稿中还有许多得意之笔，在此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毛泽东是一位语言大师，是一位精通文章之学的高手。他改稿时善于统御全局，充分运用文以载道这一机理，把中国革命及建设的大道理糅合于生动活泼而又丰富多采的文字中，沁人心田而令人铭记难忘。对于每篇文章，他修改时增删润色，潇洒自如，似有成竹在胸。多少文章，经他一改，便成上乘之作。毛泽东改文，确有高屋建瓴之势，点石成金之功，画龙点睛之妙。

九 独立自强求平等三分世界抗霸权——《毛泽东外交文选》览要

外交的实质是内政的延伸，是一国为着自己经济、政治、文化及其发展的需要而在国家范围之外与他国进行的交往活动。正因为外交与内政的联系十分紧密，故在政治术语中尤其是在中国的政治术语中，内政外交这两个词往往联用，近乎一个词。事实上，中国历代伟大的政治家多半也是伟大的外交家，这种政治传统在毛泽东那里获得了充分的继承。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最伟大的外交战略家。他在漫长的革命生涯、建国和治国生涯中，既主内政，也主外交，尤其是在建国后长达 27 年的执政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外交战略方针和政策，几乎都由他主持制定。在为中国独立自强、建设社会主义美好国家的过程中，毛泽东根据中国当时的国际环境确立的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国际战略，主持制定的外交政策和依此而展开的外交活动，不仅在当时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和经济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当今中国的外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在主持和从事外交活动、制定外交战略和策略时，形成了丰富的外交思想和理论。1994 年，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联合出版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便是一部纪录毛泽东这种丰富的外交思想和理论的文献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总共收录了毛泽东有关外交方面的文献 160 篇，其起迄时间为 1937 年 7 月至 1974 年 5 月。这 160 篇文献中，除有 24 篇摘选自《毛泽东选集》第 2、3、4 卷；26 篇辑自《人民日报》，4 篇分别选自《毛泽东文集》、《毛泽东著作选读》、《解放》及《解放日报》外，其余全部选自一些未发表的谈话纪录、手稿、电稿、修改稿、批示、文件原稿等。这些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首次公开发表的文献总共有 105 篇之多，差不多占全书总篇数的近 2/3。尽管《毛泽东外交文选》只是一部选集（毛泽东早年及 60 年代至 70 年代的一些著作或外交言论未曾收编入），但透过这部著作，仍可以大体把握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及其发展脉络。

一、毛泽东外交思想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

毛泽东外交思想发展的分期，若以新中国的成立来界分，可以分为新中国成立以前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前的 40 年代及 30 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及至苏维埃政府，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但在 40 年代，中国共产党亦有一些外事活动，特别是对美国、苏联等国的外事活动。尽管直接外交活动不很多，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的外交思想却是在这一时期孕育形成的。1949 年，蒋介石逃到台湾岛（省），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了中华民国政府，正式行使国家主权并实行对外交往，自 50 年代至 70 年代这 20 余年间取得了丰硕的外交成果。在开拓和发展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过程中，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为适应实践的需要也变得丰富起来，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

但从其外交实践和外交战略重心的转移过程来看，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发

展则可以切分为四个历史阶段。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时期，为毛泽东外交思想发展的初始阶段，其战略重心是反抗日本侵略者和反对扶植蒋介石反动派的美帝国主义。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11月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时期，为毛泽东外交思想全面展开的阶段，其战略重心是“一边倒”向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1958年中国拒绝与苏联合作建立长波无线电台和核潜艇舰队，至1963年夏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共代表团会谈，及苏、美、英“三国条约”的签订这一时期，为毛泽东外交思想进一步发展演化的阶段，其战略重心渐渐离开“一边倒”的政策而谋求英、法、中、苏四大国结盟以抗拒美国。

1963年夏至1969年苏军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及拟对中国实施核威胁这一时期，是毛泽东外交思想发展的战略转移阶段，其重心是拒苏抗美。1970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谋求与中国和解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这一时期，为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战略调整阶段，其战略重心是与美国缓和，并以“三个世界”的理论为基础，号召第三世界国家联合第二世界国家结成国际统一战线，以抗拒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其抗拒重心已移至苏联。

毛泽东外交实践活动和外交战略重心的演化和转移，都较为集中地反映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故要探讨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战略重心及其发展演化进程，拟先对《毛泽东外交文选》进行具体研究，在总体上把握毛泽东外交思想。

自1937年7月至1949年9月这12年间，收编入《毛泽东外交文选》的文献计有35篇，这些反映毛泽东外交思想最初发展阶段的文献，其内容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中国的和平而战，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这些思想内容主要体现于《抗日的外交政策》、《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争取外援》、《抗战与外援的关系》等文献中，基本观点是：中国的外交政策以抗日为中心，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中国神圣、正义，进步、求和平的抗战之所以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需要外援配合，是因为中国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不是孤立的战争而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包括中国抗日战争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爆发基础上发生的，它将会转化为革命的、世界性的民族解放战争，所以社会主义苏联积极地支持军力、财力较弱的中国抗战；美英等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援助中国抗战，因为“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中国战败，他们亦将不能安枕。当然，中国是在不损害自己领土主权的前提下接受外援的，基点是自力胜敌。（二）提出结成国际统一战线，以反对世界法西斯战争的策略。这主要体现在《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说》、《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等文中。这些文献阐明：世界上存在一种破坏世界和平，由德、意、日侵略者结成的侵略阵线，和另一种由苏联及美、英、法等国反侵略者团结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反侵略阵线。这两大阵线的形成，便打破了原先的帝国主义两大阵线，使美、英、法等国投入了反法西斯侵略战争阵营。在这种

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作为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起点，是因为从这时起毛泽东才真正开始提出一些外交主张，同时《毛泽东外交文选》中收录的第一篇文献的时间是1937年。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下引此书，不再注版本。

新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可结成一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以及日本人民组织的反侵略的统一战线。这三个统一战线因目标一致而相适合，并且日益巩固和扩大，必将使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三）提出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民主阵营的策略。这主要体现在《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联合世界上的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论人民民主专政》节选）等文献中。毛泽东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世界各种不可调和矛盾的发展，侵略阵线和反侵略阵线发生分化，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民主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但由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它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道路，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阶级，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阵线。而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统一战线，取得了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这就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这就使中国革命斗争不再孤独，有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援助，因此一定能战胜帝国主义反革命阵线，打败外强中干的反动派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国革命胜利后，在外交上宜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四）提出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确立以平等姿态对外交往的原则。阐述这一思想的文献主要有《抗日的外交政策》、《目前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否认一切卖国外交》、《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应当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如果美英断绝同国民党的关系可考虑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合作》等等。这些文献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中国否认一切卖国外交，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欢迎英美等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且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中国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合作。同时，中国应努力实现工业的现代化建成强大国家，才能达到真正的平等。

从1949年10月至1958年夏这8年多时间内，毛泽东共留下了56篇文献。这些文献主要阐明如下重要的外交思想：（一）中国的建交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并且，这五项原则可以推而广之运用到所有的国际关系中去。阐发这一原则的文献主要有《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等篇。（二）中国的外交重心是与苏联结成友好同盟，实行“一边倒”政策，以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阐述这一思想的文献主要有《缔结中苏条约和协定的重大意义》、《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一边倒”对不对？》等篇。（三）提出美国与苏联及中国之间有一中间地带，它包括广大的国家，日本、英国、德国也在

内。还提出了“三类国家”的观点；第一类国家是美帝国主义，第二类是在两次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由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第三类是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由于形成这种世界格局，中国交朋友的重点应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大半个欧洲。阐述这些观点的文献主要有《关于中间地带、和平共处以及中英中美关系问题》、《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等篇。（四）提出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向世界所有民族学习的思想。指出每个民族都有长处和短处，故中国的方针是有选择地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要学，对美国等国家的长处也要学，并可与美国和平共处。阐述这些论点的文献主要有《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中国和外国关系》、《和平为上》等篇。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革命不能输出的问题，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与政治上不友好的帝国主义国亨做生意问题，大国小国一律平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问题，中国决不屈服于强国，亚非弱小国家团结起来反对大国称霸问题，以及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世界实质上已进入帝国主义怕社会主义的时代等问题。

从1958年夏至1963年夏这5年多时间内，《毛泽东外交文选》共编入了42篇文献。它们主要包含如下一些重要的外交思想：（一）在国家关系上仍然强调与苏联团结一致，认为苏联的强大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但强调对苏联交往中保持独立主权，对苏联的经验择善而从，在两党关系上反对父子党关系而谋求平等。对美国从战略上反对，认为美帝国主义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表面上强大而实质上虚弱，它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是干涉中国内政。这些思想主要表现在《要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对待苏联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四海之内皆兄弟》、《关于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被压迫人民就是不要屈服》、《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关于台湾问题》等诸多文献中。（二）分析世界形势是处于反华反苏、冷战共处的时代，谋求英、法、苏、中四国一致，以使美国、西德、日本受约束。这一观点在《同蒙哥马利元帅谈国际局势》、《中法之间有共同之点》等篇目中得以阐述。（三）分析世界力量对比，认为世界上存在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而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比较接近。民族主义分布在亚、非、拉三大洲，除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亚、非、拉人民的反殖反帝斗争帮助了中国。这些观点主要通过《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国际形势》、《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西太平洋要西太平洋国家自己来管理》、《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等文献得以阐明。（四）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威胁，反对核讹诈，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认为缓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对帝国主义，既要文打，也要武打，而以文打为主。这些观点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际团结问题》、《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缓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等文献中得以明确表述。（五）分析西方国家之间也有矛盾和分裂，指出中间地带国家性质各有不同，如英、法、比、荷等国家有殖民地，西德、日本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非洲一些国家如几内亚、阿联、马里等取得了真正的独立，但也有一些国家只是名义上独立，实际上仍是附庸国。这些观点在《西方世界势必走向四分五裂》、《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

不相同》等文献中得以阐述。

从 1963 年夏至 1970 年夏这 7 年时间内,《毛泽东外交文选》并收录了 20 篇文献,它们主要阐明了这些问题:(一)提出有两个中间地带或两个第三世界的理论。认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日本是第二个中间地带,美国在这两个中间地带或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赫鲁晓夫的日子也不好过。《中间地带有两个》等文献集中阐述了这一论点。(二)不再只以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来划界,而将美苏两个大国并称为纸老虎,反对的重心仍在美国,并与法国等独立性较强的国家寻求一致点和战略上的合作。这些思想在《中法之间有共同点》、《我们很欣赏法国这种独立政策》等文献中得以清楚阐述。(三)主张团结和依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利用英、法、德、意、日等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核战争威胁。阐明这一主张的文献主要有《反对外来干涉,实行八项原则》、《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世界人民是反对用原子弹杀人的》、《同斯诺谈国际问题》、《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等。

从 1970 年夏至 1976 年秋这 6 年间,《毛泽东外交文选》共收入了 7 篇文献,它们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谋求与美国缓和,以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认为苏联自身困难很多,其政策是声东击西,但欧洲人却想把苏联这股祸水引向中国。《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现在不存在中美两国互相打仗的问题》、《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等文献阐明了这一问题。(二)明确提出三个世界划分问题,认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主张第三世界的国家团结起来,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同希思的谈话》两文重点论述了这一问题。

二、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几个重要原则

在对《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各个历史时期文献的内容进行分类概括,对其基本理论观点进行了解之后,就可以大致提炼出毛泽东外交思想中一些核心理论观点或外交战略,并揭示它们的内在联系和把握其发展演化过程。但由于《毛泽东外交文选》是一部选集,故要较为全面地提炼出毛泽东的外交战略理论还需结合研究毛泽东的其他著作,同时还需结合毛泽东的外交实践,以及结合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历史的研究以从中寻找出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历史坐标和起点。纵观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其核心理论观点主要有四个:(一)中国的独立自主是对外交往的基础;(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对外交往的准则;(三)处置对美对苏关系是外交战略的轴心;(四,结成国际统一战线是抗拒霸权主义的保证。

(一)中国的独立自主是对外交往的基础在研究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时候,首先不应忽视的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以东方大国的姿态自立于世的悠久历史,和以自己的力量战胜外族入侵以光复自己民族的斗争传统,也不应忽视中国自近代以来开始落后于世界的发展而遭受西方(英、法、德、美、俄等国)与东方(日本)列强的侵略和掠夺的百年灾难史。尤其是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与一些侵略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条约，渐渐沦为外国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种历史的耻辱一直是百年来反抗外敌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的心灵重负，同时也是这些优秀人物独立自强、光复自己国家并决心建设一个强盛国家的巨大动力。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毛泽东既继承了中华民族敢于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历史传统，也负有一种建设一个强大中国的历史使命感。从中国自近代以来由于经济落后、国力贫弱而屡遭列强欺侮的历史教训中，从弱国无外交这一严峻的真理中，毛泽东希冀中国的强大，渴望中国早日实现工业化以走向富强。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曾这样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国家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学得了许多东西，知道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有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必要，而这些条件是互相关联的，缺一不可的。”1963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曾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这些话表明，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一个国家只有富强才有独立和统一，才不致挨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以实力地位为先决条件的，一个国家强大与否是该国对外交往的根本。正因为如此，独立自强，建设现代化强国以作为外交的基础便构成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出发点。

本着独立自强的原则，毛泽东把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国作为自己确定不移的目标，并尽其一切可能将它付诸实施。在中同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即在部署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建国伊始，毛泽东就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设想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迅速向前发展社会生产力，掀起技术革命，采用先进的机器去工作，借以达到大规模地生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页。

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最后巩固人民政权。1954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党政领导人进一步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国防的目标，并在60年代对四个现代化问题加以多次解释和重申。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还专门论及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中国真正建立起强大的国防，真要有原子弹，就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加快发展工业。为了在外交上不致受人欺侮，毛泽东在1958年就设想用十年功夫搞一点原子弹、氢弹，在1970年又提出要搞人造卫星。中国60年代核武器研制的成功，正是在自己已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基础上进行的。随着经济的较快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外交地位不断提高。

鉴于中国一穷二白的历史基础，毛泽东在提倡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同时，也努力争取外援，并首先争取社会主义苏联的援助。从50年代起，苏联对中国社会经济建设事业给予了多方面的援助，如帮助中国新建和扩建了156项工矿企业，派遣大批专家援华，在资金和科技方面也给予帮助。苏联的这种援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起步。毛泽东同时也努力争取其他一些工业国家的援助。尽管当时美国等国对中国采取“禁运”封锁政策，但中国还是千方百计打破这种封锁，自60年代起先后从日本、欧洲引进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精密机械等国内短缺的先进技术和设备84项。这些项目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工业的现代化进程。不消说，落后就要挨打这种紧迫感在这里变成了一种内在的驱动力。

正是看重实力地位在外交中的作用，毛泽东尽管在气势上和战略上把帝国主义说成纸老虎，但在具体策略上和战术上则把帝国主义看成真老虎，非常重视它。50年代，当中国的综合国力还很弱的时候，毛泽东常常自叹中国是个弱国，还“没有完全独立”，有点怕人家。例如，毛泽东在与印度、缅甸、印尼、南斯拉夫等国家首脑会见时，曾说过这样一些话：“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而是一个农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帝国主义“也知道中国工业的不发达，只靠人多力量大，没有什么可怕。他们第一怕苏联，第二才怕中国。”怕我们是“怕我们的政治，怕我们在亚洲起影响。”“亚洲、非洲国家都是多年来受帝国主义的气的。”中国“现在还在受气。总有一天，我们真正独立起来，把自己的国家搞好了，就可以少受一点气。”假如亚非各国都兴旺起来，“到那时候就不会由几个大国称霸了”。到60年代中叶，中国有了自己的核弹，终于打破了核大国的核垄断地位。70年代中叶，中国的人造卫星上天，这标明中国在航天科学与技术上也在追赶发达国家。当中国拥有这一切，并在70年代已初步建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时候，毛泽东终于能够这样说：“现在已不是几十年前那样，谁人都可以在中国头上拉屎拉尿。”正是因为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的日益增强而逐渐朝大国地位靠近，迫使对中国长期采取敌视政策的美国在70年代初开始与中国对话，并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与此问时，中国在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4、256、194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4、256、194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4、256、194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89页。

联合国安理会的合法席位也终于得以恢复，这终于为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发挥更多的作用打开了方便之门。

（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对外交往的准则实力地位是外交的基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则是外交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它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已在世界上得到广泛承认与运用。这五项基本原则之所以为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政府领导人在 50 年代初所首创，同样与中国曾长期受外国的侵略和欺负，主权和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在与外国的交往中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的历史有密切关系，也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革命者为反抗外族压迫、争取民族平等的奋斗经历有密切关系。长期遭受外国强殖民侵略所爱到的切肤之痛的感觉，推动着毛泽东那一代革命家在寻找救国方法时选择了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把革命的爱国主义与马列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统一起来，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从现实的革命斗争和党的外交事业的实践中总结出了国与国之间交往的这五项宝贵准则。这五项具有创造性的准则，可以说是国际交往的最为公正的原则，它集中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党政领导人反对弱肉强食的政治道德，正义感和责任心。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完整提出是在 50 年代初期，但其思想渊源却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甚至更早的年代。生活于中国这个饱受列强侵略的国度，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处于政治忧患之中。早在 1915 年，毛泽东还是一个青年学生时，就参加了反对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可耻条约“二十一条”的“仇袁反日”爱国运动，并在一本揭露日本灭亡朝鲜、屡祸中国，法国灭亡越南，以及袁世凯媚日卖国罪行的小册子上题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表明他 20 世纪初叶就已养就反对外族入侵、追求中华民族独立、平等、自由的爱国主义精神，而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推动着毛泽东的思想向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20 年冬，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即明确主张自己的政治态度是“取世界主义，而反对殖民政策”，认为世界主义是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的主义，他还寄希望于世界“各地民族自决”，并以此为基础促进“世界大同”。显然，从青年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萌芽中生长发育出他尔后所制定的国际交往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1937 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如何制定对日政策即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制定抗日的外交政策时，在不同方面及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一些带有原则性、根本性的准则。例如他指出：中国应“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否认日本债务，废除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收回一切日本租界”，等等。除提出对日外交政策外，毛泽东还指出中国应与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的外文政策，主张“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英、美、法”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还欢迎外国人“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到中国、到边区“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活动”，等等。这里提出的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都是带有根本性的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1、560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1、560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5、43—45 页。

准则。自此以后，其他一些外交原则在 40 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外交性实践的需要相继不断地提了出来。1945 年夏，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时，又提出了保卫肚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与友谊等问题。他这样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外文政策和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毛泽东在报告中呼吁国民党政府停止对于苏联的仇视态度，改善中苏邦交，因为“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此外，毛泽东还欢迎“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当然，他清楚地意识到要使中国“争取真正平等地位”，主要地是靠中国人民努力“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的一些具体政策也体现了他的外交准则，如他表示拥护开罗会议关于朝鲜独立的决定，并希望亚洲各国如印度、缅甸、马来亚、印尼、越南、菲律宾等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之后，“能够得到建立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权利”等等。

日本投降后，在反对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干涉中国内政的过程中，毛泽东一再申明民族独立与平等的主张。例如，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是“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解放战争接近尾声，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胜利时刻，毛泽东更是把注意力放在捍卫行将诞生的新政权的主权并摧毁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谋求与外国的平等地位方面。1949 年 1 月，他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时，在阐明一些具体政策之后，指出中国外交关系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1949 年 3 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确定不移地提出应当“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等等，主张“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还以“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样形象的说法来阐明这么两个重要的外交方针：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政府建立的；日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在这之前废除帝国主义想保留的在中国的特权。1949 年 4 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5、43—45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63、78、81、79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63、78、81、79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63、78、81、79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63、78、81、79 页。

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进一步阐明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利的外交思想。他严正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英国、美国、法国等国的武装力量，必须“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他继而阐明了新中国政权的外交立场：“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尔后在1949年6月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以及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的有关外交条款中，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公告中，毛泽东多次重申了这些外交原则：“凡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中国“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开拓和发展对外关系便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在新中国与苏联等10余个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与一些亚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及建交后的外事往来过程中，毛泽东关于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得以迅速扩展和升华，以致臻于完备，这样就开始形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1953年12月至1954年4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谈判开始时，中国方面首先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为印度方面所接受并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出访印度，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时，再次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并在文字上作了修饰，其表述也更规范：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联合声明说：中印两国总理重申指导两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感到在它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应该运用这些原则。如果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实基础。”稍后，中国和缅甸两国的联合声明亦强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果“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障，而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威胁和对于侵略和干涉内政的恐惧就将为安全感和互信所代替，”此后，尤其经过1954年12月亚非29国联合召开的著名万隆会议以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开始为亚非国家及少数欧洲国家所接受。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与一些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及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会谈时，也反复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是国际间关注的普遍准则。1954年10月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毛泽东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各国应按五项原则来受约束，承担义务。

1954年12月与缅甸总理吴努谈话时毛泽东亦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它适合于中国的情况，也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从社会制度的性质来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合于社会主义国家，也适合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和封建王国。这是因为它有利于促进世界和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5、116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5、116页。

参见谢益盛著：《折冲与共处——新中国对外关系4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3—165、177—191页。

平。而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各个国家都是需要的。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应该反对大国谋求特别的权利，大国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同时，毛泽东认为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使之不至成为抽象的原则。他批评英美等国口头上也说要和平共处，但是它们只是讲讲就算了，并不打算真要，并不采取具体步骤来实现。中国真要与它们和平共处、它们就不干了。

通过正确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国在 50 年代尽管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和联合反对，但在外交上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首先中国与苏联为首的 10 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率先建立了外交关系，并通过谈判与中国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及欧洲一些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了外交关系。至 70 年代前期，以美国为首的长期反对中国的国家，也终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自此以后，由中国首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通用准则，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政府领导人对国际外交理论的一大贡献。

（三）处置对美对苏关系是外交战略的轴心 处置同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的关系，是毛泽东全部外交战略的轴心所在。对这两个大国关系的处置之所以成为毛泽东外交战略的轴心，是从 20 世纪初期以来所形成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以及政治势力范围的明确划分使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位处中国北方、国土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国俄罗斯，在列宁领导下通过十月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苏联；而大洋彼岸的新生资本主义大国美国则在战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国家。这两个国家以不同的政治形象给中国以深刻的影响，也以不同的外交方式与中国进行交往。20 世纪中期，当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赢得了中国的独立和新生，使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亚洲、从地球的东方站立起来的时候，对这两个国家关系的处置自然也就处于优先加以考虑的地位。

较之美国来说，苏联对中国革命、对毛泽东的影响更早、更直接，也更巨大。当 1917 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地球上诞生的时候，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正处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国政府后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中，也正处于反抗英、德、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殖民侵略的斗争中。社会主义的苏联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面，它的社会主义榜样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立场和政策，强烈地鼓舞着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各个被侵略奴役国家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封建国家反封建专制压迫的民主革命运动。处于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中的中国，同样深受这种世界历史潮流的影响，尤其是领导中国革命的先进分子更是对列宁领导下取得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欢欣鼓舞。一时间，本世纪初叶许多觉醒了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者纷纷转化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以效仿苏联十月革命为时尚。另一方面，苏联的对外政策也助长着风起云涌的世界革命运动。苏联倡导成立的共产国际当时是世界各国共产党“支部”的领导中心，指导着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同时也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革命者进行民主革命运动。这也就形成了本世纪初叶即已开始的中国革命力什么最后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63—165、177—191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86 页。

向往俄国革命的榜样。当北方吹来十月革命风之时，毛泽东就从一位崇尚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热血青年转变为马列主义的信仰者。十月革命胜利后快要两年的 1918 年 8 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撰文如此赞叹道：“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全世界为之震动”他在多方寻求中国社会改造的办法而失望后，最终在 1921 年初选定了“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他当时对苏联抱有无限希望，向往不已。故当一些青年学子纷纷去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勤工俭学或留学时，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自那时起一直到 50 年代初斯大林逝世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直接受共产国际、受列宁、斯大林的指导。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在政治方向上始终是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在大革命时期，他积极赞成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他以中国党的重要领导人的身份从共产国际那里得到了许多重要指示，尤其从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得到了观察和指导中国革命问题的根本方法。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与苏联共产党及斯大林在社会主义政治方向上保持着紧密联系，尽管在中国革命的具体策略上观点有巨大分歧。正因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政治上外交上完全采取“一边倒”的政策，这种情形至 50 年代后期才开始改变。

美国是大洋彼岸新生的年轻资本主义国家，它在 18 世纪下半叶通过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独立战争而获独立。独立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美国在政治上开始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美国在 19 世纪末也步英、法、德、俄、日等国后尘而入侵过中国，它当时对中国提出过门户开放政策，虽然这一政策也主张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但主要是出于防止沙俄等国对中国领土的掠夺而争得它自己利益的一种策略上的考虑。美国是一个从摆脱殖民压迫的历史中走过来的崇尚独立和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与另一些野蛮侵略和疯狂掠夺中国的殖民主义国家稍有不同，它善于通过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途径对中国产生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军事及政治援助，使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差不多达到顶点。美国不仅从军事上装备中国国民党军队，还在 1943 年 12 月召开的英、美、中开罗会议保证把所有日本占去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并在德黑兰会议上坚决主张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应享有大国的地位。在抗日战争后期，美国还企图弥合中国内部国共之间的分裂，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充当国共之间战争调停人的角色。然而，美国敌视共产主义的政策和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计划最终使它完全倒向国民党反动派一方。在中国人民需要和平的时候，它不仅以大量美元和新式武器来装备蒋介石的军队，还直接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国又与残存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勾结在一起，将其视为盟友。为遏制中国，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发展，1950 年美国纠集和操纵联合国军队悍然发动侵朝战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第 390 页。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第 467 页。

美国是参与 1900 年八国联军掳掠烧杀北京，在与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后，向中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的国家，国民党政府用这笔退款在 1924 年设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争，却被中朝两国军队击败，不得已在板门店签订和约。60年代，美国又在越南冒险，再一次败北于有中国人民作坚强后盾的越南军队。与军事上的冒险相配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1/4的世纪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一直实行“禁运”封锁政策。不仅如此，美国自持经济、军事实力雄厚，它赤裸裸地谋求霸权，在世界各地驻军，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美国所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孤立中国的政策，使它成为中国人民的仇敌，成为世界人民的公敌，至少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是如此。

显然，美国人遏制共产主义、帮助蒋介石的错误政策直接把人民共和国推向了苏联一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尽管信奉马列主义，但在外交政策上实行的是“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外交上曾属意交好美国。在抗日战争开始的第二年，毛泽东就注意到英、美、法等各民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援助中国的这一事实，并认为日本的进攻进一步加深了日、美间的矛盾，加深苏、中友谊，使“中、美、苏三国有进一步亲近的可能”。1939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中指出要争取英、美清国的援助。1944年，毛泽东特地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感谢他“为着团结中国以使击败日本并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成为可能而作的巨大努力，”并表示“深愿经过罗斯福总统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之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然而，美国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它最终实行“扶蒋反共政策”。于是，毛泽东对美国政府敌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错误政策予以尖锐的批评。毛泽东所持的立场是，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也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他把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手中拥有原子弹的美国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认为它完全可以被打败。当中国革命胜利在望时，毛泽东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计前嫌，表示在美国“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的前提下，可考虑与曾站在自己对立面的美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但由于美国政府仍一意孤行，继续奉行敌视人民中国的政策，最终把中国推向了苏联一边，促进中国“一边倒”政策的实施进程。

处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中国革命的国际政治格局中，中国实行一边倒向苏联的政策，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它使新生中国赢得了世界另一极政治力量的支持。新中国宣告成立的次日，苏联就宣布予以承认并决定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断绝同国民党当局的外交关系。两个月内，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阿尔巴尼亚、蒙古、朝鲜等国都迅速与新中国建交，越南也于1950年1月与新中国建交。紧接着，中国周边民族主义国家如印度、缅甸、斯里兰卡（锡兰）、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尼也纷纷与中国建交。稍后，少数西欧国家如瑞典、丹麦、瑞士、芬兰等国也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苏交好不仅使中国有强大的政治盟友，亦使中国避免于孤立地位，同时也使中国这个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主要亚洲国家获得了苏联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援助，50年代中国工业化的起步，与苏联的这种援助是分不开的。从世界政治

《毛泽东外文文选》第17、40、87页。

《毛泽东外文文选》第17、40、87页。

《毛泽东外文文选》第17、40、87页。

大势看，尤其是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看，苏联援助冲破帝国主义战线的东方大国中国，实际上也就是援助它自己。苏中结盟，不仅更加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也使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盟主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但是，由于苏联与中国在对待马列主义的理论问题上有原则分歧，又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中国一边倒的政策并未奉行多长。如果说，毛泽东在 1956 年底还称赞“中国同苏联靠拢在一起”这种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还称赞苏联帮助中国设计了“化学、钢铁、炼油、坦克、汽车、飞机等工厂”，而强调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帮助过中国的话，那么当 1957 年初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捅穿“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时，毛泽东就扬言要把这些大国沙文主义分子“臭骂一顿”了。但此时毛泽东还只是就中苏“内部”矛盾“抬杠子”而已，他还不急于谋求与另一极资本主义世界靠拢。当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毛泽东在 1957 年 11 月莫斯科会议上甚至还这样认为，“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尽管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和强调资本主义的“和平过渡”不满，但此时中国还是坚定地站在苏联一极，与苏联等国在 1956—1957 年资本主义世界反苏反共浪潮中维护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然而，中苏关系并不单方面取决于中国的意向，是苏联有损中国主权的对外政策最终激怒了毛泽东，加速了中苏分裂。1958 年夏，苏联要求与中国合作建立长波无线电台和核潜艇舰队，以强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尽管它此时正在谋求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缓和紧张关系，以实行“和平共处”。当中国认为合作建立长波无线电台、核潜艇舰队有损中国主权而加以拒绝之后，苏联即在 1959 年单方面撕毁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援助的协议，既报复中国又取悦于美国，并在中印冲突中持批评中国的立场。1960 年 7 月，苏联又单方面撕毁有关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召回了全部援华专家。接踵而来的是中苏之间数年之久的“大辩论”。此外，苏联还与美国、英国签订《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显然是把中国作为异己的力量而置于一旁。1964 年夏，苏联外交部官员甚至暗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不保证战时苏联协助中国，与之同时，中苏边界纠纷逐渐增多。1969 年 3 月，苏军侵入中国领土珍宝岛。半年后，苏方扬言拟袭击中国西部的核基地，并鼓吹建立一个旨在对待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在苏联媚美反华、敌视中国及核威胁面前，毛泽东并没有因中国势弱而有丝毫的怯懦屈服。相反，面对两个强大的对手，他以大无畏的勇气将苏联与美国并称为“两个大纸老虎”，认为它们最后是要倒的。但美苏南北夹击的严峻形势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寻求一种新的外交战略，以迅速改变这种被动局面。面对苏联更直接更咄咄逼人的攻势，毛泽东自然把目光重又投向美国，他拟采用一条“远交近攻”的外交对策以重点对付虎视眈眈于北方的苏联。

而作为美国“头号敌人”的中国，由于 50 年代以来在亚洲的连连失败，尤其是孤立中国的政策未获成功，自 60 年代后期开始调整和改变自己的外交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79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82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523、592、595、604 页。

政策。特别是 1969 年尼克松新任美国总统以后，便开始摒弃社鲁门主义而推行尼克松主义。1970 年 10 月，尼克松公开表示了访华的愿望和设法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愿望。这一举动正是毛泽东多年企盼和求之不得的事情。毛泽东及时地把握住了这一历史机遇，他在同年 12 月即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并提醒美国“不必那么僵着”。美国想整中国或整苏联于己都不利。中美双方在通过一系列的接触和安排之后，1972 年 2 月，尼克松总统终于飞抵北京与毛泽东会见，从而结束了中美之间 20 余年的对抗。中美和解、建交以后，毛泽东显然仍把美国与苏联并称为超级大国，但由于“现在不存在中美两国互相打仗的问题”，他反对超级大国的侧重点便放在防备和打垮苏联对中国的进攻之上，尽管毛泽东认为苏联把手伸向欧洲、亚洲、非洲，国内困难很多，力不从心。在 2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自 50 年代“一边倒”向苏联，到后来演化为抗苏反美，发展到 70 年代前期的和美抗苏，这在外交战略上是一种巨大的变化，是在世界范围内处置美、中、苏大三角关系的一种历史性变化。自此以后，这种美、中、苏大三角关系一直延续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苏联解体、中苏对立的缓和和消除。然而，对美、中、苏这种大三角关系的适时处置确曾构成毛泽东的外交战略重心。

（四）结成国际统一战线是抗拒霸权主义的保证国际统一战线理论，是毛泽东把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所一贯奉行的革命统一战线理论推广运用于国际领域抗拒大国霸权主义的产物。这一理论首先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过程中产生，尔后围绕美、中、苏大三角关系的处置过程而得以发展，并最终“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而达到终点。

毛泽东最初提出国际统一战线理论是在抗日战线时期。1937 年，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有过“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的提法。1938 年 2 月，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说中，在分析中国战胜日本的诸种条件时明确地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还有一个日本的统一战线”（日本人民反侵略的统一战线）由于中国“全国的反侵略统一战线”“恰好和历史上空前的全世界反侵略统一战线相遇合”，并且恰好和历史上空前的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相遇合，所以中国的抗战一定可以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还号召全中国人民和全日本人民实行大团结，坚持反侵略的目标，以把侵略者打倒。毛泽东在这里虽然没有使用国际统一战线的提法，而是使用“世界的统一战线”的提法，但内容的实质是一样的。同年 5 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再次提到这三个统一战线，并使用了“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提法。他说，中国战胜日本“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

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 1939 年，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523、592，595、604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523、592，595、604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523、592，595、604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7、8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7、8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7、8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513 页。

毛泽东在《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演讲中还提出了组织“被侵略国家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口号，他认为这个统一战线有四个可能的组成部分：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人民统一战线，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是民族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社会主义的苏联；各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这些成分中主要的力量是苏联，如果苏联同各个所谓民主国政府能够组成真正有效的统一战线，配合着各国的人民统一战线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统一战线，就能够制止或战胜各个法西斯国家的进一步侵略。”

毛泽东规范使用国际统一战线的提法是在 40 年代初，见之于 1941 年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目前共产党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任务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种情况表明，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几乎与抗日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在时间上同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世界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理论便随着这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分化而发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中苏同盟破裂之前，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是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中心的。他强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共处，以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中苏反目之后，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所倚重的是第三世界广大弱小国家，结联第二世界国家，反对苏美两霸。从具体理论形态及其演进过程看，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理论是借助“中间地带”理论演化过渡到“三个世界”理论而达到完善。

“中间地带”的理论在解放战争前期毛泽东就提出来了，其含义指苏美两个大国以外的国家。1946 年，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关于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争的提问时说：“美国和苏联打不起来，因为它们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同时，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是阻碍美国反动派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因素，有了苏联，美国和世界反动派的野心就根本不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在业已形成的苏美两极政治格局的世界范围内，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理论和策略便又具有了新的内容。这就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优先发展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邦交关系，及注重发展同其他愿与中国邦交正常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邦交关系，同时也不排除同美英等国建立正常的邦交关系。但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不承认的敌视政策，这迫使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理论具有倚重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广大亚非拉国家，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坚决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色彩。与这种外交策略相对应，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的内容也变得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71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3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59—60 页。

丰富起来。50年代前期，毛泽东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对“中间地带”的解释是，美国与苏联和中国各处于中间地带的两边，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在这个包括日本、德国在内的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因此，苏联，中国、英国和其他各国彼此都应靠拢些。同时，毛泽东也希望美国采取和平政策。在“冷战共处”的60年代，毛泽东又设想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并进一步分析了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他认为，处于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之间的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如英、法、比、荷等是有殖民地的国家，西德、日本等被剥夺了殖民地但是有强大垄断资本的国家；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等是取得了真正独立的国家，还有一些名义上是独立实际上是附属的国家，等等。尽管“中间地带国家各式各样，各不相同，但美国统统想把它们吞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压迫者、剥削者、欺侮者，是矛盾的一个方面；全世界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另一个方面。与大帝国主义美国有矛盾的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这里明显可见，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始终是为他的国际统一战线服务的，目的是把美国这个大帝国主义彻底孤立起来以利打击。

60年代前期，毛泽东提出有两个中间地带的论点。他在同日本客人谈话时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日本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毛泽东认为，这些中间地带的国家以及东欧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中国与苏联虽属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个国家，但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还不如中国同日本自由民主党的关系好。在这两个中间地带的论点中，“三个世界”的理论已呼之欲出了。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时候，也开始采用“第三世界”这一概念。1964年与路易斯·斯特朗等人谈话时，毛泽东就曾这样说：“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毛泽东还认为，美国不仅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而且在苏联、东欧也会遇到抵抗。另一方面，作为“四大核强国之一”的苏联日子也不好过，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十三个国家中，支持赫鲁晓夫领导的并没有占多大的多数。不过，以上这种概念的演化并不是内容实质的变化，无论是中间地带概念还是第三世界概念，它指称的都是美、苏两极政治之间的大多数中小国家。但毛泽东这里论述问题的重心开始转移，在思想上开始突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界线，其中间地带或第三世界理论已明显有反对美苏两霸的新特点。1964年1月与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这样明确地指出，要反对大国的欺侮，不管是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都不准在别人头上拉屎拉尿。他还考虑到扩大第三世界以反对苏、美两霸问题，认为“如果把英国拉过来，从欧洲、巴黎到中国、日本，就可以把‘第三世界’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1、487、487、509、507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1、487、487、509、507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1、487、487、509、507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1、487、487、509、507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1、487、487、509、507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15、523页。

扩大起来。”这样生产“大批大批的原子弹”、“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的美国和苏联也就只是“两个大纸老虎”。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以来，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新的发展演化，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既相互争夺又相互勾结、称霸世界的问题十分突出，因此，团结亚、非、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联结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遏制苏联、美国的霸权主义便构成毛泽东国际政治战略的重心，构成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内容。这也促使毛泽东突破60年代提出的第三世界观点的内容，而提出了一全新的“三个世界”理论。1974年，毛泽东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着重谈了“三个世界划分”的问题。他明确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第一世界是剥削者、帝国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是中间派，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第三世界是受剥削的人口众多的穷国，因此，第三世界应团结起来，同第二世界协作，不要让苏联和美国把手伸得太长，对世界上的问题干涉太多。当然，这个曾在70年代风靡一时的三个世界理论并不是国际统一战线理论的全部。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理论还包括其他许多策略方面的内容，如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殖民、反种族压迫；号召亚、非、拉国家团结起来维护世界和平，缓和世界局势；提倡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不主张输出革命；在反对帝国主义政策时，应将各帝国主义国家区别对待，将这些国家的政府与其广大人民区别开来，将这些国家制定帝国主义政策的人们与政府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区别开来，等等。总之，在具有丰富内容的国际统一战线理论中，三个世界理论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更具战略意义。它的提出使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理论达到一新的战略高度，并给予了世界人民反抗大国霸权主义的新的思想武器。

十 文字陈心迹尺素传真情——《毛泽东书信选集》览要

无论是纵观还是鸟瞰，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毛泽东都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杰出人物。从一个封建气息浓厚的农村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成就为一名举世皆知的中国革命家、现代中国的奠基者和创始人，这就是毛泽东的不凡历史。毛泽东与中国人民的辱荣悲欢、与中华民族的亡存衰兴紧紧维系在一起。在他生前身后，国内国外有关毛泽东的传记、评价及思想研究的著作比比皆是。在评说他的成败得失中，政治家可从他那里学得经验教训；在研讨他的思想、学说时，思想家可从他那里吸取精神力量。人民在他最辉煌的时期对他充满爱戴，敌人则把他视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恶魔。虽然对伟人褒贬不一的评价是常有之事，但旁人的评价只能是旁人的。毛泽东毕竟就是毛泽东。人类大概只有自己才能够真正表现出自己。这种表现，一是通过自己的行动，二是通过自己的言论。在言论方面，毛泽东通过《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诗词选》等表现了一个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毛泽东，一个军事家毛泽东、一个诗人毛泽东。然而，一部《毛泽东书信选集》亦表现了一个顶天立地、敢作敢为、有血有肉的男子汉形象的毛泽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15、523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0页。

东。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使我们对毛泽东的形象及其思想作更完整的理解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也使我们得以窥知毛泽东人生追求的另一个较深层面。《毛泽东书信选集》总共选录了毛泽东自1920年12月1日至1965年9月25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写下的372封信，毛泽东在与同志、朋友、亲属、故旧及普通群众的交往中，所写下的这些书信，有的论及理论观点、政治原则、方针政策，有的涉及品德修养、思想方法、学习方法，有的关系到群众的柴米油盐、生养病痛，有的则是细度诗境、雕文刻意。这些保持原貌的书信，可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更贴切地看到没有人为地给他罩上神秘外衣的毛泽东，在国家存亡之秋，他是一个热血青年，报国立志和民族英雄；在执政新中国期间，他是一个经常与普通民众联系的可亲的人民领袖；在老师面前，他始终是学生；在友人眼里，他是一个可信赖的益友；于革命事业，他终生孜孜以求；在精神追求中，他更是锲而不舍。总之，这45年中各个时期的书信，自现了各个时期的毛泽东的活生生形象。

一、志存高远：改造中国与世界

20年代的毛泽东是一个热血志士。时值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之际，青年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怀抱报国大志，踏上了他的人生征程。通过不倦的艰苦的探索，毛泽东后来找到了一条真正能够救国救民的道路，并把这条道路作为自己的真正归宿。20年代前期的几封书信，记录了青年毛泽东的这种不倦索求，展示了青年毛泽东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抱负，以及为实现这种抱负的严肃思考。

1920年底，毛泽东在给远在法国的挚友蔡和森等人的书信中，在讨论“新民学会”这一组织的发展时，提出了自己“明确的路数”。他认为，学会的方针是“改造中国与世界”，而实现这条方针首先应从中国的改造入手。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是人类全体的幸福，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是国际的，但生在中国地方的人，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先应从中国着手改造，然后帮助世界各国的社会革命。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途径，毛泽东赞成“用俄国式的方法”即“马克思的方法”，而不赞成“温和的革命”和教育的方法，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而反对无政府主义。他认为，若用和平的方法去达到共产目的，不知何时才能成功，而现在无产者“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因而理应行俄国式的革命。在该信中，毛泽东还论及了新民学会这一组织应采取“潜在”的态度，“不倚赖旧势力”。学会个人应“互助互勉”、“诚恳”、“光明”、“向上”，应认真研究学术，以求思想进步。虽然这封书信的某些观点并不大成熟，但它却是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一个草图，它集中地展现了青年毛泽东的不凡抱负，毛泽东等这一群时代的佼佼者和弄潮儿，为了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他们具体着手了新民学会这一团体的发展工作，并志在使之成为中国之重心，成为改造社会的中坚力量。假使说，如果中国尔后没有产生共产党这一组织，那么新民学会将会发生与这一组织相类似的功能和作用，肩负起创造未来中国和未来世界的重任。正是这远大的志向从精神上塑造了毛泽东的伟大人格，使他通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铸成了一代

伟人的形象。

毛泽东的立志远大并非一日而就。毛泽东在少时就对苦难的人民充满了深切的同情，因而萌生了救民于水火的强烈意志和渴望。为了寻求救世的“大本大源”，他广泛求学。尤其是在1918年以后，他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种种新的主义、学说予以一一考察，看它是否在中国的实际中行得通。就在1920年秋冬，毛泽东还着手了“湖南自治运动”，赞成湖南“问罗主义”。在更早一点的时候，毛泽东还主张过社会改良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运动及无政府主义等等。呵是，毛泽东通过不间断的严肃思考，迅速地将这些主义一个接一个地抛弃了，进而很快地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定马列主义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后，就在实际中一步一步地按照它去作，这在这一时期的另几封书信中可明显看出来。他不仅志向远大，而且脚踏实地，把恢宏的抱负与实际的工作结合起来。毛泽东的这种风范，尤其值得当代青年认真效法。当然，毛泽东之所以具有如此高远的志向，首先是他所处时代之需要而塑造形成。不平等的腐朽社会积聚了摧毁自身的物质力量，孕生了改造自身的强有力之物；苦难的人类为了摆脱苦难，充满了对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向往，锻成了毛泽东这一理想人格，因而在毛泽东身上就集中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全体需要。高远的志向，渊博的学识，变革的年代，不止的奋斗，使得毛泽东成为一代伟人。

毛泽东的这种风范并非可望而不可及，这里的关键在于立志的方向，即远大志向的树立应与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幸福、民族的兴盛紧密联系起来。因此，新一代的中国青年，只要有求索功夫、求真精神，只要胸存报国的宏伟抱负，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世界新的技术革命风暴来临的时代，将会有更加广阔的显露才华的天地，也将会像毛泽东那样作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伟绩。

二、义重民族，驱除日寇高于一切

作为中华民族的精英，毛泽东在任何时候都注意为全民族谋利益。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后，之所以在当时能赢得广大人民的普遍爱戴，在于他能忍辱负重，胸怀大同，把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泽东在1936年前后写下的许多书信集中地反映了他以民族利益为重的精神。

早在1931年，日本侵略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这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恨。中国共产党人自九一八事变起就坚决主张抗战。1931年11月27日刚刚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但是，国民党政府在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同时，却加紧了对共产党政权的“围剿”。至1934年10月，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被迫撤出华南根据地，进行万里远征。尽管自身的处境十分险恶，但红军仍系念着抗日事业。还是在长征途中的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尔后，共产党不断发起抗日救亡号召，有力地促进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的新高潮。但是，当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在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其处境仍然非常险恶，他们立刻遭受到国民党政府派出的重兵围困。尽管由于遭受外来日寇的侵略，广大国民党下层官兵及许多中高级将

领不再尽心听命于蒋介石而竭力围歼红军，但共产党和红军如何取得政治上、军事上的自由，以实现全面抗日救国的主张，推动国民党政府走上抗日的道路，调动全民族的抗日热情和力量，仍充满极大的困难而非要竭尽全力去争得不可。因此，当时共产党除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外，更是发起了与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舆论。在这一时期内，毛泽东向许多国民党的军政要人、地方实力派、民主党派人士、国内知名人士写了不少信。毛泽东在信中明之以理，晓之以义，直陈民族生存之利害，倡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字里行间、情真意切，拳拳动人，一个炎黄子孙的赤诚的心尽露无遗，一位民族英雄的形象跃然纸上。

1936年9月毛泽东致国内知名人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蔡元培的信，可谓典型地反映了他的强烈民族情感。毛泽东于信中写道，“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廓将非复我之城廓，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毛泽东在信中满怀义愤地批评“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希望蔡元培先生能“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使之“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三民主义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对于这封充满真挚的民族感情的书信，单独看来，几乎难以使人相信它是出于共产主义者毛泽东之手。在1936年12月致蒋介石的书信中，也可以看到毛泽东以民族利益为上的精神。毛泽东在信中对自已的宿敌蒋介石开诚相质、愤慨陈义，申言不念两党前仇，不再自相残杀，只求合作救国。他首先批评蒋介石“始终孤行己意”，“集合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调集260个团企图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而红军虽“步步退让”，仍不能回蒋介石“积恨之心”。他劝规蒋介石当“清夜扪心一思”，只要“一念之转”，则“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并要求蒋介石“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唯一之出路也”。毛泽东还希望蒋介石成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毛泽东的这种以民族利益为重的言论不止是停留在笔头上，更是见诸于行动上。当蒋介石后来在西安事变中被下属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后，毛泽东并不是将这个阴险毒辣的死敌假手除之而后快，而着是从全民族抗日大业出发，主张并协助和平解决“陕变”，使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从而开始了中国全面抗战的新阶段。在同年12月22日给山西的阎锡山的信中，直接表露了毛泽东妥善处置“陕变”，以抗日为第一义的原则。毛泽东在信中悦：“陕变突起，事出非常。……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原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如果说，直接写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6—68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7、88、95、30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7、88、95、30页。

给蒋介石的信若是较多地表现出政治家的策略的话，那么从给阎锡山的信中则可看到一个杰出政治家的海量胸怀和义重民族的赤诚。此外，毛泽东在给许多国民党军事将领的信中都透露出了自己对日本侵略者的深恨，和对危亡中的中华民族的炽爱的感情。例如，在给高桂滋的信中，毛泽东这样写道：“时至今日，全国即将陷于沦亡惨境，凡属食毛践土之伦，实舍救国无急务，舍抗日无工作。敝军闯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当此国亡无日关头，鄙人等决不因小节而忘大难。区区救国之诚，谅蒙贤者深察。”总之，从毛泽东的这些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胸存民族大义、视民族生存、团结、发展、强盛为第一义的毛泽东。毛泽东的这种民族主义精神，不仅是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精神的直接继承和发扬，也是他的新民主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思想来源和基础。毛泽东的民族主义精神，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应当认真学习、保存的，在当前和平统一中国大业中，中共领导人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台湾当局难道不也应们心一思吗？

三、情真意切：以平等态度待人

毛泽东的一个可贵的品格是待人态度平等。毛泽东的许多书信，特别是50年代后的书信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的这种可贵品格。从50年代到60年代，毛泽东给自己的朋友、同志、亲属、故旧，及普通的不相识的群众写过许多信。这些书信，有的是勉励晚辈努力学习的，有的是肯切批评同志盼求其进步的，有的是关心其生活上的困难、身体上的病痛的，有的是与之欣赏诗作的，有的是寄托对自己已故战友和亲属的怀念的，有的是因普通国家职工工作有成绩致以祝贺的。毛泽东那平等待人的品质，连同那细致入微的体贴和亲切周到的话语，在信中一露无遗地表现出来。

在建国之初，毛泽东的一些亲属、故旧生活较为贫困，毛泽东得知情况后，一方面鼓励他们克服暂时困难，一方面慷慨解囊以自己的稿酬相资，他心里总挂念着他们。曾同学于湖南省立一中的易南屏体弱多病，毛泽东复信给他并寄上人民币三百元，以“借佐医药费用”。私塾同学和邻居邹普勋病困交加，毛泽东复信他要他告知“生活困难至何种程度”，并致信堂兄毛宇居，要他接济邹普勋“苦干”，“容后由弟归还”。在1950年10月给王首道的一封信中，毛泽东提到张次、罗元鲲两位湖南教育界老人（其中张在湖南一师任校长时曾要开除毛泽东——笔者）“生活极苦，还挂念着曾作过自己的国文教员、已故的袁仲谦先生之妻“七十岁饿饭”。毛在信中“请予酌办见复”。从前面这几例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种急人之难，不是一种慈善家的施舍，不是慷公家之慨的挥霍，而是纯粹出之于个人情谊，出之于一种人道主义的平等，一种与穷苦人民息息相通的深切感情。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对自己的亲朋十分严格，他要求亲朋应与其他人一样保持社会地位上的平等。1950年5月，在接到一封“要求救济”的舅家来信后，毛泽东旋即给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7、88、95、30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54、370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54、370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89、375、481、343页。

当时的湖南湘乡县县长刘亚南写了一信，特地强调说：“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当时他得知文家亲戚“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后，致信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请其“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他们“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当一些亲友想托自己帮忙介绍工作时，毛泽东总是加以婉言拒绝和耐心劝导，做到既不伤情面也不丢原则。例如，杨开智要求到京工作时，毛泽东致信他恳言相劝：“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当然，在家庭、在亲属圈中，毛泽东毕竟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在给自己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及儿媳刘松林的信中，体现了毛泽东慈父般的爱；在给长沙的亲属的信中，体现了毛泽东对岳母家的赤子般的情；在给李淑一的信中，则体现了毛泽东对爱妻杨开慧深切怀念的丈夫情。

毛泽东最可贵的一个品德是十分尊敬师长。这在1937年给徐特立的生日贺信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毛泽东在信中一开始就写道：“徐老同志：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毛泽东在热烈赞扬徐老坚贞不渝的革命意志、严谨的工作作风、不倦的进取精神后，接着写道：“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从该信的内容结构看，绝不是一篇娇柔造作的生日贺辞，也不是一种哗众取宠的装璜门面，而是实实在在地体现了已成为杰出革命领袖的旧日之学生对尊师的一片虔敬，体现了革命队伍内人们相互关系问同志式的平等。

平等待人虽然是毛泽东的一个处世之道，但毛泽东并不总是一个老好人。这是因为，虽然历史造就了他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性格，陶铸了他吞吐天地、厚人长者的胸襟；但历史又培育了他不能容忍社会罪恶现象，并往往对之极度憎恨的秉性——这正是革命家的一种本质。1937年，红军干部黄克功为逼婚而枪杀女方，后被处以极刑时，毛泽东致信当时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在表示惋惜之后，接着指出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其行为不仅失掉了党的立场、失掉了革命的立场、也失掉了人的立场。毛泽东认为，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处以极刑，否则无以教育党、教育红军、教育普通人。从对待党员干部犯罪问题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看见毛泽东平等待人的另一面：即对待干部罪犯与普通罪犯都一样，都应绳之以法而不能赦免。

四、取舍绝续：着眼于今清理中国文化遗产

任何一个有头脑、勤于思考的中国人，特别是社会文化工作者、学者、所面临的一个不能摆脱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对待自己祖国的文化遗产。在这个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89、375、481、343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89、375、481、343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89、375、481、343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98、110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98、110页。

问题上，充分显示了毛泽东作为真正思想家、理论家的特有风度。他不像五四运动时的偏激派那样主张“全盘西化”而根本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像守旧者那样主张“保存国粹”而极力张扬孔孟之道，而是用自己掌握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体的知识作为工具，去衡量中国传统文化，并加以扬弃、改造制作，以创造出适时代所需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延安时期毛泽东留下的几封论孔墨哲学思想的书信，便是他作为严谨思想家的一个真实纪录。

在1939年2月给张闻天的两封信中，毛泽东就陈伯达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发表了自己对孔子及其学说较为系统的评价，尤其对孔子哲学学说的整体形态、各个重大观点、某些重要概念予以切中的分析。毛泽东首先对孔子哲学的整体形态进行了评价，认为观念论是孔子哲学的整个纲领。肯定了它的两个长处，即具有片面的真理性和强调主观能动性。毛泽东指出：由于孔子在“名不正”之前没有加上“实不明则名不正”，没有“承认实为根本”，“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毛泽东认为正名工作本身是必要的，关键是要分别名实区别。他指出：“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毛泽东接着指出了观念论的另一个优点，他说：“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

关于中庸问题，毛泽东首先肯定了“‘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认为“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毛泽东认为《中庸》中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等语“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而朱熹的注释虽然大体上对，但他不应将“两端”单训为“众论不同于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毛泽东接着从事物运动发展的角度对“中庸”作了比较正确的新的解释。他认为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但能“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他肯定中庸思想“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认为作为中国的赫拉克利特的墨家，于“中庸”“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但它是唯物辩证论的而不是“折衷论”的。

对于孔子的道德论，毛泽东也予以唯物论的批判和改造。他认为被称为“三达德”的知仁勇，是历来的糊涂观念。毛泽东对知仁勇予以唯物主义的新的解释：“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象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象现在说的‘克服困难’”。毛泽东认为对孔子的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对于孔子本人的评价，毛泽东也是实事求是的。在2月22日致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指出：“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事实”。尽管毛泽东后来对孔子思想的看法有较大变化，但在这里所作的这样总体性的评价，是较全面和细致的，对于孔子的各种思想，何处可取，何处当舍，及如何加以改造，发挥了自己精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4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6、147、147、148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6、147、147、148页。

辟独到的见解。毛泽东对待中国文化遗产的这种作法为后人提供了范例。

五、孜孜以求：在实践检验中学习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一生忠实于自己的事业，他把自己着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看得比任何书本理论更为重要。毛泽东是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使他求教于马克思主义，使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但毛泽东从不盲从，从不迷信。他有许多至理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共产党人对每件事情都应当问一个为什么；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

毛泽东一直没有停止过向马克思主义著作吸取精神营养。对马克思主义著作长期的认真研读，在毛泽东的书信中明显地反映出来。这些书信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环境的变化，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的方法和态度也不断地改变。如果说，在前期他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是如饥似渴，那么在后期则是细细品味。在中央苏区初创的 1929 年，毛泽东在福建汀州致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要求中央寄送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等书，并说：“我们望着书报如饥似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自己发愤读书，还着手领导成立各种研究机构和团体，与党内外的同志们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还领导创办了抗大等许多学校，大批培养党的高级干部，注意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他们。毛泽东还非常注重马列著作的出版发行工作。在给何凯丰的一封信中，他建议中央设一个编译部，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认为做翻译工作是“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毛泽东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其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在事业上成功的秘诀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巧妙的掌握和运用。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经常鼓励他人注意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他在致吴晗的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在给一位中学教员陈寄生的信中他又说：“惟党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此点尚祈注意及之。”

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态度是不盲从、不迷信。1958 年，由于中国反经济规律地发起了“大跃进”运动，又不合时宜地办起了“人民公社”，这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挫折，严峻的事实，促使毛泽东用冷静的头脑来重新思考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故此，他在 1958 年冬专为读书事宜而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不为别的，专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6、202 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6、202 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10、386、552 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10、386、552 页。

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且不管这种读书号召的具体背景和旨意如何，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这种公正的科学的态度，则为我们作出了师表。正是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的这种优良作风，我们党才有可能在思想上从两个“凡是”的圈于中冲破出来。并且为了防止对马克思主义只言片字的理解及主观主义的阉割，我们党提倡准确、完整地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提倡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它。在当今时代，只有像毛泽东那样，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付诸实践并经其检验之后，再去认真研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中，哪些地方正确或不正确，哪些观点模糊不清，哪些问题作者自己并不甚清楚，以致能够在理论上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正推向前进，以指导当前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的另一个科学态度是，不管是对自己的理论观点还是别人的理论观点，什么人都可以自由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1956年，有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毛泽东得知后，特致信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这种见解不仅表明自己胸怀的豁达，更是从本质上揭示了学术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这种见解可谓是毛泽东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个补充说明。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10、386、552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10页。

十一 发愤读书贵在精通有的放矢变革社会——《毛泽东哲学批注集》 览要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是毛泽东从事哲学活动最为活跃、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处于盛期（主要是延安时期）留下的文字记录，这本批注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并于1988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录了毛泽东自1936年至1965年近30年时间内研读10本哲学书籍的批注、1篇读书摘要和1篇读书日记。它从一个侧面记载了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从事的哲学活动和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它不仅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轨迹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者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并使现代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化这一历史过程的不可多得的材料。在这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是一部有重要价值、并受国内学界尤其是受研究毛泽东哲学的专家们珍视的文献。

一、《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概要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总共收集了毛泽东研读10本哲学书籍的批注，它们构成全书的主体。这10本被批注过的书名是：《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中译本第3版、第4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米丁等著，沈志远译）、《哲学与生活》（艾思奇著）、《社会学大纲》（李达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斯大林著，博古译）、《哲学选辑》（艾思奇编）、《思想方法论》（艾思奇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河上肇著，李达等译）、《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任继愈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李达主编）等。毛泽东对这10本书的批注，有8本是在延安时期作的，另两本是在建国以后作的。10本批注中，有5本批注较为重要。从其数量看，它们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全书批注文字的97%；从其内容看，它们集中体现了全部批注中的主要哲学观点，是精华之所在。这5本批注是：

（一）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原著1931年在苏联出版，1932年李达和他的学生雷仲坚把它的日译本转译成中文，至1935年6月印行了第3版。毛泽东是到达陕北后读到这本书的。从书页上留下的笔迹看，毛泽东对这本书曾多次研读，许多章节至少批注了3遍。这本近600页、共27万字的书每一页上都有批注符号。毛泽东对这本书的批注文字总共约12000字，其中对认识论、辩证法的批注约占一半。对辩证法的批注则集中在三大规律部分，而对三大规律的批注，又以对立统一规律的批注最多。从批注类别上看，有对原著内容的提要和评论，亦有对某些理论观点的发挥，同时还有不少根据相关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的议论。

（二）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

准确他说，《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4版是第4次印刷。毛泽东研读此书的时间大致在1941年3月以后至9月前后，对全书写有1200字的批注，其中2/3集中在该书的最后一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这表明毛泽东对此书是在重点批读。

（三）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这本书于1936

年 12 月出版，共 34 万余字，491 页，毛泽东在书上留有批划符号的有 186 页，占全书页数的近 2/5。批注的内容集中在实践是认识的标准、对立统一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二节内，共有 2600 余字，其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批注占了一半。毛泽东对这本书的批读时间当在 1937 年 7 月以前，与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 3 版的批读一样，目的是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及其《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做理论准备。

（四）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社会学大纲》于 1937 年 5 月出版。出版后李达将此书即寄于毛泽东，毛泽东对此书颇为赞赏，认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在十年反动时期能有这样一部书问世是难得的，毛泽东对这本书写的批注文字约有 3400 字，集中在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毛泽东的《读书日记》看，他阅读这本书的速度是每天 25 页左右，阅读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在书页上留下的批划符号表明，时这本书他至少读了两遍。

（五）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哲学选辑》1939 年 5 月在延安出版，它是从当时传至延安的中外新哲学著作中选取精华编辑而成，来源分别是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 3 版、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米丁主编的《新哲学大纲》，还附录了斯大林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以及艾思奇本人写的《研究提纲》。《哲学选辑》共有 37 万余字，毛泽东对此书批读了 3 篇，共写有约 3200 字的批注。毛泽东的批注文字集中在绪论的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三节和艾思奇的《研究提纲》部分，而对《研究提纲》的批注又占全书批注文字的 2/3 左右。

毛泽东批读过另外 5 本书是：（一）艾思奇著的《思想方法论》。此书出版于 1937 年 1 月，毛泽东仅在书中的一页上写有约 40 字的批注。（二）河上肇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这本书，由李达等人翻译成中文，于 1936 年 6 月初版，11 月再版。根据批注的内容看，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时间当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三）斯大林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系《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的第四章第二节，由斯大林亲撰。它发表于 1938 年 9 月 12 日苏联《真理报》，当时未署斯大林的名。博古根据《真理报》原文将它译成中文，译本于 1938 年 12 月出版。出版后博古即赠送毛泽东一本，毛泽东收到赠送本后进行了认真研读。该书 52 页，22000 余字，毛泽东几乎逐页作了批划，并写有 200 余字的提要性和疑问性的批注文字。此书收入 1939 年 5 月出版的《哲学选辑》后，毛泽东阅读时对其批划为数不多，也未留下任何批注文字。（四）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

《中国哲学史》（第三册）出版于 1964 年 10 月，毛泽东在阅读这本书的第五章第一节中有关华严宗的分析时，写了近 100 字的批注，主要是论述相对与绝对的辩证关系，批评书中的某些分析离开了客观辩证法，认为其分析与书中引述的列宁的观点相矛盾。（五）李达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内部讨论稿上册，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是在毛泽东提议下，在《社会学大纲》的基础上修改扩充形成的，1965 年出版了内部讨论稿，毛泽东即在内部讨论稿上写了近 300 字的批注。其中较长的一条批注是关于唯物辩证法体系的；另一条批注是针对书中讲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而写的，毛泽东认为李达在此问题上“不必抄斯大林”。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收有一篇 3000 字的读书摘录，它是毛泽东 1937 年 9 月阅读艾思奇著的《哲学与生活》一书时摘录下的。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毛泽东唯一的读哲学书的摘录。在这个摘录中，毛泽东对艾思奇的“差别不是矛盾”的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并为此写了 200 多字的评论。这是摘录之中夹批注。在摘录之后，还附录了毛泽东为摘录之事于 1937 年致艾思奇的一封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还收入了毛泽东自 1938 年 2 月 1 日至 4 月 1 日写下的《读书日记》，这是保存下来的毛泽东的唯一的读书日记。这为期两个月的日记，记载了毛泽东阅读李达《社会学大纲》、潘梓年《逻辑与逻辑学》和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这 3 本书的时间和进度。

总起来看，《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有 13 件材料，其中属于毛泽东写作的文字总量达 27000 字左右。这 27000 字中，约有 23000 字是毛泽东研读 10 本书时留下的批注，余下是 3000 字的读书摘录和近 1000 字的日记。所有这些幸存下来的文字材料，对于学术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可说是极为珍贵的。

二、毛泽东读书及批注的特点

毛泽东读书贵在精通，他喜欢反复研读，直至掌握其精神实质方才罢休。毛泽东读书时不仅全神贯注、细致入微和善于思索，而且还有不动笔墨不着书的特点。他在读书时，总是喜欢在书页上圈圈点点，勾勾划划，留下自己的心得或评论。这种良好的读书习惯是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开始养成的。早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在研读德国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就曾在书页上写有 12000 字的读书批注。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壮烈事业后，毛泽东仍充分利用时间读书，以充实自己的革命理论知识。领导红军长征到达延安以后，由于有了一个较为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为全面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尤其是哲学学说，又一次开始发愤读书。毛泽东的这种发愤读书，不仅为当时的人们耳闻目见，也通过他所研读过的书籍中留下的手迹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特别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所读过的书页上，到处都有他留下的阅读符号，如竖线、横线、斜线、浪线、三角、方框、圈、点、勾、叉及问号等等。有些符号不止圈划一次，而是杠上加杠、圈外划圈。这样，书上批划的符号密密麻麻，重重叠叠。从毛泽东所留下的批注看，它大多写在书页的天头、地脚，页边、中缝或字旁行间。有不少批注呈“密集型”态，即密密麻麻写满书页，这样的文字密集型批注多达 100 余页。此外，毛泽东在读书时，还细心地改正了原书中一些排错的文字和标点符号，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专心读书的精神状态。

毛泽东一读书就要作批注，那么毛泽东的读书批注有些什么特点呢？从总体上看，毛泽东的读书批注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价值取向，它表明毛泽东发愤读书以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指导自己所着手的中国革命事业并夺取这一革命事业的最终胜利。

（一）毛泽东读书批注的强烈现实主义价值取向首先表现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有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思考和批注占有重要比例，这类批注多达 50 余处，总共有 3000 字左右。具体说来，这类批注主要是对中国革命的政治、军事路线、方针、政策

和策略的议论或旁及，以及在制定中国革命的政治、军事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问题上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之思想根源的深刻揭露，它们多是毛泽东在读书时参照原书中有关哲学观点的论述或有关对实际问题的论述相机而发的。例如，当原书提出观察问题应从“具体的现实，即一定的社会”出发时，毛泽东即在书页边写有这样的字样：

“例如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当原书指出新火星派不懂得重要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一哲理，因而不能在革命运动中提出无产阶级的正确斗争口号时，毛泽东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现实情况在书页上批写道：“目前斗争的正确口号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首先的问题是国内和平即国共合作”。当原书批判均衡论、论述事物发展的内在原因与外在矛盾的关系时，毛泽东感慨尤多，他指出，“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外的力量须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的即间接的发生影响。”“国民党能够破坏苏区与红军，但必须苏区与红军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点，自己巩固，则谁也不能破坏。红军至今没有被破坏，就因为此。”毛泽东在批注中还有许多揭露主观主义者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看问题以给革命造成危害的地方，例如在原书有关论述旁边他这样写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毛泽东认为原书中关于把“离开具体发展的死的抽象作为对象，造出了产生任意的主观的非唯物论的解释事实的地盘”的话，“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进一步揭露主观主义的看法是一种危险的“类推法”，认为“妄用类推法，没有不错误的。”并慨叹此类错误思想方法“中国人犯的太多了，”“如拿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比，拿北伐战争与苏维埃战争比，拿第一次大战与现在的大战比。”从这种用中国革命实际例子来解释抽象哲学原理的研究风格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比哲理于实际行动中的思想倾向是何等强烈，毛泽东内心对于正确思维方法的审度和体会是何等的渴求，毛泽东哲学的实践风格又是何等明显。从这里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对王明一类只知生吞活剥地背诵马列主义词句的空头理论家是那样深恶痛绝。根据毛泽东的准则，如果一个人把马列主义的书背得滚瓜烂熟，但却不会应用，那他就是一个应当被用手指头刮脸皮的可笑理论家，甚或他根本不是一个理论家。而真正的理论家是在精通理论的同时，能够灵活地运用这种理论去解决现实社会问题。透过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10、7—8、106—108、9、317 页。下引此书，不再注版本。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10、7—8、106—108、9、317 页。下引此书，不再注版本。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10、7—8、106—108、9、317 页。下引此书，不再注版本。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10、7—8、106—108、9、317 页。下引此书，不再注版本。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10、7—8、106—108、9、317 页。下引此书，不再注版本。

跃然纸上的文字，我们依稀可见当年毛泽东倚立在延安窑洞中简陋的书桌旁如此喟然叹息：“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

（二）毛泽东读书批注的强烈现实主义价值取向其次表现在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研究和掌握。对中国革命的政治、军事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正确制定，取决于对中国革命的未知的必然王国领域的不断认识和揭示。因而力求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就成了毛泽东研究哲学的重点之一。这种倾向在批注集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因为集中有关认识论方面的概括、批注和阐发占有很大比例。这些概括、批注、阐发不仅表明毛泽东对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观点有较系统的理解和掌握，同时也表明毛泽东能借助哲学方法论去反思自己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去蒸馏和升华中国革命中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丰富。广袤的个人阅历使毛泽东对认识论的理解有着他人不可能有的深邃性。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所留下的有关认识论方面的文字材料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已超越了他所读原书中某些观点的局限而富有创造性。正是在读书时所激发、闪现出来的这些卓越思想火花，为毛泽东撰写出使自己作为哲学家名传遐迩的《实践论》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因而批注集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冶炼自己的认识理论的一个思想熔炉和精神试制场所。只要浏览一下《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就不难得知，《实践论》所提出的不少新颖观点，例如认识的两次飞跃的观点，认识与实践应达到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观点，及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之认识发展的总规律等等，在这里就已初露端倪或显而易见了。例如，批注中说：“理论从实践产生，如果正确反映客观外界的发展过程，然后再应用这种理论去实践，就能在实践上实现这种理论，完成认识的路程。”“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由实践到理论”、“又由实践到高级的理论”。由于毛泽东立足于变革中国社会的现实实践来谈认识，所以他鞭劈入里地揭露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思想根源和认识根源。他说：“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脱离实际）’”。他认为“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并嘲笑中国的主观主义者不是以实践为革命的指导，而是以脱离实践的教条式理论去范围实践，正是在强调实践的需要而去研究认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毛泽东的独具本色的实践—认识论哲学。

（三）毛泽东读书批注的强烈的现实主义价值取向还表现在注重对辩证法尤其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探究。在批注集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十分注重对辩证法的探究，尤其是对立统一规律、对矛盾双方的统一和斗争关系的探究。毛泽东把对立统一规律认作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这种情形与列宁十分相似。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毛泽东像列宁一样，生活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社会阶级斗争空前剧烈，尤其在是与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政权和入侵的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斗争过程中，首先重要的是制定出高明的政治、军事斗争策略和把握制定这些策略的思想方法。所以在批注集中，处处可见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45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3—34、144、435、429、429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3—34、144、435、429、429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3—34、144、435、429、429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3—34、144、435、429、429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3—34、144、435、429、429页。

毛泽东这种政治哲学极为注重辩证法的致思方向和致思风格。可以说，这种方向和风格，从投身革命的 20 年代初至辞世的 70 年代中期，在毛泽东那里数十年一直保持不变。从汇入集中的 1965 年写下的最后一篇批注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如何建构辩证法思想体系的精简叙述：“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

毛泽东对辩证法核心规律的确认虽然经历了一个过程，但毛泽东所处的外部社会条件的潜在作用却决定了他的哲学思想行程的这种最终归宿，是历史时代塑就了毛泽东以斗争为主导的对立统一思想观念和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思想体系。通过批注集，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早在 30 年代研究、比较辩证法诸规律时，就形成了对立统一规律是核心规律的思想，譬如他如是说：“矛盾统一及其分裂也是思维的法则”。“辩证法中心任务，在研究对立的相互渗透即对立的同一性。”“对立的统一性不是本质，对立的斗争是。”

“对立就是辩证。”

如果注意到批注集中对“中庸”思想评价的变化，就会加深对毛泽东关于“斗争就是辩证”的思想倾向的理解。由于强调“理论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因素、组成部分。”毛泽东在批注中对“中庸”几乎采取了否定态度。在给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尤言中庸观念、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认为中庸观念虽没有“发展的思想”，但它“从量上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因而毛泽东称赞中庸思想“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但在批注中毛泽东则认为“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是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显然，由于认为中庸是不能提供推翻旧社会制度、实现社会革命和飞跃这种政治主张的哲学根据，革命家毛泽东就将其列入反辩证法思想范畴中。从这里可以青出，毛泽东研究哲学以实际社会效用力准则的立场是多么明显。

如果要找到一种恰当的语言来从总体上概括《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的主旨，那么在研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时，毛泽东自己在首页上所写下的“找出法则、指示实践、变革社会”这句话最为合适，这句话与其说是毛泽东对该书写作的目的提纲挈领的把握，不如说是毛泽东对自己钻研哲学的根本宗旨的最好说明。因为中国社会亟待变革的现实和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推动毛泽东去探究哲学；为撕破夸夸其谈的、以马列本本上的词句唬人的教条主义的画皮，并系统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促使毛泽东“发愤读书”。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505—506、71、79、99、232、314 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505—506、71、79、99、232、314 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505—506、71、79、99、232、314 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505—506、71、79、99、232、314 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505—506、71、79、99、232、314 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505—506、71、79、99、232、314 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45—147 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80、209 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80、209 页。

在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理论融合于中国文化环境，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过程并使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的具有实践风格的哲学。通过研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不仅可以了解毛泽东如何以一个革命家、政治家的眼光去审视社会哲学文化，进行理论思考时而形成自己具有浓郁政治色彩的奇伟哲理，而且也可以从毛泽东以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取舍、衡量准则来研究哲学的方法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不过，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仅是毛泽东研读哲学教材和通俗哲学书籍时随时作下的批注，它有的地方表现出深思熟虑，有的地方则是即兴而发；有的地方闪现出的思想光华熠熠生辉，有的地方则显得含混错杂。它是富含哲理的思想资料或半成品，犹如深埋在地下极有开采和冶炼价值的富矿，因而绝不能将其中的话全部当作至言绝论。毋庸讳言的是，为历史熔炉所陶铸成的毛泽东哲学也同样避免不了历史的局限。例如，毛泽东认为只要确立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地位就已基本解决辩证法问题，剩下的任务只是在这一核心规律指导下作一些解释和发挥，并且把“斗争”抬到不适当高度，过分强调它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这就使辩证法的内容流于简单化、近乎片面化。同时，毛泽东从过分强调直接经验的重要性，发展到轻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忽视科学理论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这种偏向。也许与他晚年夫政时首先向文化知识界发难有较大关系，也正是从这里出发，仔细研读毛泽东未加反复锤锻、带有原始色调的文字所组成的批注集，于把握毛泽东思想深层的发展轨迹，领略毛泽东哲学的风骨和脉络确实具有极大意义。

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与《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及其《实践论》、《矛盾论》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真实地纪录了毛泽东当时对哲学的钻研和思考的情况，特别是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一些珍贵文字记录，从中可以窥见它们与毛泽东 1937 年 7、8 月间为了在抗大讲课而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之间的紧密联系。不难看出，《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对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 3 版）和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的批注，是毛泽东写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尤其是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直接理论准备。只要对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与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从篇章布局上作一宏观比较，并具体考察毛泽东对前两书的大量批注，那么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及其《实践论》、《矛盾论》与《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在理论上的渊源关系和亲缘关系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一）《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与《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篇章结构比较（有些章的节次从略）：

通过以上三书篇目章节的大体比较，可以看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与《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有着理论渊源关系。首先，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与《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在篇章结构的总体上具有一致性，基本内容都是讲唯物论及与唯心论的关系，唯物论的认识论，辩证法

及其诸法则等等。甚至在书名上也有某种相似性，如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为讲演之用称“讲授提纲”，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教材称“教程”。其次，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篇章结构也从《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尤其是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中得到启示。例如，《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总共三章的标题“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唯物论”、“唯物辩证法”，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中的第二章“唯物论和唯心论”、第三章“辩证法唯物论”和第四章“唯物辩证法之诸法则”标题相同或基本相同。再次，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一些章节与西洛可夫、米丁等人的书亦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如《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一章的第一节是“哲学中的两军对战”，《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第二章的第一节是“哲学中的两条路线”；《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二章中第九、十、十一节“反映论”、“真理论”、“实践论”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第三章中的第三、四、五节“物质和意识。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客观的绝对的和相对的真理”、“社会的实践为认识的标度”等颇有共同之处，等等。同时，《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所阐述的内容，基本上是对西洛可夫、米丁等编著的前苏联哲学教科书（以及中国的哲学读物、内容的综述、概括和提炼，以及不同程度的发挥。

但是，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与前苏联 30 年代哲学教科书体系结构、篇目章节的大致相似或个别相同以及内容概括上的某种共通之处，并不表明毛泽东没有独创性。从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篇章结构的总体布局及其讲授的全部内容来看，它既获益于西洛可夫、米丁等编著的哲学教科书，又超出它们，有自己的独立构思，并结合中国思想文化条件和中国革命实际的特点赋予的新的时代内容。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总共 3 章的谋篇布局可说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结构，它是作者在充分吸收他人劳动成果基础上精心构思的产物。《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第一章“唯物论与唯心论”，讲哲学史上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根本区别，以及唯心论与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社会根源。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其第一节讲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并把它与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联系起来，与掌握这一思想武器以“达到解放中国与改造中国的目的”联系起来。其第二节讲旧的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它仅概略地提到西方“旧的哲学遗产”，舍弃了有关机械唯物论、马赫主义、康德哲学、黑格尔唯心论、费尔巴哈等繁杂的内容，而重视中国在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发生了与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动”；并指出“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而来的。”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除了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作斗争外，还应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其第三节讲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指出辩证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其第四节讲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指出列宁把唯物辩证法看作关于客观世界的发展法则及认识的发展法则的学问；辩证法、论理学、认识论具有一致性。其第五、六、七、八、九、十、十一，是具体展开讲物质论、运动论（发展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实践论。这整个十一节的安排

使整个第二章显得层次清楚，逻辑严谨，并且语言文字简略，使人听起来或读起来亲切易懂。第三章“唯物辩证法”，讲辩证法的诸法则和范畴，法则如矛盾统一法则、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范畴则有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原因与结果、根据与条件、可能与现实、偶然与必然、必然与自由、链与环等等。毛泽东指出，这些法则和范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的系统。”同时，毛泽东在本章还具体讲授了“矛盾统一法则”。尽管由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使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未能最终完成，但其逻辑的严谨和思路的明晰，中国化的语言和通俗易懂的文风，使它成为了毛泽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哲学里程碑，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意义。其中至为重要的，在于这一讲授提纲已脱离了书斋习气和经院式哲学，把哲学理论与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从哲理上指导中国革命的教科书。

（二）毛泽东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的批注与《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毛泽东写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尤其是写作《实践论》、《矛盾论》是经过长时间理论准备的，主要是在通过研读前苏联哲学教科书及其他哲学读物的基础上着手进行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在保安和延安就读到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毛泽东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研读这些哲学教科书，然后开始写作包括《实践论》、《矛盾论》在内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毛泽东研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先后写有12000余字的批注，这些批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的类别：（1）评论性批注。这类批注不多，总共不足200字，主要是对原著内容的评论，如说“对”，“此例很好”，等等。（2）提要性批注。这类批注有3000余字，占总量1/4以上，它们是对原书内容的提要、概述，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提炼和加工一些理论观点。（3）联想性批注。这类批注不足2000字，主要是读书时相机而发的感慨，包括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中国共产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对和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分析及对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阐述等等，这表明毛泽东研究哲学的一个重点是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使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用理论来说明和指导中国革命中的诸问题。（4）发挥性批注。这类批注文字占一大半，达7000余字，它们主要是对原书论点的发挥和引申。从这类批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一些理论观点，是如何源之于原书又高出于原书，以至形成自己的特色。

从毛泽东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内容看，主要集中在认识论和辩证法问题上。对该书的第二章“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毛泽东写有近1000字的批语，主要是阐发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以及分析机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对该书的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毛泽东写了多达9000余字的批注，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批注是1500余字，对对立统一规律的批注是6000余字，这许多批注后来为《实践论》、《矛盾论》直接沿用或加工提炼后而采用。

毛泽东对《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的批注，重点同样放在辩证法和认识论方面，即主要集中在该书第三章第五节“社会的实践为认识的标度”，第四章第一节“对立一致的法则”及第二节“量变质和质变量的

法则”。毛泽东对该书写有 2600 余字的批注，其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占一半以上。从批注的内容看。有的文字与《实践论》、《矛盾论》中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有的论点后来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和完善。所有这些表明，对西洛可夫、米丁等编著的哲学教科书的研读批注，是毛泽东为写作《实践论》、《矛盾论》作直接的理论准备。

从研读和批注前苏联哲学教科书和从事哲学著述的实际情形看，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矛盾论》时利用和采集了前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的这样一些思想资料和理论成果：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吸收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关于在实践以外不能认识外界的观点，关于感性认识阶段向理性认识阶段深化形成统一的认识过程的观点，关于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更正确的感觉它、理解是解决本质问题的观点，关于实践贯串认识的全路程的观点，关于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的变化在革命时期表现得特别强烈的观点等等。《实践论》吸收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关于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不能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的观点，关于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及实践活动的多种形式的观点，关于实践之观点是认识论第一的观点和实践是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的观点，关于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是发展的观点，以及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的观点等等。此外，《实践论》还吸收了《新哲学大纲》关于认识过程的感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等理论分析。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吸收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关于对立统一法则是客观现实及思维的普遍法则的观点，关于辩证的发展观与机械发展观不同、它把矛盾看成是自己运动和发展的源泉的观点，关于对立的双方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相互斗争、相互转化的观点，关于主要矛盾制约其他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主导作用的观点及其对均衡论的批判，关于矛盾普遍存在、对抗是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发生的观点，关于差异就是矛盾的观点，关于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的观点，关于外部矛盾对内部矛盾发生影响但内部矛盾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作用的观点等等。《矛盾论》吸收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关于两种发展观的观点以及对外因论的批判，关于事物各个过程中矛盾有特殊性、各种不同的过程有各种不同的矛盾等观点。

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矛盾论》时利用了现存的前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的这样一些思想资料和理论成果：学教科书，吸收了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从科学研究工作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正常的，历史上任何思想家要从事理论创作，他们首先需要学习、研究、批判和继承人类文化遗产，吸收和利用前人或同时代人的优秀文化成果和思想资料，可以说，毛泽东在写作“两论”时利用前苏联 30 年代哲学教科书、吸收其中一些理论观点，是遵循了思想家从事理论创造、从事精神文化生产的一般规律，也符合人类思想发展史的一般规律。决不能因《实践论》、《矛盾论》利用和吸取了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一些理论观点而低估它们的理论价值，看不见它们的理论独创性，认识不到它们在现代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所享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事实上，《实践论》、《矛盾论》与整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样，是毛泽东着意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使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化的理论产物。它们表明毛泽东已熟练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用来成功

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实践。在毛泽东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仅仅停留在纯粹的精神文化领域，停留在书斋，而是同时转化为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毛泽东不仅善于运用中华民族文化的理认模式来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使之通俗化、大众化和具有中国民族特色，更是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总结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来阐明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政策、策略和前途。同时，在总体谋篇布局上，《实践论》、《矛盾论》比前苏联哲学教科书有关篇章的逻辑更严谨，说理更深刻、更透彻，语言也更简洁，它们系统地阐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如果将《实践论》、《矛盾论》与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有关篇章作一比较，就不难看出前者的优越之处。

首先，《实践论》以鲜明的层次、清晰的说理和严密的逻辑进行论述，它以实践与认识为轴心，首先论述了实践的基本形式，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真理的标准；进而论述了认识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即它先形成感性认识，并从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飞跃到实践；接着指明人们在认识运动中应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最后揭示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完全可以这样说，《实践论》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系统化的一部杰作。相比之下，《辩证唯物论教程》中的“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章，分四节讲认识论，但各节之间脉络下清楚。第一节“认识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重在说明应以实践的发展为基础来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但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来源这一主题未展开说明，相反用了几乎3/5的篇幅来批判费尔巴哈、黑格尔，普烈汉诺夫及德波林派在认识论上的种种错误观点。第二节“认识过程的阶段与动因”集中阐述了认识过程的两个发展阶段，有一些独特、精辟的地方，但它重心是在阐发列宁“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一观点，而且用了较大篇幅到批判实用主义、哲学史上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康德主义、马赫主义、普烈汉诺夫及德波林学派的认识论，从而使该节的阐述显得零散而不系统。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第三章的第三、四、五节分别是讲“物质和意识、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客观的绝对的和相对的真理”和“社会的实践为认识的标度”，它们都涉及认识论。第三节讲反映论，讲认识是由感性到思维的运动；第四节主要讲真理论，讲绝对和相对真理在实践基础上的相互贯通性；第五节主要讲实践与认识过程的辩证关系，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品格和实践是认识的标准，以及人类认识是一历史长过程等问题。这

三节有许多深刻的论述和有利的说理，但由于节次安排不尽合理。加之各节都花了相当多的篇幅来批判在认识论问题上形形色色的不同学派，唯心论者及普烈汉诺夫的不正确见解，这样它们枝叶蔓延，反而使主要理论线索交待得不清楚。另外，《新哲学大纲》的“认识的过程”章分八节讲认识论：1. 经验的认识，感觉；2. 表象；3. 概念；4. 判断；5. 推理；6. 分析和综合；7. 归纳和演绎；8. 形式论理学的批判。这一章主要是讲认识的起源，形成和内在发展过程，它对认识诸要素及其联系的分析较深入和出色。

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却不是其论述的范围，并且还对形式逻辑（形式论

理学)给予了不甚恰当的批判。《实践论》在采集以上各书精华、摒弃各书特点和弥补其不足的基础上,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根本,突出实践论,依逻辑层次展开论述认识与实践,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故它自成理论系统,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都具有创新意义。

其次,《矛盾论》从列宁强调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论点出发,依次展开论述了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问题,形成一个以对立统一为核心阐述辩证法的层次清楚的逻辑体系,较之前苏联哲学教科书来说,这是它篇章结构上的优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的法则”,总共有11节。第一到三节讲质量变化的法则,第四到十节讲对立统一法则,第十一节讲否定之否定法则。关于对立统一法则的七节内容主要是:关于发展的两种根本对立的见解;统一物的分裂是客观现实及一切思维过程之普遍的发展法则,一过程之内的矛盾和他种过程之内的矛盾是不同质的,具有特殊性;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相同的方法去解决,故有心要去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对立的相互渗透及其转变存在于一切过程之中,具体的研究它们是认识论、辩证法的中心任务;过程之内的矛盾有主导的方面,必须发现过程的最根本关系、暴露主要矛盾、把握自始至终的过程的矛盾运动之发展;对立的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等等。这七节中不仅花了不少笔墨批判季诺维也夫、普烈汉诺夫、德波林等人的观点,还设专节批判布哈林的均衡论。当然,该章的这些论述无疑曾给毛泽东写作《矛盾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和启迪,但其理论框架在总体上却远不如《矛盾论》那样严谨有序,其论述也不如《矛盾论》那样集中、精当。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唯物辩证法之诸法则”章中的“对立体一致的法则”一节,其基本内容是:两种主要的发展观即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和辩证的发展观的对立,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把发展归结为外因、发展是数量增加,辩证的发展观把发展归结为自身矛盾的运动所引起;各种事物和各个过程之特殊的运动和发展形式中表现着各种辩证的矛盾;事物内部的矛盾既相互排斥又互相贯通;对立的一致律是客观世界和认识之普遍的法则;对立的一致是相对的,它们的斗争是绝对的;冲突是矛盾之个别的特殊场合;每一差异中已包藏着矛盾;新事物的发生是原有矛盾的解决,它内部包含着新的矛盾又在发展;唯物辩证法要抓住事物及其发展阶段上的共同点,同时要把握其特殊点,等等。该节还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唯心的对立统一学说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并称赞列宁把马克思的对方统一法则提到了更高的阶段。总的来说,这一节的优点是理论阐述较为集中,有不少精辟之处,但缺点是逻辑层次不那么清晰,并且过多的枝节发挥和批判性文字使其论点不那么突出和鲜明。经过以上比较之后,可以看出,无论在逻辑层次上还是在内容上,《矛盾论》确实出于前苏联哲学教科书之上,它不愧为是中国现代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路碑,不愧为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篇章。

《实践论》、《矛盾论》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时,不仅其谋篇布局、体系结构明显优越于前苏联哲学教科书,其基本理论内容显得更充实、脉络更分明,而且还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在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吸取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理论精华,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新思想，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与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相比较，《实践论》主要贡献有如下四个新的理论观点：

（1）提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飞跃”，完善了认识运动全过程的理论。《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根据列宁的“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的观点，对认识过程推移运动的关系作了分析，并论述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阶段的各自特征，这是它的可贵之处。但是，“教程”对认识阶段发展衔接过程的论述并不完全符合列宁的观点，它没有把理性认识到实践的推移作为一个“飞跃”阶段提出来，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陷。《实践论》吸取了“教程”中有关认识阶段及过程的较好论述，并从此出发，强调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仅是认识的第一个飞跃，而从理性认识回到社会实践这第二个飞跃则是更重要的飞跃，因为通过这一飞跃检验和发展真理性认识。《实践论》的这一论述建立在认识对实践的根本依赖基础上，从认识发展过程上完善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2）提出实践着的人由于常常受着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和事物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使自己原来的认识会发生“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揭示了认识主体首先受客观环境和认识工具的限制，认识是能动性和受动性之统一的崭新理论。这一崭新理论是前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根本没有的，它是《实践论》观照科学发展史，尤其是通过总结中国革命所遭受的多次挫折和失败，多次使党内正确路线遭错误路线的干扰之历史教训而提炼出来的。从理论渊源上看，它也许会受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有关观点的启发，但从根本上看，却是《实践论》作者在新的社会实践条件下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总结而形成的，它揭示了认识论中的一个新领域。

（3）提出认识应在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已提出“认识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问题，但它主要是通过联系前苏联革命实际并通过批判各种错误观点来阐述问题，并未从主题展开来进行理论分析。其有关真理的论述，也是通过批判各种错误观点来说明问题的，亦未涉及真理的过程性。《实践论》从认识过程的推移出发，从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关系出发，指出人的认识是不断深化、人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不会完结，在此基础上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并强调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这就较完整地理论上解决了问题。

（4）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行到高一级的程度。”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下引此书，不再注明出版社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29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29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297、319—320页。

这实质上概括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列宁关于认识推移运动的论点揭示的是认识的一次循环，前苏联哲学教科书对之作过发挥，但都未曾深入探讨人类认识运动的长过程、总规律。《实践论》借鉴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予以哲学概括，并吸收了中国学者关于认识的螺旋运动的思想，提炼出人类认识运动总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大发展。其中“再认识”概念的提出不仅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更有重大现实意义。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和我国改革事业的发展，“再认识”思想的重大意义将愈来愈为人们所珍视。此外，《实践论》在强调亲身参加变革现实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意义，在强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这一前提下，提出“间接经验”的概念，认为人的多数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它把人的知识分为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个部分，这在前苏联哲学教科书中也是没有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内容。

与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相比较，《矛盾论》也有如下两个新的主要理论观点：

（1）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绝对和相对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前苏联哲学教科书根据列宁有关思想，虽然也指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客观世界和人类认识的最普遍法则，客观事物的过程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运动，但都未提炼出“矛盾的普遍性”概念，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即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更未曾涉及，它们只是提出要认识矛盾的特殊点的必要性问题。《矛盾论》对矛盾普遍性的阐述和对矛盾特殊性诸情形的剖析，是在对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有关论述加以系统化之后，并根据中国革命中错综复杂而又性质殊异的诸种矛盾加以分类概括而形成的新观点。它提出的矛盾特殊性和普遍性即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论点，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思想。

（2）提出“主要的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的发展”，“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丰富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有关内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根据列宁关于链与环的思想，提出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的理论，但却未能对之展开论述。《矛盾论》则紧紧扣住这一论点，结合中国革命过程中此长彼消、旋转变化的剧烈现实社会矛盾，从理论上加以透彻的发挥；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同时，《矛盾论》还指出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也不是平衡的，其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主要方面所规定的，一旦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矛盾论》中的这些阐述确实比前苏联哲学教科书有关矛盾的论述更为精辟和完整。

通过以上比较研究可见，《实践论》、《矛盾论》在利用现存的思想资料、吸取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两论”是毛泽东从事哲学活动和理论创造的结晶，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297、319—320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322页。

闪耀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智慧；“两论”不仅是中国哲学文化园林的奇葩，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的瑰宝。

十二 神游史河文海心鉴风物政事——《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览要

毛泽东酷爱中国史学是尽人皆知的事。1952年，他添置了一部乾隆武英殿本的二十四史，这部史典共850册，2249卷，约4千万字。添置以后，毛泽东在繁忙的政务活动之余，抓紧时间研读阅览，晚年弱体卧榻之时也未曾停止。毛泽东几乎通读了这部卷帙浩繁的典籍，有些卷册篇目，他一读再读，还在书页上圈圈点点，留下了不少读书批注。“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歌未竟，东方白。”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中的慷慨吟赋正是他神游中国史海的心灵写照。自幼时起，毛泽东就酷爱历史小说，他沉湎于历史传奇故事，敬仰历史英雄人物，获取了许多文史知识。而到50年代以后，已是耳顺之年的毛泽东，由于自己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已完全达到成熟的程度，当他再次潜游于中国文史海洋之中时，确能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地。

毛泽东酷爱史学，也更酷爱文字。包括诗词曲赋、楹联、笔记小说，毛泽东都百读不厌。对于文学作品，毛泽东一方面是在鉴赏和品味，另一方面也是把它们当作“历史”来读，因为那些诗文小说之中深埋着历史事实和思想。

毛泽东阅读文学书籍时也写下了不少批语。尽管他所读过的大量文史古籍有些已经散失，但也有不少得以保存下来。199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将既存的毛泽东阅读40部文史古籍的批语加以整理并部分标点，以《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为书名结集出版。这给广大读者提供了了解毛泽东喜读那些文史书（哪怕只是部分）和怎样读文史书的珍贵资料。

毛泽东孜孜不倦地研读史书，将其视为工作的一种需要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精神享受或个人偏爱，其目的是要从历史中发现未来，从历史教训中总结经验，挖掘和提炼出指导他所着手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方法和策略。对于这一点，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史学理论家柯林武德(R.G. Collingwood)的史学观可以从理论深层上予以恰当的解释。他曾这样指出过：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并非死掉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目前依然活着的过去。史学研究的是“过程”而不是事件。事件有始有末，而历程则无始无末而只有转化：历程P1转化为P2，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界线标志着P1的结束和P2的开始。P1并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有结束，它只是改变了形式而成为P2，P2也并没有开始，它以前就以P1的形式存在着了。历史本身并没有开端和结束。今天由昨天而来，今天里面就包括了昨天。历史知识乃是对囊括于现今思想结构之中的过去思想的重演，而现今思想与过去思想相对照并把它限定在另一个层次上。史学家重演前人的思想，并不是，也不能是简单的重复，其中必然也包含着他自己的思想在内。

毛泽东喜读文学书籍也同样可以从现实的需要作出合理的解释。法国著名哲学家、解释学家保罗·利科尔(Paul Ricoeur)曾这样说过：文学的“虚构叙述也含有历史的现实主义的目的成分”，“虚构世界将我们带进行为的现实世界的核心。”亚里士多德曾以一种矛盾的形式说过：“诗与其说是历

参见[英]柯林武德著，《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史……倒不如说具有哲理。”利科尔的这段话也许可以揭示毛泽东为何喜爱中国文学典籍的秘密：他是要在文学世界中探览史实并寻求于现实有用的哲理。

从上述角度来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的，收集有毛泽东阅读 40 部文史古籍时所留下的内容富博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弥足珍贵。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尤其是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曾思考过什么。这本批语集，计有批语 308 处，总共约有 6200 字（含标点符号）。其中对 16 部文学书的批语有 75 处，计 2500 余字；对 24 部史学书的批语 233 处，计 3600 余字。对文学古籍的批语中，最长者是读《初唐四杰集》时留下的，约 920 字；最短者是读《历代诗话》时留下的，仅 4 个字。对史学典籍的批语中，最长者 1640 余字，是读《三国志集解》时留下的，其中对《魏书·张鲁传》的两次批语便有 1370 字左右；最短者是读《随书》时留下的，亦仅有 4 字。

从批语的内容看，广涉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伦理、哲学；政策与策略，工作方法，调查研究，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人口考证，地名考证及一般史实考据；农业、种植史、工程、工艺学，医学及养生，以及历史人物评价，诗文评论等等诸多领域。其中一般性或提示性评语很少，仅 10 余处。从类别上看，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最多，达 60 余处；次则为军事，36 处；顺次为政治及政策和策略等等。这些批语的内容大致上为这 40 部文史古籍的内容所规定，正是这些古籍内容激起毛泽东的才情思绪，使他在研读之时或直抒己见，或借题发挥，或旁证博引，或浮想联翩，或心有所悟，或感慨万千。

从《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我们不仅可以领略作为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的毛泽东确有许多为常人所不及的读书方法，而且也可以透过他留下的批语窥见他那为常人所不及的心态情意。首先，毛泽东把所读之书放置在一个恰当的历史背景中，他注意把握所读之书形成的时代特点、社会条件和作者成书条件、写作动机、指导思想和目的，故能弄通读透书的内容。其次，毛泽东读书有自己特殊的价值取向，他能从书中鉴取历史兴亡之道，通过品评历代政事，臧否人物，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悟出自己所需的为政方略，并能在同古人的对话中激发出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再次，毛泽东能自如地游大在书的海洋，他以自觉的清醒的批判意识来读书，从不为书所俘虏。在恰当评价书中所言风物政事、以明利害得失时，总是显露出自己的独具智慧。最后，由于毛泽东知识渊博，尤其是文史知识渊博，他善于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对所读之书作认真考证，辨别史学真伪，甚或勘正文字错误，校改和添加标点符号。所有这些，都是一般人尤其是知识菲薄的人难以作到的。遍览毛泽东在书页上所留下的文字，不难看出他素来所提倡的古为今用的原则和革命功利主义的原则。毛泽东在评价历史作品、历史人物与事件时，总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总是以能否促进社会进步作为真善美的标准去衡量之。当然，毛泽东在注重作品的政治思想倾向时也注重艺术标准。总之，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渊博的学识，能使毛泽东在中国文史典籍中读出他人不能读出的东西，悟出他人不能悟出的道理。一部《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表明，毛泽东心中有自己的一部中国

[法]保罗·利科尔著《解释学与人文科学》，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08 页。

人文历史。

毛泽东到底是怎样阅读文史古籍的呢？

一、点评历代政治得失，从中悟出治国之道

作为大政治家，毛泽东首重的是从古人政治得失中悟出兴亡之道，以鉴取治国之策。古籍中所载的历代贤主良臣所制的政纲、政策和政举，他无不为之关注。《新唐书·姚崇传》记述姚崇以历史经验为戒，结合时政之弊，向唐玄宗跪奏“十事”：政先仁恕，不幸边功，法行自近，宦竖不与政，租赋外一绝之，戚属不任台省，君臣接之以礼，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绝道佛营造，推汉之禄、莽、阎、梁乱天下鉴为万代法。毛泽东读至此时对之颇为赞赏，他在书页上批写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显然，他认为这十条政治纲领在当时是有见地的，其内容有一些是可以鉴取的。毛泽东一向注重政治思想教育，亲严疏宽；提倡令行禁止，同时又提倡下级敢于坚持正确意见；主张在全党宣传唯物辩证法；对国家的安定和统一持有高度的警惕等等，这些与姚崇的主张多有相通之处。对《旧唐书·李百药传》中有关唐太宗李世民的记述，毛泽东在阅读时将其内容归纳为“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1）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不籍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2）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3）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4）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这四条工作方法，显然与毛泽东的工作与生活习惯有相似之处，故他加以看重。

毛泽东还善于从古之政事得失中推导出新的政治经验。在读《智囊》卷八下《明智部·经务》时，书中有徐阶关于法往往责将校而不责守令，而地方守令是使民者、守令勤、果、警、仁等要素可不致败绩的记载，毛泽东即在页边批写道：“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显然，毛泽东这里看出了地方守令与将校各自职责不明，军政体制不完善而需改进，今之军区党委制则具有优越性。对于古代行政的效率，毛泽东更是加以注意。

《汉书·赵充国传》中记载这样一件事：赵充国在六月戊申日上书给汉帝，从金城呈送长安；汉宣帝的批示在七月甲寅日即从长安下达金城，来回只有七天，极为迅速。毛泽东经过推算，在页边上注道：“七天”。可见，他至力欣赏这种高工作效率。作为共和国的开创者，毛泽东对国家政权的稳定持有高度警惕，这在读书批语中多处反映出来。如在《宋史》之《太宗》本纪卷中有“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的史家评述旁，毛泽东指出这是宋太宗害死其兄太祖，“不择手段，急于登台”。并在其它地方多处指出史家“不书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7、221 页。下引此书，不再注出版社年版。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7、221 页。下引此书，不再注出版社年版。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57、125、280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57、125、280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57、125、280 页。

病而书葬”，“不书病而书死”，掩饰宫廷内部倾轧夺位的政变类史实的撰史方法。这是否从一个侧面映射出他与林彪、江青阴谋集团斗争时的警戒心态呢？

总之，从历史中导出现实需要的为政方略，是毛泽东读古籍时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这在读《魏书·张鲁传》时两次写下的共计 1300 余字的批语中表现得非常鲜明。毛泽东读此传时，是在 1958 年 12 月，当年他正在国内推行“三面红旗”的政策，读此传显然是要从思想上得到一些启发。长长的批语也表明毛泽东比较推崇张鲁的一些作法。毛泽东认为，张鲁的五斗米道有其经济、政治纲领，“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以神道治病这种“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对“犯法者三原而行刑”是“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毛泽东由思昔而抚今，把思考的重点转向了中国的现实，他接着写道：“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人民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今是接近的”。毛泽东认为，在这一穷二白的纸上正好画上美丽的图画，写上美丽的文字。他要依靠新时代的“半无产阶级”去实现昔日张鲁未能长住的梦想，借助人民公社以争取早日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当然，毛泽东对张鲁的作法是取中有舍并加以改造了的。他清楚看到，五斗米道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尽管“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这一点相同，但包括道教在内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毛泽东还指出了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的特点和局限性，一是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二是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三是带有封建性质，即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等方面。然而在现今中国，由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所以，人民公社这种社会主义形式的历史承担者理所当然地是广大农村中的农民。显然，毛泽东从农民的革命传统和现状中寄托了社会主义之实现的希望。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将自己对《张鲁传》的这些批语印发给与会者，充分表明他将中国历史上的小农平均社会主义思想及某些作法，在加以批判和改造后作为在新时代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途径。虽然毛泽东这里带有若干空想成份。但正是这种追求平等、自由、幸福的理想主义给他以精神动力，同时也显露出他一贯提倡的古为今用的现实主义原则。

二、臧否历史人物，尤爱贤才新进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批语集中对历史人物的赞赏、怜惜、比较、臧否多达 60 余处。对忠奸贤庸各式人物及其行为，毛泽东总是凭藉自己的人才观和价值观率性而论，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142、143、150、151、143、145、148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142、143、150、151、143、145、148 页。

善恶分明。在集中，毛泽东对一些杰出人才的赞誉比比皆是：“臧质豪杰之上”，“田弘正，好将军。”“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生子当如李亚子”。“伟哉虞公，千古一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翟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毛泽东对不少历史人物作过比较，如“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翻不如禁。”“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李恪英物，李治朽物。”⁽¹¹⁾“袁凯无能”，“袁粲死节。”⁽¹²⁾对于一些无能、昏庸、奸佞之辈，毛泽东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给予客观评价，如“郭象无行。”⁽¹³⁾（刘表）“虚有其表。”⁽¹⁴⁾“‘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¹⁵⁾“王建庸人，不知政治。”⁽¹⁶⁾“笑里藏刀李义府。”“杨再思佞人。”

毛泽东对一些人物的性格及工作作风的评价往往切合得体，甚或入木三分。如对于梁太祖朱温，毛泽东认为他“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

对于唐代的刘幽求，毛泽东看出其性格弱点是“能伸而不能屈，年六十一，以患死。”而对于南朝名将韦睿之子韦放，毛泽东称他“有父风”

臧否人物、区分贤庸，需要一定的识别能力和一定的评价标准。毛泽东是以人物的德才胆识、作为大小，对民族的贡献和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促进为标准的。他本着这一标准去褒贬毁誉各类人物，也本着这一标准去推翻前人对一些历史人物有失公正的评价。在读，《魏书》时，毛泽东对注家指曹操为奸雄，“志骄气盈，言大而夸”等评语断然予以否定，他写道：“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并引李白的诗句赞誉之：“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在读《古文辞类纂》时，毛泽东对于书中所言的“老成”与“新进”亦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应以德才胆识来衡量，而不可以年龄来划界。他针对性地这样批写道：“看什么新进。起、翦、颇、牧其始皆新进也。周瑜、诸葛、郭嘉、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237、121、159、204、233、192、107、140、208、212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237、121、159、204、233、192、107、140、208、212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237、121、159、204、233、192、107、140、208、212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237、121、159、204、233、192、107、140、208、212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237、121、159、204、233、192、107、140、208、212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237、121、159、204、233、192、107、140、208、212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237、121、159、204、233、192、107、140、208、212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237、121、159、204、233、192、107、140、208、212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237、121、159、204、233、192、107、140、208、212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237、121、159、204、233、192、107、140、208、212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23、226、253、227、205、138、98、291、196、109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23、226、253、227、205、138、98、291、196、109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23、226、253、227、205、138、98、291、196、109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23、226、253、227、205、138、98、291、196、109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23、226、253、227、205、138、98、291、196、109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23、226、253、227、205、138、98、291、196、109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23、226、253、227、205、138、98、291、196、109 页。

毛泽东在批语集中还点明了怎样看待和使用人才问题。他的原则是：“观人观大节，略小故。”对人才不可求全，有一技之长者即可用之，如在读《南史·曹景宗传》，读到梁武帝使用作战勇猛而军纪不严的曹景宗时，毛泽东批写道：“曹孟德、徐世勋、郭雀儿、赵玄郎亦用此等人。”毛泽东还认为，“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

尊重人才，珍惜人才，关怀人才的成长，是毛泽东的一大特点。毛泽东最为爱惜的是一些青年英才，这在批语集中也尽情显露出来。在读《初唐四杰集》时，毛泽东为四杰之一的王勃专门写了一段长达900余字的批语，不仅对王勃作《滕王阁诗序》时的年龄及不幸淹死的地址作了具体考证，尤其怜惜王勃这位“英俊天才”“死得太早”，并从王勃等人开创新骈、活骈文体、领一代风骚的史迹而大发感慨和联想，进而议论起人才成长道路的艰辛和爱护青年人才的重要，同时把这些与现实社会中党的方针政策联系起来。毛泽东认为：“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这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他进而指出“如果党再对他们加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他还认为“这个论断”已为“我们近来全民性的四化运动”“充分地证明”了。尽管古今人才成长的社会历史条件各有差异，但一些基本道理是大致相同的。毛泽东由议论唐代文学英才王勃而“想及一大堆”，正好体现出他这位新时代、新社会的领导者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人才观。

毛泽东深知优秀人才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都是难得的宝贵财富，故他一方面提倡爱护人才、反对压制人才、鼓励青年人才成长，另一方面又树立典范以引为人们学习的榜样，以利社会涌现出更多的人才。毛泽东的这种主张在批语集中也充分表现出来。在读《南史·韦睿传》时，毛泽东对南朝名将韦睿的才识操行赞佩之至，写下了不少赞语，如“躬自调查研究”，“善守”，能及时捕捉战机“以众击少”或“以少击众”，“不贪财”，“劳谦君子”，“仁者必有勇”等等。尤其是在读到书中记述韦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扫竹如意以麾进上，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等语时，毛泽东动情地批写道：“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三、熟诸兵家之道，胸中犹存一部古代军事史

中国历史上的人才大致分文才和武才两大类。《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论及的人才，少数是文才，而多数是武才（其中包括不少政治家在内）。因为中国历史上战乱之多，世所罕见，以力服人由此而构成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中国史书，在某种程度上是记述的一部战争史。毛泽东读史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3、226、253、227、205、138、98、291、196、109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3、226、253、227、205、138、98、291、196、109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1、12、13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8—204页。

时对历史上杰出人才的关注，多在他们对军事问题的巧妙解决或出奇制胜的谋略方面。这种关注当与毛泽东那出生入死的战争经历和熟谙韬略有关。《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有关战事的批语达 30 多处，它们主要涉及战例的评述，战略战术原则的运用及军事伦理等方面。

批语集中，毛泽东注重的较大战例有孙子攻魏救赵之战，南朝名将在梁武帝五年率军数万与北魏中山王元英百万大军相战于钟离、邵阳洲的战役，大通元年南朝名将陈庆之率兵七千破魏军 40 万于荜阳的战役，宋代虞允文破金的采石之战，明代燕王破李景隆的白沟河之战以及三国时陆逊破刘备的新野之战等。毛泽东对孙子围魏救赵的胜着及唐太宗等推崇的孙子用兵的“驷马之法”，欣赏之极。他称孙子“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并对孙子的“驷马之法”作出较详解释：“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并对师此兵法的李世民、朱元璋等人许以赞语，谓“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对于钟离、邵阳洲战役，毛泽东赞其获胜者韦睿“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这显然是将此战役与更始元年刘秀破王莽的昆阳之战、建安十五年周瑜破曹操的赤壁之战相提并论。对于陈庆之破荜阳之战，毛泽东评价亦高。1969 年 6 月在武昌重温记有此战役的史书时，他在书页上这般批写道：“《陈庆之传》再读此传，为之神往。”对于极力主战在采石破金而获胜的虞允文，毛泽东称他为“千古一人”，评价尤高。

毛泽东在评述历史上一些有名的战役时，往往以军事家的慧眼将其当作一整体过程去剖析、观察。例如，他把白沟河之战与后来的东昌之战看成一个前后相续的战争链，对燕王在东昌之战中的失利，毛泽东似乎在意料之中：“白沟河大胜之后，宜有此败。”其评语道出了胜者易骄而轻敌，必致失败的缘由。对于军事家们的用兵之道，毛泽东的观察甚为细致。《南史·臧质传》中有载臧质在汝南与魏太武帝会战时，“封搜便与”太武帝，并遣书信辱骂他。毛泽东对此批写道：“此是欲战法，激之使战。”他颇为欣赏臧质的军事才能，称他为豪杰之士，“一解汝南之围，二胜眭眭之敌，三克刘劭之逆。”毛泽东指挥作战历来慎重初战，故他对古代兵家如何处置初战兴味甚浓。对于《资治通鉴·魏记》中蜀将马谡的街亭之败，毛泽东认为是诸葛亮用人不当，指出“初战亮宜亲临阵”。并认为诸葛亮从这次兵败中得到了教训：“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毛泽东用兵善诱敌深入而歼之，故对于古代军事家相同的战法予以注重。对于《宋史》中所载宋太宗与契丹的战事，毛泽东评说宋太宗“不知兵，非契丹敌手。”“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毛泽东还善于从宏观战略着眼分析战役问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65，66，201、205、315、331、188、292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65，66，201、205、315、331、188、292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65，66，201、205、315、331、188、292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65，66，201、205、315、331、188、292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65，66，201、205、315、331、188、292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65，66，201、205、315、331、188、292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65，66，201、205、315、331、188、292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78、161、106、141、163、270 页。

题。对于《吴书·陆逊传》中注家评价刘备败于陆逊火攻，是未以土石为营的结果。毛泽东却指出势态并非如此。他在书页上写道：“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在另一处批语中，毛泽东认为诸葛亮弃荆州而就西蜀，“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作为身历百战的军事家，毛泽东在对历史上的战例、战局之态势及利害得失予以评价时，往往语言精辟得当，时有点睛之笔。如以下评语在批语集中随处可见：“打援”，“中间突破”，“先退后进”，“大迂回，乘虚而入”，“内线作战，以寡对众，以弱敌强”，“有强大的战略预备队”，“避其锐气”，“正，原则性。奇，灵活性”，等等。

中国历史上的大军事家往往讲究武德，毛泽东对这方面的内容也非常关注。在集中可以见到不少这样的批语，如“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杀降不武”。“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等等。这些批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毛泽东的军事伦理观。在自己的军事实践中，毛泽东主张对战俘不辱不杀，不搜腰包，有伤病者给予医治，这表明毛泽东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来讲求武德，并把这种武德的弘扬看成是仁义之师的克敌制胜之道。

毛泽东读书的一大特点是严于考证。他像一位治学严谨、知识渊博的学者，对所读书中的史实哪怕是一些别人认为微不足道的细节也不予忽略。如他指出《梁书·太祖本纪》中有一处记载的“万骑不实”，推算出明太祖灭陈友谅一役“打了两月余。”针对《太宗平吐谷浑》中所载夏闰四月，吐谷浑可汗伏允悉烧野草，意使敌军马无草疲瘦等语，毛泽东则从物候学、植物学角度指出：“夏烧野草，随烧随长，况烧可尽乎广”对于《金主亮南侵》中提到的蒋州一址，毛泽东即以自己丰富的地理知识指出：

“蒋州即光州，即今河南光山县。”对于《明史·沈炼传》中提到的保安，毛泽东对之作作了细心区分，说“今有新保安，此是；旧保安，在张家口、怀来县之间。”对于《金主亮南侵》中有关南军装备的海鳅大船的记载，毛泽东从工艺学角度指出这是“从黄河（潼关至葭县）船式学来的。”他还从《新唐书·康承训传》中注意到了“徐州兵七百戍桂林，六岁不得代”的史实，从《吴书·骆统传》中看出了当时曾使用过“买壮丁”的扩军办法。对于历史上农民起义者下落的问题毛泽东更是予以关注。在读《明史纪事本末·平河北盗》时，相对书中记述湖广官军“追杀遂等于应山井子铺、随州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78、161、106、141、163、270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78、161、106、141、163、270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78、161、106、141、163、270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54、28、305、317、286、316、244、160、334、347、309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54、28、305、317、286、316、244、160、334、347、309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54、28、305、317、286、316、244、160、334、347、309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54、28、305、317、286、316、244、160、334、347、309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54、28、305、317、286、316、244、160、334、347、309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54、28、305、317、286、316、244、160、334、347、309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54、28、305、317、286、316、244、160、334、347、309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54、28、305、317、286、316、244、160、334、347、309 页。

蓬龛山等处”，“刘七势迫，遂赴水死”等语，他这样批写道：“吾疑赵凤子、刘七远走，并未死也。‘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倚栏杆看落晖’，得毋像黄巢吗？”此外，毛泽东对军队的素质和技能也较关注。如他多次提到，“水军应学游泳。”

从这些批语来看，毛泽东更是一位深明军机哲理的大家，他深知用兵贵审时度势，把握战机。在读《后唐灭梁》时，对于后唐帝李存勖力排手下诸将的约和退兵之议，而决心进攻梁军而致胜的史实，他如此评论道：“已成摧朽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11〕}本着一切从战局具体实际出发的原则，毛泽东反对一切军事教条主义，故他一般认为“书不足信”，“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

四、品诗论文，尽披文采风骚

毛泽东不仅熟谙史学，而且精通诗文。批语集中对文学典籍的批语，淋漓尽致地表明毛泽东具有极深厚的文学素养和诗歌才华。毛泽东善以自己独特的感觉去揣摩作品，或欣赏、或品味、或解释、或评论、或研习、或考据。如鱼在渊、自由自在；似出神入化，尽得风流。每读美文佳章，毛泽东总兴会之至，赞誉不迭；

而对于浮文劣作，则殊厌之。如对于李白的《将进酒》，毛泽东赞曰：“好诗”。对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川》、韦应物的《淮上喜会梁州故人》及孟浩然的《早寒有怀》等，毛泽东分别评为“好”或“略好”。而对于《古文辞类纂·唐论》中的某些文字，毛泽东则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文什么也没有说”。对于《谏论》（下），毛泽东批评它“空话连篇”。毛泽东认为《闰智部·贤哲》中的评语是“废话”，《明人百家小说》中某些话更是“劣语。”

毛泽东读文重文辞，更重思想内容。对于《新唐书·马周传》中所载的马周上疏，毛泽东誉之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同时批评“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毛泽东读书的另一特点是细致，惯于反复品味。例如，他对清代孙髯为昆明池大观楼所作的长联就曾反复品评，研读过几种文本。在《楹联丛话》中读到此联时，毛泽东赞其“从古未有，别具一格”，认为《楹联丛话》作者对其“究未免冗长之讥也”的评价“不确”，还细心指出其中言“一楹贴多至一百七十余言”是“一百八十字”之误。对于《楹联丛话》中所录阮元对此联的改笔，毛泽东斥之为“死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54、28、305、317、286、316、244、160、334、347、309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54、28、305、317、286、316、244、160、334、347、309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104、269、100、101、70、235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104、269、100、101、70、235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104、269、100、101、70、235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104、269、100、101、70、235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104、269、100、101、70、235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104、269、100、101、70、235 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104、269、100、101、70、235 页。

对，点金成铁”。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再次读到这副被改写过的楹联时，毛泽东悉心指出，“此阮元改笔，非尽原文。”

毛泽东善于把作品还原于作者创作时的最初情景中去体味其内容，并从中揣摩作者的创作心态，读出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特殊信息。关于《古诗源》所录的谢灵运的《登池上楼》，毛泽东这样分析道：“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

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

是造反的檄文。”对于罗隐的《偶题》，毛泽东认为它是罗隐“十上不中第”的诉衷之作。从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毛泽东看出了“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谓“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毛泽东认为纳兰性德的《江城子·咏史》是“巫嵩之类”，《蝶恋花·出塞》是“看出兴亡”，《菩萨蛮》（四首）和《临江仙·寒柳》是“悼亡”，《清平乐》则是“赠女友”。在读《聊斋志异》时，毛泽东从《马实甫》中看出的是“个性斗争”的突出典型；从《白莲教》中看出“作者的封建主义，然亦对农民有些同情”的立场，《小谢》则“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主张：《细侯》里的有关内容如“纳太平之税有余”则有“资本主义萌芽。”

作为喜爱古典诗文的人，毛泽东当然也同样喜爱那些为中国诗歌和文学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在读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时，毛泽东对王勃赞誉备至，称王勃“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并谓“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王勃“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英俊天才。”

由于自己能诗善赋，又博学强记，通晓中国文学、诗同的发展历史，故毛泽东对历史上的诗风词派有颇高的鉴赏能力。1957年，在读范仲淹词二首时，他曾为此写下了一条不可多得的较长批语：“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人的心情是复杂的，虽有所偏袒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18、113、3、17、21、33—35、78—85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18、113、3、17、21、33—35、78—85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18、113、3、17、21、33—35、78—85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18、113、3、17、21、33—35、78—85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18、113、3、17、21、33—35、78—85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18、113、3、17、21、33—35、78—85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9—11、27、28页。

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这段批语既有客观评价，也道出了主观感受上的相通之处。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的一些作品如《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答友人》等作品也同样有婉约之中见豪迈的风格。

五、言为心声，批语集是毛泽东思绪的凝结，也是他心境的袒露

作为本世纪的伟人，时代使毛泽东成就为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诗人、大书法家，如果不是长期紧张的军旅生涯和繁忙的政务工作，毛泽东也定可以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史学家、大文学家或大教育家。毛泽东文史知识之渊博，凡是接触过他的人或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会有强烈的感受。过人的才思，敏锐的洞察力，雄辩的口才和幽默的谈吐，使毛泽东在各种场合都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周围的人，而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在演讲或谈话时，为着说明或论证自己的观点，毛泽东或乘兴吟诵古人的佳作妙章以作衬喻，或似乎漫不经心而又恰到好处地提到别人所不熟悉的历史掌故和人物来将古托今。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所留下的丰富多采的文字，其内容已远远超出文史范围之外。除对历史人物、政治、军事、诗文等的关注外，毛泽东还留心到许多其他问题如经济、教育、文化、伦理、哲学等等。例如，毛泽东在读《新唐书·刘晏传》时，注意到刘晏的“平准法”是古代“国营商业”；在读《智囊》的《胆智部·识断》时，他针对书中“以麦饭以进”一语，断定“广西早已植麦”，推及历史上农作物栽培地区的分布；在读《技智部·敏悟》时，他注意到书中所言的“造桥柱新法”，这表明他心系社会经济建设之事。在读《绘图增像西游记》有关章节时，他把三藏评猪八戒“只因他做得，所以吃得”等话引申为“只因做得多，所以分配应当多，多劳应多得。反过来，只因吃得多，所以才有可能做得多”，并将其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联系起来：“生产转化、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同时，他还本着自己的伦理观批判了唐僧的“乡愿思想”；“千里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并赞扬与此相反的孙悟空的思想（以及作者吴承恩的思想）：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

毛泽东对古代思想流派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见解，在批语集中也时有表露。例如，他针对《智囊》作者谓于贡“直是纵横之祖，全不似圣贤门风”的评语，以否定的语气这样批写道：“什么圣贤门风，儒术伪耳。孟柯、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在读《读通鉴论》时，毛泽东更是表露出对于佛老与申韩思想派脉联系紧密的看法：“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而“申韩未必皆贼杀，如曹操、刘备、诸葛。”他还这样指出：“儒俗者万千，而贤者不一，不如过去法家之犹讲一些真话。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9—11、27、28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7、59，63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73、74、65、343、344、225、107、62、248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73、74、65、343、344、225、107、62、248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73、74、65、343、344、225、107、62、248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73、74、65、343、344、225、107、62、248页。

对于古代教育制度，毛泽东也考略在心。在读《旧唐书·韦嗣立传》时，毛泽东注意到当时的学制是“小学七年，大学包括中学在内。”从苏子瞻《徐州上皇帝书》中，他看出上书中所言“以诗赋取士”或“以经术用人”都是“以文词进耳”，故宜“别开仕进之门”等语是“言科举无用”。他赞同《智囊》中有关“用人不可以资格限”的评语，强调“小知识分子有用。”他还注意到“大历十才子”中“只有钱起为进士。”所有这些，都是与毛泽东的教育观紧密相联的：毛泽东历来认为，书读多了无用，学历高不一定才智高。

作为大思想家，毛泽东对古籍中富有哲理性的文字甚有兴趣。在读到魏文侯使西门豹往治邺的告语：“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下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辩之”等等时，毛泽东认为“此有唯物论思想”。在读《资治通鉴》时，针对书中言“天下善人少，恶人多”等语，毛泽东批评道：“此古人一贯谬论”。毛泽东还注意到了历代王朝兴亡的周期率形成的原因：权势重必至骄、至罪、至亡。英雄人物的作用与社会发展的“时”“运”不可相背：“时来大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遍览毛泽东留下的内涵丰富的批语，不难看出这位大政治家首先是一位具有大学者风度的学识渊博的思想家。考究《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的文字，则可以了解一位大政治家曾怎样论文读史。一方面，毛泽东在理解历史、研读历史文化典籍，神游于史河文海时，他的思想意识在跟随着文史典籍行走，他与古人对话，为历史兴亡而悲欢。另一方面，毛泽东从古籍中鉴取为现实所能用的历史经验，同时又把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广袤的见识投射到作品中去，在与古人的思想对流中将自己相机而发的议论留录在书页上，这使我们能以得知毛泽东，尤其是老年毛泽东想要从历史文化典籍中寻找些什么，其内心深处在关注、在思虑些什么。保罗·利科尔指出：“本文是我们通过它来理解我们自己的中介”，“我们只有通过积淀在文化作品中的人文标记的漫长弯路才能认识我们自己”。“理解就是在本文前面理解自我。它不是一个把我们有限的理解能力强加给本文的问题，而是一个把我们自己暴露在本文之上并从它那里得到一个放大的自我。”这从解释学的一个侧面揭示了本文即作品与读者的关系。确实，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时留下的批语，是他心灵的一种自我展示，这些批语犹如一扇洞开的窗户，使我们能窥见毛泽东的某种心境。不仅如此，毛泽东所爱读的古籍本身也同样是毛泽东心灵展示的一种借助物。凭藉艰难卓绝的武装斗争而取得伟大中国革命的成功感，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又使中国陷入一场长时间动乱而难于收拾的遗憾，这种复杂心情难道不正可以借助一些作品来展示吗？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际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年功，费尽移心心力。尽珠帘画栋，卷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73、74、65、343、344、225、107、62、248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73、74、65、343、344、225、107、62、248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73、74、65、343、344、225、107、62、248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73、74、65、343、344、225、107、62、248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49、293、185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49、293、185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49、293、185页。

保罗·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杆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清代孙髯为昆明大观楼所撰的这副长联的下联，也许正好切合毛泽东晚年的英雄孤独心境。

十三 鼓舞革命教育人民暴露黑暗打击敌人——《毛泽东论文艺》览要

革命家毛泽东有自己自成体系的文艺思想。这种自成体系的文艺思想之形成的直接动力是革命需要文艺为自己服务，需要革命的文艺宣传革命、歌颂革命，鼓舞革命，教育人民，暴露黑暗，打击敌人。当然，这种自成体系的文艺思想的形成亦直接取决于毛泽东本人是一个大文豪、大诗人，他有着丰富的写作经验，尤能诗善赋；熟谙为文之道。199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论文艺》（第3版）加以增订，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核批准，重新出版，这为人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提供了文献专集。这个增订本共收入自1936年11月至1976年2月的文献65篇，分编为两辑。第1辑选编的是毛泽东有关文艺工作的论述、讲演、批示、电报、题词，共31篇；第2辑选编的是毛泽东给文艺界人士和关于文艺问题及其他问题的书信，共34封。这65篇文献中，选自《毛泽东选集》（包括节选），《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有12篇（分别为6篇、2篇、4篇），选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的有28篇。增订版虽然删除了前版中几篇论述文化、理论工作的文献，但仍保留了不少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文献，如《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要使人民离开愚昧状态》、《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等。另外，《片面性问题》、《“放”还是“收”？》、《关于纠正对待知识分子宁“左”勿右》等文献在整体上都不是论述文艺问题，充其量只有个别句段的涉及。尽管增订本存在有关文献的取舍上仍可以精益求精，但它不失为一个较完整的版本，这给人们提供了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发展的方便。在对这个增订本作研究时，本章拟先对它从整体上加以考察，然后再重点介绍有关论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献。

一

《毛泽东论文艺》一书中，系统地论述文艺理论的文献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篇，其余文献对文艺的涉及都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不完全的，但这些文献却有其自身的价值，它们不仅展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也含藏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不具有的较丰富的若干文艺观点。只有尽量去挖掘和把握这些观点，才有可能全面把握和理解毛泽东的文艺理论。

从《毛泽东论文艺》第1辑文献的内容看，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外，主要有如下方面的一些观点：

（1）革命者应“文武双全”，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解放的过程中，要“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要组织好文艺工作，有专门计划，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的

前两版的出版时间分别是1958年和1964年。

鉴于此，本章对上述文献的内容一般不从整体上涉及，因为文化与文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据毛泽东的定义，文化是指“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而文艺则是指文学、戏剧、舞蹈、电影、小说、诗歌、音乐、绘画、美术，等等。所以，将二者区别开来作研究可不致发生混乱。

团结抗日”。

(2) 给鲁迅以极高评价，指出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鲁迅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鲁迅在中国的价值，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因此，要学习鲁迅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3) 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亭子间的人”和“山顶上的人”都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亭子间的人不要自以为“老于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不要摆老粗架子，不要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

(4) 大众文艺不应离开三亿六千万农民，否则大半成了空话。

(5) 人民革命的胜利、人民政权的建立是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的基础，也为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应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

(6) 文艺创作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应当“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应当歌颂“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反对“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应当有更好的作品出世。

(7)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中国的艺术有独特之处，但某些方面外国比我们高明。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但学习要反对教条主义，艺术上“金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总之，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入，向外国入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文艺的发展应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

(8) 百花齐放是促进艺术发展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

《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4、7—10、11、77 页。下引此书均此版，不再注明。

《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4、7—10、11、77 页。下引此书均此版，不再注明。

《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4、7—10、11、77 页。下引此书均此版，不再注明。

《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4、7—10、11、77 页。下引此书均此版，不再注明。

《毛泽东论文艺》第 82、14、86、87、90—98、119、101—107、122 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 82、14、86、87、90—98、119、101—107、122 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 82、14、86、87、90—98、119、101—107、122 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 82、14、86、87、90—98、119、101—107、122 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 82、14、86、87、90—98、119、101—107、122 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 82、14、86、87、90—98、119、101—107、122 页。

由发展，不可利用行政力量去推行禁止。艺术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的实践去解决。鉴别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固然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六条政治标准对它也是适用的。这六条政治标准是：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

(9) 对文艺作品“不要求全责备”，否则“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此外，第1辑中还指出历史上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作品是“民主文学”，古代的一些神话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入的故事等等，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虽然因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殒力’，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

《毛泽东论文艺》第2辑选录的34封书信，多是毛泽东与文艺界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党内同志交往和联系时留下的，这些书信反映了毛泽东对文艺事业的积极领导和对文艺界人士的关心。从内容类别上看，这些书信大致反映这么几个方面：

(1) 与文艺界人士诚恳交往，关心其身体、工作和思想动态。例如毛泽东在致萧军的信(1941.8.2)中，以朋友式的语气帮助萧军改正缺点，他劝导萧军“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他表示，还愿意与萧军谈一回心，在致萧军的另一信(1941.8.13)和致欧阳山的信(1942.4.9)中，毛泽东都是以朋友式的身份与他们交谈，邀请他们“惠临一叙”。在致沈雁冰的信(1944.11.21)中，毛泽东特意问道：“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1939年6月，当得知诗人朋友萧三要用马时，毛泽东即致信说：“如你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马给你用一下。”对于文艺界、文化界的一些名人，毛泽东与之交往时更是虚怀以待。例如，在1937年收到何香凝的书画礼物时，毛泽东即致信答谢，信中称道，“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在1944、1945、1946年分别致柳亚子的三封信中，毛泽东更是与之推心置腹的交谈，他在1944年的信中称赞柳亚子自广州别后没有被灾难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问及柳“精神还好罢，没

《毛泽东论文艺》第82、14、86、87、90—98、119、101—107、122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82、14、86、87、90—98、119、101—107、122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116、5、132、133、134、153、128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116、5、132、133、134、153、128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116、5、132、133、134、153、128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116、5、132、133、134、153、128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116、5、132、133、134、153、128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116、5、132、133、134、153、128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125、152、156、158、128、130、130、138页。

有病罢？”并为自己收到柳诗后无有回赠表示歉意。在1945年的信中，毛泽东不仅与柳亚子议论时局，亦品评柳氏的诗作。他说：“先生诗慨当以慷，卑机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在1946年的信中，毛泽东告之柳亚子在得到柳的印章、和词之后，同样是“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

（2）对文艺工作者的工作成绩时时予以鼓励，对其作品加以公正评论。例如，毛泽东在读了萧三的一本诗稿后，致信萧三（1939.6. 17）说：“大作读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盼望你更多作些。”在读到萧三的另一首诗时，亦称“很有意思”，还说：“报纸既不登，就在街头发表好了。”对其他一些文艺工作者的工作，毛泽东总是鼓励有加。例如对当时任延安大众读物社社长的周文，毛泽东在读了群众报及《大众习作》之后，便写信鼓励说：“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对罗烽发表在1941年7月1日延安《文艺月报》上的《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一文，毛泽东说“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同时又指出罗烽其他的文章有些论点似乎有毛病，建议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以对于他的前进有益。在看了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的平剧《逼上梁山》后，毛泽东即致信编导者杨绍壹、齐燕铭，鼓励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并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大大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还说他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希望能将这种风气“推向全国去。”对于当时一些有影响的作品，毛泽东更予以认真的评价。如对郭沫若的历史话剧《虎符》，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甚为推重，他在致郭沫若信（1944.11.21）时说，延安把《甲申三百年祭》是“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并称赞郭沫若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对于李健侯的《永昌演义》，毛泽东则认为“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毛泽东还委婉提出，“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

（3）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例如，在读了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编者序言后，毛泽东便致信周扬说：“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

《毛泽东论文艺》第125、152、156、158、128、130、130、138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125、152、156、158、128、130、130、138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125、152、156、158、128、130、130、138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125、152、156、158、128、130、130、138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125、152、156、158、128、130、130、138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125、152、156、158、128、130、130、138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125、152、156、158、128、130、130、138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142、150、146.144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142、150、146.144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142、150、146.144页。

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鉴于《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毛泽东以谦虚的态度向周扬提出：“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信中还就对列宁思想的准确理解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提议将有关内容“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对于艾青的《秧歌剧的形式》一文，毛泽东读后即致信（1944.5.27）秘书胡乔木，认为“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

除以上三方面的内容外，第2辑中还有一些书信反映的是毛泽东的文艺实践活动以及对诗词创作规律的揭示。例如，致臧克家等人的信（1957.1.12）记载了毛泽东将自己的18首旧体诗寄给《诗刊》发表，同时也表明了他不愿发表旧体诗怕“贻误青年”的顾虑。致周恩来的信（1959.4.24）是毛泽东建议调郑州戏班来京为人大代表表演《破洪州》，他认为这个改造过的戏颇好。致毛岸英（1947.9.12）是毛泽东得知儿子想看中国历史小说时，向儿子推荐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致刘少奇（1958.2.10）是毛泽东专就《全唐诗话》所载贺知章《回乡偶书》中的诗句“儿童相见不相识”作考证，毛泽东认为诗中“儿童”不是指贺“自己的儿女”，并推论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致刘大杰（1976.2.12）是毛泽东对历史人物韩愈的评价，他同意刘大杰对韩愈的意见：韩愈虽非法家，但也不是醇儒。致陈毅（1965.7.21）则反映了毛泽东的诗歌活动。他不仅为陈毅致诗，还阐明了为诗方法：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毛泽东还说，要作今诗，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二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与成熟和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与成熟差不多是同步的，它成熟的标志是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毛泽东文艺思想成熟于40年代初期客观上取决于两方面的条件：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这一时期已经传到中国，传到延安，毛泽东对之有较为全面的研究和掌握。二，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有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从事革命文艺的创作和宣传，取得了较大成绩，大大促进了党的革命文艺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文艺工作的实践经验。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运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并对这种革命文艺工作加以全面总结，便产生了标志毛泽东文艺思想成熟的经典性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包括引言和结论两个部分，引言是提出问题，结论是讲话的主体。在引言中，毛泽东提出了邀集文艺工作者开座谈会的目的：“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

《毛泽东论文艺》第142、150、146.144页。

《毛泽东论文艺》第148、170页。

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道路。”他指出，在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文武两个战线，即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要战胜敌人，仅有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自“五四”以后，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要把中国革命向前推进，就要使文武两个战线结合起来，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就需要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文艺工作者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去暴露敌人，歌颂人民，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的残暴和欺骗，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赞扬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人民的劳动和斗争。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对象是广大工农兵及其干部，这需要熟悉他们，和工农兵大众打成一片，懂得他们的语言，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文艺工作者还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它们的相互关系、各自状况及心理，这样，革命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在结论中，毛泽东主要讲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去服务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及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批评及其标准问题，文艺界的整风问题，从而阐发了自己丰富的文艺思想。

关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首先引用列宁的话说，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它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大众。而人民大众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总之，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对于文艺如何去服务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这其中主要是解决好提高和普及的问题。这只能从工农兵出发，为工农兵普及，为工农兵提高。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都来源于人民生活，这种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古代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也是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对一切优秀文学艺术遗产必须继承和借鉴，但决不可以替代自己的创造，尤其不可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搞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因此，有出息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文艺工作者创作的文艺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带普遍性。革命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要完成这个任务，具体要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比较难予在群众中迅速传开。和敌人作残酷斗争、不识字、无

文化的工农兵，目前迫切要求的是启蒙运动，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以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与敌斗争的胜利信心，他们第一步需要的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但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提高的，因此文艺应不断发展和提高，从初级文艺基础上发展起高级文艺。不过无论是高级的或初级的文艺，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也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

对于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以及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认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由于文艺服从于政治，党的文艺工作者就应该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在抗日、民主、艺术方法和艺术作风这三点上团结起来，结成一个统一战线。

对于文艺批评和批评的标准，毛泽东指出，文艺批评是推动文艺进步的方法之一，文艺批评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反之便都是坏的。这里有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按照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也同样要看社会效果。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作品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成为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是完全必要的。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不是等同的，应该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当然文艺作品应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要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从文艺批评的标准出发，毛泽东澄清了一些糊涂观念，如人性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的问题，毛泽东认为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的人性，没有超阶级的人性。自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统一的人类之爱，真正的人类之爱只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又如写光明与黑暗、暴露和“鲁迅笔法”问题，毛泽东认为文艺作品并不都是写光明与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是以写光明为主，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颠倒光明和黑暗。因此，革命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而不是人民大众，对于人民自己不能用“鲁迅笔法”加以嘲笑和攻击。对于人民的缺点需要批评，但必须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而不乱用讽刺。再如歌功颂德，好心与结果、要不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文艺家歌颂资产阶级而不歌颂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文艺家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而下歌颂资产阶级；文艺家的真正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妨害创作情绪，而只会破坏种种非人民大众的创作情绪。

毛泽东最后还指出，延安文艺界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尤其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同志很有必要开展思想斗争，使整个队伍在思想上、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文艺工作者在整风及以后的工作中，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总的来看，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文艺的性质、作用，文艺的源泉，文艺工作者的立场和文艺的服务对象，文艺的评价标准等问题作了全面说明，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成熟。

十四 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毛泽东诗词选》览要

当代伟人毛泽东有两件至宝：一是马，一是诗。马得之于外，诗言之于心。他骑马长驱远征了二万五千里，从罗霄山脉转战到长城脚下，在马背上度过了成年后三分之一的生命。多年的戎马生涯给了他世之罕见的考验，也给了他与天、与地、与人奋斗的无穷乐趣。撇开二十二年的戎马生涯来谈论毛泽东，就会使毛泽东黯然失色，就会使他用历史巨笔绘成的整个中国革命画面顿失辉煌、无斑无斓。马背上的生活不仅丰富了毛泽东的人生，更能使他的思绪骏马般的飞腾驰骋。这飞扬的思绪在升华中便凝结成诗。毛泽东常常在马背上吟诗。这些马背上吟成的诗大多美妙绝伦。

假如说，时代没有将毛泽东塑就成一位世之空前的大革命家，也许，他仅会成为中国不可多得的（古体）诗词大家？然而假设不是现实。孰重孰轻的议辨在这里似乎并无多大实质性意义。且不妨这样说，毛泽东既是大政治家，又是大诗人。他的政治杰作，即他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就是一首传奇般史诗的物态化；而他的诗，则很少不渗透社会政治意识。怪不得有人说，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是政治家诗人。如若要细细的考察，毛泽东从事诗词活动的时间要比从事政治活动的时间更长久。也许，他在诗坛上如果不比在政坛上更得心应手的话，至少在技艺上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政治塑造了一个革命家的毛泽东一样，诗塑造了另一个风骚独著的毛泽东。

毛泽东离不开诗。

只要一踏入诗的领域，就像鱼儿来到水中，毛泽东便又临驾于自己另一块美妙奇幻的天地。这位生就诗人气质、秉具诗人天赋的政治奇才在这天地中一切是那么潇洒自如。莫许，他首先是通过诗国之路踏进人生的？还是在故乡韶山南岸私塾读书时，年少的毛泽东因有违塾规被塾师罚以吟诗“天井”。这位顽童气满身的小诗入围着天井转了两圈，便如此这般赞了开来：“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围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这首朴实无华的赞井诗蕴含特别的内容。它既是对束缚学子全面发展的旧学的一种鞭笞，更展示了这位少年诗人意欲远游水深浪阔的江湖河海的鲲鹏志。此诗的即席赋出，使这位抱负宏远的少年诗人初露才华。

自幼喜赋、善赋，以致后来发展到，赋诗成了毛泽东的生活方式中一个不可割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或成为毛泽东的生存方式之一，恰如山呼海啸、鹤鸣虎吼是自然类和动物类的存在表现方式一样。诗本能的冲动，战斗激情的激发，兴之所会，神之所到，毛泽东便要赋诗而不能自己。悲不赋诗，不足以表现悲；怒不赋诗，不足以表现怒；喜不赋诗，不足以表现喜；功不赋诗，不足以表现功。诗之如气，蒸郁在胸，不吐不快。不赋诗，毛泽东的生活便会显得平淡无味；下赋诗，他便难以志念那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的九死一生的战斗；不赋诗，一大计的定夺、一战略的部署、一决策的作出都似乎不那么信然自得。凡悲愤交加之时，毛泽东便有出色的诗章。《菩萨蛮·黄鹤楼》等这些荡气回肠的诗作，便从悲愤中出。凡与敌格斗、奋不顾身之时，毛泽东便有出色的诗章。《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忆秦娥·娄山关》等这些纪录征战的诗作，便从鏖战正酣中出。凡情绪压抑、意志难伸之时，毛

参见董志英编：《毛泽东轶事》，昆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7 页。

泽东便有出色的诗章。《清平乐·会昌》、《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这些借物言志、或直抒意气的诗作，便是高压环境中不舒之心气的泄漏。凡在生死攸关的重大战略决策关头，心潮翻卷之时，毛泽东便有出色的诗章，《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等这些大气磅礴的诗作，便是决策前夕心态的袒露。凡置身山水、忘情天地、兴物写心之时，毛泽东便有出色的诗章。

《沁园春·长沙》《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水调歌头·游泳》、《七律·登庐山》等这些心雄万夫、气势汪洋的诗作，其夺人意气便来自那孕育出伟大中国文化及盖世英才的天地山水间。凡情深意绵、伤感痛楚、或与友纵情遣兴之时，毛泽东便有出色的诗章。《七古·送纵字一郎东行》、《贺新郎》（1923年）《七律·和周世钊同志》、《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答友人》、《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等传情之作，便在离愁别恨、久别重逢或其乐陶陶中出。凡在享受胜利喜悦、踌躇满志之时，毛泽东便有出色的诗章。《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七律·送瘟神》等这些凯歌胜曲，便发自由衷喜悦的心境。总之，诗人的或喜或怒或悲或怅或乐或欢或庆，全系于心与情，心奋情激便有诗。毛泽东作为伟人，不仅胸隔如岸，更有激情似海。他那如海之翻卷的奔腾思绪，超出世外的奇特想象，合之以吞吐天地日月的恢宏意象，所赋出的许多诗章，莫不神工鬼匠。再配之以龙飞凤舞的手书，这些诗作更具诱人的魅力。它把阅读欣赏者带进一个不胜其美的审美境界，使之会形成这样一种朦胧的感觉：每读一首佳作，似乎是在醉迷于一首惊世名曲，在悦目于一幅绝世名画，或在省悟一个深邃的人生哲理。

毛泽东留下的绝世之作使他在同代诗人中独领风骚。也许，毛泽东在诗词领域的成功，如果不比在军事及政治领域的成功更加令人观止的话，那也至少可以等量齐观。诗词大家柳亚子曾以诗赞毛泽东“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著名作家徐迟则称“诗从毛主席，文崇马克思”。一代诗豪郭沫若，虽“有点目空一切”，但对毛泽东的诗词却“五体投地”，佩服之至。性情豪爽、犹喜赋诗的陈毅元帅，更是以“诗词大国推盟主”的句章来认定毛泽东作为诗空巨星的地位。

毛泽东之成为诗词大家，除其天赋之外，最主要的，他首先是一个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和大思想家。他生活在一个东方大国，而这个大国又正处在苍黄翻覆的变革时代。如火如荼的社会革命斗争实践给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第一推动力。经共产党广泛组织和直接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国革命传奇般的经历，革命胜利后的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和建设活动的各个气势非凡的场面，通过这位伟人的奇妙构思，便化成为一首首壮丽豪迈、气魄宏大的诗篇，并染上诗人爱惜分明的真挚的感情色调，烙上坚如磐石般的意志的深深印痕。毛泽东诗词风格的豪迈和气魄的宏大与中国山河的壮丽、中国国土的辽阔有着某种一致性。如果中国地不过百里，没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中国没有地球上最高的山脉，没有地球上少有的大河或浩瀚的海洋，或者毛泽东的生活足迹没有踏遍北国南疆的丰富的广泛性，那么他的诗的气魄或许要小得多，其内容或许将会远为逊色。如果毛泽东不是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身份出现，不处之于中国社会政治旋流的中心，他的诗就不会如此令人惊心动魄，激人意气，而充其量只像那闲吟风花雪月、山川云树、胭脂黛眉、卿卿我我之类的古代言情诗、婉约

缠绵、愁山泣水。正是置身在震撼世界的现代中国革命巨变中，在为着夺取这个革命胜利的频年苦斗中，毛泽东用诗家的慧眼细致入微地去观察沸腾如蒸的生活，并用诗的色彩去涂写自己丰富的阅历和体验之路。是伟大的中国革命运动造就了大诗人毛泽东。

—

然而，仅仅注意到革命实践的现实一面，不了解中国是一个富具诗歌传统，诗歌与社会生活有举足轻重影响的诗词大国，就不能了解毛泽东作为诗词大家，在古典诗词形式濒于没落、新诗渐起的时代所赢得的历史上无人比肩的成就。中国作为诗国，其诗词数量恐怕堪称世界之“最”。往古来今，多少墨客骚人留下了多少脍炙人口的诗篇。正是这无以复计的诗歌，使中国成为诗的国度，并形成源远流长的诗文化。而这种诗文化又代复一代地养育出无数的诗词大家。自 2500 年前周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诞生，标志中国的诗歌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自那以后，中国的诗歌在漫长的发展和演化中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形式。先秦的四言，汉魏的五言、七言，唐的格律诗，宋的长短句，元的散曲。色彩缤纷，各得其妙。这些古代诗词，内容包罗万象，或写乱世风云，或歌盛世太平，或赞文治之效，或颂武功之赫，或叹劳动艰辛，或间民间疾苦，或扬民族正气，或哭祸国之害。总之，日月之德，帝王之居，山川之气，草木之春，飞禽走兽之态，金戈铁马之壮，才子佳人之美，无所不歌，无所不咏。在这样一个诗气醇郁的国度中成长的毛泽东，身上不能不载负着诗的遗传密码，披袭着古典诗风。仅就形式来说，周秦的四言，汉魏的五言、七言古风，唐代的格律诗，宋代的词，诸如此类的格调都可以从毛泽东的诗集中见到。这位诗人直接运用历时数千载发展起来的诗律词谱赋诗填词，并把中国这种古老的、广为人们青睐的、富有生命力的诗歌形式赋予崭新的现实内容时，便不知不觉地使自己跻身于古体诗词名家的行列。可以说，如果中国不是一个诗词大国，没有源远流长的诗歌历史，也许就没有大诗人毛泽东。纵观中国文学艺术的历史脉络，毛泽东的诗词，不过是这一无涯的诗文化山带中于后崛起的一座高耸的峻峰而已。

二

《诗经》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本只称《诗》，因儒家列为经典之一，故称《诗经》。《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共 305 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有十五国国风，《雅》有《大雅》、《小雅》，《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产生于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及湖北等地。诗的形式以四言为主，运用赋、比、兴手法，其优秀篇章，描写生动，语言朴素优美，音节自然和谐，富有艺术感染力。《诗经》长期以来受到很高的评价，它对中国二千多年来的文学发展有着深广的影响。

说这一诗歌文化山带无涯，是因为它将延伸何方还不得而知，尽管目前它已明显崩落。毛泽东自己亦认为旧体诗束缚人的思想，尤其不提倡青年们去学写。但他又宣称旧体诗词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它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情性和风尚。（参见董志英编：《毛泽东铁事》，昆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1 页。）

诗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的精神生活，构成毛泽东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更是毛泽东的一种有力斗争武器。1945 年秋，毛泽东在赴重庆与蒋介石和谈期间，遗赠旧识柳亚子的“一阕新词”《沁园春·雪》公布以后，顿时轰动整个山城，使众士归心。一时间，渝州骚人名流，纷纷步韵唱和咏雪词，成为时髦。甚至“沁园春”词牌也有口皆碑，连一些酒店门口也挂出“沁园人”招牌，内壁上更书有“沁园春”百阕。人称《沁园春·雪》“睥睨六合，气雄千古”、“风调独绝”。仅此一词，不仅改变了毛泽东本人在中国士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更是改变了蒋介石在士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相比之下，满身戎装、窃得中国统治大权的蒋介石酷似那“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赳赳武夫，而衣著随便的毛泽东已不复是一农民造反领袖，而是有“魏征之才”的大政治家。这正是所谓“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当新时代的士人——现代知识分子为毛泽东“睥睨六合，气雄千古”的“新词”所倾倒，争相握笔唱和时，这种独特的中国文人式的思想对话已下自觉地流露出他们的政治选择意向和价值取向。毛泽东以自己诗词的艺术魅力，撼动了知识分子们的心，使其心理天平朝自己的一方倾斜，从此奠定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选择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心理基础。

毛泽东的诗不仅被直接地用来作为斗争武器，而且也间接地鼓舞着人们的斗志。相传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某纵队一部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作战，最后剩下的几名战士在准备与敌同归于尽前，打开收音机想听听党中央的声音，恰好此时陕北电台正在播放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当那豪迈的词章通过播音员充满激情的声音传入耳中，战士们无形中仿佛被注入了一股不可摧毁的强大精神力量。他们顿感信心百倍，终于勇猛无畏地胜利突破敌人的包围圈。诗在这里成了一种鼓舞人心的克敌制胜的有效精神武器。

毛泽东的诗词不仅有着一种潜在的精神威慑力量，还是一座最径直的文化沟通桥梁，他的诗词的艺术语言似乎能使不同思想意识之间的分界和对立变得不那么鲜明，像一条色彩斑斓的纽带维系着不同社会制度下和不同政治立场上的人们。与中国对立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后，美国当任总统尼克松 1972 年早春来访北京。在周恩来总理为欢迎美国客人所设的国宴上，尼克松总统在致答词时，申言要与中国找到合作的共同点，以无限地增加争取世界和平的机会。当答词特地以毛泽东主席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词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作为结束之时，不仅缩短了中美两国政治家的感情距离，而且深深打动了在场人士和大洋彼岸的美国电视观众：尼克松总统居然可以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诗句来阐述美国外交政策！这于世界各地的电视观众来说，也确是闻所未闻。

三

作为革命领袖，毛泽东的诗歌题材尽管非常广泛，但中心却围绕着中国

《沁园春·雪》一词在重庆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还表现在，当时国民党当局的报刊在很短的时间内抛出了一批反动和词及文章，竭尽能事对其歪曲丑诋，大肆围攻，有人谓《沁园春·雪》是“封建余孽的抬头”、是“革命家”“透出些谋王图霸的初衷”；有人则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曲解为想当英王霸主”，狂妄叫嚷要共产党“把霸图收拾，应在今朝”。这种狂吠喧嚣，倒从反面印证了《沁园春·雪》一词本身的巨大精神威力。

革命和建设，而可歌可泣、艰难卓绝的中国革命和规模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潜在地或外在地决定了毛泽东诗词所特有的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的总体倾向是：悲壮、激越、奇伟、率性、乐观、慷慨，虽然忧患意味浓郁，但却更为“争雄势”。你看，“人有病，天知否”，“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这些悲壮之句，不足以夺人心魄么？“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些激越之句，不足以鼓动人心么？“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山，刺破青天锷未残”，“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这些刚烈、奇伟之句，不足以壮人胸怀么，“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头上高山，风展红旗过大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试看天地翻覆”，这些豪情横溢之句，不足以催人奋进么？“踏遍青山人未老”，“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这些涌动着乐观意向之句，不足以使人活力常驻么？“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这些慷慨抒意之句——它把诗人作为大革命家与世争雄的气度尽情拱出——难道不令人倾倒么？

毛泽东诗词悲壮、豪迈、奇伟的风格之基础是现实主义的，这种风格是如此鲜明、强烈，以致诗中的浪漫色调及婉约之风亦受其裹挟。尽管如此，毛泽东诗词中的浪漫主义色彩仍时时透现出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使毛泽东的诗作成为一个和谐的艺术整体。这美妙绝伦的诗词虽然是毛泽东那奇谲高古的诗之思维的直接产物，但又是他博取历代诗词名家之长，深受中国传统诗词艺术风格熏陶的结果。从历史继承性看，战国时屈原、魏时曹操、唐代李白、李贺、李商隐、宋代苏轼、辛弃疾、岳飞等等诗词大家的诗风，对毛泽东的影响似乎尤其深刻。“九疑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从中依稀可窥见屈原《九歌·湘夫人》的潜影。“间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莫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从中略能闻出李白的仙气，李贺、李商隐的鬼风。“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从这凝结着现代地学、天文学知识的诗句中，不难体味到辛弃疾为诗时那种丰富的想象力。

但是，毛泽东诗词中与传统诗风有一定联系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并不改变其现实描写的主流。也许正是具有某种浪漫色调的对衬，才使他的诗词更具现实感，更显出艺术的真实。你看，轻飏直上重霄九的杨柳忠魂，在“忽

《湘夫人》以湘君思念湘夫人的口气写成。其开首这样写道：“帝子降兮北清，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辛弃疾的《木兰花慢》的上阕是：“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荡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毛泽东在辛弃疾这首词的标题前连划了二个圈。1964年8月，他在与人谈哲学问题时，认为辛弃疾这首词和晋朝张华《励志诗》中的“太仪斡运，天回地游”都包含着地圆的意思。

报人间曾伏虎”的欢欣鼓舞的时刻“泪飞顿作倾盆雨”。六亿神州“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使长期为虐人间的“瘟神”无处藏身，逃之夭夭。“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这充满美丽幻想的诗句吟罢，接着便是以梦想“芙蓉国里尽朝晖”来表达对现实的美好追求。翻动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鲲鹏虽然背负着青天，但朝下看到的却是“人间城廓”。从“眼鹏展翅”的画面上更可看到一个搏击风云、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斗士形象的叠影。总之。

浪漫色彩点缀了毛泽东诗词的现实主义图画。

毛泽东的豪迈、雄奇的诗篇中，也可以找到凄凉婉约之句，虽然数量不多。“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凄苦难言，情意绵绵。“今朝霜重东问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悲悲切切，难离难别，无限怅恨。但这种婉约凄凉与豪壮雄浑亦是相反相成的：“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这样志与天齐的豪放词章与之相得益彰。毕竟是伟男胸怀，连青年时写苦恋愁绪用词亦是“江海翻波浪”，更不须说用“三千毛瑟精兵”去比喻“文小姐”手中的“纤笔一枝”，用“不爱红装爱武装”去歌颂新时代的女性了。可见，毛泽东诗词中的凄凉悲愤也显示出壮美的一面。

四

毛泽东的诗作，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的诗作，自成诗之日起，便广为流传。建国后，毛泽东每出一诗，国中莫不争相传诵，人们均以一读毛泽东的诗为快事。为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将毛泽东发表过的诗词结集，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1986年，在毛泽东逝世10周年纪念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选》。诗词选辑了毛泽东诗词50首，其中诗16首（包括古风、杂言），词34首。有42首编入正编，8首编入副编。尽管这本集子仍是一本选集，但它为人们欣赏毛泽东的诗词艺术提供了上好的原材料。作为历史的产物，一部毛泽东诗词，不仅堪称艺术珍品，不仅是毛泽东诗词艺术不断发展的原始纪录，也是一部记载半个多世纪中国革命历程的瑰丽史诗，是毛泽东的思想不断升华的一个历史侧面的映照。那醇郁的时代气息和满含战斗激情的诗章中，蕴藏着深刻的革命哲理和政治哲理。可以说，毛泽东的诗同时又是一部哲理诗。毛泽东借诗词艺术表露思想的才能是如此之高超，以致寥寥几句便可告诉你一个深刻的道理。或者，你从他那优美的诗句中可以窥知他探求社会人生哲理的心路历程。你想要了解“新民学会”时期的青年毛泽东的抱负吗？《七古·送纵字一郎东行》可以给你一把入门的钥匙；您想要了解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那一代职业革命家离乡背井、奔走四方之所求何在吗？《沁园春·长沙》会给你启迪；你想要了解以中国工农红军为砥柱的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起源吗？读读《西江月·秋收起义》你就会领略到其中的道理；你想要了解毛泽东的战争观吗？最好还是先去吟诵和品味《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你想要了解毛泽东对人民的敌人或社会公敌的态度吗？创览一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也就一目了然；你想要了解毛泽东对帝国主义或外国侵略势力的态度及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憧憬吗？最好是去细析《念奴娇·昆仑》；

你想要了解毛泽东的社会历史观吗？那就从头至尾背熟《贺新郎·读史》。毛泽东的众多诗词犹如一扇扇向你开着的通往他心灵深处的窗户，只要注意，就不难发现他内心的奥秘。有言道，诗如其人。从这众多的诗词中，确实可以看到毛泽东那卓尔不群的精神品格和独立特行的个性。

由于毛泽东诗词中的政治意识异常强烈，所以，如果要对毛泽东从事诗词创作活动和作品本身作分期研究的话，可以从毛泽东投身中国社会政治活动、革命活动的几个大的转折时期来作相应划分。当然，也可以按作者的自然年龄段即不同年龄期的作品来作相应划分。这两种划分基本上是重合的，即可以把毛泽东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诗词创作活动大体划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中期，后期。前期主要指作者在长沙求学的时期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时期；中期包括作者投身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和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建设的时期；后期则包括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

前期（1915—1920年），是作者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求学期间进行社会活动、毕业后从事革命活动的时期。当时他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仅选入作者的一首古风《七古·送纵字一郎东行》。从这首诗作中可以看到青年毛泽东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作为热血青年，这位未来的伟人此时比他人更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道德责任感，这种敦厚的感情通过作品较细腻的刻画而表露出来。

从思想倾向上看，新民学会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个果欲改造中国的心存鲲鹏之志的青年，表明他当时为他日一展鸿图而十分注重自身修养、求学储能的情怀。“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这些句子特别揭示他由于深受中国古文化熏陶而养成鄙视碌碌诸公的气度，有着斯人继大任、舍我其谁的勃勃雄心。从哲学上看，毛泽东此时还未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彻底转变。“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表明毛泽东此时还是一个唯我论者。“名世于今五百年”，则可看到孟子的唯心论在他身上的印痕。总的说来，这首诗提供了一个处于社会巨变时期忧国忧民、追求自身进步的青年学子的形象。

中期（1921—1956年），这一时期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它包括作者接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后，投身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依次经历的各个阶段：建党和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前后及建国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等阶段。这期间作者留有大量诗词作品，选集收录了31首。在这些诗作中，写与爱妻惜别，抒发革命豪情以示志在革命，或对革命前途和革命形势表示忧虑的3首。革命战争题材的最多，共19首。在革命战争时期寄情山水以抒怀的，或与战争题材有间接联系的7首。歌颂新生的社会制度和新中国建设的2首。

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留下的3首词，是作者无形中自我塑造了一尊职业革命家的雕像：作者与革命共生存，抱负恢宏。读罢《贺新郎》（1923年），令人宛如置身残月西流，横塘寒气、东门霜重的肃杀境地，那里，作者与刚

毛泽东当时在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书页上如此批注道：“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31页。）

生下第二个儿子不久的年青妻子依依惜别。妻子掩面而位，他不忍挥手离去。而作者之所以决然“挥手人兹去”，奔走他方，暂于家私不顾，为的是掀起“扫寅字”的“台风”，使全部现存社会“似昆仑崩绝壁”。词的最后短短六字构成这样一幅画：在某一天，日暖风清，比翼鸟展翅翱翔——那是一对革命夫妻的化身。《沁园春·长沙》向人展示的，是一个独立在红山碧江的壮美秋色中伟岸男子形象，他从内心深处发出与世争雄而呐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誓与社会恶势力——封建军阀努力宣战。《菩萨蛮·黄鹤楼》则表露了作者为当时形势忧心如焚，使人几乎可触摸到一种沉重压抑的气流，领受一种苍凉的心感。这一时期的3首词都可堪称佳作，风格各具。用字也十分讲究，富有感染力，艺术上较前几首有不小的进步。

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写下的22首诗词，是作者揭竿而起，首创红军，并展开数十载艰难卓绝的武装斗争、与国内外敌人勇猛奋战的珍贵历史记录，它以诗的形式记录下了作者从开创井冈山道路，到挥师攻克蒋家王朝盘踞地南京、夺取全国政权的光辉军事历程。且看：

发动组织湘赣农、工，领导秋收起义（《西江月·秋收起义》）——率工农革命军奔向井冈山，并以井冈山为革命根据地开创工农武装割据、实行土地革命的时代（《西江月·井冈山》）——乘新军阀蒋系同桂系混战之机，在闽西开辟了大片革命根据地（《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从闽西向赣南进军（《如梦令·元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率红军东西征战，从福建汀州进逼江西南昌，又直抵湖南长沙（《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指挥反第一次大“围剿”取得辉煌胜利，使红军军威大震（《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指挥反第二次大“围剿”再次取得巨大胜利，红军自西向东横扫七百里，使敌闻风丧胆（《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遭受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负责人排斥后，在路经曾激烈鏖兵的旧地瑞金大柏地时感慨万千，却只言关山风景（《菩萨蛮·大柏地》）——第五次反“围剿”濒临失败前夕到南方战线会昌地区视察、指导工作，透露了对战局无比忧虑的心情（《清平乐·会昌》）——在长征路经湘贵多山地带的壮美感受（《十六字令·山》）——率红军入黔北在娄山关一带征战的纪录（《忆秦娥·娄山关》）——红军万里长征接近胜利时的绝唱（《七律·长征》）——长征路上，由白雪覆盖的千里岷山而联想到莽莽昆仑山脉，进而联想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压，更觉以人民武装势力削平内外反革命武装势力而得太平世界之必要（《念奴娇·昆仑》）——率红军跨越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前的最后一座山峰六盘山时，表露出东山再起、重振雄威的心境（《清平乐·六盘山》）——对敢于担当军中重任、指挥破敌追兵的英勇善战的将军彭德怀的由衷称赞

（《六言·给彭德怀同志》）——亲率红军东征途中，为北国雪原之壮美而倾倒，由之激发萌生了对中国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帝王为江山折腰的评点，遂留下咏雪的千古绝唱（《沁园春·雪》）——对来陕北保安当红军的“文小姐”丁玲的热情赞赏（《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势如破竹的攻势占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所在地南京的胜利欢欣鼓舞，显露出一颗乘胜前进、勇追穷寇、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刚决之心（《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建国前后及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作者留下的6首诗词中，有3首

是和柳亚子的，1 首是和周世钊的。从《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诗的产生不难理解，在“南国炮声隆隆、北国硝烟犹在”的建国前夕，作者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真可谓日理万机。他刚刚指挥罢功垂史册的“三大战役”，从河北山乡西柏坡风尘仆仆地赶到京城后，读到的便是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因新政权对其生活照顾许有不周而“无车弹铗”的“感事”诗。作者即以诗作答，情真感人，道明个中缘由，使柳先生“昌言吾拜心肝赤”，“躬耕原不恋呈江”，牢骚顿消。仅此一诗，牵动众士之心，国内名流归之若水，尽为新中国新政权的诞生献计出力。《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是作者在建国后第一个国庆佳节期间的兴会之作，体现了作者一种愉悦的心境。而另一首和词除了表明同一心境外，更是充满对抗美援朝战争所取得辉煌胜利的喜悦。《七律·和周世钊同志》是作者与故人在故地重游后的佳作，这首答诗的独特之处是，所渗入的政治意识较薄，几乎沉浸在重温游年青时常游的湘江、登年青时常登的岳麓山的无限乐趣之中，真可谓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浪淘沙·北戴河》和《水调歌头·游泳》是作者尽享击水之乐时的遣兴。仿佛惟有置身三千逆水，才感到心畅意酣。他前思古人，后想来者，从诗中可品味出他的踌躇满志。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将有可能为作者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人类千年来的美好梦想奠定现实基础。故他在北戴河登碣石山追思魏武帝曹操统一北方的功业时，抒发出“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豪情。作者在中国最大的江河中游泳时，联想起几千年前站在河岸上望流兴叹的圣人孔夫子，一个壮丽的宏图更展现在他的心头。

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艺术上造诣非常之高，莫许是诗人的军旅生活更易激发诗情，抑或军事天才发挥时更易催生灵感？这些作品词章峻秀，笔力雄健，无拘无束，挥洒自如。或光昌流丽，或气象汪洋。《西江月·井冈山》令人有庄严持重、凛然不可侵犯之感，而另一首《秋收起义》则一破格律，读来别有一番风味。《采桑子·重阳》沉雄、悲壮。《如梦令·元旦》与《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则形成鲜明对照，前者宛如从军乐，后者却置人于军令如山、军情紧迫的摄人魂魄之境。读《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仿佛见到千军万马在厮杀，神话中以头触不周之山的共工式英雄形象跃然纸上。《菩萨蛮·大柏地》和《清平乐·会昌》颇有欲说还休的意味，它既含藏了对开创江西革命根据地时艰难岁月的回忆，更隐现对革命事业前景的担忧。这种回忆和担忧糅合在彩虹、阵雨，斜阳映照下的苍翠山峦里，或晓雾蒙蒙、山树森森的峻岭中。辞章豪放挺拔、壮丽华美的《十六字令·山》、《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展示了祖国山河的千姿百态。在这里，山成了力量的象征，它如巨澜卷海，或如利剑刺破青天，或阅尽人间春色，或欲与天公试比高。自然的壮美与超自然人格的壮美浑然一体，作者或爱或憎的鲜明情感亦从他对山的描写中尽露无遗。这一阶段不仅有《雪》这样的蜚誉中外、光耀环宇的词章，亦有令作者自以为惬意之极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样壮美而意境悠深的佳句。《雪》构思了一幅如此巨大崇高的画面：一仗剑驰驱的伟人丈夫，立于华夏大地，为北国冰雪世界而凝神。蜿蜒万里的长城，横贯东西的黄河，纷纷扬扬的弥天大雪，激起他无限的审美情趣。从“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八个字中，则似乎可以看到一支酣战后休息的刚毅正气之师，隐没在那落晖染峰、晚秋气寒的群山里。这画面是那样牵人心魂，不由你不问，这支远征的孤军明朝将在何方？《清平乐·六盘

山》笔调轻逸明亮，秀美之中见阳刚。《临江仙·给丁玲同志》读来琅琅上口，体现了一伟男对一才女的一种特别赞许。孤城落照，略露愁绪，令人有设身处地之感。《六言·给彭德怀同志》，寥寥数字，塑造了一位叱咤风云、横刀立马的大将军形象，比之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毫不逊色。《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通篇显示一种疾风卷云的雄猛之风。《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用词考究，用心良苦，友好中略见批评，婉约中隐露严辞。而和柳亚子的另两首《浣溪沙》则如行云流水，作者在万方同乐欢庆胜利的时刻，与友人共享良辰的悠然心境以明快的节奏表现出来。《七律·和周世钊同志》一诗则以画图般的美景，展示了作者对青年时代的珍贵回忆，风格优柔婉厚，使人百读不厌。《浪淘沙·北戴河》格调深沉，《水调歌头·游泳》则壮丽空阔。与《雪》相比，这两首词各有其艺术价值。它们的共同之处是：抚今思古，兴物言志。既发幽思，又抒豪气。

后期（1957—1973年），是作者指导全党在全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着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此期作品选集共录有18首。

在这18首诗词中，有14首与作者后期的社会实践紧密相关。余下4首中，1首是记述读史时引发的强烈感慨，另3首是感答友人或悼念亡友的真挚之作。《贺新郎·读史》是作者鉴古识今，抒发心中无限感慨时的难得珍品。《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答友人》尽寄幽思之情，并在怀旧之时热情讴歌新时代的新生活。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在凭吊战友之时表达了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从中同时透现了一种鲜明的时代色彩。

1957年夏由收到李淑一寄赠的《菩萨蛮·惊梦》而引发，为怀念亡妻杨开慧及李淑一的亡夫柳直荀而作的《蝶恋花·游仙》，1962年秋由收到故友李达、乐天宇等人寄赠的湘产礼品及诗作，再次触动对亡妻的怀念之情而作的《七律·答友人》，在艺术上颇有特色。这两篇作品均用了神话典故，意境幽远，感人至深。但行笔较为婉转，藏而不露。幽思缕缕隐匿在美好的幻景中，欲哭又止的伟人意志凝结成整个诗体。尽管其中的现实主义色调并不失平淡，但作为丈夫对爱妻的割不断的爱恋之情时时溢于诗表。也许，随着岁月无情的流逝和渐渐步入老年，作者对金色时代恩爱的夫妻生活、娇妻无比宝贵的奉献和宁死不渝的爱情愈是思念难忘，愈是在记忆中变得清晰。“骄杨”“轻飏直上重霄九”、“帝子乘风下翠微”，这些雅美而奇异的章句表达了一位英雄丈夫永难磨灭的爱心。

50年代后半期留下的另5首诗，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七律·送瘟神》是作者巧妙借用神话传说，以奇异的笔调，采用浪漫与现实相间的手法赋成的诗篇。它意在歌颂新社会制度下组织起来的人民力量强大。作者梦想中国人民能尽快摆脱“东亚病夫”的时代，早日进登美好幸福的生活之境。从小序中可以看出他赋此诗时心意酣畅：“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两首诗，则明显地烙上了作者

我们甚至不能断定《贺新郎·怅别》这首词在作者心中锤炼了多长时间和最终写成的日子乃是何日，尽管知道最早构思成词是在1923年冬。从作者那笔力遒劲、潇洒流丽的字迹看，和从词的不断改动情况看，此词最终写成可能是在60年代初。可以说，这首词如同存之于作者心核上的一尊玉雕，其雕琢过程历时半个世纪之久！伟人的情爱竟也如此令人佩感之至。

亲自倡导“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并极力捍卫这“三面红旗”的印痕。《到韶山》在回忆故乡过去年月英勇的革命斗争时，更是赞美了“换”来的“新天”。诗的最后一联“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绘绣了一片作为共产主义社会起点的人民公社的田园美景。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创举及随之而来的后果作辩护构成《登庐山》一诗的主旨，作者冷眼以待国内域外对“三面红旗”的种种非难。“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此联表露了作者深信自己所倡导的事业必将收取民效，尽管它已遭受极大挫折。在艺术上，这两首诗的手法较具特色。诗中对“人民公社”、“大跃进”的赞美不置一字，但为“三面红旗”喝彩却是诗的主题。

60年代，除《七律·答友人》和《贺新郎·读史》之外，作者所写的10首诗词几乎全都贯穿着反对“帝、修、反”特别是反对“修正主义”的背景意识。“三面红旗”的陡然受挫，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饥谨遍于国中。其时，中国的边境线上也变得不安宁起来。西边，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中印之间已起战事。东南，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则乘机叫嚣要反攻大陆，并不时派遣特务过来。北边，由于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论战及苏共对中国“三面红旗”的指责，导致两国之间关系的紧张。中苏蜜月已经过去，两国之间漫长的边界处已不复平静。厉兵秣马，以防外敌可能的入侵和颠覆，是作者当时迫切关注的一个问题。1961年初春发表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可看作是作者向外界透露的一个富有军事威慑精神的信息：中国全民皆兵，连女性也“爱武装”，女民兵也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故任何外敌胆敢来犯，必定葬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同时，该诗也是对当时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所谓“民兵只是原子弹面前的一堆肉”说的一种精神上的有力挑战。在《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一诗中，不难体会作者不畏重重险阻、执着追求至高至险的既定目标的一种崇高意境，也可领略到他那喜欢飞渡“乱云”的与众不同的性格。

60年代前期留下的这4首诗词：《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总的基调是反对“修正主义”。《和郭沫若同志》诗的特殊之处在于，作者笔下的中国马列主义者，真正的革命者，既有神话故事中孙大圣那样的大智大勇，有识别妖魔鬼怪的火眼金睛，有降服敌人的高强本领，更能团结曾对敌仁慈、犯有敌我不分错误的唐僧那样的“中间派”一道革命，以集中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且永远保持百倍警惕。——统一战线的策略在诗中得以完整地体现。《咏梅》字面上是咏颂斗雪独开、严寒不惧的梅花，实际上是倚物言志，抒发豪情《冬云》亦是作者那种顶风傲雪、独立不惧的梅花般的性格特征的展示，恶劣环境中方显英雄本色。在此诗中作者满腔英气已无法遮掩，只有连同诗句直接抒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满江红》词则充满了战略上藐视敌人的宏伟气魄，它以对比的手法衬托着描写敌我态势。一方是：碰壁的苍蝇、缘槐的蚂蚁、撼树的蚍蜉。另一方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世界革命者将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去扫除苍蝇等害人虫，他们将所向无敌。

作者在60年代前期留下的另3首诗词，即《杂言·八连颂》、《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贺新郎·读史》，可谓各具特色。《八连颂》是作者留下的唯一一首杂言诗，它用字随意，行句通俗。透过纸背，似有唐代白居易诗

之遗风，但更多地可以看到《古诗源》里收入的苏伯玉妻写的《杂言·盘中诗》的潜形。也许，这是作者想如自己所说，“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的一种尝试和创新？尽管《八连颂》当时不腔而走，广为流传，但若从艺术上进行评估，与那些艺术造诣极高的诗作如《七律·长征》、《沁园春·雪》、《水调歌头·游泳》、《七律·答友人》等这样的“阳春白雪”较之而言，它只能列入“下里巴人”了。1963年冬所作的《吊罗荣桓同志》一诗，是作者慰寄曾忠实追随自己于革命数十年的老战友的深切哀悼。

其悲切之情不能自制，但这种悲意识中更贯穿着政治忧患意识。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是作者对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是否改变颜色的一种思虑。成之于1964年春的《读史》，其首要价值在思想方面。在艺术上，它亦可列入上乘之作。这首词为人们了解作者晚年在思考些什么，了解作者的社会历史观、阶级斗争观提供了极好的材料。该词短短几行，百十余字，完整地勾勒出人类社会如何在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线索。它以精美辞章，表述了自猿进化到人以来历史上依次演进的几种社会形态，历史上各对立阶级彼此之间残酷的阶级斗争。同时，该词也表明了作者的奴隶们创造历史的观点，以及作者与历史上那些反抗压迫剥削的造反英雄们息息相通的感情。字里行间，透现了他对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高度赞扬。

作者在1965年夏秋填写的三首词值得特别的留意。从其内容看，它们是作者运筹帷幄，欲要实施一个大的政治决策的一种意志的外露。作者在年逾古稀之时，“千里来寻故地”，定当有不凡之举，或有难下之决心。回转到38年前，在井冈山，作者亲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创立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开辟了通向新中国政权的惟一可行道路。作者来寻故地，也许是要回味一下“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的难忘岁月，“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的句章，确也表白了作者期待“风雷磅礴”的“独有豪情”。从艺术角度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写得更有气势，《念奴娇·井冈山》则色逊一筹，于中个别句子，如“古代曾云海缘”等似未经细心推敲，使之白璧见瑕。

入秋写成的《念奴娇·鸟儿问答》，运用比兴手法极为有趣，用字造句也很讲究。该词的一个特点是化俗为雅，雅俗相宜。通过两只鸟儿的对话，

苏伯玉妻的原诗是：“山树多，鸟鸣悲。泉水深，鲤鱼肥。空仓雀，常苦饥。吏人妇，会夫希。出门望见白衣，谓当是而更非。还入门，心中悲。北上堂，西入阶。急机绞，杼声催。长叹息，当语谁。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还无期。结巾带，长相恩。君忘妾，未知之。妾忘君，罪当治。妾有行，宜知之。黄者金，白者王，高者山，下者谷。姓者苏，字怕玉。人才多，知谋足。家居长安身在蜀，何惜马蹄归不数。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马肥麦与粟。今时人，知四足。与其书，不能读。当从中央周四角。”作者在研读由这位不知名的民间女子所写的这首侍时，对之全部加了圈点，在苏伯玉妻旁划了红、兰两色着重线，并在天头上批注“熟读”，还推荐给别人看。

《致陈毅》，《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8页。

一般说来，人们对生活中的不雅总会有所忌讳，涉及时尽量委婉一些。例如“屁”，古人在言及它时将文饰得十分之高雅：“依稀丝竹之声，仿佛麝兰之气。”直接以“屁”入诗者恐怕有史难寻，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鸟儿问答》最后来一句“不须放屁”粗鄙无饰，连病危卧榻的周恩来在听到医护人员念至此，嘴角也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发出隐隐的笑声。但从诗人的运思行程看，至此遮遮掩掩反则失却气

把作者对蓬间雀般的“修正主义者”的极度鄙视尽展无遗，把对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好菜的无情讽刺之态和盘托出。从词中不难意味到，作者认为扰患与人生共来，人间没有仙山琼阁，惟有奋斗才有光明前景，惟有奋斗才是快乐的哲学观念是何等强烈。连天炮火，遍地弹痕，只能吓倒那些拜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胆小的蓬间雀。而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鲲鹏则要翻转整个天地。

五

毛泽东的诗词不仅是艺术的整体，也是智慧的空间。如果说，毛泽东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著作和文字，是为适应中国投身革命的干部及人民群众的口味而通俗易懂；那么，他的奇异峻秀的诗词却有些深奥洞幽，愈读愈觉玩味无穷，颇能开智明慧。这在情理之中。作为智慧的空间，一部诗词集，不仅凝结着毛泽东个人和中国革命的全部经历，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和奔腾的中国现实生活洪流，也映射了毛泽东面对严酷的现实斗争所特有的进取心态和对祖国辽阔、壮美河山的审美感受。当你此时此刻与作者彼时彼刻的审美心感真正达到某种对流时，你的精神生活就会变得充实起来。

诗词无疑是毛泽东的文学艺术造诣最高的领域。毛泽东修炼最精美、意义最浓缩、冥思最幽深、想象最丰富、境界最崇高的文字语句，几乎全都聚集在他的诗词中。又由于毛泽东赋诗填词时使用的是他种文字无法比拟其优越性的方块形汉字，这就更加有利于毛泽东的诗词艺术达到旁人难及的地位。汉字之所以比起它种文字来，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是因为它的每一个由笔划组合成的字，就相当外文，如英文中由单个字母直接组合成的一个词，它的许多词则相当英文中的一个句。显然，意蕴极为丰、博、深、广的汉字用于赋诗抒怀，有着比它种文字更优越的意义表达能力。然而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这位极善运用语言文字的大师，这位在文学艺术领域造诣极深的诗词大家，在赋诗填词时能将汉字汉语运用到神工天造的地步。只要统计一下毛泽东诗词中使用的汉字总量，你就不能不真正的信服这一点。收入选集的 50 首毛泽东诗词，总共用字仅 3240 个！——其中还包括重复使用的字数。

这个数量仅相当一篇小型文章。但这 3240 字包涵了何等丰富的内容啊！

汉语一字一节（单音节）朗读起来抑扬顿挫，动听悦耳。用汉语赋写成的古体诗词吟诵起来更是琅琅上口，如歌如诉。毛泽东诗词在以最简约的汉语文字表达最丰广的意义时，除诗词本身具有比现代白话文更简约的旧式文言文语言形式外，还在于其遣词造句又受特殊的文法规则所制约。这种特殊的规则便是古体诗同写作的规则，它比文言文更为简约洗炼，成句时往往舍弃了古代或现代常规语法条件下的一些必须成分（如主词、谓词、连词、介词等），且常常词序颠倒。旧体诗词的一般规则，使得毛泽东以极少的文字表达极多的内容成为现实的可能。故毛泽东诗词中，最短的词仅 16 字，最长的诗也只 154 字。诗绝大部分是七律，每首 64 字；词也大多是小令，58 字以内。

从艺术形式上看，毛泽东所写的全是旧体诗，不是当今流行的新诗——

白话诗。但这种旧体诗又有古体和近体之分。选集收录的毛泽东诗词中，有古体诗 3 首，近体诗 14 首，还有词 33 首。

为了便利更加全面的理解毛泽东诗词，有必要对古体诗的特点、要求，近体诗的格律，词的格律作简明扼要的说明。

古体诗古体诗主要包括唐代以前的诗歌，从《诗经》、《楚辞》，两汉乐府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的五言、七言诗都包括在内。古体诗至今犹有人赋写，主要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杂言几种形式。古体诗不像后来的格律诗要求那么严格，其特点是：每首诗句数不限，每句诗字数不限，每个字平仄不限，押韵可或平或仄，每首诗可一韵到底，也可中间换韵，不一定要用对仗，可谓相对自由。

四言四言诗是我国古代诗歌成形最早的一种诗体，公元前 6 世纪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集的主要就是这种四言体诗。四言主要以四字句或以四字句为主构成。诗体多种多样，每首包括一章或数章，每章的诗句数量多少不一，有四句、五句、六句及数十句者。四言诗用韵主要有三：每句押韵，隔句押韵，交互押韵等。

五言、七言五言、七言古体诗也是我国古代诗歌成型较早的一种诗体，汉魏时就很流行。五言一句的称五言古风，七言一句的称七言古风，简称五古、七古。五言、七言间杂也是一种形式。这些古体诗篇幅不限，短至五句一首，长至十韵、数百韵一首。五言、七言古风用韵较自由，既可押平韵，亦可押仄韵。既可一韵到底，亦可中途换韵。除不讲究平仄外，也不要求粘对和对仗。毛泽东的七言古体诗用韵较随便。

杂言杂言诗具有古风的一切特点，也是古风的一种，惟不同之处就是“杂”。它时而三言，时则五言或七言，篇章长短不一，用韵亦很自由。可一韵到底，也可随意换韵。（在对古体诗分类时，人们习惯将其归入“七言古风”一类。）毛泽东写有一首杂言诗《八连颂》，三言、七言相杂。这首杂言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像是用白话写诗，具有民歌风格，似更多地属民歌体。也许，这种特点正是古风本身的特点，因为古风首先起之于民间。

六言六言诗也是一种古体诗，但远不及五言、七言常见。如果说四言诗以《诗经》为代表，六言诗则以《楚辞》为代表。毛泽东只写过一首六言诗。

近体诗也叫今体诗，或叫格律诗，是至唐代发展成熟的一种新体诗。这种诗除长律（即每首超过八句）外，每首诗限定句数，每句诗限定字数，每个字按一定的平仄押韵，且一韵到底，可谓格律要求谨严。这种格律诗又分绝句和律诗两类。绝句每首限定四句，每句五字的叫五言绝句，简称五绝；每句七字的叫七言绝句，简称七绝。律诗每首限定八句，每句五字的叫五言律诗，简称五律；每句七字的叫七言律诗，简称七律。

在韵律方面，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的共同之处是，每首限定八句，都是逢双押韵，并限定用平声韵，且一韵到底；每一句的句式、平仄都有规定，且讲究粘、对；每首诗的中间两联须用对仗。不同之处是，五言律诗以首句不入韵为正例，以首句入韵为变例。七言律诗则以首句入韵为正例，以首句不入韵为变例。五言律诗正例者全首只求用四韵，变例则用五韵；七言律诗

我国诗学界习惯把唐代以前的诗歌称作古体，把唐代以后的称近体或今体。这是沿用唐人根据诗歌发展的时代风格和特点，从当时的角度对诗歌的分期或标界所致。但不管是唐以前的古体还是唐以后的近体，在今天统统称旧体。

的用韵数正好与之相反，正例首句起韵，全首共用五韵，变例则只须用四韵。

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的韵律要求与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的韵律要求相似。五言绝句以首句不入韵为正例，因之全首只有第二句、第四句用韵；以首句入韵为变例，这样就有三韵：首句起韵，第二、四句押韵，只有第三句不用韵。七言绝句则以首句入韵为正例，全首用三韵，首句起韵，第二、四句押韵；以首句不入韵为变例，全首用两韵。

选集收录的毛泽东的 13 首格律诗，其中七言律诗 12 首，七言绝句 1 首。这些诗基本上遵守了为诗格律。这种遵守主要在三方面：（一）律诗、绝句的句数、字数、韵脚所在和用平韵等完全依照格律。（二）遵守律诗颔联、颈联对仗的规定，——多用宽对，也用工对。（三）遵守平仄律。有时也用拗句，但非常少，如，“特拗”仅有“我欲因之梦寥廓”，“借问瘟君欲何往”；“三平调古句”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等。在毛泽东的 13 首诗中，有 7 首是一韵到底，另 6 首则押邻韵。严格遵守韵律、一韵到底的 7 首诗是：《七律·送瘟神》二首（第一首歌韵，第二首萧韵）、《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均先韵）、《七律·和周世钊同志》和《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均灰韵）、《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冬韵）。6 首用韵稍宽即押邻韵的诗是：《七律·长征》（寒删通押）、《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和《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均为江阳通押）、《七律·答友人》、《七律·冬云》（均支微通押）、《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支微齐通押）。

选集收入毛泽东填的词 33 首。这 33 首词共用了 19 个词牌，其中小令 19 首，中调 5 首，长调 9 首。（若以单、双调分类，其中单调 4 首，双调 29 首。）作者按这些词牌填词时，基本上遵守了词律。这些词牌是：

《十六字令》又名《苍梧谣》、《归字谣》。单调，十六字，四句，三平韵。作者以“山”为题用此词牌填词 3 首。第一首、第二首均用删、寒、覃韵，三韵不同部。第三首用删寒韵。

《如梦令》相传后唐时庄宗作《忆仙姿》词，其中有“如梦如梦”句，后来苏轼将《忆仙姿》词牌改为《如梦令》，遂得名。此词牌除原名《忆仙姿》外，还名《宴桃源》、《比梅》、《不见》、《古记》、《无梦令》等，单调，卅三字，七句、五仄韵，一叠韵。作者用此词牌填词一首，其中“化、下、下、画”用去声吗、卦韵，上声马韵，同部。唯“滑”为人声黠韵，不叶，然在现代汉语中，“滑”由入声转为阳平，与“化、画”同韵部。

《浣溪沙》唐教坊曲名，后借作词牌名。一说由春秋时西施浣纱的故事得名。又名《浣纱溪》、《小庭花》、《满院春》，双调，四十二字，上片三句三平韵，下片三句两平韵。作者以此词牌填词两首。第一首五韵“天、蹶、圆、阆、前”均属于声失韵；另一首“前、边、联、妍”及“元”用先、元韵，通用。

《卜算子》又名《百尺楼》、《楚天遥》、《眉峰碧》，双调，四十四字。上、下片各四句，两仄韵。作者用此词牌填词一首，四韵“到、报”和“俏、笑”用去声号、啸韵，同部。

《采桑子》唐代教坊有《采桑》、《杨下采桑》等曲，由此得名。又名《丑奴儿令》、《罗敷艳歌》、《罗敷媚》，双调，四十四字，上、下片各

清人毛先舒在《填词名解》中，认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此种分类至今一直为人们沿用。

四句，两平韵，一叠韵。作者用此词牌填词一首，以“阳、香、光、霜”为韵，均属平声阳韵。

《菩萨蛮》又名《重叠金》、《子夜歌》、《花间意》，双调，四十四字，上、下片各四句，两仄韵，两平韵。作者以此词牌填词二首，《黄鹤楼》中“国、北”用人声职韵，“苍、江”分用平声阳、江韵，通用。“去、处”的去声御韵，“滔、高”为平声豪韵。《大柏地》中“紫”用上声纸韵，“舞”为上声虞韵，不叶，“阳、苍”皆平声阳韵。“急、壁”为人声缉。锡韵。“山、看”为平声删、寒韵，同部。

《减字木兰花》唐代教坊曲调有《木兰花》词牌，五十六字，后经调整韵脚，减去一些字数，便叫《减字木兰花》，又名《减兰》、《木兰香》、《天下乐令》，双调，四十四字。上、下片各四句，两仄韵，两平韵。作者用此词牌填词《广昌路上》一首，其中“白、迫”用人声陌韵，“山、关”则为平声删韵；“去、处”用去声御韵，“颁、安”则分别为平声删、寒韵，二韵通用。

《忆秦娥》相传唐代李白作《忆秦娥》词，中有“秦娥梦断秦楼月”句，由此得名。又名《双荷叶》、《秦楼月》、《蓬莱阁》、《碧云深》、《花深深》等，双调，四十六字。上、下片各五句，三仄韵，一叠韵。作者用此词牌填词一首，《娄山关》六韵中，“烈、咽、铁、务”用人声屑韵，“月、越”则属月韵，同部。

《清平乐》又名《清平乐令》、《忆萝月》、《醉东风》，双调，四十六字。上、下片各四句，四仄韵，三平韵。作者用此词牌填词三首。《蒋桂战争》中，上片“怨”用去声愿韵，“变、战、现”皆霰韵，同部。下片“江”为江韵，“杭、忙”为阳韵，亦同部。《会昌》中上片“晓”用上声彼韵，“早、老、好”为皓韵，同部。下片“峰”为冬韵，“葱”为东韵，亦同部。唯“俱”为青韵。不同部。《六盘山》上片中的“雁、汉、万”分别用去声谏韵、翰韵和愿韵，同部。唯“淡”用去声勘韵。下片中的“峰、龙”均属冬韵，“龙”属东韵，同部。

《西江月》又名《白苹香》、《步虚词》、《江月令》，双调，五十字，上、下片各四句，两平韵，结句各叶一仄韵。作者以此词牌填词二首。《秋收起义》六韵中“头、留、分、愁”用平声尤韵，但“进”和“动”分属为震韵和董韵，均为尤韵不同部。《井冈山》中的“闻、重、隆、城”分用平声文、冬、东韵和庚韵，均不同部。“动”和“遁”则分属仄声董、阮韵，亦不同部。作者是用湖南方音来押韵的。

《浪淘沙》唐诗人刘禹锡、白居易诗中有“春风吹浪正淘沙”、“请君莫忘浪淘沙”句，后演变为《浪淘沙》词牌。又名《浪淘沙令》、《曲入冥》、《卖花声》、《过龙门》、《炼丹砂》，双调，五十四字。上、下片各五句，四平韵。作者用此词牌填词一首。《北戴河》八韵中，“燕、天、船、边、年、鞭、篇”均用先韵，仅“间”为删韵，同部。

《临江仙》又名《画屏春》、《谢新恩》、《雁后归》、《庭院深深》、《鸳鸯梦》，双调，六十字。上、下片各五句，三平韵。作者用此词牌填词一首，《给丁玲同志》六韵中，“地、兵”为庚韵，“新、人”为真韵，“年”为文韵（与真韵同部），“东”为东韵，均不同部。

《蝶恋花》本名《鹊踏枝》，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宋人改为《蝶恋花》。又名《黄金缕》、《卷珠帘》、《凤栖梧》、《一梦金》、《江如

练》等，双调，六十字。上、下片各五句，四仄韵。作者用此词牌填词二首。《从汀州向长沙》八韵中“恶、缚、略、跃、鄂、落”均用入声药韵，“角”用觉韵，通用。唯“曲”为沃韵，不同部。《答李淑一》中“柳、九、有、酒”均用上声有韵，“袖”用去声看韵，同部。但“舞、虎、雨”均为上声虞韵，不同部。此词作者曾自注云：“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渔家傲》宋人晏殊有“神仙一曲渔家做”诗句，由此得名。双调，六十二字。上、下片各五句，五仄韵。作者用此词牌填同二首。《反第一次大“围剿”》十韵中，“漫、汉、唤、半、干、乱”均用去声翰韵，“瓚”和“万”分属旱和愿韵，均同部。唯“赣”、“暗”分属去声送、勘韵，与前不同部。《反第二次大“围剿”》中，“立、急、入、泣”均用人声辑韵，“力、逼”为职韵，“日”为质韵，“碧、席”为陌韵，均同部。

《满江红》原唐代教坊曲名，后用作词牌名。又名《上江虹》、《念良游》等，双调，九十五字。上片八句，四仄韵；下片十句，五仄韵。作者用此词牌填词一首，《和郭沫若同志》九韵，其中“壁、鏖、激、敌”用人声锡韵，“泣、急”用缉韵，“易、迫、夕”用陌韵，均同部。

《水调歌头》据《隋唐佳话》，隋炀帝开凿汴河时，曾制《水调歌》。唐人演为大曲，曲有散序、中序、入破三部分，歌头是截取《水调歌》中序的开头一段，另创新声。据此，遂成词牌《水调歌头》。又名《元会曲》、《凯歌》、《台城游》、《江南好》等，双调，九十五字。上片九句，四平韵；下片十句，四平韵。作者用此词牌填词二首。《游泳》八韵中“鱼、舒、馥”等平声鱼韵，余下为虞韵，同部。《重上井冈山》八韵中“端、看”为寒韵，其余六韵均用删韵，同部。

《念奴娇》念奴为唐代天宝年间的著名歌女《念奴娇》词牌即由引得名。又名《百字令》、《百字谣》、《酹江月》、《赤壁谣》、《大江东去》、《壶中天漫》、《湘月》等，双调，一百字。上、下片各十句，四仄韵。作者用此词牌填词三首。《昆仑》八韵中六韵“彻、罄、说、雪、截、热”用人声屑韵，唯“色、国”两韵用职韵，不同部。《鸟儿问答》八韵中“角”用入声觉韵，“廓、雀、跃、阁、约”五韵用药韵，二韵同部。唯“肉、覆”二韵用屋韵，不同部。《井冈山》八韵中“岳”为觉韵，“阁、跃、昨、礴、落”五韵用药韵；另有“绿、覆”两韵分用沃、屋韵，与前不同部。

《沁园春》沁园本为东汉明帝之女沁水公主的庄园，章帝建初二年被窦宪仗势夺走。后人咏其事，并因之以为词牌名。又名《东仙》、《寿星明》、《洞庭春色》、《念离群》等，双调，一百一十四字。上片十三句，四平韵；下片十二句，五平韵。作者用此词牌填词二首。《长沙》九韵均属平声尤韵，首句亦入韵。《雪》九韵中有“滔、骚、高”为平声豪韵，其余皆属平声萧韵，二韵同部。

《贺新郎》又名《贺新凉》、《金缕歌》、《金缕曲》、《金缕词》、《乳燕飞》、《风敲竹》、《貂裘换酒》，双调，一百一十六字。上、下片各十句，六仄韵。作者以此词牌填词二首。《怅别》十二韵中有“否、缕、字”三韵为上声虞韵，“语、汝、许、旅”四韵为上声语韵，“去、翥”两韵为去声御韵，“诉、住、路”三韵为去声遇韵，四韵同部。《读史》中“别、节、热、血、雪”五韵为人声屑韵，“月、锁”为人声月韵，“物”为人声物韵，此三韵同部。另一韵“迹、客、白”为入声陌韵，“得”为人声职韵，与前不同部。

选集收入的 50 首诗词中，有 7 首属作者的和诗和词。和诗和词一般都应依照别人诗词中用过的韵来作诗填词。依照别人诗词中用过的韵作诗填词，使叫和韵。这种和韵，有次韵、用韵、依韵几类。

次韵又叫步韵，是和韵中要求最严格的广种，它须要依次用别人诗词中的原韵、原字。用韵不如步韵那么严格，它只要求用别人原诗词的韵字，但不必按照原用韵字的次序。依韵则只须依照别人原诗词所用韵的同一韵部的字，不一定使用原韵的字。

作者的几首和诗词中，有两首词属次韵。这两首词即 1950 年 10 月、11 月分别填写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作者步韵唱和时，守律严格。另外 4 首唱和诗词则有些特别，即它们既非步韵、用韵，亦非依韵，而是作音自己另行起韵。这也大概表明作者在精神生活领域中的从心所欲吧。这 4 首诗词是：《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七律·和周世钊同志》、《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作者用江、阳韵，柳亚子的原诗却是寒韵。《和周世钊同志》一诗，作者用灰韵，周世钊的原作却是用的麻韵。《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诗作者用的亦是灰韵，而郭诗的是用萧、肴、豪韵。《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作者用锡、缉、阳韵，郭沫若原词为职、陌等韵，部韵大多不合。

六

要真正读懂毛泽东诗词，就要对它加以完整的把握。重视对毛泽东诗词作系统研究，在这种系统研究的前提下再对毛泽东的单篇诗、词作个别研究。只有从整体上了解毛泽东诗词产生的历史过程、时代背景、气势和风格，才有利于个别地把握各首诗或词。而对毛泽东的每首诗或词的把握实质是一种意境领会。这种意境领会，不再是字面的解释，也不是一般的玩味文字的赏析、鉴赏之类，而是从字面进入到诗境，从阅读到理解，是一种超出原文文字之外的意会，亦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解释毛泽东诗词。这种意境体会综合了历史学、语言文字学、文化学、文艺学、心理学、解释学及哲学的成分，偏重人文学科角度以力求在新的层次上以新的视角理解和解释毛泽东诗词。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作品作解释，尤其是对毛泽东这位伟人的作品作解释，不能不是一件难事。根本的问题是，一个人真的能够解释另一个的作品么？特别是当解释者与被解释作品的作者之间存有代沟，即当每一人类个体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社会阅历，在不同的教养中形成不同的知识结构、价值标准，具有不同的心理经验、文化素养，不同的性格、敦品、气质、情操及人生追求时，这种解释是可能的么？能不发生误解么？这里确有困难，也会发生误解，但正是力求在对困难的克服、对误解的纠正过程中走向愈来愈正确的理解之路的。

尽管困难重重，但正确的解释之路也许可以摸索到。这就要求解释者自己首先真正进入阅读和理解的角色。在正确地解释一部作品之前，先去正确地阅读和理解它。则这种阅读和理解是一个双向的、二合为一的过程，即它同时也是作品获得读者的过程。这样，解释者便先变成了读者。作为读者，当我只有丧失自我时才能发现自我，阅读和理解把自我引入一个异在的理解性和想象性的变化之中。这种理解，要求读者比作者自己更好地理解作者，理解者力图与作者的内部生活相一致，把自己与作者相类比，重新造出产生

作品的那个创造性过程。换言之，理解就是遵循作品为之打开的思维之路，使理解者置身于这条路上。或者说，理解就是理解者自己的把自身放置在由作品所支持的那种意欲语境的关系中。于是，全部困难及误解由此生出。因为语言文字——毛泽东诗词作为一种语言文字形式——是精神和思想的物质载体和外壳，它成为语言文字之后，它固化之后，不复是那活泼泼的精神和思绪了，它所表达的亦不再与作者的意图尽相一致了。语言文字不过是人类精神、思想、意图的外化，是一种“外部记号”。法国著名思想家、解释学家保罗·利科尔（Paul Ricoeur）曾对书面语的弱点有过很好的说明。他在《解释学与人文科学》一书中论及此的时候，曾引用古埃及国王梯贝斯的话说：书写是一副假药，因为它用物质保存方法代替真实的回忆，用表面知识代替真正的智慧。这位古埃及国王的话极为深刻。一方面，文字语言的自然本性，使作品难于完整表达作者的心理经验。另一方面，一个词，一首诗或词的隐喻意义和潜在的东西在词典上又绝对找不到。一个词的意义不仅仅依赖支配词的字面用法的语义学规则和语法规则，也依赖于支配整体语境的其它规则。由于自身的特性或局限性使然，语言、文字往往处在一种可表达和不可表达的边缘，对之的理解和解释类似于处在这个边缘地带，这个前沿阵地。正是以书面语、文字出现的作品与阅读、理解之间存有间距，困难便由此而来。尤其当理解者用文字语言去解释作品——另一种文字语言之时，这种困难就会更加增大。

为着要理解，首先便需要阅读。但这种阅读本身又是一种理解式的阅读，因为阅读者本人有理解能力。这种理解力是与阅读、理解者后来形成的知识结构和生活经历切实地联系着的。每一个阅读、理解者都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作品，以自己的既有知识之尺去衡量作品，以已成之见——这种成见不是贬义的偏见——去对待作品。这其中必定含有某种半先验的和超前理解的东西。因之，只要去阅读、理解作品并对之作出解释，就会有误解。即是说，人们对作品的理解本身包含着一定的误解，把自己的误解结合到理解中去。

理解作品的过程中，当然可以暴露出阅读、理解者自身，暴露出阅读者、理解者的理解力，理解的意向、成见及偏见。但是，理解决不只是映射理解者自我。也许，更重要的，是理解者以作品为中介来理解自己。作品使读者和理解者在其中获得了理解他自身和他阅读作品的方式。这样，问题的另一极是，理解就是读者在作品面前理解自我。它不是把读者有限的理解力加之作品，把自我映射到作品中去，而是从作品那里得到一个放大的自我，从对作为解释之真实对象的意欲语境的理解中接受一种放大的自我。读者通过作品本身获得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因之，正如有一千名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有一千名读者或解释者，就有一千种阅读、解释方式，一千种对毛泽东诗词的注读和解释。每一名读者以自己的方式在作者和它的语境范围内尽量扩展属于自己理解的境界。

从文化经济学角度看，毛泽东诗词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读者对之阅读、欣赏也就是进行消费。尽管这种消费并不会使原产品丧失什么信息，但读者及解释者在对之进行消费时，吸取了其中的精神营养。作品优美的辞章，开阔的视野，深邃的思想，崇高的境界，宝贵的经验，哺育了阅读者，它使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思绪变得丰富、活跃起来，性情得到陶冶，仿佛人格也随

着这种伟大作品的塑造变得高大起来。在这里，是读者理解作者作品还是作者作品影响了读者，是读者、解释者阅读、注释作品还是作品哺育了读者、解释者，其界限变得模糊。浑沌起来。作为一个真正的读者，你的精神会在一种崇高的审美境界中不断升华，似乎由此进入一个已放弃自我的非我的境界，但也许，这个非我正是一个放大的自我，一个吸取了丰富精神养分的自我。

从全息的角度看，人类与动物、大自然及宇宙之间确有许多相通之处。如同风号长谷、雷鸣大空、惊涛拍岸、雪崩山陵一样，如同飞禽走兽唧唧、咕咕、长鸣、悲嚎、怒吼、狂啸一样，如同宇宙本身存在发光、发热。发声现象一样，人类确也会借助自身进化而获得的发声器以发出声音来表现自己：号子、吆喝、呼叫、吟啸、呢呢、喃喃、高歌、呐喊。自从大自然赋予人类以高度发展的文化，文化了的人类的声音活动更具有别出一格的特色。它不仅有顿挫抑扬的节奏、有优雅浑厚的旋律，不仅能够模仿大自然、再现大自然，更能够尽情抒发人类自身的感情和兴致，表现人类自身的喜怒哀乐，显示人类自身的力量。尤其是科学或政治文化凝结于中，愈使人类的声音活动显得高深莫测。有时铿锵悦耳，万物陶醉；有时厉如霹雳，鬼神饮位。在这种声音活动中，一种最典型、最高雅的方式便是赋诗吟诗、诗歌活动。理解、解释人类这种活动看似容易，其实颇难。尤其当这种诗歌活动最后演变为仅仅写而不吟、赋而不歌，只是抽象化的赤裸裸的书面语、纸上文字之时，这种理解和解释就会变得百倍地艰难起来。不过，迎难而上，回答困难的挑战也许同样是人类的一种本性。古人对天下事的难与易有很好的辩证看法：天下享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不为，则易者亦难。这种重行重实践的传统思想与诗人毛泽东写出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样的乐观豁达之句不能说没有联系。正是本着“肯登攀”精神，我才不揣浅陋把本书奉献给读者。我不知道目前人们对毛泽东诗词的注读和研究已达到何种水平，但我相信诗人毛泽东那奇伟的诗篇定会吸引无数的热心读者，他那颗独一无二的心灵太阳定会照耀需要光照的世界，他那崇高的形象将铭刻在世代人的记忆之碑上。对于这位诗人，人们已经用笔在这样写：

你用平平仄仄的枪声
写诗
二万五千里是最长的一行
常子马背构思
便具有了战略家的目光
战地黄花如血残阳
成了最美的意象
有时潇洒地抽烟
抬头望断南飞雁
宽阔的脑际却有大江流淌
雪天更善畅想
神思飞扬起来
飘成梅花漫天的北国风光
相信你是最严肃的诗人
屈指数算

一首气势磅礴的诗
调动了半个世界的酝酿轻易不朗诵
天安门城楼上只那一句
便站成了世界的诗眼
嘹亮了东方！

早在 60 年代，国内即有人以如此壮丽典雅的一阕《水调歌头》来赞颂毛泽东其人其诗。伟人巨章，尽在词中展出。其词曰：

掌上千秋史，
胸中百万兵，
眼底六洲风雨
笔下有雷声。
唤醒蛰龙飞起，
扫灭魔炎魁火，
挥剑斩长鲸。
春满人世间，
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
写鏖战，
记长征。
天章云锦，
织出革命之豪情。
细检诗坛李杜，
词苑苏辛佳什，
未有此奇雄。
携卷登山唱，
流韵壮东风。 —

